

ISSN 2223-7461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第九卷第一期 2015 年 1 月

◎ 研究論文

「總統國會解散權」之比較研究：以法國第五共和與我國現行憲法為例/邱瑞朝

主體的召喚：意識形態與教育/王振輝

太陽花小學弱勢學童補救方案/呂金靜、呂朝賢

從漢譯偈頌探勘佛教的美學意蘊：以本緣部佛傳為考察中心/王晴慧

社會工作的職場靈性/張英陣

十二年國教及少子女化下一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與私校經營之研究/吳俊憲、吳錦惠、蔡幸芬

App 市場的時間維度分析：一個系統理論觀點/鄭志文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出版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 發行人 唐傳義（靜宜大學校長）
- 總編輯 林克敬（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 執行編輯 郭俊巖（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 編輯助理 賴秦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候選人）
- 編輯委員 王香蘋（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 王德睦（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 王迺宇（靜宜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 林海清（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兼任教授）
- 郭俊巖（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彭瑞金（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
- 出版者 靜宜大學
- 地址 (43301)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 電話 04-26328001 # 17001~17002
- E-mail pu20600@pu.edu.tw
- 網址 <http://www.huso.pu.edu.tw/puchess/index.htm>

本期售價：新台幣 600 元；美金 20 元整。

ISSN 2223-7461

目 錄

研究論文

「總統國會解散權」之比較研究：以法國第五共和與我國現行憲法為例	
/邱瑞朝.....	1
主體的召喚：意識形態與教育	
/王振輝.....	41
太陽花小學弱勢學童補救方案	
/呂金靜、呂朝賢.....	65
從漢譯偈頌探勘佛教的美學意蘊：以本緣部佛傳為考察中心	
/王晴慧.....	103
社會工作的職場靈性	
/張英陣.....	159
十二年國教及少子女化下一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與私校經營之研究	
/吳俊憲、吳錦惠、蔡幸芬.....	187
App 市場的時間維度分析：一個系統理論觀點	
/鄭志文.....	223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9 No. 1 January 2015

◎ **Research Articl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ench Republic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 President's power to dissolve the parliament " in the Constitution/
Ruei-Chau Chiou

The Interpellation of Subject: Ideology and Education/Chen-Hui Wang

Remedial Programs for disadvantaged pupils: Case of Sunflower
Elementary School/Chin-Ching Leu, Chao-Hsien Leu

A Research to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Chinese-translated Gatha—BEN-YUAN- BU Chinese-translated Buddha Biography as study center/
Chin-Hui Wang

Spirituality at Workplace of Social Work/Ying-Chen Chang

The Research of Why Parents Prefer Enrolling Their Children into
Private High Schools/Chun-Hsien Wu, Chin-Hui Wu, Hsing-Fen Tsai

An analysis on the time-dimension of the APP market: From a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Chih-Wen Cheng

研究論文

「總統國會解散權」之比較研究：以法國第五共和與我國現行憲法為例^{*}

邱瑞朝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法律組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4 年 6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9 月 25 日。

^{*}作者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指正，使本文內容得以更臻完善。

通訊地址：桃園縣蘆竹鄉山鼻村南路 3 段 63 號。E-mail：AK0390@ms.ntpc.gov.tw

中文摘要

2013 年我國憲政史上首次發生涉及總統（最高行政權）與國會議長（最高立法權）對立的馬王政爭，並因此產生了許多憲政議題。回顧我國過往憲政發展史，馬王政爭並非行政權與立法權對立之首例，在陳水扁總統任內 8 年，行政權與立法權對立的政治僵局從未停歇，連帶使我國國家整體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不禁令人省思，要靠何人或是何種制度來調和解決？其他國家又如何解決類似這種的憲政僵局？有無可供我們參考精進的規範，本文有鑒於此，參酌法國第五共和運作實例，具體提出解決方案。

關鍵詞：馬王政爭、第五共和、國會解散權、憲法、政治僵局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ench Republic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 President's power to dissolve the parliament " in the Constitution.

Ruei-Chau Chiou

Doctoral studen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Abstract

2013 occur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involving constitutional president (chief right) and Speaker of the House (the highest legislative) opposition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thus produced many constitutional issues. Recalling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st,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s not the first confrontation of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legislative power, in any of the eight years of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the executive power and legislative opposition political deadlock never stop, so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joint severely hampered . Can not help but reflect on, rely on who or what kind of system to reconcile solve? Other countries like this and how to resolve the constitutional impasse? Have sophisticated specification for our reference herein such, deliberate operation of the Fifth Republic in France instance, propose specific solutions.

Keywords: Ma Wang political struggle, French 5th Republic, The power to dissolve the parliament, Constitution, Political deadlock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3 年 9 月 6 日，一場由檢察總長黃世銘所召開，指控立法院長王金平、法務部長曾勇夫、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與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涉嫌司法關說之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以下簡稱「特偵組」）記者會，為我國憲政史上的馬王政爭（亦稱為「九月政爭」或「馬王之爭」）拉開了序幕。隨後同年 9 月 9 日，總統馬英九、副總統吳敦義與行政院長江宜樺於總統府召開，譴責立法院長王金平涉嫌司法關說之記者會，更一舉將政爭位階拉高到總統與國會議長的對立¹。

這場以司法為舞臺，涉及國家行政與立法最高權力的馬王政爭，讓法務部長下台、檢察總長遭判刑²、國會議長遭到其所屬政黨開除黨籍，並面臨國會議員身分不保的困境，更讓總統的民意支持度，一度只剩下百分之九³。馬王政爭最後演變成總統（最高行政權）與國會議長（最高立法權）的對立，並因此產生了許多憲政議題⁴。

¹ 參照維基百科，《9 月政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6%9C%88%E6%94%BF%E7%88%AD#cite_note-.E3.80.8C.E5.8F.B0.E7.81.A3.E6.B3.95.E6.B2.BB.E6.9C.80.E6.81.A5.E8.BE.B1.E4.B8.80.E5.A4.A9.E3.80.8D_.E9.A6.AC.E6.96.A5.E7.8E.8B.E5.B0.B1.E6.98.AF.E9.97.9C.E8.AA.AA-8 >

² 參照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囑易字第 1 號刑事判決意旨，檢察總長黃世銘，因職務持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而無故洩漏、交付，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伍月，；又公務員因職務持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之資料，而無故洩漏，處有期徒刑陸月，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為「壹年貳月」。

³ 年代新聞，2013 年 9 月 15 日，「九趴總統!立委：威信全失，民嗆下台」。<<http://era.news.eracom.com.tw/files/news/xml/era/n16411.xml>>

⁴ 馬王政爭所引發的憲政上議題不勝枚舉，包括行政權與立法權溝通的管道，因此受

人類社會從遠古發展而來，經歷文明及社會演進，最終形成國家機制，其目的乃在於藉由國家的力量，來維繫人類社會各項制度之運作，並因此衍生各項規範。而渠等規範中位階最高，也是受政治力影響最深的即為「憲法」⁵。憲法一詞，在英文與法文為Constitution，德文為Verfassung，而該字之原意為「構造」或「體制」之意義，爰此，西方國家對於憲法的定義，皆為規範政府的體制與權力，及人民的權利與義務之最高法則⁶。

所謂的「國會解散權」，係源自於內閣制之制度。在內閣制的國家，當國家憲法與政治上（以下簡稱「憲政」）的行政權與立法權，如面臨對立的政治僵局時，最常使用的解決方式，就是由立法權對行政權行使倒閣權通過不信任案，或是由行政權對立法權行使「國會解散權」，以求透過國會改選的票決，直接訴諸民意以解決憲政僵局⁷。此種相較於總統制的國家，因行政權與立法權雙方，皆受任期制的保障，除非其中一方妥協或退讓，否則沒有解決憲政僵局的方法⁸，而陷入長期政治對立的窘境，實有較能靈活反應即時民意之優點。

惟雖然大多數的政治學者都肯定內閣制中，行政權所擁有的國會解散權，具有化解政治僵局的效用，甚至在實施「半總統制」的國家中，也在憲法中賦予總統可以行使國會解散權⁹。但是，實務上卻少有總理或是總統主動行使國會解散權來化解政治僵局的案例，大多是在立法權對其提出不信任案後的反

到嚴重阻礙、政策無法推動，如何化解。又身為不分區政黨代表的國會議長，失去所屬政黨黨籍之後，還是國會議長嗎？如果不是，那麼一個不是議長身分的人，其所主持的國會，所通過或審議的決議或法規，其效力為何？國會自治與政黨對於所屬黨員的管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互動，其核心界線又何在。參同註 6，惟因與本文題旨無關，不另贅述。

⁵ 許育典，《憲法》（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頁 18-20。

⁶ 吳進安、吳威志、詹炳耀、王服清，《憲法釋論》（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頁 3-4。

⁷ 同註 1，頁 355

⁸ 彭錦鵬，〈總統制是可取的制度嗎？〉，《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2001 年 6 月，頁 75-106

⁹ 法國 1958 年第五共和憲法條文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共和國總統於諮詢總理及國會兩院議長後，得宣告解散國民議會」，即賦予法國總統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

制，方被動予以行使。這種情況，是憲政制度上的問題，還是政治局勢的通盤考量，亦或是國會解散權本身權力上的根本問題，又我國目前憲法上的規範，是否有所缺漏或需要精進之處，殊值探究。本文以為，國會解散權在制度本質設計上沒有問題，但容易受限於政治局勢之現實考量，尤其我國現行憲法增修條文上的設計，更是無法執行，空留具文，根本無力化解憲政僵局，實有從根本上予以全盤修訂之必要。

回顧我國過往憲政發展史，馬王政爭並非行政權與立法權對立之首例，在陳水扁總統任內 8 年，行政權與立法權對立的政治僵局從未停歇，連帶使我國國家整體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不禁令人省思，要靠何人或是何種制度來調和解決？其他國家又如何解決類似這種的憲政僵局？有無可供我們參考精進的規範。

在這種憲政僵局激化社會嚴重對立、國會議長本身權力來源亦有所疑慮的情形下，解散國會重新改選，以訴諸社會最新民意之票決來化解，似為可行之道。然雖我國在 1997 年，進行憲法增修條文的第 4 次修正（史稱「九七憲改」），已將總統與國會權限予以重大翻修。按照目前國內較多數學者的見解，我國的憲政體制自該次的憲法增修後，已由憲法本文的內閣制精神轉為類似法國的「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¹⁰。當時我國在總統職權的設計上，參考部分法國總統職權，而僅賦予總統被動的解散國會權¹¹，在國會亦即立法院未主動出擊之前，總統並無主動解散國會之權力。

這樣的設計，終使我國總統的「國會解散權」一直只是見諸於文字，而未有實際操作之案例，其原因究竟為何？有無應與時俱進修正調整的需要？我國

¹⁰ 呂炳寬、徐正戎，《半總統制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7

¹¹ 詳參 1997 年我國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5 項主文：「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可知，我國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的唯一機會只有在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才有行使的可能與權力。

實施半總統制時猶尚短，或為其原因，然法國實施歷久，有實際案例可供觀摩，因此，如果要參考其他先進國家，對於類似我國此種憲政僵局的解決及因應之道，最適合的方式，還是應該先從與我國憲政體制相類似，而且已有長久運作實務經驗的先進民主國家，亦即「法國」著手。

揆諸我國與法國的憲政發展歷史，同樣歷經多次政爭，同樣有類似的左右對立或藍綠對立之政治情勢，雖處於地球之兩端，卻有不謀而合的相同機運。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能終結法國自 1789 年以來紊亂的政治情勢，從 1958 年制定之後，為法國帶來了相對安定的政治局勢，而我國自 1997 年憲政改革後，也終結了解嚴後紊亂的政治局勢，迄今亦已有 15 年之安定，凡此種種，應非巧合。

職是之故，為能借鏡他山之石，以為砥礪，遂以法國第五共和與我國現行憲法上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的相關規定為比較研究之對象，希望可以探求歷史背景、制度原意以及解決之道。

二、研究方法與綱要

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¹²為「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所謂的文獻分析法，又稱文獻歸納法，係指廣泛的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後，加以分類、分析及整理。最後加以解釋、歸納及批評。所謂的歷史研究法，則係指從研究資料或素材的歷史時空環境因素，予以探求真正契合的本意。兩者研究方法，恰可彼此呼應社會科學的本質，使本文不單純只從文獻資料表面解釋研究社會科學現象，而能真正追求內在本旨。

又本文以為，任何的結構或事件，都是不同時空環境因素下結合的結果，亦是各種關係折衝、對立及平衡下的產物。要了解政策或是法令制定當時的歷

¹² 林文程演講、趙文瑾整理，〈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第 5 期，2005 年 11 月，頁 23 至 27。

史時空背景，才能真正掌握文獻的價值。因此，本文採取歷史研究法，是以敘述方法對某一過去事件作詳細的描述。著重於個案時間序列的敘述，藉由歷史、人物及制度來著手，重視由人事時地物，來找到之前相互的關連性，以解釋事件的本末。

總統國會解散權，一言以蔽之，就是總統擁有解散國會使其改選的權力。本文為比較法國與我國總統在國會解散權上權限之異同及其適用，乃以法國與我國的憲法相比較。又本文並非專文研討法制史，兼以考量兩國的憲法均有多次修正，因此，對於過往的法條規範，除有必要引用之價值外，原則上將以現行有效的憲法條文為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社會科學之研究，鎖定總統國會解散權此單一議題。又按國會解散權本為內閣制之產物，然本文既以法國與我國總統權限為比較，自當恪遵由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的面相，不予討論內閣制由總理行使國會解散權的情況。

本文內容分為兩章來探討，第一，將先就法國與我國現行憲法上總統國會解散權的規範、內容以及歷史背景予以論述，力求探知立憲者的原意。第二，將就總統國會解散權的實踐情況予以討論，並分為「法國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是否能適時化解政治僵局」以及「中華民國九七憲改後，面臨的政治僵局」兩節予以論述。最後，在結論中具體表達本文的建議，建議參考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規範，修改我國憲法，賦予總統主動解散國會之權力，以化解憲政僵局。

貳、總統國會解散權的內容

一、法國 1958 年第五共和憲法規範及其歷史背景

無論是實施總統制、內閣制亦或是半總統制的國家，「總統」都是國家元首，為國家象徵，差別僅在於其所擁有的權力之內容而已。作為國家元首，其

所擁有的權力，主要可以國家元首以及行政首長兩個角色來區分，在國家元首的角色及高度上，其所擁有的權力諸如公布法令權、赦免權、授予榮典權以及院際調解權。而在行政首長的角色及高度上，其所擁有的權力則為統帥權、締約宣戰媾和權、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官員認免權、覆議核可權、解散國會權、國家緊急應變權以及國家機密特權等¹³。

實施內閣制的國家，係將國家元首及行政首長兩個角色分隸，由總統或君王等虛位元首行使國家元首權，而由首相或總理等內閣閣揆行使行政首長權。而在實施總統制或是半總統制國家中，原則上，國家元首及行政首長兩個角色及權力都是由總統所行使，僅於半總統制國家，例外於朝小野大的情形下，因為國會多數為反對黨議員，總統基於政治情勢而任命反對黨組閣時，由反對黨出任內閣總理，並由總理行使行政首長權，形成權力分隸。

所謂的國會解散權，如前所述，係行政權與立法權面對政治僵局的解決方式，其目的在於透過國會改選的票決，直接訴諸民意解決憲政僵局¹⁴。法國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政局動盪不安，除歷經多次憲法制修訂外，迄今也有多達14次國會被解散的案例¹⁵，其中有9次是在第五共和憲法實施之前¹⁶，在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第三共和之前，解散國會的權力係由「君王」行使，在這段時間沒有所謂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制衡的問題，完全是「君王」恣意用以

¹³ 同註1，頁350-359。

¹⁴ 同註1，頁355。

¹⁵ 徐正戎，《法國總統權限之研究》（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頁105。

¹⁶ 這9次分別是波旁王朝5次、第二共和2次、第三及第四共和各1次，茲臚列如下：

- 1815年7月8日路易十八時期。
- 1816年9月5日路易十八時期。
- 1827年11月5日查理十世時期。
- 1830年5月16日查理十世時期。
- 1830年7月25日因「光榮的三日戰爭」而解散。
- 1848年6月26日因「六月內戰」而解散。
- 1851年12月2日被路易拿破崙解散。
- 1877年6月25日Mac-Mahon總統任內。
- 1955年12月2日Coty總統任內。以上詳參同註14，頁105-106。

箝制民意機關的緊箍咒，以查理十世在 1830 年 5 月 16 日及 1830 年 7 月 25 日，短短一個多月內，兩次國會解散為例。即使第 1 次解散國會後的改選，仍舊是由反對黨取得大多數的民意，但是查理十世仍然再次恣意解散國會，最終導致「光榮三日戰爭」，又第二共和中，路易拿破崙解散國會也是因為國會反對其稱帝之路¹⁷。凡此總總，均可看到當時法國的國家元首挾國會解散權，以威嚇國會之情形。

到了第三及第四共和，總統的國會解散權終於開始有解決憲政僵局的功用，以第三共和為例，1877 年 6 月 25 日，當時的法國總統Mac-Mahon因為國會反對其總理任命案，而予以解散國會訴諸民意票決。選舉結果，反對黨獲得勝利，總統Mac-Mahon接受人民的選舉結果，這是法國憲政史上，第 1 次由人民決定，當行政權與立法權發生僵局時的解決方式¹⁸。第四共和的憲法，因為係基於對第三共和的反思、對於行政權濫權的憂慮以及議會內閣制精神下的產物。因此在第四共和憲法第 51 條中，增加了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的三個限制及先決條件，包括須先獲得國民議會議長的同意、必須是該屆國民議會議員的任期已經經過一年半以及在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的前一年半內，必須曾經出現兩次倒閣危機¹⁹。

正是因為這樣明顯不利於行政權行使國會解散權的設計，導致第四共和「小黨林立、議會獨大、政爭頻繁」的現象，從 1946 年到 1958 年，在短短的 12 年內，法國第四共和竟然產生了多達 17 位的總理，先後組成多達 24 屆的內閣²⁰，其中最長的內閣只有 1 年多，最短的內閣有 2 個竟然只持續了兩天²¹，立法權即國會對行政權行使倒閣的次數頻繁，但是相對的行政權對於立法權卻

¹⁷ 同註 14，頁 106-109。

¹⁸ 同註 14，頁 111。

¹⁹ 同註 14，頁 113。

²⁰ 李曉兵，《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與憲法委員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年），頁 17-18。

²¹ 何勤華，《法國法律發達史》（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44。

僅有 1 次解散國會的案例，使得行政與立法兩權制衡的機制嚴重失衡，更使得國家政府威信喪失，整體發展受到限制及阻礙。

1958 年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終結了第四共和，也為第五共和拉開了序幕。當時面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反抗軍的獨立革命，以及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陸軍領導人的軍事叛變，在國家面臨危機的窘境下，整體法國人民產生思維，認為法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及政府。因此，在取得法國國會的全權授權下，戴高樂於 1958 年 6 月 1 日接管政府組閣²²。在戴高樂的領導與監督下，開始了新憲法的起草，於 1958 年 9 月 28 日由公民投票方式，以百分之六十六點四的贊成票，通過了憲法草案，並於 1958 年 10 月 5 日公布施行，正式開創了法國第五共和²³。

依據法國 1958 年第五共和憲法第 12 條第 1 項²⁴規定，共和國總統於諮詢總理及國會兩院議長後，得宣告解散國會。正式賦予總統有解散國會的權力，與一般內閣制不同，法國國會對於總統並無相對抗衡的權力，依據第五共和憲法第 50 條²⁵規定，國民議會通過不信任案時，總理應向共和國總統提出政府

²² 參照維基百科，《法蘭西第五共和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F%8A%E5%88%A9%E4%BA%9A%E7%8B%AC%E7%AB%8B%E6%88%98%E4%BA%89> >

²³ 同註 20，頁 146-147。

²⁴ Article 12 -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eut, après consultation du Premier ministre et des Présidents des assemblées, prononcer la dissolu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Les élections générales ont lieu vingt jours au moins et quarante jours au plus après la dissolution. L'Assemblée nationale se réunit de plein droit le deuxième jeudi qui suit son élection. Si cette réunion a lieu en dehors de la période prévue pour la session ordinaire, une session est ouverte de droit pour une durée de quinze jours. Il ne peut être procédé à une nouvelle dissolution dans l'année qui suit ces élections.

第十二條 共和國總統於諮詢總理及國會兩院議長後，得宣告解散國民議會。國民議會議員的改選應於解散後二十日至四十日內舉行之。國民議會在選舉後第二個星期四自行集會。自動集會日期如在國會正常會期外舉行之時間，則此會期訂為十五日。國民議會在經解散而改選後之一年內，不得再予解散。以上詳參同註 14，頁 103-104。

²⁵ Article 50- Lorsque l'Assemblée nationale adopte une motion de censure ou lorsqu'elle désapprouve le programme ou une déclaration de politique générale du Gouvernement, le Premier ministre doit remettre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a démission

總辭。換言之，法國國會可以提出不信任案的對象是內閣總理，而非總統。而內閣總理也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甚至連請求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都沒有。雖然依據第五共和憲法第 68 條²⁶，定有彈劾總統的程序，但是國會僅能對總統於執行職務有叛國行為時方得為之，需要經過嚴格的程序要求，方能成案。且縱使彈劾案成立，也須由最高彈劾法院審判之。這種看似完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一方面是行政權在經歷過第四共和那段紊亂政爭後的反撲，一方面也許可以從第五共和的制憲環境與背景來討論。

政治受之以「力」，如果要找一部最具政治性的法律，那非憲法莫屬。國家在誕生之初，創建這個國家的人，依照當時的環境背景以及其政治實力，可以決定國家制度，是帝制或共和、是民主或專制，以及行政機關的組織等等國家事務。換言之，政治即眾人之事的遊戲規則由其建立，後續繼位的總統或是領導人只能在其框架下行使權力或是酌予修正而不能動其根本。如果用老師上

du Gouvernement.

第五十條 國民議會通過不信任案，或對政府所提之施政計劃，或一般政策不予同意時，總理 應向共和國總統提出政府總辭。以上詳參同註 14，頁 347。

²⁶ Article 68 -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ne peut être destitué qu' en cas de manquement à ses devoirs manifestement incompatible avec l' exercice de son mandat. La destitution est prononcée par le Parlement constitué en Haute Cour. La proposition de réunion de la Haute Cour adoptée par une des assemblées du Parlement est aussitôt transmise à l' autre qui se prononce dans les quinze jours. La Haute Cour est présidée par le Président de l' Assemblée nationale. Elle statue dans un délai d' un mois, à bulletins secrets, sur la destitution. Sa décision est d' effet immédiat. Les décisions prises en application du présent article le sont à la majorité des deux tiers des membres composant l' assemblée concernée ou la Haute Cour. Toute délégation de vote est interdite. Seuls sont recensés les votes favorables à la proposition de réunion de la Haute Cour ou à la destitution. Une loi organique fixe les conditions d' application du présent article.

第六十八條 共和國總統僅對其執行職務中之叛國行為負有刑責。對總統之彈劾，須經國會兩院對同一罪名，採用公開投票之方式，並獲兩院議員總額之絕對多數贊成，始能成立；總統由最高彈劾法院審判之。政府閣員執行職務，若其行為當時被認定具有犯罪或違警之情事，需負刑責。如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行為，政府閣員及其共犯依上述之訴訟程序處理。在本款所述情形下，彈劾司法法院應依據犯罪或違警定義及罪刑之確定，以及犯罪時之現行刑法有關條文處理之。

課所舉過的案例來說，政治人物是建築師，設計並建造了國家這棟房屋，後面的人只能修修補補，不能動其根本。如果不服，只能尋革命或是相類似手段，尋求制憲的方式為之，這也正是憲律與憲章差別之所在。

戴高樂²⁷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反抗軍「自由法國」的領導人，是法國的二戰英雄。1958 年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及軍事政變，當時的法國歷經第四共和長達 12 年的政爭後，實已國力衰敗，動盪不安。當時整體的法國社會其實是期盼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帶領法國走出困境，重振法蘭西的光榮。在這種思維下，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法，其本質上就是刻意的設計成「行政權大、立法權小」，甚至可以說是行政權獨大，論者有謂第五共和憲法，就像是為戴高樂量身訂做的一襲新衣²⁸。這種兼具總統制與內閣制精神的憲政體制，遂然誕生，學者稱為「半總統制」²⁹或「雙首長制」。

論者或有謂，既然戴高樂主張擴充總統的權力，並相對抑制國會權力。法國為何不直接改成總統制，而要採取所謂半總統制，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中擺盪，適時修正彼此的權限。其係主要考量於第五共和誕生時的環境。當時法國的民意，基於傳統的憲政制度，對於總統制仍有所顧慮，而且法國當時政黨林立，對於贏者全拿的總統制，多認為不能全面有效反映，及容納所有的政治勢力，反而容易造成紛爭。此外，戴高樂早期對於總統角色的定位，是扮演超然立場，維持國家利益的仲裁者角色，所以戴高樂僅希望能修正內閣制的制度，並擴充總統權力即可³⁰，因此催生以半總統制為憲政體制的第五共和。

²⁷ 參照中文百科在線，《夏爾·戴高樂》，< <http://www.zwbk.org/MyLemmasShow.aspx?zh=zh-tw&lid=127354> >

²⁸ 劉鐵軍，〈法國憲法修正案與權力制衡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2007 年 7 月，頁 71-76。

²⁹ 1980 年，法國政治學者杜偉傑（Maurice Duverger）在《歐洲政治研究》期刊論文中，首次以英文發表「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 system）（Duverger, 1980: 87-135）。「半總統制」意指總統經由公民直選產生，國會亦由公民直選產生。總統與總理（國會多數黨領袖），兩位行政首長共同治理國家（雙首長制）。詳參同註 27，頁 77，註 9。

³⁰ 呂炳寬，《我國與法國憲政體制之比較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

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範及歷史背景

在中國古代，並無憲法一詞，雖有學者從古籍中，找到憲法的名詞³¹，但其實並不具備現代憲法的意涵。憲法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其實是於自於日文，清末立憲主義自日本將憲法一詞帶進了中國³²。中國的憲政發展史歷盡滄桑，從 1911 年武昌起義建國後，包括北洋政府及國民政府的各項憲法草案，總共歷經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天壇憲草」、「中華民國約法（袁記約法）」、「訓政時期約法」、「安福憲法（民八憲法）」、「曹錕憲法」、「民國 14 年憲法草案」、「五五憲草」、「憲政期成會憲法草案」、「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中華民國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 1991 年開始的七次憲法增修條文³³。這樣紊亂的憲政發展歷史，其實正恰是充分反映了憲法的高度政治特性，以及各項政治權利之間的衝擊與制衡³⁴。

1789 年 7 月 14 日，法國爆發了大革命，並在同年 8 月 26 日由當時的國民制憲議會發布「人權宣言」³⁵。之後的法國，頒布多達 15 部的憲法，較有名的有「1791 年憲法」、「第一共和憲法（雅各賓憲法）」、「共和三年憲法」、「拿破崙及波旁王朝多次修憲」、「1946 年第四共和憲法」、「1958 年第五共和憲法」

論文，2004），頁 219-221。

³¹ 尚書中有「臨於先王成憲，其永無衍」，後來晉書中有「稽古憲章，大釐制度」，唐書中有「永華憲則，始範後昆」，韓非子非命上篇中有「先王之國，所以出國布施百姓者，憲也」，國語中有「賞善罰姦，國之憲法」，管子中有「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也」。參吳進安、吳威志、詹炳耀、王服清著，《憲法釋論》（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頁 3。

³² 劉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頁 7。

³³ 維基百科，2014/4/14，〈中華民國憲法〉，<<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86%B2%E6%B3%95>>。

³⁴ 同註 1，頁 19。

³⁵ 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法語：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簡稱《人權宣言》，1789 年 8 月 26 日頒布）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頒布的綱領性文件，也是法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

及實施以來的多次修正³⁶。此種與中國同樣誕生於革命之後、同樣穿插於共和與專制交替之間且同樣紊亂的憲政發展史，恰有不謀而合之處。

我國憲政史上，第一部正式憲法，是在二次戰後，1946年12月25日由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458人於南京議決通過，1947年1月1日由國民政府公布、1947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當時的憲法係源於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於1946年1月10日邀請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及民社黨等各黨派代表，以及社會賢達等38人，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擬出「修憲十二原則」或稱為「政協十二原則」，凝聚了當時國內各方政治勢力的意見，並成為後來憲法的主要內容³⁷。

換言之，這部憲法其實是多方政治勢力角力下的結果，特別是當時係基於對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權力的制衡，所以在內容上刻意限制了總統權限，而採取內閣制的精神。而國民黨為使各方政治勢力能和諧融洽，雖不滿意亦勉為接受該內容，並據以制定憲法。該憲法內容除前言外，全文共175條、計分14章，體係規範完整，堪稱當時先進立法。然行憲之始，即為國共內戰之興，當時國民政府，為使行政權有臨機應變之權力，遂於1948年5月10日制定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下簡稱戡亂條款）」，解除憲法對於總統職權的限制，並凍結了憲法的適用³⁸，所謂的行憲竟然不到5月，我國再次進入沒有憲法的時代。

1987年，當時的總統蔣經國，依據戡亂條款之規定，宣布終結動員戡亂時期，並廢止戡亂條款，恢復原有憲法的適用。然而解嚴之初，當時我國對內面臨統獨意識形態紛爭，對外則有中國大陸文攻武嚇的威脅，以及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大陸在即的國際情勢，國內政局紊亂，憲政體制面臨危機，加上國家尚

³⁶ 有學者統計，法國自1791年以來，正式頒布的成文憲法，不包含拿破崙及其後波旁王朝多次修憲，就高達15部之多。詳參同註20，頁91-95。

³⁷ 李惠宗，《憲法要義》（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頁42-45。

³⁸ 同註36，頁45-48。

未統一。為因應現實的需要，故於 1991 年由總統李登輝開始修憲，凍結部分憲法條文，將修憲增修條文以修正案方式列於憲法之後，而非在原有憲法條文處改動，並在增修序言內聲明係「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以作為增修條文實施時效，此種修憲方法是仿照美國憲法修正案的方式為之³⁹，其目的在於不更動憲法主文內容，只是用增修條文替代。日後如有需要，只要廢除增修條文，即可恢復原有憲法主文之規範。

從 1991 年到 2004 年，我國共計經歷了多達 7 次的憲法增修。其中 1997 年在多方政治勢力折衷妥協下，我國進行第 4 次的憲法增修條文制定，史稱「九七憲改」。依學者通說，我國的憲政體制自該次增修後，已由憲法本文的內閣制精神轉為類似法國的「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⁴⁰。伴隨者法國第五共和憲法之憲政精神的導入，當時參酌法國憲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在該次增修條文的第 2 條第 5 項主文，增賦予總統被動解散立法院的權限⁴¹，正式為我國導入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的概念與制度。

依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5 項之規定：「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但總統於戒嚴或緊急命令生效期間，不得解散立法院。」所謂不信任案，又稱倒閣案或是不信任投票案（vote of no confidence）⁴²，其性質是一種議會議案，原則上係由反對黨所提出，其目的在於希望執政內閣下臺，如果不信任案通過，則內閣只有在辭職或解散議會並進行大選兩者間作出選擇。

換言之，我國總統在國會解散權這個總統權限的行使層面，係屬被動權

³⁹ 呂炳寬，《中華民國憲法精義》（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頁 46

⁴⁰ 同註 9，頁 7

⁴¹ 1997 年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二項主文：「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⁴² 參照臺灣大百科全書，《不信任投票 Vote of No Confidence》，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330>>。議會內閣制源於英國，早在 1742 年輝格黨的華爾波耳（Robert Walpole）首相即因黨內分裂，致使一個重要議案未獲議會通過，故憤而辭職。此舉遂奠定了內閣須對議會負責的憲政慣例。

限，只有在國會即立法院，先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而且通過的情形下，總統才能選擇解散國會。也就是說，如果我國的總統想要藉由解散國會來達到其化解行政、立法對立的政治僵局，必須借力使力，利用反對黨提出不信任案並使其通過，才能有機會解散國會。如果反對黨堅持不提出不信任案，雖法理上，並不禁止執政黨的國會議員發動，甚至是執政黨本身發動不信任案，但是執政黨自己對自己提不信任案，其目的又是為了解散國會，不僅於政治法理有悖，而且會產生嚴重的政治誠信問題，影響人民觀感。

參、總統國會解散權之實踐

一、法國總統國會解散權之行使

法國第四共和期間，由於前述第四共和憲法本身的門檻限制，使得總統沒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限，僅有一次解散國會的案例。到了第五共和成立後，依據第五共和憲法第 12 條的規範，總統要行使解散國會的權力時，僅需踐行「事前諮詢」總理及國會兩院議長的程序即可。且該諮詢程序僅係禮貌性諮詢，並不需要得到總理及國會兩院議長的實際承諾或同意，亦即第五共和的總統，擁有主動而且絕對的權力，可以解散國會，第五共和時期總統解散國會的「自主決定權」實不可謂之不大⁴³。

法國第五共和期間，共出現 5 次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的案例，窺窺其當時的政治環境背景，可以分析如下：

⁴³ 「簡言之，就總統解散國民議會的權限而言，倘若總統並非憲法的代理總統，國家也沒有處於憲法第 16 條的特殊情況下，那麼在理論上，總統可以在任何時期，無須任何理由，逕行宣告解散國民議會。**第五共和時期總統解散國民議會的自主決定權實不可謂之不大**」。詳參同註 14，頁 71

（一）1962 年 10 月 9 日戴高樂總統期間

戴高樂於 1958 年因逢阿爾及利亞的問題，得以脫穎而出，掌握歷史契機催生第五共和，並當選第一屆總統。但是，隨者阿爾及利亞問題的解決，國會的勢力開始醞釀反撲，戴高樂則提出總統直選憲法修正案，企圖藉由全民直選的方式，來獲得並強化其行政權的正當性⁴⁴。在行政權與立法權，雙方政治勢力的角力僵局之下，國會（國民議會）在 1962 年 10 月 4 日通過對內閣的不信任案，而戴高樂則隨即解散國會進行改選，並同步將總統直選的憲法修正案付諸公民投票，以訴求人民票決來解決憲政僵局。

訴求人民票決的選舉結果，戴高樂在國會改選以及公民投票中，都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在 1962 年解散國會後的改選，戴高樂派由改選前的 216 席（40%），大舉展獲增加至 229 席（49.3%）。公民投票也通過憲法修正案，修正憲法第 6 條，將總統改為直接民選⁴⁵，戴高樂更在 1965 年的首次總統直選中，以 54.5% 的得票率勝出，成為法國第五共和第一位民選總統。在戴高樂執政時期，挾高度的民意支持，加上掌握國會的多數。戴高樂時期的總理，只是其總統政策的執行者，半總統制成為超級總統制⁴⁶。

爰此，我們可以說，第五共和期間，總統國會解散權的第一次行使，雖然是出自於國會主動發動不信任案的被動反制，但其實仍是行政權主動化解憲政僵局的作為，訴諸民意的結果，也確實有效化解了當時法國的政治局勢，戴高樂適時掌握民意的結果，更開創以總統為權力中心的運作制度。

（二）1968 年 5 月 30 日戴高樂總統期間

⁴⁴ 同註 20，頁 154。

⁴⁵ Article 6 -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st élu pour cinq ans au suffrage universel direct. Nul ne peut exercer plus de deux mandats consécutifs. Les modalités d'application du présent article sont fixées par une loi organique.

第六條 總統由全民直接投票選舉之，任期七年。本條款之施行方式由組織法明定之。

⁴⁶ 同註 29，頁 159-162。

1968 年 5 月，在美國 60 年代學生運動，與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法國左派勢力興起，掀起了嚴重的工運與學潮，多達千萬人的學生與工人進行罷課與罷工。面對社會動盪不安，戴高樂掌握法國人民希望安定、厭棄動亂的契機，在 1968 年 5 月 30 日解散國會、進行改選。戴高樂派由改選前的 233 席（49.6%），更是一舉壓倒性的增加至 349 席（74.3%）⁴⁷。

雖然這次壓倒性的勝利，使得戴高樂誤判情勢，於 1969 年強推有爭議性的憲法第 11 條修正案，而於遭到公民投票否決後，辭職下台。但是就 1968 年，當時解散國會、進行改選的舉措而言，實在是總統掌握民意，主動行使國會解散權，以求改選來取得國會穩定多數的最佳案例。而相同的情形也發生在英國首相柴契爾任內，柴契爾擅長於運用政治優勢來推動行政改革，其於英阿戰爭（即福克蘭群島戰役，1981 年至 1982 年）獲勝後，隨即請求英國國王解散國會，並重新改選，結果在擊敗工黨取得國會多數席次後，立即於 1982 年推動其「財務管理方案」⁴⁸。

（三）1981 年 5 月 22 日密特朗總統期間

第五共和的法國國會採取兩院制，上院為參議院，現有議員為 319 名，由間接選舉產生，任期為 9 年，每 3 年改選三分之一。而下院為國民議會，現有議員為 577 人，由直接選舉產生，任期為 5 年⁴⁹。一般而言，雖然在第五共和的憲法上，兩院似乎不分先後，但因為其憲法第 39 條⁵⁰規定，財政法草案則

⁴⁷ 同註 29，頁 161-164。

⁴⁸ 參照劉坤億，《英國柴契爾政府改革背景與理念的探索（四）》，〈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1648,&job_id=68496&article_category_id=1634&article_id=32074〉

⁴⁹ 同註 20，頁 149。

⁵⁰ Article 39 - L'initiative des lois appartient concurremment au Premier ministre et aux membres du Parlement. Les projets de loi sont délibérés en Conseil des ministres après avis du Conseil d'État et déposés sur le bureau de l'une des deux assemblées. Les projets de loi de finances et de loi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sont soumis en premier lieu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Sans préjudice du premier alinéa de l'article 44, les projets de loi

須先送國民議會審議，使國民議會因掌握財政法案的審議權限，而成為實質的國會。

依據第五共和憲法第 12 條規定，總統有解散國會的權力，其解散對象也是國民議會。而第五共和也確實於 1962、1968 年發生總統解散並改選國民議會 2 次，加上總統任期為 7 年，與國民議會任期為 5 年，二者並不一致。所以，國會與總統皆非同時改選。兼以總統受任期保障，只要其任期未屆至，雖然在位期間，其所屬政黨無法掌握國會多數席次，但是只要服膺憲法上的半總統制精神，任命國會多數黨組閣，仍然可以「左右共治」的方式，來推動國政。在法國第五共和中，就發生過三次的左右共治，分別是 1986 至 1988 年、1993 至 1995 年及 1997 至 2002 年⁵¹。

1981 年 5 月 10 日左派社會黨的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為了不願與 1978 年改選，以右派政黨為多數黨的舊國會共同治理國事，不願意進行左右共治，而選擇於 1981 年 5 月 22 日就任當日，立刻解散國會進行改選。社會黨並以完全執政、進行社會改革的理念，訴諸於法國人民，因而獲得多數人民支持，社會黨的席次從改選之前的 112 席(23.62%)，一舉躍進當選了 282 席(59.49%)，成為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的真正執政黨⁵²。

(四) 1988 年 5 月 14 日密特朗總統期間

第五共和的第四次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而解散國會，發生在 1988 年，與

ayant pour principal objet l'organis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et les projets de loi relatifs aux instances représentatives des Français établis hors de France sont soumis en premier lieu au Sénat.

第三十九條 總理及國會兩院議員均有提出法律案之權。政府所提法律草案經諮詢中央行政法院意見，由部長會議議決後，送交國會兩院任何一院之秘書處。財政法草案則須先送國民議會審議。有關社會保險收支草案亦同。

⁵¹ 張世瑩，《法國第五共和三次「左右共治」的法理與實際》，〈<http://blog.yam.com/teacherchang/article/12767339>〉

⁵² 同註 29，頁 171-172。

前一次國會被解散的背景情形與理由雷同，密特朗於當選總統後，為了終結法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左右共治（1986 至 1988 年），再次解散國會，訴諸民意支持，這次社會黨雖然不像上次獲得的勝選結果，沒有獲得過半席次，但是也從原先的 212 席（36.74%），成長到 276 席（47.83%），而且在獲得共產黨的支持下，也足以組閣成立聯合政府，結束左右共治時期，並結束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屬不同政黨的憲政僵局⁵³。

（五）1997 年 4 月 21 日席哈克總統期間

1993 年當時左派所組成的社會黨內閣，因受困於政治醜聞與貪污事件，導致形象重挫，失去法國人民的支持。當年度的國民議會改選，同屬右派的 RPR 戴高樂派獲得 242 席（41.94%），UDF 法國民主同盟獲得 207 席（35.88%），兩黨合計席捲 449 席（77.82%）。可以說是右派的空前重大勝利，並開啟了法國第五共和史上的第二次左右共治（1993 年至 1995 年）。此次國會改選結果，並間接影響 1995 年法國的總統大選，使席哈克以 52.6% 得票率當選總統⁵⁴。

1997 年 4 月 21 日，當時的法國總統席哈克，為確保右派能繼續掌控國民議會，擔憂如果按照原定時間改選，右派可能會失去其國會超級多數黨的地位，遂行使國會解散權，解散國會提前一年進行改選，詎料此舉並未獲得法國人民的認同。改選結果，左派政黨獲得 319 席（55.29%），而席哈克所屬的右派政黨，國會席次則從選前的 449 席（77.82%），縮減至 242 席（41.94%）。社會黨搖身一變，由反對黨成為國會執政黨，因此開啟了第三次長達五年（1997 年至 2002 年），也是法國第五共和史上最長的左右共治時期⁵⁵。

（六）評析

⁵³ 同註 14，頁 126。

⁵⁴ 同註 29，頁 183-185。

⁵⁵ 同註 14，頁 126。

綜合前述可知，在法國第五共和期間，總統共計行使 5 次的國會解散權，除了第 1 次是因為國會對內閣先提出不信任案，行政權才對立法權進行反制外，其餘 4 次都是總統，也就是行政權主動對立法權提出。**而前 4 次也確實有效化解了當時的行政與立法權對立的憲政僵局。**

至於最近 1 次，也就是第 5 次之所以失敗，一般以為⁵⁶，其原因在於該次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既非解決憲政僵局或衝突，也不是為了避免左右共治的政治考量。完全是席哈克充滿個人政治權謀的國會席次考量，而非為國家憲政體制著想，嚴重背離人民情感，自然反應在選舉結果之上。綜整而言，法國第五共和期間總統所屬政黨或派別，因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而解散國會，再予以改選後新國會席次變化如表一。

表一：法國第五共和期間總統所屬政黨或派別，解散後國會席次變化

選舉日期	原先席次	改選後席次
1962.10.09	216 席（40.00%）	229 席（49.30%）
1968.05.30	233 席（49.60%）	349 席（74.30%）
1981.05.22	112 席（23.62%）	282 席（59.49%）
1988.05.14	212 席（36.74%）	276 席（47.83%）
1997.04.21	449 席（77.82%）	242 席（41.9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中華民國九七憲改後的政治僵局

我國在九七憲改之後，先歷經李登輝總統任期（1997 年至 2000 年）。在這段期間，因為總統與國會均由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所掌握。恰如

⁵⁶ 同註 14，頁 126-127。

前述，此時的總統是超級總統制，行政院長實質上已成為幕僚長或是執行長的角色。基本上，沒有行政權與立法權對立的憲政僵局問題。

2000 年，我國舉行第 10 屆總統大選，陳水扁掌握國民黨分裂契機，以 39.3% 的得票率當選，我國發生第一次政黨輪替⁵⁷。陳水扁總統上任之初，我國國會即立法院的政治生態為 1998 年所選舉的第 4 屆立法委員，在 225 席中，國民黨佔有 123 席（54.67%），而民進黨僅佔有 70 席（31.11%）⁵⁸。

如果按照我國憲政體制採取法國半總統制的精神，以及法國第五共和自 1958 年以來的實踐經驗，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應該任命國會多數黨領袖為行政院長，由其負責組閣，開啟我國第 1 次「左右共治（其實是藍綠共治）」的新時代，方能穩定政治局勢，持續推動國家發展。但是，歷史之所以為歷史，正是因為我們在當下不可預見未來，而在時空經過後，卻又只能回首唏噓，無力改變歷史的結局。

2000 年 5 月 20 日，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第 10 屆總統後，為安撫軍方派系以及國民黨立委，選擇任命具國民黨籍背景，且曾任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及國防部長的唐飛為行政院長，由其組閣，並延攬多位非民進黨籍人士出任閣員，號稱全民內閣⁵⁹。雖然唐飛具有國民黨籍身分，但是並非國會多數黨的領袖或是由國會多數黨所推薦，唐飛所組之內閣也非國會所同意，就其意義來說，根本不是法國左右共治的情形。果不其然，唐飛內閣在面對來自總統府的意見衝突，與國會生態的內外夾攻狀況下，只短暫的維持了 140 天而已（2000 年 5 月 20 日至 2000 年 10 月 5 日）。

隨後在陳水扁第 1 任總統任期內，先後任命張俊雄（第一次，2000 年 10

⁵⁷ 參照維基百科，《陳水扁》，<<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9%B3%E6%B0%B4%E6%89%81>>

⁵⁸ 參照歷屆公職選舉年度及類別一覽表，2014/4/14，<<http://vote.nccu.edu.tw/cec/cehead.asp>>

⁵⁹ 參照維基百科，《唐飛內閣》，<<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9%A3%9B%E5%85%A7%E9%96%A3>>

月 6 日至 2002 年 1 月 31 日)以及游錫堃(2002 年 2 月 1 日至 2005 年 1 月 24 日)組閣,雖有期間有少數非民進黨籍的閣員(例如 2001 年 3 月 7 日,當時的新黨立委郝龍斌,便受邀出任張俊雄內閣的環保署長)⁶⁰,但探究其性質,其實都是民進黨內閣。

在陳水扁第 1 任的總統任期內,我國國會歷經第 5 屆立法委員改選。2001 年 12 月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在主要政黨中,屬泛藍陣營的國民黨獲得 68 席、親民黨獲得 46 席,合計獲得 114 席(50.67%),屬泛綠陣營的民進黨獲得 87 席、臺灣團結聯盟獲得 13 席,合計獲得 100 席(44.44%)⁶¹。雖然民進黨躍身為國會第一大黨,但是仍未過半,加上民間湧起新國會新內閣的聲浪,張俊雄遂以功成身退以及新國會組成為由率領內閣總辭。當時陳水扁總統如果服膺半總統制的精神,尊重人民的選擇,實在應該選擇任命泛藍陣營的人為行政院長。但是結果仍舊是由同屬民進黨的游錫堃出任閣揆。

2004 年 5 月,陳水扁總統競選連任,本來是化解我國行政權與立法權分隸、憲政僵局困境的一個機會。詎料,選舉結果,陳水扁以 6,471,970 票(50.11%)對連戰的 6,442,452 票(49.89%),即些微驚險的差距連任成功。在陳水扁第 2 任總統任期內,我國國會歷經第 6 屆立法委員改選。在 2004 年 12 月的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在主要政黨中,屬泛藍陣營的國民黨獲得 79 席、親民黨獲得 34 席,合計獲得 113 席(50.22%),屬泛綠陣營的民進黨獲得 89 席、臺灣團結聯盟獲得 12 席,合計獲得 101 席(44.89%)⁶²,選舉結果與上屆相當,仍舊是行政權與立法權分隸於不同陣營的對立局面。

⁶⁰ 參照維基百科,《第一次張俊雄內閣》,<<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5%BC%B5%E4%BF%8A%E9%9B%84%E5%85%A7%E9%96%A3>>

⁶¹ 參照維基百科,《2001 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1%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9%81%B8%E8%88%89>>

⁶² 參照維基百科,《2004 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9%81%B8%E8%88%89>>

九七憲改之後，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已不必經立法院同意。而行政院長是否仍須於立法委員改選時率內閣總辭，即成為一個憲政問題。就此，在 1998 年的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61 號解釋理由書中提及：「依憲法第 53 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並規定，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是憲法雖迭經增修，其本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並無變更；而憲法所設計之權力分立、平等相維之原則復仍維持不變」。

又在 2001 年的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20 號解釋理由書中亦指出：「憲法第 57 條即屬行政與立法兩權相互制衡之設計，其中同條第 2 款關於重要政策，立法院決議變更及行政院移請覆議之規定，雖經 86 年 7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刪除，並於該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增設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投票制度，但該第 57 條之其他制衡規定基本上仍保留於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至有關立法院職權之憲法第 63 條規定則未更動」。

從上述憲法解釋可知，大法官認為「行政院必須向立法院負責」的基本立場，在九七憲改後並未改變。因此，大法官似尚未變更「立法院改選後行政院應總辭」之見解⁶³。但是，在 2004 年的國會選舉結束後，民進黨的游錫堃內閣雖然總辭，但是並不是為了服膺憲政慣例對國會負責，而是因為自認選舉結果不如預期，為負起所政治責任而予以總辭。自此，國會改選與內閣總辭正式脫鉤。陳水扁總統隨後任命的謝長廷內閣（2005 年 1 月 25 日至 2006 年 1 月 24 日）、蘇貞昌內閣（2006 年 1 月 25 日至 2007 年 5 月 21 日）以及張俊雄第二次內閣（2007 年 5 月 22 日至 2008 年 5 月 19 日）都與國會改選無關。

2008 年 1 月 12 日的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在當時主要政黨中，國民黨（含國民黨、親民黨及新黨，而以國民黨名義登記聯合參選）以壓倒性的勝利，獲得 81 席（71.68%），屬泛綠陣營的民進黨獲得 27 席、臺灣團結聯盟獲得 3 席，

⁶³ 呂啟元，2002/1/24，〈內閣應否於立法委員就職時改組〉，《國政分析-憲政(析)091-006 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1/CL-B-091-006.htm>〉

合計僅剩 30 席（26.55%）⁶⁴。在選舉結果出來後，當時的行政院長張俊雄為了遵循憲政慣例，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向總統陳水扁提出內閣總辭，而陳水扁於同年 1 月 29 日，以「維持政局安定，避免新總統上任後重新組閣，所可能產生於 4 個月之內大幅更動內閣兩次」為理由，退回總辭案⁶⁵。更足見，在陳水扁擔任總統的 8 年任內，國會的改選與結果，與總統任命行政院長是完全脫鉤的。

2008 年同年先後舉行的國會改選，與第 12 屆總統選舉，都是由國民黨獲得絕大多數的選票支持，國民黨在國會席次上獲得獲得 81 席（71.68%），在總統選票上獲得 7,659,014 票（58.45%）⁶⁶。行政權與立法權同步歸屬於同一政黨，馬英九成為半總統制下的超級總統。這個結果也終結我國長達 8 年的憲政僵局。

參考法國的第五共和發展歷史，似乎與 1993 年當時左派形象重挫，右派的兩黨合計席捲 449 席（77.82%）的空前重大勝利，以及 1995 年法國的總統大選，席哈克以 52.6%得票率當選總統⁶⁷的結果，恰有不謀而合之處。比較我國的 2008 年與法國的 1993 年，都是建立在執政黨本身發生醜聞，而反對黨同時襲捲國會與總統的勝利，也同時終結了左右共治或對立的局面。綜整而言，陳水扁總統任內 8 年，所任命之行政院長與立法院國會席次變化之互動如表二，可見端倪。

⁶⁴ 參照維基百科，《2008 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9%81%B8%E8%88%89>〉

⁶⁵ 參照維基百科，《第二次張俊雄內閣》，〈<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5%BC%B5%E4%BF%8A%E9%9B%84%E5%85%A7%E9%96%A3>〉

⁶⁶ 參照維基百科，《2008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E9%81%B8%E8%88%89>〉

⁶⁷ 同註 29，頁 183-185。

表二：陳水扁總統任內 8 年，所任命之行政院長與立法院國會席次變化

屆別	國民黨 (泛藍)	民進黨 (泛綠)	行政院 長	任期
1998 年 第 4 屆	123 席 (54.67%)	70 席 (31.11%)	唐飛(個人組 閣)	2000.5.20-2000. 10.5
2001 年 第 5 屆	114 席 (50.67%)	100 席 (44.44%)	張俊雄(民進 黨)	2000.10.6-2002. 1.31
			游錫堃(民進 黨)	2002.2.1-2005.1. 24
2004 年 第 6 屆	113 席 (50.22%)	101 席 (44.89%)	謝長廷(民進 黨)	2005.1.25-2006. 1.24
			蘇貞昌(民 進黨)	2006.1.25-2007. 5.21
2008 年 第 7 屆	81 席 (71.68%)	30 席 (26.55%)	張俊雄(民 進黨)	2007.5.22-2008. 5.1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肆、綜合分析

在我國長達 8 年(2000 年至 2008 年)的憲政僵局中，對於總統無視國會多數黨為反對黨，而恣意任命行政院長的情況下，國會不斷謀思反撲之道，從 2000 年 10 月 29 日因核四停建風暴而提案(未成案)罷免總統開始，先後於 2006 年 6 月 27 日因臺開弊案風暴而提案(提議成案，未通過)罷免總統，於 2006 年 8 月 2 日因國務機要廢而提案(未成案)彈劾總統。並杯葛多項法律案、預算案與人事案，包括於 2007 年延宕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達半年以上、2000

年至 2008 年凍結中央政府總預算超過 8000 億，於 2004 年底杯葛監察院長提名案，使監察院空轉長達 3 年多（2004 年至 2008 年）⁶⁸。

檢視國會這些杯葛手段所需之門檻如表三，其中門檻最低的屬法律案及預算案，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 章對於議案審議之規定，法律案及預算案，只要出席委員過半數，表決通過即可。再來是人事案，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9 條之規定，立法院對審計長、大法官含司法院正副院長、考試委員含考試院正副院長及監察委員含監察院正副院長行使同意權時，需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的同意。最高的門檻是彈劾案及罷免案，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9 項以及第 4 條第 6 項的規定，須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本文研究至此，不禁產生質疑，既然國會把所有能對付行政權的武器都搬出來了，為何獨漏「倒閣案」，亦即前述的不信任案。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 10 日內提出辭職。換言之，不信任案的門檻只要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對照前述，在陳水扁擔任總統的 8 年期間，國會中泛藍勢力重未低於 50%，而事實上，國會也確實多次成功杯葛，門檻相同的人事案。為何國會要捨較容易的不信任案而不用，而要走困難的彈劾或是罷免總統案，殊值研究。

⁶⁸ 參見自由電子報，2008/5/19，《扁政府八年回顧》，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may/19/today-art1.htm>>

表三：國會提出提案或各項杯葛，所需要之門檻

名稱	門檻
法律案、預算案	大會出席二分之一
人事任命案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不信任案（倒閣案）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總統彈劾案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總統罷免案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陳水扁 8 年總統任內，先後任命民進黨組成 5 屆內閣，屬於少數政府，泛藍勢力雖然不滿，但始終未曾對其行使倒閣權。其主因在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5 項規定，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立法院期望以倒閣權，制衡陳水扁違反所謂應由國會多數黨組閣的憲政精神，反而將給予陳水扁解散立法院的機會，無異制衡總統不成，反而自我終結。

另外，立法委員選舉競爭激烈，各黨的立法委員候選人，不僅須在大選與他黨競爭，且須在初選階段就與本黨其他候選人競爭，戰況激烈且花費龐大。如此困難才能選上，自然不願意冒者改選失敗的風險，而寧願以質詢、杯葛政府法案及預算方式反制，不願提起倒閣案。導致國會對行政，行使倒閣權在我國變成有名無實的權力⁶⁹。

事實上，當時許多憲政學者都曾大力疾呼⁷⁰，國會應該對於陳水扁總統所逕自任命的少數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亦即行使倒閣權。即使因此連帶使總統行

⁶⁹ 參照臺灣大百科全書，《不信任投票 Vote of No Confidence》，〈<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330>〉

⁷⁰ 徐正戎，〈倒閣案，回歸憲政制度的利多：任何權力間的憲政爭議，皆回歸由人民為最後仲裁者〉，《聯合報》，1999 年 3 月 2 日，版 15。

使國會解散權以反制，都能化解當時的憲政僵局，訴諸於全民票決，尋求最新民意，使我國的憲政慣例能夠予以建立，可惜終究受限於政治現實，錯失建立憲政制度的機會。

在我國憲政史上，國會對於行政院提起不信任案亦即倒閣案的紀錄，共有 3 次如表四所列，分別於 1999 年、2012 年及 2013 年，都是民進黨對國民黨⁷¹提出，而當時民進黨都不是國會的多數黨，更無法掌握國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這 3 次的不信任案，可以說是未表決就可以知道結果。造成我國的憲政史，一種詭異的現象，有過半數的國會多數黨，不敢提不信任案，沒有過半數的國會少數黨，卻勇於提出不信任案，完全與不信任案的制度設計精神背道而馳。

表四：立法院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的歷史紀錄

日期	行政院長	提出政黨	贊成票數
1999.02.26	蕭萬長	民進黨、新黨	83 席(36.89%)
2012.09.18	陳冲	民進黨、台聯	46 席(40.71%)
2013.10.11	江宜樺	民進黨、台聯	45 席(40.1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這樣的結果，使得我國雖然於九七憲改後，參採法國第五共和半總統制的精神，設計出總統、行政院長與國會的權力運作模式。但是設計之初，忽略了我國特殊的選舉文化，以及我國國會議員大多並非專業國會議員，沒有人願意用自己的任期相拼搏，造成實質運作的結果，徒使倒閣權與國會解散權均同具文，無助解決憲政僵局。

在法國第五共和的歷史上，共有 5 次總統解散國會的案例，已如前述。但

⁷¹ 參照維基百科，《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4%BF%A1%E4%BB%BB%E6%A1%88>

是相對的，在國會對內閣提出倒閣案的情況，先後雖有多達 31 次的提案，但僅有 1 次的成功⁷²。唯一成功的 1 次，就是在 1962 年因為戴高樂要推動總統直選的第 6 條憲法修正案，導致國會對其不滿，所提出的不信任案。這是第 1 次，也是唯一成功的 1 次。

雖然這次國會成功的倒閣案，隨之而來的是戴高樂的第 1 次解散國會，訴求全民票決，並以最後戴高樂獲得人民支持，由改選前的 216 席（40%），大舉展獲增加至 229 席（49.3%）而收場，但是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慣例卻也自此建立，此後再無成功的倒閣案。

探究法國之後為何沒有成功倒閣案之原因。本文以為，國會害怕因此反被總統解散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法國總統自此極力克制，服膺憲法精神，恪遵憲政慣例，提名國會多數黨為內閣總理，使行政權與立法權的矛盾消弭，一個高度民主素養的國家，加上彼此互相尊重的政治勢力，才能維繫第五共和的繁榮安定。

反之，對照我國在陳水扁總統任內 8 年的憲政僵局，本文不勝唏噓，對於政治人物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卻錯失為我國的憲政制度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憲政慣例。不能服膺憲法精神，維護民主制度，只圖眼前近利，忘乎百年國計；而國會也怯於一戰，不願意將決定權力回歸全民，由其擔任這場憲政僵局的裁判，反而陷入長期對峙泥淖，導致國家陷入動蕩不安、經濟衰敗的歷史悲劇，本文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總統毀憲亂政、國會自取其辱」。

伍、代結論：建議修改憲法增修條文

整體而言，在法國現行的半總統制憲政體制下，如果總統與國會同屬一

⁷² 楊嫻芳，《法國第五共和與我國憲政制度之比較：總統、內閣與國會三者間權力互動關係之探討》（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81。

黨，總統將因為集國家元首與行政元首權限於一身，而總理只是其意志貫徹執行者，而成為比總統制下的總統權限更大的「超級總統制」，舉例來說，總統制的總統尚須接受國會監督與質詢，也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而法國總統既不受國會監督又可主動解散國會，又有總理為其執行政策，有權而無責。如果不是民主素養高度發展的國家，實在是有憲政上出現強人統治的風險。

另一方面，一旦面臨總統與國會分屬不同政黨時，無可避免的左右共治對立與衝突，又在考驗總統的政治智慧，以及仰賴其對憲政體制的尊重，如果不是民主素養高度發展的國家，亦將陷入政黨紛爭與動亂。目前世界上，曾經或現正實施半總統制的國家，除我國外，只有 7 個國家，分別是威瑪共和時期（1919 年至 1933 年）的德國，以及目前的奧地利、冰島、愛爾蘭、葡萄牙、芬蘭及法國⁷³，均為民主高度發展的先進國家。

又法國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似乎是其對抗左右共治時期，另一個陣營國會的武器之一，但是如果行使不當，過度操作政治權謀，席哈克的慘痛教訓，未必不會促使每一位法國總統，特別是左右共治時期的法國總統，在行使國會解散權時，多點醒思，多點顧慮。因此，雖然總統行使國會解散權，看似可以有效解決憲政僵局，但是如果沒有強力的民意做後盾，有時候，選擇服膺憲法，尊重國會，和諧的左右共治，才是解決憲政僵局的良方。

但是在我國政治環境未改變、國會議員素質未全面提升前，倒閣權與國會解散權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是無法看到實際實施的案例。加上我國總統與國會議員均同受任期保障，如果彼此分隸於不同政黨，而有政見歧異時，如同結了婚的怨偶，卻沒有離婚的管道時，每天見面只有刀光劍影、怒眉睜目，家中永無寧日。家裡的小孩，也將痛苦不堪，只能被迫成為壞小孩。這也就是這 10 多年來，我國的公民社會，不斷發生公民抗爭運動，從紅衫軍、白衫軍到黑衫

⁷³ 總統制、內閣制與半總統制，2014/4/14，<<http://cge.gec.nthu.edu.tw/faculty/regular/trshen/law/president.htm>>

軍，從 20 萬、50 萬到上百萬人上街抗議的原因。

僵局必須化解，持續的僵局無助於解決困境。僵局化解的管道可以是兩邊的任一方，只要有一方行動就會化解開。但是我國目前在行政權與立法權兩方面，其實是給與「不對等的武器」，總統沒有主動化解的權力，只能被動等待國會出手。正所謂敵不動、我不動，往往因為國會不發動倒閣，而最後只能導致繼續僵持對峙的窘境。

本文建議，內閣制固然有適時反映民意，不會有內閣、國會分屬的不同政黨的情況等諸多優點，但是未必適合我國的國情。既然在九七憲改當時，我國就已經凝聚社會共識，參採法國第五共和的半總統制精神來設計政治制度，實在應該徹底仿效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 12 條規定，賦予總統「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

本文具體建議，將憲法增修條文第 2 條第 5 項主文，由現行的「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改成「總統於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後十日內或認為有必要時，經諮詢立法院院長後，得宣告解散立法院。」增加「或認為有必要時」的文字，賦予總統有主動解散國會之權限。

另外，雖然我國憲法自 2005 年 6 月 10 日第 7 次增修後，於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憲法之修改，須經立法院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於公告半年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複決，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數，即通過之。」將修憲的門檻一舉拉高，但危機未嘗不是轉機，這因為這樣高的門檻，將促使朝野政黨正視憲法上的問題，共同謀求彼此共識的最大公約數，並且經過全民票決後，人民對於這樣的內容會有更深刻的認同感。

民主需要長時間深化，我國自九七憲改後，方才經歷 10 多年的憲政運作，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強化政黨與人民的民主素養。況且，制度的建立，是保障

每個人。未來我國難保不會再出現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屬不同政黨而僵持對立的情形。難道，我們的國家還能再一次容忍憲政僵局對峙、讓國家空轉 8 年嗎？

例如 2013 年 9 月發生的馬王政爭，當總統顯然已經無法認同國會議長的存在合法性時，試問行政權要如何與立法權相互合作。又例如 2014 年 3 月所發生的太陽花學運⁷⁴，當人民對於重大國家議題顯然存在歧見時，舊的國會如何能適時反映並代表最新民意，難道真要凡事訴諸直接民權、公民投票嗎？又或是讓支持與反對雙方，彼此互相動員群眾上街頭，看誰動員人數多嗎？如此一來，國會議員身負代議政治角色及民主憲政的精神將被破壞殆盡。

如果總統有權力可以主動解散國會，當憲政僵局發生時，總統可以將國家的重大政策直接訴諸全民，讓人民的最新民意，可以用選票來表達，選舉出專業的國會議員扮演代議士角色。讓新國會來代表人民發聲，使代議政治能代替民粹主義。又如果解散國會、進行改選的結果，不如總統所期望，作為民主憲政的捍衛者，總統自然應該體察民意，服膺憲政民主精神。如此一來，國家不會空轉，人民亦能甘服於全民票決的結果。如此，方為國家之福，也才方能使國家長治久安。

論者或有謂，賦予總統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是否會造成總統擴權。誠如前述，半總統制的國家通常都是民主高度發展國家，這是因為，這個制度本身就是高度仰賴民主素養方能運作，我們要學習半總統制，需要全民一起深厚民主素養，需要當權者尊重民主憲政，需要多方勢力相忍互助。

以法國第五共和為例，總統雖然擁有主動的國會解散權，但是自 1958 年以來，在 50 多年期間，總統只有主動行使 4 次，大多有效化解憲政僵局，只有最後一次，是充滿政治權謀的舉措，但是也受到人民用選票予以懲罰。所以，總統擁有主動的國會解散權，這個制度本身沒有問題，是人民的民主素養決定成敗。如果我們因為畏懼制度的變質，而只學半套，弄成四不像的憲政體制，

⁷⁴ 參照維基百科，《太陽花學運》，<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A%E9%99%BD%E8%8A%B1%E5%AD%B8%E9%81%8B> >

反而將使我們的憲政民主之路，在可預見的未來，更加步履蹣跚、舉步艱辛。

參考文獻

- 中文百科在線（2014，5月1日）。《夏爾·戴高樂》，2014/5/1，取自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127354>
- 自由電子報（2008，5月19日）。《扁政府八年回顧》，2008/5/19，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may/19/today-art1.htm>
- 何勤華（2004）。《法國法律發達史》。臺北：韋伯文化。
- 吳進安、吳威志、詹炳耀、王服清（2009）。《憲法釋論》。臺北：元照。
- 呂炳寬（2004）。《我國與法國憲政體制之比較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
- 呂炳寬（2005）。《中華民國憲法精義》。臺北：五南。
- 呂炳寬、徐正戎（2005）。《半總統制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鼎茂。
- 呂啟元（2002，1月24日）。〈內閣應否於立法委員就職時改組〉。《國政分析-憲政(析)091-006號》。《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2/1/24，取自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1/CL-B-091-006.htm>
- 李惠宗（2006）。《憲法要義》。臺北：元照。
- 李曉兵（2008）。《法國第五共和憲法與憲法委員會》。北京：知識產權。
- 林文程（2005）。〈方法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5，23-27。（趙文瑾整理）
- 徐正戎（1999，3月2日）。〈倒閣案，回歸憲政制度的利多：任何權力間的憲政爭議，皆回歸由人民為最後仲裁者〉。《聯合報》，版15。
- 徐正戎（2002）。《法國總統權限之研究》。臺北：元照。
- 張世瑩（2014，5月1日）。《法國第五共和三次「左右共治」的法理與實際》，2014/5/1，取自 <http://blog.yam.com/teacherchang/article/12767339>
- 許育典（2008）。《憲法》。臺北：元照。

彭錦鵬（2001）。〈總統制是可取的制度嗎？〉。《政治科學論叢》，14，75-106。

楊娛芳（2001）。《法國第五共和與我國憲政制度之比較：總統、內閣與國會三者間權力互動關係之探討》。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法蘭西第五共和國》，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8F%8A%E5%88%A9%E4%BA%9A%E7%8B%AC%E7%AB%8B%E6%88%98%E4%BA%89>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2001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1%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9%81%B8%E8%88%89>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2004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9%81%B8%E8%88%89>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2008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AB%8B%E6%B3%95%E5%A7%94%E5%93%A1%E9%81%B8%E8%88%89>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200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E9%81%B8%E8%88%89>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9月政爭》，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6%9C%88%E6%94%BF%E7%88%AD#>

cite_note-.E3.80.8C.E5.8F.B0.E7.81.A3.E6.B3.95.E6.B2.BB.E6.9C.80.E6.81.A5.E8.BE.B1
.E4.B8.80.E5.A4.A9.E3.80.8D_.E9.A6.AC.E6.96.A5.E7.8E.8B.E5.B0.B1.E6.98.AF.E9.97.9
C.E8.AA.AA-8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太陽花學運》，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A%E9%99%BD%E8%8A%B1%E5%AD%B8%E9%81%8B>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之不信任案》，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4%BF%A1%E4%BB%BB%E6%A1%88>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唐飛內閣》，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9%A3%9B%E5%85%A7%E9%96%A3>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第一次張俊雄內閣》，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5%BC%B5%E4%BF%8A%E9%9B%84%E5%85%A7%E9%96%A3>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第二次張俊雄內閣》，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5%BC%B5%E4%BF%8A%E9%9B%84%E5%85%A7%E9%96%A3>

維基百科（2014，5月1日）。《陳水扁》，2014/5/1，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9%B3%E6%B0%B4%E6%89%81>

臺灣大百科全書（2014，5月1日）。《不信任投票 Vote of No Confidence》，2014/5/1，取自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330>

劉坤億（2014，5月1日）。《英國柴契爾政府改革背景與理念的探索(四)》，2014/5/1，取自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1648,&job_id=68496&article_category_id=1634&ar

ticle_id=32074

劉慶瑞（1993）。《中華民國憲法要義》。臺北：三民。

劉鐵軍（2007）。〈法國憲法修正案與權力制衡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25（4），71-76。

歷屆公職選舉年度及類別一覽表（2014，5月1日）。2014/5/1，取自 <http://vote.nccu.edu.tw/cec/cehead.asp>

總統制、內閣制與半總統制（2014，5月1日）。2014/5/1，取自 <http://cge.gec.nthu.edu.tw/faculty/regular/trshen/law/president.htm>

研究論文

主體的召喚：意識形態與教育^{*}

王振輝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收稿日期：2014年6月11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12月15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每遇選舉，不同意識的意識形態便激烈交鋒，為此二十幾年來社會對立衝突不斷，其中，教育能否免於意識形態的糾纏，成為值得一探的議題。本文從當代西方文化研究的鉅觀歷史中鳥瞰意識形態的演變，從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到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再到阿都瑟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意識形態配合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個人在教育體系中被建構為一個主體，一個仿佛是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的個體，這種嶄新形式召喚主體的意識形態工程，在資本主義精密的外部的物質性操作下，讓當代意識形態顯得更為隱晦與神秘，也讓人們更加難以抗拒。

關鍵字：意識形態、教育、文化霸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The Interpellation of Subject: Ideology and Education

Chen-Hui Wang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fierce ideological battles in every election which makes society in conflicts after 1990's in Taiwan. How the education could be free from the ideology? It's worthy of further consideration. We will overview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from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e history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doctrine of false consciousness of Marxism and the hegemony of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ideology State apparatus of Louis Althusse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is accompanied with capitalism, in which a man was constructed to be a subject in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individual seemed to be the master of himself. This is a new form of subject created by the ideological engineering, with the external of material opera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It makes contemporary ideology more obscure and mysterious, and also irresistible.

Key words: ideology, education, hegemony,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壹、前言

2008年4月在東吳大學校長劉兆玄內定出任閣揆之後，接受記者的訪問時，兩度提到對教育部長的期望，指教育政策應微調，不能搞革命，避免把孩子當白老鼠，「教育部長要對問題深入、不要有意識型態，應與選舉保持距離。」¹特別是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台灣意識抬頭，與傳統教育中所傳達的中國意識大相逕庭，每遇選舉，這兩種意識便激烈交鋒，可是偏偏台灣各式各樣的選舉繁多，於是一遇到選舉便有意識型態的衝突，許多家庭甚至因此而產生糾紛，一些朋友也可能因而反目。為此，劉兆玄在就任行政院院長之前有感而發，其語意味深遠，教育能否免於意識型態的糾纏，值得一探。

此外，一般的理解的是，控制愈是嚴厲的社會，其意識型態愈是鮮明而強烈，相對的，愈是開放民主的社會，我們愈是感受不到意識型態的作用。台灣是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它早已遠離戒嚴時代，理論上講，不「應該」還有意識型態的包袱；然而，其實不然，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許多人雖然感受不到意識型態，但並不代表它不存在，也不代表它的弱化，特別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意識型態極為隱晦而微妙地潛藏在一般文化中，若依當代通俗文化研究的巨擘費斯克(John Fiske)所說的，文化是我們從社會經驗中產製意義的過程，²而要瞭解意義如何產生、進行轉化、最後被個人與社會團體所吸收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關鍵，其中意識型態則是極重要的一個切入點。³

那麼當代社會中的意識型態是如何產生的？我們作為教育者，到底能否像上述行政院劉兆玄院長所期勉教育部長那樣「不要有意識形態」，教育能否去

¹ 林嘉琪、張錦弘、錢震宇，〈劉兆玄：教長不應有意識形態〉，台北《聯合報》2008年4月10日。

² 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 Unwin Hyman.1989.

³ 杰拉爾德·古特克(Gerald L. Gutek)著，陳曉端譯，《哲學與意識形態視野中的教育》(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2008年，北京，北京師大出版社。

除意識型態？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探問的議題。

貳、市民社會與文化霸權的提出

有趣的是，當代許多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在開放社會中，意識型態不僅存在，而且正是透過現代的教育制度，國家機器不斷複製國民的意識型態，「說服」國民服從它的統治、進而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例如有學者認為，學校課程內容對教師及學生灌輸了一種嶄新的控制方式，其中之一即是去技術化（deskilling）以及更理性化；而有些學者則強調，透過詮釋性的和選擇性的規則，教育的意義和實踐被教師和學生所「閱讀」，而那些規則受先前存在的形勢和組成的意識型態所影響。⁴而在眾多學派中旗幟最為鮮明的論者是新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認為，國家機器的掌握者有意識地再製人們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結構。

在當代文化研究之中，意識型態被界定人們用以認識世界的集體思想、信念，一個思想信念的網絡(the network of ideas and beliefs)；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除了認為意識型態是一個經濟基礎的反映，受社會經濟力量所牽引之外，意識形態更有將現狀合理化、再製現狀的功能(naturaliz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status quo)。⁵所謂的「現狀」指的是統治者掌握權勢的現狀，透過對這種現狀的合理化與再製，教育人們理所當然地接受統治者的治理，也因此，在西方傳統思想中，意識型態向來被視為具貶抑、消極、控制和遮蔽真實的意義。

意識型態複製現狀的功能雖然在傳統馬克思主義那裡早已被提出，但馬克

⁴ 參見 Genry Giroux,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 Garvey, 1983.

⁵ Brett Farmer, "The Ide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in F. Martin ed., *Interpreting Everyday Culture*, London: Arnold, 2003, pp.15-20

思主義者都將它做為資本主義的罪行加以批判，在那裡，意識型態無疑是錯誤的代名詞，它是被批判的對象，縱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幾十卷的著作幾乎竟其全力就在揭露資本主義那種錯誤的、虛假的、具欺瞞性的意識型態，他們希望透過其強有力的批判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來喚醒工人的自覺意識。然而，從1848年第一國際的成立正式宣告共黨革命的誕生伊始，歷經幾近一個世紀，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屢屢的失敗，促使學者思考其根本原因，後來義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以往社會主義革命過於重視經濟、政治鬥爭，而較少顧及文化領域的鬥爭，這是一個他稱之為「文化霸權」(Hegemony)或「文化領導權」的爭奪戰，對葛蘭西來說，統治階級領導文化霸權基本上就是必須創造出一種社會上其它不同階級與團體都能接受的世界觀、哲學和道德觀點。依此，一個階級或團體的支配權(ascendancy)主要是關鍵是在於將其個別的世界觀轉化成普遍性與支配性的思潮，並以此指導日常生活之能力。⁶葛蘭西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進行的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在內的總體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因而不能只是一種側重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革命。⁷

葛蘭西著重從文化和意識層面揭示了市民社會中隱性存在的資產階級文化、意識的內蘊，闡明了發生在市民社會中的諸多變化，從而以其獨特的對社會生活的領悟力確立了其獨具特色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理論；⁸在一般的市民社會理論中，市民社會通常被定位為私人自治領域，它是與政治社會相對置的概念。傳統的市民社會是指個人的日常經濟活動，政治社會是指人們的政治、文化和意識活動。但葛蘭西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敏銳地觀察到了滲透於私人生活領域並且轉化為私人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化和意識，市民社會不僅僅是人們的經濟關係而已；亦即葛蘭西擴大了市民社會的範圍與意義，包括教

⁶ 引自劉燕青，〈談網路控制〉，見

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Gramsci_Antonio.html

⁷ 衣俊卿等著，《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

⁸ 波寇克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台北：1991，遠流出版，p.43。

育、教會、工會、傳播媒體等各種民間團體，它們都在配合著統治者進行對於大眾的潛移默化。⁹

在市民社會不發達的國家，如俄國，政治國家就是一切，取得政治革命的勝利就可以控制整個國家，所以革命可以採取「運動戰」(War of movement)。但在西歐高度發達的市民社會中，社會關係網絡異常複雜，統治者的控制力量必須經由文化與意識的滲透來實現，當被統治者接受了這些文化意識，在某些意義上，他是被說服了，也同意了統治者的統治。這就是為什麼在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革命者不僅面對著資產階級敵人，它還必須面對飽含敵意的勞動階級的原因，此是西歐革命屢屢失敗的根本原因；因此革命的策略應改弦易轍，採行將改變社會的種子貯存、呵護發芽以致開花結果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因為革命不可能經由一次決戰完成，而是需醞釀並藉助新的「歷史性集團」(Historic bloc)。¹⁰在這樣的陣地戰中，葛蘭西認為，所謂的意識型態已不只是一種政治理念，它更具有物質力量，能夠「組織」群眾，讓人民進行活動並意識到自身的立場，這樣的意識型態稱為「有機的」(organic)意識型態。¹¹

然而，文化霸權是一種相當隱蔽的文化宰制，文化霸權不只是一種道德和哲學的領導，它事實上會展現為一種強制性的力量，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生活中，我們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們是被限制的，被控制的，有一個明確的強制力量非常強勢地告訴我們該如何做，不可違反，在此，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我們是被壓迫的。不過，這種強制性、被壓迫性並非經常性

⁹ Antonio Gramsci, "Notes On Politics".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1st ed. 197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99. pp. 123-205.

¹⁰ Antonio Gramsci, "Notes On Politics".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1st ed. 197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99. pp. 123-205. 所謂「歷史性集團」，是用以指涉在市民社會中能把各種力量的領導與對生產的領導兩者的結合並持續一整個「歷史時期」的新霸權階級。

¹¹ 梁濤、馮曉艷，〈市民社會、「陣地戰」和「有機知識分子」〉，《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是可以獲得減緩的，這是因為，學者認為，由於統治階級握有的政治與經濟的優勢遠超過其他團體，所以它能運用一些策略如協商、妥協、壓迫等方式，將其價值觀、信念、態度、行為模式等灌注於國家機器中。然而統治階級在這種文化塑造過程的主控性卻被民主社會中諸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所宣揚的「自主性」所遮蔽，所以社會大眾並無法察覺存在於文化中所隱藏的意識型態。簡而言之，民主社會這種相對自主性將激烈的社會階級權力鬥爭轉換為隱晦而神秘的文化宰制。¹²

再者，這種文化宰制是透過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教育與領導功能；在葛蘭西，資本主義意識型態之所以有強大支配力量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知識份子；它不僅涉及知識份子的社會與政治功能，以及知識分子與統治階級的密切關係，並且亦牽涉到知識份子與被統治階級的關係。我們要知道，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依附統治階級的，而統治階級的文化領導權大部分卻是透過知識分子在操控的，儘管有少數知識份子堅持自我的理想，抗拒統治階級的收編，但是這些少數的抗拒者卻也與被統治階級有著高度的疏離性；因而無論是傳統或是有機知識份子，都無法讓被統治階級清楚地意識到其被宰制的地位與情形並因而自覺地起而革命。存在於知識份子與被統治團體之間的疏遠距離使統治者的霸權政權得以鞏固，職是之故，因為缺乏知識份子領導作用，那種馬克思所期待的被統治團體的階級意識也無法被喚醒，因而無法發展出集體意識與行動來對抗統治階級的霸權，最終的結果當然也就無法改變被統治團體處於被宰制的地位。¹³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既是研究社會權力關係體系的一個切入點，同時也是探究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複雜動態關係的有力工具。葛蘭西對意識型態的研究開啟了解釋變動的可能性，意識型態的權力是強大而變動的，不是固定附著於社會場域的，而且是必須爭取、妥協的。換言之，文化領導權是永遠處在

¹² N.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LB. 1979, p. 238-239.

¹³ 潘宜協，〈試析葛蘭西的知識份子理論〉，《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衝突的動態平衡中，掌握它即是擁有了道德與知識的領導權。在文化霸權這裡，統治階級不能單靠武力維持其權力，統治者統治的正當性乃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一方面統治集團必須生產語言或論述，使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具體體現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培養」人民認可和同意，心甘情願地接受統治階級的統治；另一方面，統治者必須考慮被統治者的利益，注意他們的文化、價值觀，然後對人民作出「讓步」(concession)。也正因如此，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讓後人意識到市民社會的重要性。¹⁴

參、意識型態國家機器

但葛蘭西的理論卻沒有辦法指出個人如何被說服，個人如何接受文化霸權等問題，這個問題就由阿都瑟(Louis Althusser)來接手繼續完成。

阿都瑟繼承馬克思主義衝突論的觀點，認為當代社會仍受到統治階層的主宰，他們掌控作為訓練工人的上層結構或機器(the superstructure or apparatuses)，阿都瑟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來統稱那些從「市民社會」發展出來的各種社會體制，包括教會、教育、家庭、法院、政黨、媒體乃至於從文學藝術等領域發展出來的各種組織。¹⁵

阿都瑟在考察當代社會的意識型態時，首先將意識型態放在社會結構當中去理解，在初步揭示意識型態的外在特徵和社會職能之後，再進一步思考作為

¹⁴再論Althusser意識型態理論與Gramsci文化霸權理論》，引自
www.wretch.cc/blog/sweetselina/21821662黃庭康著，〈葛蘭西、霸權、與教育社會學〉，
《教育社會學通訊》2001年第27期，頁11-12。

¹⁵ 阿都瑟從職能上把國家機器分成為「鎮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兩種。鎮壓性國家機器包括政府、行政機關、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是由國家直接控制，並且能夠有效地使用強勢性力量；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則是從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是相對於國家的私領域)中發展出來的各種社會制度。詳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p. 121-173.

表象系統的意識型態與個體「意識」的相互關係，他傾向於將意識型態理解為一種先於個體存在的文化客體、社會結構、思想通道或政治無意識；之所以會如此，他認為：

因為意識型態所反映的不是人類同自己生存條件的關係，而是他們體驗這種關係的方式；這就等於說，既存在真實的關係，又存在「體驗的」和「想像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型態是人類依附於人類世界的表現…是人類對人類真實生存條件的真實關係和想像關係的多元決定的統一。¹⁶

簡言之，阿都瑟所說的意識型態：「是一個諸種觀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統，它支配著一個人或一個社會群體的精神」。¹⁷這裡的表象系統其實就是人類社會文化行為的再現系統，亦即人類使用語言、文字等符碼將存在於心中的情意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系統性符號。

顯然阿都瑟在此仍然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社會決定論的思路；而就歷來研究意識型態的社會決定因素而言，依學者分析，這裡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主要的路徑，它們分別是利益論和張力論；在前者看來，意識型態乃是一種面具或武器；而對後者來說，意識型態則是病症和處方。以利益論來看，意識型態的主張要在爭取優越的廣泛鬥爭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依據張力論，則是在修正社會心理失衡的漫長努力背景中來考察。在前一種背景中，人們是追逐權力，在後一種背景下，人們則是逃離焦慮。¹⁸用這個標準來看，阿都瑟是利益論的意識型態觀點。

阿都瑟在《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書中，一開始就把意識型態放

¹⁶ 阿圖賽著、陳璋津譯，《保衛馬克思》，台北，遠流，1995年，頁202-203。

¹⁷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op.cit., p.120.

¹⁸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201.

到社會生產關係當中去具體分析它的功能和存在條件。在阿都瑟，馬克思所說的再生產並不單是生產資料的再生產那麼簡單，事實上它還包括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而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至少又包括兩個必要條件：一個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另一個是現存生產關係的再生產。¹⁹阿都瑟特別重視的是勞動力的再生產問題，因為後者涉及到意識型態和主體構造這個更複雜的問題。阿都瑟說道：

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要求一種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同時，還要求一種勞動者順從現存秩序規範的再生產，即工人們對統治意識型態的馴服心理的再生產，以及一種剝削和壓迫的代理人們恰如其分地操縱統治意識型態的能力的再生產，這一切甚至在「話語」上都為統治階級提供了支配權。²⁰

從勞動力再生產角度考察意識型態所起的特殊功用，必然涉及主體的自我建構，涉及國家機器和社會教育機構的教化功能問題，這些正是阿都瑟意識型態理論的核心。

阿都瑟認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所傳遞的馴服性，正是再製社會分工體系中所必需的勞動力，以往這種「再製」乃是由生產體系本身進行，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此種再製並非發生在生產本身，而是由學校扮演主要的催化角色。雖然在當代社會，人們並不把工資視為作為再製勞動力量的物質條件，但是它卻是一種作為撫育及重建這些勞動力的工具，為了在複雜生產體系過程中賺取工資，這些工人必須用不同工作與職位所需的各種技術去互相競爭；而這些不同的技術是在學校所習得的，除了學習到如何在生產部門生存的勞動技術，學生亦習得在資本體系生存所需的一整套態度、價值與法則。

¹⁹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by Ben Brewster,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p.128.

²⁰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by Ben Brewster,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p.131-32.

就學校的作用來說，阿都瑟認為，教育制度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目的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再製，其中包括生產力的再製與生產關係的再製。在學校教育中關於生產力的再製，其主要的方法就是用學校教育來培育學生的專業能力與技能，讓他們成為能夠為企業所用的各種人才。至於生產關係的再製，它的主要方法則是精神思想方面的訓育，這是一種意識型態的陶冶，它教導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紀律與道德規範，以便成為奉公守法的公民以及溫良恭儉讓的企業人才。在此一意義下，教育制度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指的是指政治的統治階級藉著教育來傳遞有利於國家的意識型態，以利於鞏固其統治地位，並打壓不利於或對其統治地位可能造成威脅的思想；此外，統治者也透過教育中特定知識、道德、價值與哲學，來合法化其統治與宰制的正當性。²¹

阿都瑟認為，學校就如同社會主要的仲介者，用以訓練學生及塑造在社會分工體系所需個人的溫馴服從性，就整體而言，統治階層握有國家的力量，並且掌握了學校這個意識型態機器，透過學校，統治階層的宰制力量得以隱藏，並建構他們的支配性意識型態，進而再製生產所需的勞動力。而大多數的教師並未能知覺到此種潛隱在現存知識及教導事務的權力關係；除了少數的有識之士外，其他的教師不會懷疑被統治階層利益所控制的主流知識，以致於無意識的執行社會階級再製的工作，此種非意識性讓教師得以成功地實現統治階層的期望。²²

肆、主體的召喚—意識型態的再製

²¹ 引自莊淑琴，〈課程意識型態之分析〉，《國民教育研究學報》，2002年第9期，頁253-272。

²²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Appendix. First Published: by François Maspero, 1968;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1.

這裡必須注意到學校的「宰制性」功能，對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而言，意識型態具有宰制性功能，也會「再製」對國家有利的意識型態。

在這裡，阿都瑟所使用的意識型態意義已然有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那裡，意識型態的存在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本身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就功能來說，意識型態根本是統治階級為蒙蔽被統治所製造出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是一種統治者粉飾太平的美麗謊言，本身不具任何自主性；相反地，在阿都瑟這裡，意識型態不是虛假意識，它是個體對自己生活的「想像性關係」，是人們生活方式的決定性原因；阿都瑟由此進一步關心個體的「主體性」如何被意識型態所建構。從阿都瑟的角度來看，人們會發現，在當代社會裡，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主要的功用在於召喚(interpellate)個體成為主體，這種召喚事實上是一個漫長過程，一般是透過國家的義務教育體系，有些國家甚至貫穿到大學教育及其社會媒體教育，它的焦點在於透過外部的物質性操作，讓人民自行「想像」彷彿碰觸到人民意志集合體的集體展現，然而其實這都是一種「生產關係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也就是所有的意識型態都是從既有的生產關係再生產出來的，換言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提供我們一整套文化成規，這套文化成規有沒有意義並不重要，學生都必須花費很長的時間在學校學習統治者所認為「正確」的行為及社會規範、「正確」的思想及價值觀，藉由這樣的過程形塑我們對正確與偏差的概念，以及在這個階級社會中應該扮演履行的角色。此外，它的重點還在於意識型態必須通過諸如學校、語言、金錢等等這些強而有力的「外部的物質性操作」來實現它的功能，透過這些外部的物質性操作，統治者將個體縫合進他所認定的社會秩序裡，²³以當代的觀點來說，這樣的外部操作是一種「超個人的機制」，²⁴

²³ 〈再論 Althusser 意識形態理論與 Gramsci 文化霸權理論〉，引自 www.wretch.cc/blog/sweetselina/21821662 從語言哲學來看，語言符號是一種不透明的物質性的存在，當代的哲學已充分意識到語言文字本身的物質性：文字並不表象事物，語言並不指涉世界，語言和文字是探向那事物和世界之上、之外、之下的非場所的場所。海德格(M. Heidegger)甚至指出，語言乃存有之屋，而不論是學校教育或媒體

具有高度普遍性的感染力與涵攝力，在正常的條件下，任何人都難以幸免。

阿都瑟特別把這種人民對主流意識型態的內化和不假思索的服從稱為「召喚」(interpellation)。這是阿都瑟引用法國心理學家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理論來解釋意識型態如何在個人建構為主體的過程中發生影響力、並且產生與世界之間的關係。當我們每個從家庭走出來要成為一個社會人，融入社會實踐中，每個個體都被不同的名詞所指稱(addressed)或召喚(interpellated)，而這些名詞被賦予了社會認同，例如一個人從小立志要當老師或是科學家這樣一個被社會所認同的角色，那麼老師、科學家這樣的名詞對他就具有特別的吸引力，這個名詞無時無刻地召喚著他：「所有的意識形態召喚具體的個人成為主體」。個人被既存的結構和實踐所指稱，並構成主體，雖然指稱的辭彙和主體性會根據特定時空的社會角色而改變。²⁵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召喚還透過一種機制產生作用，此為「誤認」(misrecognize)，也就是說在召喚過程中人們會產生誤認，一方面通過這種誤認，統治者讓人們相信自己是經驗世界的主宰者，而事實上這個經驗世界卻是經由意識形態符碼所建構出來的，因此，在這種召喚下，個人便誤認了他或她自己；另一方面，誤認也是透過社會的認同即人們對集體的信任而產生，使人們相信與自願接受掌權者所界定的事物並認定其為社會集體意志，從而不加以懷疑地將之內化為理所當然的認知。意識型態如此這般經由誤認獲得個體的認同，而這些個體也服膺意識形態所指定的位置或身分。正因如此，個體視意識型態的觀點為自我證實的事實，並且處於一個世界，此世界中意識型態不斷被承認及確認。召喚的作用就是將每個人安置在意識型態所編織的世界的相關位置，而讓個體忘記自己原本所屬的社會位置。

都是透過語言符號來操作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意識形態並非理念或精神性的存在，而是物質性的存在，它存在於各種體系、制度、機制或實踐活動的再現系統，從而發揮支配主體的權力。

²⁴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216-18.

²⁵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by Ben Brewster,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p.170,p.171.

召喚的發生主要的就是透過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阿都瑟這裡所指的國家機器包括扮演維護社會關係再製的主要角色，如：教堂、家庭、教育體制、工會、媒體等，而不是透過壓迫性的員警、法庭等國家機器。

因此，召喚事實上就是意識型態的建構，根據阿都瑟，這種意識型態建構是一種非常精密的操作，它利用在個人當中「招募」(recruits)主體（招募所有的個人）或者把個人「改造」(transforms)成主體（改造所有的人）的這一種方式來「行動」(acts)或產生作用(function)的。²⁶阿都瑟在此實際上是顛覆傳統哲學思想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主體」(subject)；「主體性」(subjectivity)指涉的乃是個人的意識與潛意識的思想與情感，對自身的認知以及瞭解個人與世界的關係的方式。原來西方傳統的人道主義（humanism或譯：人本主義、人文主義）哲學傳統，預設了存在於人類內心深處的一種本質，它是獨特的、固定並聯貫的，並且這個本質使個人成為他/她所是(is)的那個人，這就是主體。²⁷阿都瑟在此則斷定，一向把自己當作主體的個人其實是透過意識形態的作用而建構出來的，也就是說，主體是掌握國家機器者透過他所掌控的力量與機制諸如教會、媒體、教育體制所創造出來的，它不是西方傳統那種本質性的主體。相對的，一切意識形態也都是通過主體範疇的作用，把具體的個人召喚或建構成具體的主體的。

然而，必須澄清的是，意識型態在召喚主體的過程中，也就是在主體在建構過程中，主體是否是自覺的呢？從某種意義上講，主體是無法自覺的，這是由於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想像性關係，通過意識形態這種非透明性的媒介，人不可能完全達到對自我的清醒認識，再加上，在實踐過程中，每個主體本身都不是一個封閉的、已經徹底完成的靜態物，而是一個不斷裂變和重組的過程，而促成主體變化的主要精神動力正是具有致命魅惑力量的意識型態。主

²⁶ L.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 Other Essays*. Edited by Gregory Elliot. V E R S O. London - New York 1990, p.191.

²⁷ 維登 (Chris Weedon)，白曉紅譯，《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台北市：桂冠，1994年，頁38。

體陷入意識型態的循環，鋪天蓋地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與國家機器中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像空氣一樣籠罩著每一個企圖來到這個世間或自以為在這個世間「自由自在」生活的每一位個體。²⁸

以此而論，當學校教育在作為國家機器的同時，也扮演了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角色。當然，被教育者或馴服者的主體的成立，也是在這個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召喚出來的「主體」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中，建構這個主體的「內部」做為規訓化與知識生產的對象的對象化（objectification）的過程之後才成立的。²⁹

總之，就如學者所作的評論，阿都瑟歸根究底還是一名唯物主義者和階級論者，他以其悲劇性的勇氣在教育機器內部頑強地抵制著這個國家機器的強大慣性，並將此看成了自己莊嚴的政治行動。阿都瑟在具體存在的國家機器中看到了勞動者身體的不斷地再生產，並且聽到了統治階級恩威並濟的規訓聲以及那些被規訓者的苦難歎息與抗爭。³⁰

然而，學界對阿都瑟的再製理論也不全然是讚美聲，赫斯特(Paul Hirst)便指出，阿都瑟雖然不認同意識型態是錯誤意識的說法，但依然未能與之劃清界線，意識型態的再製根本上依然模糊了資本家剝削的真實。更嚴厲的是赫斯特對阿都瑟的召喚理論的批評，他認為，如果意識型態藉由召喚來建構個人成為主體，而這種召喚牽涉到誤認，那麼它只能經由既存主體的誤認自己來達成。簡言之，召喚預設了想要詮釋的對象。³¹

最後，我們必須說，阿都瑟為我們指出真正的問題核心是，作為統治階級

²⁸ 孟登迎，〈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與文藝問題〉，《中青人文網》，renwen.cyu.edu.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138

²⁹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Appendix. First Published: by François Maspero, 1968;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1.

³⁰ 胡繼華、孟登迎、郭軍，〈法蘭西的另一種政治哲學〉，《中華讀書報》，見 www.booktide.com/news/20040304/200403040013.html

³¹ 引自蕭小芳，〈意識形態理論：從阿爾都塞到赫斯特〉，《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規訓的意識型態的魅惑之所以為魅惑在於它的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以及人們對它的無意識，正如李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評論的，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向後世提出意識型態問題：「它的新穎之處就在於：理性現象可能比起非理性現象晦暗，更難以把握。它的神秘化力量可以如此隱蔽，以至於邏輯的藝術不足以打碎這種神秘。神秘化源於一種無意識的意圖，將神秘之物給神秘化了」。³²這樣的論斷果然一針見血。

伍、結論

台灣自二十年前開始了一場教育改革，在那場教改中，普設高中、大學，以致從早期的二十幾所大學，短期內膨脹到將近一百七十所大學，這場教育鬆綁其來有自，即源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許多歐美國家所進行了一場名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教育改革；例如在高等教育方面進行私有化（privatization）與自由選擇（free choice），「鬆綁」與「競爭」（de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的開放教育系統，也就是援用企業的管理哲學、強化中央的主導權力，強調學校教育要如企業一般有「效率與效能」（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³³

這股新自由主義思潮其實深受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影響，³⁴特別是福柯對「主體」觀念的詮釋與傳統的自由主義有所不同，在其《生命政治的誕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一書中，福柯詮釋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更多的強

³² Emmanuel Levinas, "Ideology and Idealism," in Seán Hand, ed., *The Levinas Reader*,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p.237.

³³ H.Giroux, Neo-liberalism, corporate culture, and the promis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as a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Winter 2002;72,4.

³⁴ 周祝瑛（2005）。新自由主義對高等教育之影響-以紐西蘭為例。教育研究月刊。136期。

調的是主體「自我管制」(self-governmentality)和自我規訓。³⁵在此一理念底下，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政府不再像傳統自由主義那樣扮演守夜者的消極角色，而是要積極地去保護自由市場競爭的各種條件，因此，個體被建構成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力資本」，於是，主體的建構變成培養個體的溝通能力和社會關係。也就是說，資本不再僅限於剝削勞動力，而是通過創造和溝通的能力來穿透社會關係，主體的建構是自我技術的產物。³⁶簡單地說，這種新的管制方式從傳統的工廠式集中化規訓變成分散的、彈性的、開放的控制，它強調個人必須整合自由、風險、權力、責任與角色，個人被建構為要主動承擔就學、就業、選擇和責任的各種風險，並努力開發自己的潛力，易言之，在這樣的一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每一個體都必須是配合著資本主義企業邏輯的自我管理與自行生產的小機器。

這種新的管制技術表徵著新形態的權力和主體結合的誕生，擴展了經濟理性的範疇，將原本在市場中的競爭意識滲透到生活的每個領域之中，個體也被形塑為必須自己的行為和選擇負責，並將所有可能的風險和後果合理化為實現個人自由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角度來看，原本屬於政府和國家管制的經濟領域被「個體化」了，交由個人自我負責，即問題的解決方式落在發展個人的倫理方面。個體需要表現得理性、積極、能夠自由選擇、自我管理、自我創造、自我約束，與此同時，自由選擇的權力和自主性也就成為建構主體的核心。個體有義務通過自己的選擇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在這種新的『自我觀照』中，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瞭若指掌，將自己的人力資本發揮到最大的限度」。這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將主體的潛能、傳播溝通能力、思考創造能力、感受能力轉化為生產力的新的階段，主體的建構不僅僅是由國家和經濟決定的，而是個體的自我管制，是個體將規訓與常規化內化為自我的一種表

³⁵ Michel Foucault, trans. Graham Burchell, Palgrave Macmillan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2008.

³⁶ 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trans. R. Braidotti).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6(autumn), 5-28.1979.

現。³⁷

依學者的詮釋：在這種新自由主義下國家統治就展現為一種「智性治理」(Governmentality)，即政府試圖塑造最適合國家政府政策的公民，系統化地透過它所掌握的國家機器從心態、技術等各方面訓育人民成為公民，最終讓這些合格的公民接受政府管理。³⁸學者認為，在狹義上，智性治理可以用來描述政府存在是為看到執政權力優化、使用，培育作為社會群體成員的個體及政府的理性觀念，「智性治理：在一廣泛的各式背景下，要求我們學會如何管理別人和自己……」。若要分析政府就要分析那些試圖塑造、動員和操縱——通過個人和群體的選擇，欲望，願望，需求和生活方式——的機制。此時智性治理提供對權力新的詮釋和理解，權力包括在紀律體系中的社會控制形式（如學校，醫院，精神病院等）以及知識的形式（意指意識形態等）。³⁹

簡單地說，這種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就是要去塑造個人的觀念來配合當代資本主義的市場需求，所以政府必須操控教育，將它所想要的觀念植入每個人的腦海之中，將每一個人都培育成企業家眼中有用的「人力資本」。這種新自由主義趨勢表現在高等教育裡，就是前教育部長楊朝祥所說的「教育產業化」趨勢，即利用市場手段擴大教育資源、利用市場機制經營教育各項措施，並且將學校教育的知識和技術優勢直接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的教育潮流。⁴⁰近幾年來，台灣各大學都在接受教育部的各種評鑑，高教評鑑中心道出評鑑的本質內涵即：「結合『全面品質管理』的概念，導入系所評鑑實施的認可機制，…我國的大學評鑑制度能以『品質保證』為依歸」。⁴¹這就是把教育當企業在經營，

³⁷史唯、劉世鼎，〈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澳門賭場荷官的矛盾體驗〉，發表於成功大學舉辦的二〇一〇年台灣文化研究年會（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新關係）。引自www.csat.org.tw/paper/C2-2

³⁸ MAYHEW S.A Dictionary of Geography[M].N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³⁹ DEAN M.Governmentality: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M].London: Sage,1999

⁴⁰楊朝祥，〈台灣高等教育的挑戰、超越與卓越〉，《教育資料集刊》，2009年，第44期，頁1-28。

⁴¹編輯部，〈確保優質學習環境建立從系所專業到整體校務發展的大學評鑑制度〉，《評鑑雙月刊》2010年1月第23期，財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出版，頁8。

這就是教育產業化，學生在教育中只是一種商品。

在傳統馬克思主義那裡，意識型態意味著偏見、迷信與無知，是粉飾資本主義邪惡的美麗謊言，是一種虛假幻象；然而，當代思想家對意識型態的認識並不止於此，在現代市民社會生活中，統治者以其龐大權力與資源取得文化霸權，被統治在此文化霸權底下是不斷被馴化的過程，他們窮其一生都以統治者的世界觀為世界觀，以統治者的價值為價值，以統治者的觀念為觀念，這就是葛蘭西所說歐洲社會主義不能說服工人階級並喚醒工人階級意識的根本原因；不僅如此，在阿都瑟看來，當代的這種意識型態更極具隱蔽性，特別是現代化的國家中，學校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教育的普及與深入更讓這種隱蔽性更具穿透力；除此之外，當代意識形態的功能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它已從一百多年前的虛假幻象轉變成真實，它可以「召喚」、「建構」人們的主體，也就是說，它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當然，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建構、召喚主體的過程，學校也扮演主要的催化角色。就此而論，作為統治階級規訓的意識型態的魅惑之所以為魅惑在於它的根深柢固、牢不可破、以及人們對它完全毫無抗拒力，它已變成我們無意識的行為模式、轉化成被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到現在許多人都還是認為學校教育是不應該有意識型態，因為它是人類文明之所寄，教育不應有偏見，所以有前行政院院長劉兆玄有2008年那樣對教育的期勉之語；本文的本意當然不是與任何人唱反調，而是期望通過此一深入探討來釐清可能的事實真相，更進一步讓有識之士來共同深思，假如我們引以為傲的主體，這個負責任的主體、可以自我負責的主體，仍是被塑造、被召喚出來的，那麼，作為教育者，我們如何可能在此一條件下讓學生擁有真正的主體？擴大來說，在這樣的一個號稱開放的、民主的體系之中，我們如何可能才能當這個體系的真正主人？

參考文獻

- 史唯、劉世鼎（2010）。〈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澳門賭場荷官的矛盾體驗〉。《二〇一〇年台灣文化研究年會（文化生意：重探符號／資本／權力的新關係》。台南：成功大學。引自www.csat.org.tw/paper/C2-2
- 衣俊卿等（2001）。《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
- 肖小芳（2008）。〈意識形態理論：從阿爾都塞到赫斯特〉。《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3-27。
- 周祝瑛（2005）。〈新自由主義對高等教育之影響-以紐西蘭為例〉。《教育研究月刊》，136，148-158。
- 孟登迎（2002）。〈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與文藝問題〉，《外國文學》，2，55-62。
- 林嘉琪、張錦弘、錢震宇（2008）。〈劉兆玄：教長不應有意識形態〉。《聯合報》，4月10日。
- 波寇克著，田心喻譯（1991）。《文化霸權》。台北：遠流。
- 阿圖賽著，陳璋津譯（1995）。《保衛馬克思》。臺北：遠流。
- 胡繼華、孟登迎、郭軍（2004）。〈法蘭西的另一種政治哲學〉。《光明書評》，見http://www.gmw.cn/03pindao/shuping/2004-03/03/content_6012.htm
- 梁濤、馮曉艷（2006）。〈市民社會、“陣地戰”和“有機知識分子”〉。《甘肅社會科學》，6，185-187。
- 莊淑琴（2002）。〈課程意識型態之分析〉。《國民教育研究學報》，9，253-272。
- 陳曉端譯，杰拉爾德•古特克(Gerald L. Gutek)著（2008）。《哲學與意識形態視野中的教育》(Philosophic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黃庭康（2001）。〈葛蘭西、霸權、與教育社會學〉。《教育社會學通訊》，27，11-12。

楊朝祥(2009)。<〈台灣高等教育的挑戰、超越與卓越〉。《教育資料集刊》，2009，44，1-28。

維登(Chris Weedon)著，白曉紅譯(1994)。《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臺北：桂冠。

潘宜協(2007)。<〈試析葛蘭西的知識份子理論〉。《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45-46。

編輯部(2010)。<〈確保優質學習環境建立從系所專業到整體校務發展的大學評鑑制度〉。《評鑑雙月刊》，23，8-8。臺北：財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出版。

Althusser, L.(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Althusser, L.(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 trans.by Ben Brewster.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Althusser, L.(1990).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 Other Essays*. Edited by Gregory Elliot. V E R S O. London - New York.

Clifford Geertz, C.(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Dean, M.(1999). *Governmentality: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Sage.

Farmer, B. (2003).“The Ide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in F. Martin ed., *Interpreting Everyday Culture*, London: Arnold.[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 database/Gramsci_Antonio.html](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Gramsci_Antonio.html)

Fiske, J.(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Foucault, M. (1979). Governmentality (trans. R. Braidotti).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6, 5-28.

Foucault, M.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 1978-1979, trans. G. Burchell.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iroux, G. (1983).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South Hadley, MA: Bergin & Garvey.
- Giroux, H (2002). "Neoliberalism, Corporate Culture, and the Promis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as a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72(4), 424–463.
- Gramsci, A. (1999). "Notes On Politics".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1st ed. 197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pp. 123-205.
- Levinas, E.(1989). "Ideology and Idealism," in Seán Hand, ed., *The Levinas Reader*. Cambridge: Blackwell.
- Mayhew, S.(2010). *A Dictionary of Geography*[M].N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ulantzas, N. (1979).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LB.

研究論文

太陽花小學弱勢學童補救方案^{*}

呂金靜

嘉義縣竹崎國小教師

呂朝賢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4 年 8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12 月 15 日。

^{*}本文為呂金靜碩士論文改寫而成。本文通訊作者：呂朝賢，leuahpou@gmail.com。誌謝：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我國教育弱勢家庭數量近年來有日益增加的趨勢，為滿足日益增多的教育弱勢學童之學習需要，補救教育因應而生。本研究目的即在檢視學校弱勢學童補救方案的績效與困境，並找出改善的方法與建議。主要研究結果為：1.以補救教學課程及多元社團為主的方案實施後，對弱勢學童的學業成就、人際關係、自信心和生活能力皆有顯著的增益效果。2.補救方案計有行政、課程與參與等 3 個層面的困境。A.前者係指方案經費、學生來源、師資及政策運作的困境。B.後者則是指補救教學內涵限制、教材準備困難，以及教學時間不足等挑戰。C.家長信念、友伴氣氛、學童自我成就動機等因素，影響學生學習成效。基於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了親師溝通、降低學習門檻、改變教學設計與因材施教等策略來解決上述挑戰，並期能供未來補救方案設計與施行之參酌。

關鍵字：弱勢學童、補救方案、補救教學、學習成效、學習態度

Remedial Programs for disadvantaged pupils: Case of Sunflower Elementary School

Chin-Ching Leu

Teacher, Chu Chi Primary School, ChiaYi County

Chao-Hsien Le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in Taiwan, remedial education is created to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the students from those families.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achievements and difficulties of this remedial program and to discover the solutions to them.

Main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execution of remedial program and multi-club strategies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confidence, and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aily life of the students from education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2.Remedial teaching confronts difficultie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basic aspects:

A. Academic problems include the budget for the strategy, the student sources, the faculty, and the execution of it.

B. Curricular problems consist of the restriction of teaching contents, the tough preparation for it and such challenges as insufficient teaching time.

C. Factors like beliefs of students' parents, companion atmosphere, and students' motivation of self-achievement affect their learning accomplishment.

In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ffers some solutions as the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and execution of future remedial program. The solutions a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lowering the learning threshold, the alteration of teaching designs and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s.

Key words: disadvantaged student, remedial program, remedial teaching, learning effect, learning attitude.

壹、緒論

近年來臺灣少子化現象使得國小學童日益減少，但在社會變遷及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狀況下，國小學童教育弱勢（educational disadvantage）¹或者說學習貧窮的狀況卻日益嚴重，此現象可由最近兒童福利聯盟「台灣偏鄉弱勢學童²學習貧窮分析報告」來佐證之。此報告顯示偏鄉弱勢學童家中教育資源，較優勢學童差了 16 倍以上、94.9% 弱勢學童未曾接觸英文雜誌、25.2% 弱勢學童無法寫完 26 個英文字母.....，以上現象赤裸裸地揭露出偏鄉弱勢兒童在教育資源、學習能力和學習機會的相對弱勢困境（兒童福利聯盟，2013）。當然，所謂學習貧窮問題並非始於 2013 年，不過我們也很難確切地說出該問題是始於何時，我們只知自 1968 開始實施的 9 年國民義務教育，那個曾經讓臺灣兒童學習的社會藩籬大大降低的制度，隨著社會變遷及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已漸漸無法滿足弱勢學童的學習落差與問題，因應而生的則是另一種教育類型：補救教育（Remedial education）³。

台灣補救教育之推動在公私部門皆有，政府自 1995 年起即開始試辦教育優先區計畫，以縮短城鄉之間的教育落差；2003 年起辦理課後照顧班，讓弱勢學童免費參加，減輕弱勢家庭經濟負擔；2006 年起開辦攜手計畫課後扶助

¹ 指因環境中經濟、文化、社會三方面的資本（capital）因素，影響到學生能力與性向的發展，造成學生在學校時能力與性向表現上的落差（discontinuity）（Kellaghan, 2001）。如依我國教育部（2003）的界定，「社會弱勢」需符合「接近公部門的教育機會可近性低於其他人或取得公部門教育機會成本高於其他人。」、「所受到的教育品質低或是不適當使得無法將教育所提供的資源轉換成個人的能力。」等兩項條件。

² 以下視行文需要，將交互採用「弱勢學生」、「弱勢學童」等名詞。鄭勝耀(2013)將弱勢學生歸納為經濟弱勢、文化弱勢、學校教育弱勢、家庭弱勢、個別弱勢等五大類型。

³ 補救教育為教育的一部分，主要關注於學生學習困難的預防、調查與處遇；無論造成學習困難的來源為何，皆會對學生的正常發展帶來相當程度的妨礙（NARE, 1977；轉引自 INTO, 1994:2）。

方案，以小班補救教學方式提升雙低（低社經與低成就）學童的學習成就，並於 2012 年取消身份別，將攜手計畫改成補救教學，以落實學習成就低落者的輔導（陳淑麗，2008；洪麗瑜，2012；鄭勝耀，2013）。而第三部門亦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推動弱勢學童的補救方案，直接推動補救教學方案的例子有：永齡教育基金會的「永齡希望小學」，至 2012 年合作的國小已達 282 所，開設課輔班級達 800 班，服務的弱勢學童達 40,000 人次以上。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的「希望閱讀」計劃，至 2012 年已認養了 200 所偏遠小學，用閱讀為 20,000 名弱勢孩童搭起希望之橋等等（永齡教育慈善基金會，2013；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2013）。間接方式助學者，以挹注資金改善學校補救方案經費不足的例子最多，例如：三花棉業公益教育基金會的「菁英種子學堂」、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的『我們班的小飛象』才藝獎助計畫（三花棉業公益教育基金會，2014；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2014）。

但補救教育對於弱勢學生真的有效嗎？有些研究顯示弱勢學生經補救教學介入後，的確在學科基本能力上有顯著提升（李孟峰與連廷嘉，2010；陳淑麗等，2007）。但亦有文獻指出，政府補救方案，學校行政及師長並未為弱勢學童之學習提出一套有效的學習策略，學生學習上的進步並未具體顯現（許添明，2006；陳麗珠，2007）。且近期（2013.11.14）監察院調查報告亦指出：「對於弱勢家庭學生課後照顧之需求及服務，迄未積極連結、整合及分工，仍各自為政，致服務成效不彰，核有疏失」（監察院調查報告，2013）⁴。上述相關文獻對於現行補救教育成果之看法仍舊分歧，政府與民間針對各類型的弱勢學童，已採用各種補救教學方案，以弭平學習落差。但在教學現場，這些方案成效是否真正的落實，對弱勢學童學習成效有所提升？還是陷於未明的困境與限制之中？對此議題，本文並沒有標準答案，惟我們認為基於補救教育所施行的教學，仍是正負面效果同時俱在，且施行的正負面效益深受個別施行單位（國

⁴ 引述來源 <http://goo.gl/izabbj>。

小) 條件, 及補救教育方案組合所影響。

為檢證上述假定, 本研究將採個案研究方式, 以嘉義縣太陽花國小(化名)全校弱勢學童為對象, 深入檢視針對弱勢學童所施行的補救方案情形, 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若沒有達成, 其理由為何? 以找出對學校弱勢學童學習真正有效的方案, 並對於未達成目標之補救方案提出改善的方法與建議。本研究期盼能瞭解針對弱勢學童所施行補救方案之成效, 釐清方案所遭遇之困境及限制, 以找出改善的方法與建議, 做為政府及民間團體推行方案之參酌資料, 使補助款發揮最大的功效, 縮短弱勢學童與一般學童的差距, 促成教育機會的均等, 實現社會正義。

貳、文獻探討

一、補救教育措施

對於弱勢學生的補救教育措施／方案可粗分成 2 大類：一是個人補助, 即政府／相關組織以現金或等同現金的抵免, 補助弱勢學童生活及教育花費, 降低其取得教育與學習機會的經濟障礙。例如：我國對國小弱勢學童即有學費補助、代收代辦費補助、午餐費補助、教育儲蓄戶等 4 個現金給付, 協助弱勢學童就學 (請見表 1) (教育部, 2012)。

表 1 我國弱勢學童個人補助一覽表

	學費補助	代收代辦費補助	午餐費補助	教育儲蓄戶
法源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	公立高中職以下學校教育儲蓄戶實施要點
補助對象	五歲以上經濟弱勢家庭幼兒。	1. 家庭經濟突發困境者。2. 社會福利機制無法照顧, 以致於無力負擔者。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2. 家庭突遭變故。3. 老師認定清寒學生。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2. 家庭突遭變故。3. 家庭須協助之個案學生。
補助方式	學前者依家戶年所得級距, 每年一至三萬元, 分上下學期撥付。	以學期為單位, 全額補助。	以學期為單位, 全額補助。	由學校視學生現行狀況支付。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2)。

另一類則為方案補助，透過給予學校經費辦理教學活動或發展特色活動項目或改善教學條件，以縮短學童間學業差距及城鄉教育資源落差。政府在不同時期點皆有類似的方案補助，這些補救教育方案通常由中央政府規劃，地方政府執行，表 2 即為此些方案的彙整表。而國內民間組織亦有類以方案，例如：永齡教育基金會的永齡希望小學、博幼基金會等，皆是針對弱勢學童施行專業的補救教學，二者皆自行研發補救教材、培訓專業師資、設立檢測及評量機制，為弱勢學童施行補救；中興保全文教基金會的社區關懷潛能開發班，除了課輔之外，還試圖為弱勢學童營造另一個溫暖的家；還有世界展望會，以陪伴孩子及身心靈輔導來協助原住民學童，以提高其就學意願等等。民間組織以不同形式的公益課輔和補救教育，在需要之處遍地開花（永齡教育基金會，2014；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2014；中興保全文教基金會，2014；世界展望會，2014），使更多政府無法顧及的弱勢學童，得以受到照顧及協助。

表 2 政府方案補助一覽表

施行時間	方案名稱	受輔對象	實施內容或方式
1996年～迄今	教育優先區	1.原住民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2.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及新移民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3.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4.中途輟學率偏高之學校。5.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6.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比率偏高之學校。	1.推展親職教育活動。2.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3.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4.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5.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6.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通車。7.整修學校社區化之活動場所。
2003年～迄今	課後照顧服務方案	1.低收入戶學生。2.身心障礙學生。3.原住民學生。4.其他情況特殊經學校評估須扶助之學生	參加課後照顧服務之參加費用由學校或縣市政府自籌，不足者再向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
2006年～2011年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	兼具有下列二種情形之學生：1.具有下列身分之一者：(1)原住民學生。(2)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3)外籍、中國配偶子女。(4)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及免納所得稅之農工漁民子弟。(5)失親、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子女。(6)其他經學校輔導會議認定學習成就低落之弱勢者。2.在學學習成就低落，需補救者：都會地區以班級成績後百分之十五，非都會地區以班級成績後百分之二十五為指標。	1.以抽離原班方式，6-12人為一班。2.除早自習及午休外，以課餘時間實施進行個別或小班制課程補救教學。
2012年～迄今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在標準化測驗中，成績未達百分之三十五的學習成就低落學生皆納為需接受補救教學的對象	1.整合國中小補救教學計畫、2.制定基本學習內容、3.編輯進階式補救教材、4.建立攜手計畫評量系統、5.檢核補救教學成效、6.鼓勵抽離式補救教學模式、7.辦理補救教學增能研習、8.完備專業支持與督導系統、9.修訂法規賦予權責。
2012年～2014年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行動方案	新住民家長及學童。	1.校內新住民火炬計畫推動工作坊及執行成果冊、2.新住民火炬行動關懷服務列車—多元文化幸福講座、3.新住民輔導志工培訓、4.新住民家庭關懷訪視、5.新住民幸福家庭親子生活體驗營、6.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想甄選活動、7.新住民簡易生活母語學習營、8.新住民家庭創意家譜競賽、9.新住民多元文化美食競賽、10.選聘臨時酬勞人員。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9、2011、2012）；內政部（2012）。

以上對於弱勢兒童的補救教育措施，除日常生活的經濟扶助之外，連帶於學童生活的社區環境、學校設備及師資、學習課業等，皆是透過學校將資源用於弱勢學生身上。因為個人式補助，較單調，且無所謂校際與區域差異，因此本研究將僅著焦於弱勢學童補救教育方案，探討國內的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透過學校的操作，施行於弱勢學生身上後的學習成效與困境。

二、補救教育方案預期目標

（一）彌補基本學力

誠如稍前對於補救教育之定義，其最初的目標即為了協助「低學業成就／技能／知識」的國小學生，縮小與一般小學生基本學業能力間的差距（INTO，1994:27）。例如：外部課輔資源的提供，可彌補弱勢學生在經濟和學力上的弱勢，是低成就學生趕上同儕兒童的主要方法之一（陳淑麗，2008）。因此有些學者主張補救教育方案之一的「補救教學」之目標，即是以補救低成就學生之學業成績，使其能在課業上達到與一般兒童相同的程度（張新仁，2000），或者說，透過優質教學來縮短低成就學生到精熟學習的差距（洪麗瑜，2012）。簡言之，增加弱勢國小學生基本學業能力，是補救教育方案施行的第一個目標。

（二）減低學習落差擴大

弱勢學童不僅有學習適應困難，在生活和行為上亦是如此，這些困難將導致其在認知、情意及技能等學習成就上的相對弱勢（譚以敬與吳清山，2009）。補救教學不一定能完全解決如上相對弱勢，亦不可能一次到位，使弱勢學生趕上同儕，但卻能預防馬太效應—即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差罅拉大的結果（陳淑麗與曾世杰，2007）。此一避免學習落差擴大的努力，在國內外已有相當多的成功實例，例如：英國曾於 2012 年 7 月到 9 月全國共 1,763 所學校，針對

弱勢學童提供約兩週的夏季學校課程，從有趣的運動或戶外活動中融入數學與語文的學習，以縮短「夏季失落」(summer loss)的情形，也就是弱勢學童因社會不利的背景，造成在暑假期間，與一般學童在學業成就差距擴大的境況。結果發現，夏季學校的施行，不但能改善學生的學習參與情形，還可讓弱勢學童學會如何學習，使學生對學習充滿熱情。受訪學校中有 94 %認為學校所開設的夏季學校課程是高度成功的(Department for Education,UK,2013)。總而言之，政府或民間機構提出補救教學或課輔班的補救資源，其目的在弭平弱勢學童的學習落差，各國的補救方案也多以此為目標。

(三) 增強自信與友伴關係

「基本學力及學習成就」2 者或許明顯可實現，但如何維繫卻是一大挑戰。國小學童的學習成效維繫，與其生活環境中的支持體系有很重要的關聯，一般研究亦指出學童除了要經營家庭關係外，也需要經營自己的社會關係(呂朝賢、陳柯玫與陳琇惠，2014)，如此才可能增益其學習與幸福感(孫秀芳，2014)。再者，學業成就除受學童支持體系所影響外，學習成就亦可提昇學童的自信，並有益於良善友伴關係建立(張新仁，2000)。

(四) 降低阻礙學習相關因素效果

根據內政部調查，我國新住民學童已佔國小學生總人數 10.9%。自 2012 年開始，政府推動為期三年的「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其目的在穩定新住民家庭功能、給予完整的生活輔導機制(內政部，2012)。教育部 2013 年中的十大施政重點之一為「全面強化弱勢扶助」，藉著補足經濟、文化、區域、學習之間的弱勢，以達到「建構優質教育環境，提升學生學習品質」及「統合資源建構支持系統，維護弱勢學生受教權益」的策略目標(教育部，2013)。

以上政府教育措施皆是期望提升弱勢學童對己身之自信，降低阻礙學習的

因素（特別是文化因素）的負面效果。此外，歐美國家還會採取補助方式，提供移民學童等文化弱勢者額外的協助，如美國有提供私人家教、家庭讀寫服務、以科技改善移民學童英語的教學形式等；英國則針對標的學生增設教學助理或學習導師來做進一步的個別指導；加拿大則有年長志工陪讀、教授練習等方式（引自譚以敬等，2009）。其中，歐美國家皆強調家庭父母的共同輔導，並鼓勵家長關心、參與學童的教育，以給予移民學童全面的協助，減少因文化落差所帶來的學習差距。我國則將新住民學童列為標的學生之一，視其學習情形給予加強學習，並優先提供活動的參與，以增其多元發展的機會。

三、補救方案的執行面限制

雖然政府與民間投入相當心力於補救教育上，但在執行面上仍舊有些困境待解，這些困境茲述如下：

（一）補助經費不足的困境

學校針對弱勢學童設計不同類型的補救方案，吸引弱勢學生的參與，並自活動或課程中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人際關係與自信。但政府經費有限，只補助限定用途的專案，不一定補助學校所欲推行的方案；有時方案送審通過，實際取得的經費不一定符合活動的預期開支，或某些開支並不符合經費審核的正當名目，造成方案推行時經費不足的困境。此外，中央補助政策年年調整，補助款需自行積極爭取，學校很難顧及補助制度的設計與美意（許添明，2010）。因此，學校必須另闢資金來源，例如向學校家長會或民間組織募款，以取得經費上的補貼與金援，方得以順利完成活動的推行。所以，若政府單位在經費的審查方面可以更具彈性與空間，也能減少補救方案施行的阻礙。

（二）理論與實際的落差

「教育優先區」的補助經費，是用來照顧弱勢學生或發展學校特色。但學校常將教育優先區的經費當成一筆額外的「學校補助款」來使用，並未將經費專用於弱勢學生，而是針對全校學生來做規劃，如全校校隊集訓，或全校免費課後輔導；發展學校特色時，也是依據教師專長或興趣而開設，而非針對弱勢學生的需求加以考量，落實積極性的差別待遇（許添明，2006）。此外，教師對弱勢學生的教學方式與教育期望並未改變，以及缺乏改善弱勢學生的統整策略等，都造成理想目標與實際施行的落差（許添明，2006）。再者，亦有研究發現，家庭和學校的學習品質環境，及教師素質亦對偏鄉學生數學基測成績有影響力。這意謂，好的教育投資策略，除了要將經費真正落實在弱勢學生身上，還要將資源挹注在家庭學習品質環境與教師素質的改善，方可讓補助款發揮最大功效（許添明，2014）。

（三）學生參與率低落的挑戰

好的補救教學課程，除需有好的教材及老師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學生願意參與。稍前英國夏季學校補救教學的例子即顯示出，雖然此方案成效受到高度肯定，但依研究調查顯示，參與此方案的學校，大約只有 50%的弱勢學童參與此課程，因此如何吸引更多的弱勢學童加入，為學校最大的挑戰。調查指出，學生不參加的原因，有 46%的學校不知道為何他們不參加；有 39%是學生已有其他活動；其他因素還有「時間不適宜」、「家長不同意」、「不想參加」等等。因此，與家長保持長期良好的互動、使家長多瞭解學校課程對孩子是有幫助的，以及針對弱勢學童需求設計活潑、生動的課程，皆是學者建議的可行方向(Department for Education,UK,2013)。在臺灣亦有類似的困擾，2008 年國小弱勢學生課業輔導現況調查研究指出，課輔學校在執行過程中，普遍感到困擾的問題即是「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以及「家長不關心兒童的學習」，而學習

動機低落可能與學習失敗有密切相關性，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即成為想推動課輔方案的學校，需事前嚴肅面對與考評的重要議題（陳淑麗，2008）。

（四）績效量化的迷思

政府施行補救方案以來，無不以量化指標來呈現各校施行的成效，如社團、補救班級開設幾班、授課合計多少小時、受益學生達多少人次等等，但量化的數字雖看來客觀，卻不能真實呈現學生實質學習成就改善的程度或自信心提升的情形，也無法看出弱勢學生特定領域的個別需求。教育部習慣以「量」來呈現補助計畫的成果或硬體設備的添購，而較少以「質」或者「學生學習成效」等實質上的受益來說明補助的必要性，畢竟質化指標不易觀察與記錄（許添明，2006）。許多參與補救方案的老師，亦多採月考成績或家庭作業完成率來當評估指標，缺乏一套專業性的評估機制與補救教學體系（陳淑麗，2008）。因此，建立專業評估機制，而非僅聚焦於數字變化，是未來補救方案績效衡量需關注的基本原則。

補救教學可有效幫助弱勢學童縮短學習差距，讓「把每個孩子帶上來」、「不讓孩子落後」等扶弱理念落實。補救方案所預期達成的目標，對經濟弱勢者，盼能落實社會關懷；對文化弱勢者，盼能促使社會予以尊重；對學習弱勢者，盼能縮短城鄉及學習上的差距。補足各方弱勢缺口，讓弱勢學童提升自信、改善人際關係，站上成功的舞台。但方案在理念與實施之間仍舊面臨到經費不足、學生參與率低落、績效衡量面向偏頗等等挑戰。因此，本研究將以第一線執行補救方案的國小經驗為依據，分析補救教育方案在教育現場中的挑戰，希望分析結果有助於未來相關單位設計補救教學方案時之參考。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了解學校所提供的補救方案，對於弱勢學生是否達成所預期的成效？以及改善了弱勢學生的哪些面向？研究係採質性研究方法，以太陽花國小為研究個案，由於分析單位涉及執行者（校長、執行主管、執行教師）及受益者（學生），因此本研究屬於第二型個案研究：單一個案嵌入式設計（多重分析單元）（Yin, 2001）。

一、研究對象及訪談對象

本研究所選定的研究對象為嘉義縣的太陽花國小（化名）。該校為嘉義縣一所山區小學，根據 2013 年 9 月學校統計表，全校學生 611 人。就 2013 年 9 月上學期資料顯示，該校學生申請午餐費補助人數已超過 110 人，申請註冊費補助也有 67 人；單親、隔代教養、新住民教養之弱勢子女比例已佔學生總數之 39% 以上，一如該國小的計畫資料所言：『地方以「農業」為主要經濟來源，無任何大型工廠設廠，家長之收入普遍不高，家庭所能產生之家庭教育效能不大。因此，我們不是偏遠小學，我們也不是「不山不市」的學校，我們是位處都會邊陲地區，各項補助申請皆不符合教育部補助教育優先區指標的小學，唯一符合的指標是「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外籍配偶子女、清寒家庭比率偏高」這一項，所以我們的支援比偏遠小學缺乏，我們是屬於「非典型弱勢地區學校」』（太陽花國小申請太鼓社團經費計畫書，2012）。由於太陽花國小具有鄉下偏遠小學的特質，是補救教育的當然對象，加上弱勢學生多，相關補救方案多元，因此本研究選擇太陽花國小為研究對象。

選擇太陽花國小為研究對象後，再依方案中執行層面之不同，做為訪談對象之選判標準，分別為領導者、主辦人員、執行老師及參與的學生等 4 類受訪

者。本研究於訪談各人員之前，先口頭取得受訪者同意之後，才進行訪談、書寫開放性問卷或活動心得單，以盡到研究倫理，尊重及保護受訪者的人權。本研究中，太陽花國小各項針對弱勢學童的補救方案，計有 6 類，他們分別為：補救教學、太鼓社團、舞蹈社團、羽球社團、足球社團及火炬計畫方案。

訪談或受調查人員分別為：1.學校校長⁵。2.補救方案計畫申請者（活動主辦人）。3.補救方案的實際執行老師。4.訪談參與以上六種方案之弱勢學童。因火炬計畫方案為一短期且一次性之活動，且學生可能同時參與一至三種以上之方案或社團，故在學生受訪對象方面，以主要參與該方案，且時間至少一學期以上之弱勢學童為優先。因考量學生的表達能力與社團活動的參與程度，故習寫活動單之五位弱勢學童皆為六年級學生，其編號分別為S1～S5。受訪者資料整理於表 3。

5. 校長並非補救方案之執行者，但卻是方案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其理由如下：太陽花國小的補救教育方案相當多元，之所以有如此的組成與形式，實與校長教育理念有關，該校校長認為：「對弱勢學生的教育理念，我希望他們有成功的學習經驗，然後提高他的自信心，他有他的舞台在，引發他的頓悟、引發他各方面的學習，這是我希望他們達到的一個境界。當然，要靠行政的規劃、爭取資源，老師的教學。」(IL1-9/10-13)。易言之，希望藉由多元化的社團學習活動，激發學生的榮譽感、自信心，產生自我向上提升的動力，進而改善學業成就，使弱勢學童脫離貧窮與弱勢的循環。故學校的補救方案結合政府、民間提供的專案申請，並輔以募款所得，合計成立補救教學課程、舞蹈社團、太鼓社團、足球社團及羽球社團。這些多元化的補救社團，兼顧學童的生活、學業及行為三方面，並以弱勢學童免費或部份付費的方式辦理，給予積極性的差別待遇（田野筆記，2013.12.30）。

表 3 太陽花國小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現行職級	性別	負責/參與社團	教職年資	受訪次數	資料形式
L1	校長	男	補救方案統整	26	3	逐字稿
P1	主任	男	補救教學	24	3	逐字稿
P2	主任	男	舞蹈、足球、太鼓	18		開放式問卷
P3	主任	女	羽球、火炬計畫	20	2	逐字稿
E1	低年級教師	女	補救教學	21	3	逐字稿
E2	高年級教師	女	補救教學	11		開放式問卷
E3	教師	女	舞蹈	23		開放式問卷
E4	教師	男	足球	17		開放式問卷
E5	組長	女	太鼓	27	1	逐字稿
S1	學生1	男	補救教學、太鼓			社團活動心得單
S2	學生2	女	舞蹈			
S3	學生3	男	補救教學、太鼓			
S4	學生4	男	太鼓、足球			
S5	學生5	男	補救教學、太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個案研究在蒐集研究資料時，有許多種的證據來源：文件、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及實體物等等，並以多重證據來源，來提升研究的建構效度。不同來源的資料，彼此之間具有高度的互補性（Yin,2001），因此運用不同種類的資料來源，有助於增進研究的完整性。本研究資料證據來源可分為四種：一是針對各層級的部份主要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並將之記錄成逐字稿；一是對於有困難因素而不能進行訪談的人員，進行開放式問卷及活動單的習寫，並繕打成書面資料；一是現有的太陽花國小的次級資料，如公文、計畫書、相關活動紀錄檔等；最後一種則是研究者於教學現場的田野筆記與互動心得。透過四種資料來源，運用多元的資料蒐集方式，為太陽花國小建立個案資料庫，並找出不同來源資料間彼此相關聯的概念，使資料間可彼此交互參照與證明，增加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的嚴謹度。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補救教學的學生學習成效

本研究將探討太陽花國小實施各項補救方案之後，對弱勢學童所產生的學習成效，以下就直接的學習成效：學業成就，及間接的學習成效：人際關係、自信心及生活能力等四方面加以說明。

1.學業成就方面

學業成就指學生學科上的成績表現，訪談者多數肯定學生在接受補救方案後的學業成就表現。擔任補救課程的老師認為，學生的成績雖無法完全跟上班上的平均水準，但相較於補救前，已有所進步不致落後太多；而學生的學習態度也有所改善，懂得自我約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擔任社團活動的老師，雖無直接看見學生成績變化，但認為學生的學習態度與行為較之前良好，不致於懶散，會較專注學習，讓自己在學業成就上有更好的表現。

老師認定的進步和學生認定的進步是不一樣的，有時孩子認為，我還是那倒數三名，但其實老師知道，即便你還是那倒數三名，可是和原來的你相比，可能本來只有二十分，現在已經有四十分了，這個就是認定有沒有幫助的一個差異。(IE1-2/15-17)

多數的學童在接受過補救教學的服務後，往往能夠學習到基本的學習技巧，不至於有太多的落後，雖然沒有辦法一定有很好的表現，但至少能夠跟上課堂的學習，不至於有太差的表現。(QE2-1/26-28)

半年其實不太看得出來，不是很客觀，因為那三次月考題目難易有關係，但學習態度可能有相關。以前可能懶懶的不太想聽的，比如說這邊

如果（羽球）細心了，上課會比較熱絡會想要參與。(IP3-9/01-03)

研究者亦請五位參與社團的弱勢學童填寫活動心得單，結果發現，學生一半以上覺得自己的課業進步了，「因為上課有認真聽」(S1-Q9)、「練完後會自己複習」(S2-Q9)、「因為老師認真教導」(S5-Q9)。也有學生曾提到自己覺得最困難的是課輔班（即補救教學班）的數學課，但未來仍想繼續參加課輔班，「可以讓我的成績變好」(S3-Q11)，可見學生也感受到補救教學對自己學業成就的幫助。學生的回答對照補救教學老師所觀察到的學生表現，得到一致的結果。

2.人際關係方面

個人與個人或團體之間相互交往與影響的行為就是人際關係。良好的人際關係可以幫助自我的成長與進步，不良的人際關係可能會影響到個人的學習與行為。學生參與的課程與社團活動，需要隨時與人互動與配合，故人際關係對弱勢學童而言十分重要。訪談者一致肯定學生在參加補救方案後，人際關係方面得到改善，尤其在社團活動中更是明顯。各種社團皆是團體行動，唯有團隊合作才得以順暢進行，並在比賽中取得佳績，因此能增進學生的團隊精神。而活動中學生彼此交換意見、互相鼓勵、甚至因意見相左而吵架，最後仍是朝共同的目標前進，讓學生學會如何與人溝通。此外，參與社團活動，讓學生之間有了共同的話題，增加互動的機會，進而增進友誼。校長訪談中提及，成立大型社團的原因，就是要培養團隊精神，也可以讓更多的弱勢學童受惠(IL1-5/07-10)；主辦人員提及，學生參加比賽得了名次，成為一個亮點，人際關係也會提升(IP1-6/04-06)。另外，與低年級的補救教學學生閒聊時，學生也覺得自己的朋友變多了，認為和他一起上課的其他班同學，都是他們認識的好朋友（田野筆記，2013.12.30）。再看學生的活動心得單，他們都認為自己參加

社團後朋友變多了，社團給了他們認識新朋友的機會（S1-S5，Q8）。因此，弱勢學生參加學校補救方案後，的確有效提升了學生的人際關係。

（舞蹈太鼓足球）均屬團隊合作之運動，需培養全員良好默契，方能獲得良好成績，相信對於培養良好人際關係，學習在團體生活中體諒別人有極大幫助。觀察中發現，學習後互助的情形增加了，更願意主動幫助其他團員，共同達成目標。（QP2-2/05-07）

弱勢學童接受補救教學後，在學業上有一定的學習成效，因此在人際關係上，不至於被取笑或是捉弄、排斥，因此能夠促進他們與同儕互動，增進他們良好的人際關係。且部分個案，在同儕間還能夠請問同儕問題，也能夠拉近彼此的距離。（QE2-1/29-31）

（足球）（他們）學會彼此尊重。營隊的成員包含低、中、高年級的學生，練習或比賽時，高年級要學會注意踢球的力道、學會照顧低年級，學會指導低年級者。低年級要學會向高年級者學習，學會尊重高年級。唯有如此，才能愉快學習，並且學習到各種技巧。（QE4-2/03-05）

學業方面有無進步我看不出來，但人際關係會，他們之間因為有話題啊！當然不是全部，就是班級之中有出來（上太鼓）的，我要他們互相提醒，例如說帶鼓棒，我發現會讓他們之間關係比較密切，像好朋友一樣。（IE5-3/06-08）

3.自信心方面

訪談結果發現，弱勢學童在上台表演及代表比賽之後，學生覺得被校長重視了、被同學肯定了；接受補救教學課程之後，還能幫助同學學習。他們減少了自我否定的行為，漸漸的產生成就感與榮譽感，也會開始自我要求，學習態度及自信心部份皆有很明顯的提升。在活動心得單中，學生表示自己在參加社

團之後，「深深感受到很開心」、「我總是高人一等，讓人敬畏」、「增加了注意力和成就感」(S1、4、5，Q5-7)，再加上校長常在朝會時間，公開請舞蹈社團、太鼓社團、棒球隊、足球隊等分次起立，然後對全校學生說明他們最近參加了什麼比賽，得到了什麼名次，並請全校學生為他們鼓掌；以及哪個團隊最近要出賽，正在加緊練習，請大家為他們加油(田野筆記，2014.02.24)。所以，弱勢學生在不斷的受到肯定之後，的確有效提升了自信心。

自信心是無庸置疑的，每個學生的特質與能力本就不同，當然就有適合他們不同的學習型態。太鼓社團中即有一位學生因不善言詞、想表現又難有機會，參加太鼓後，有機會在校內外上台表現，因此變得較有自信心。大多數時候自信心是建立在別人的肯定之上的，有機會上台即有機會獲得他人肯定，自信心自然提升。(QP2-2/08-11)

何○○為單親且經濟弱勢家庭，舞蹈社團成立之初，集訓時常無法跟上團體節奏，跳舞時也不甚用心。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後，肢體動作及學習態度改變許多。參加全國比賽(有上台表現經驗)後，現在練習時他會自我要求，跟上節拍、修正舞蹈動作(QE3-1/17-20)

尤其(太鼓)有服裝之後，他們穿起就會有那種感覺，他就是要去表演了，他們以前沒機會啊！真的與剛來參加的感覺不一樣。校長也重視這件事，會去看他們表演或比賽，他們也覺得被重視。(IE5-3/11-14)

在接受服務之後，有的個案不僅能夠理解師長的指導，還能更進一步幫助同儕學習，也許是因為他們能夠彼此理解彼此的需要、疑惑，因此給予同儕一點協助，也能夠建立自己的自信喔！(QE2-2/03-05)

4.生活能力方面

由於種種社會因素使然，部份弱勢學童並不具有良好的生活能力，舉凡規

矩、禮儀等能力知覺的養成；還有做事的方法、溝通技巧等等，都是他們有待加強的部份。因此，藉由社團活動，除了學業上、人際上，以及自信心部份以外，亦可連帶培養學生的生活能力，學習其不足之處。

現在做得比較好是舞蹈和棒球，它們本身都有隊長，當老師指導教練還沒到時，他們會帶領他們做相關的暖身、相關的活動，他們也自律性的打掃或做其它的事。(IL1-5/14-17)

(足球)讓學生學會做事：對外比賽有許多物品要先準備，如護脛、開水、通知單、練習球，這些瑣碎的工作大多由小朋友來負責，利用短短的十分鐘將事情做好，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QE4-2/11-13)

那個地方(行為)我們約束好，你一點集合的時候怎麼等老師，那老師來在說的時候你該怎麼辦，然後練習當中有休息，像有一次校長拿糖果給他們吃，結果他們就搶成一團，我就會教他們說以後有類似的情況要怎麼處理，也就是在行為上給他們機會教育。(IE5-2/32-34 ~ IE5-3/01-02)

社團成員中，除了弱勢學童，亦有一般學生的參與。故在高、低成就學生融合的社團裡，弱勢學童易有角色模範(如隊長)為學習榜樣；而弱勢學童在對待比自己年幼的學弟妹時，亦可以發揮自己擅長之處，學會照顧關懷他人的情感；此外，師長也得以利用偶發事件，給予學生課堂中學不到的機會教育。因此，在團體中與人互動之餘，無形中有許多學習生活能力的機會，學生學會之後，可從中再對人際關係與自信心產生正向的影響。

太陽花國小的弱勢學童，在接受補救方案的實施之後，學業成績是有所進步的，但並非明顯趕上同儕，而是減少落後程度；在人際關係與自信心方面明顯的進步，連帶在生活能力上亦能有所學習。太陽花國小除了補救教學課程以

外，藉由社團活動的推展，讓學生可以上台表演或代表學校參賽，站上自己的舞台，給予成功的經驗，並期盼這些成功的經驗能啟動學生的學習動機，引發「頓悟」的自覺，以外在影響內在，進而改變自己的未來。

綜上所述，太陽花國小補救方案的弱勢學童在接受補救方案後，在學業、人際、自信心與生活能力皆有不同程度的進步與成長，本研究可從訪談、開放性問卷、田野筆記與學生活動心得單中得到證明，相對於量化數字呈現績效，展現了質性研究的嚴謹度。然而在方案實施過程中，學校曾在哪些方面遭遇困難？而這些困難又是由哪些因素造成？將於下一節補救方案的困境與挑戰中予以釐清與討論。

二、補救方案的困境—行政方面

補救方案在形成與執行之間，會有難以克服的障礙，使方案無法順利進行。就行政上的考量，社團活動的經費募款、學生來源的掌控、師資的取得，及時間的規劃，甚至方案成果的彙整，在在成為行政人員的考驗。

A.經費限制。從各項方案申請書中的經費規劃中得知，太陽花國小社團活動最大的經費支出是教師鐘點費，若上課教師為學校師資，一節課 260 元；若為外聘師資，則因人議價。但弱勢學童參與的團體，根本就無法以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來維持。而且若秉持學習不中斷原則，那麼由教育部補助的補救教學課程，在寒暑假也應繼續進行。可是經費的補助是有上限的，以教育部補助的原則來看，太陽花國小的教師鐘點費一年最多六十到七十萬。若寒暑假開課，開學後就無經費的著落。也因此「學校很少辦寒暑假的補救教學，如果把錢拿到這裡，我平常上課的鐘點費就會受到壓縮，就沒有辦法做到整個學期」。 (IP1-1/07-08)再者，經費的核撥與核銷，亦造成課程進行的問題，誠如受訪者所言：「撥款方式分數期，且核定時間較晚，像今年優先區核定已四月，正值

學期中，足球早已自費開課，只能靜待暑假再開始執行，11 月底前要執行完 80%，執行時會有時間壓力」(QP2-1/02-05)。是故，補助款不足、提撥經費時間與核銷問題，是造成學校在規劃與執行方案時的第一項困境。

B.學生來源。如何篩選出弱勢學生，以及如何吸引他們參加補救方案，是執行上的挑戰之一。因為各個老師並不一定會完全幫忙，受訪者就談到：「……請老師幫忙找出弱勢學生，有些老師……認真去找出這些學生，跟家長溝通……，我們也有看到，老師叫有興趣的全部舉手……只是交差了事……老師們有沒有善盡你清查的職責，……有無落實審核？都會造成弱勢學生的來源不能確定。」(IL1-2/23-32)。再者由於太陽花國小「……很少在幫他們（學生）做性向的測驗，……沒有辦法提供……你（學生）對哪個活動、運動是有興趣的……然後家長也沒有辦法協助我們……」(IL1-3/12-25)。簡言之，學校雖有弱勢學生的指標可參酌，但學校老師並沒有落實審核。學校缺乏學生性向測驗的相關檢測工具，所以學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對什麼社團活動有興趣，對自己不夠了解，因此導致學校雖提供不同性質的社團活動吸引弱勢學童的參與，但參與的學生，是否真對該社團有高度的興趣或優勢，則完全無法判定。

C.補救教學師資問題。學校教師素質是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一項極重要的因素（許添明，2013）。因此學生對課程學習成效的好壞，師資是個很重要的點。但是這只是個理想，因為「外聘老師……的節數如果不足以支持一個沒有副業的老師生活下去，找老師其實是有困難的。……老師不是很穩定，教學方式（學校）也不是很相信」(IP1-1/03-05)。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再有理想的老師也需要生活，當然制度上也有一些限制，「……依目前政府的做法，連正式老師都編不足了，像我們學校目前，我常常都在找老師，有時還真的先有人來做就好，做得怎麼樣？再說，做不好再改。」(IP1-5/21-23)。由上可知，因生計及制度因素，好的外聘教師並不好找，尤其是太陽花國小這種因在離市區遠的弱勢小學，學校的鐘點費無法吸引他留下來任教。高年級的補救課程在每

週一、二、四、五的第八節課，課程時間過於分散，節數也過少，無法留住外聘老師。低年級則是每週一、四、五的下午共九節課，曾經還勉強聘得到外聘教師，但素質良莠不齊，也少有豐富教學經驗及班級經營的方法，對學生不見得有補救的成效（田野筆記，2014.02.24）。

D、政策運作缺乏彈性。一個方案的推行，有層層環節相互影響。除了經費、學生與師資問題之外，對於上級所要求達成的指令，行政方面產生力有未逮之感。受訪者談到：「……訪委認為「你們可以跟他（弱勢學生）收費呀！」……這些來接受教學的，是經濟地位弱勢和學習弱勢的，他如果有辦法繳出錢來這裡的話，那乾脆上補習班反而比較完整……。以一個承辦人來講，……為什麼你（教育部）政策推行會失敗，因為你步驟太複雜，複雜的東西一定都失敗」。 (IP1-1/23-29)。的確，學校行政人員亦是學校專任教師，但不僅申請補救方案程序龐雜、執程序僵化，造成方案窒礙難行，而學期中還要不斷面對上級所派下不同的配合指令及成果要求。這讓身兼多職的老師，心力交瘁，分身乏術，實在很難讓人願意主動辦理充滿變數的補救方案。

三、補救方案的困境—教學實施方面

當學校已規劃好補救方案，找到經費、學生、師資，安排了課程的時間地點等細項之後，接下來就是教學上的實施。在教學實施的過程中，老師的教學心態是否因政策的需要而做好調整？對於程度不一的學生，在教材的準備上能否配合？而實施的時間夠不夠學生學習理解？以下就實施過程中教師、教材及時間三方面加以探討。

A、補救精神無法落實。教育部原訂補救教學方式為小班教學，也就是六至十二人的小班共同或個別進行學生起始點的學習指導。例如四年級的學生，其數學程度僅小二，那就利用小二的數學教材，對該學生進行小二數學科的學

習指導。太陽花國小的老師在實施補救教學時，尤其是中高年級的補救教學，每次皆只有四十分鐘，若純拿來上課補救學生起始點，回家後家庭支持系統不佳，無法督促學生完成家課，造成學生仍是持續的落後，所以教學實施仍是以老師教學者的觀念為主，學生要先完成家課，再施行補救。誠如受訪者所言：

「……學校老師，其實他們都有在指導學生，現在，我們不要寫作業，好好的來上這個（起始）點，我覺得這個很難。因為他的家裡沒有支持的系統，家課還是沒有寫來嘛！而且它不是針對他要考的科目，月考成績也不會顯現進步。」

(IP1-2/26-30)

雖然家課內容的指導仍是從學習的起始點教到他懂，但這與教育部的目標——「以學生為學習中心」觀念有部份相違，多數老師仍認為學生應以先完成家課為主，從家課的內容開始做學習觀念的補救，或折衷為邊寫家課邊個別補救（低年級的執行方式）。另外，學業仍為學生應盡之本份，連校長都要求學生要先完成功課：「若基本的東西沒做到（寫功課），在其它團隊有再好的表現都沒用！請帶隊的社團老師注意這點。」（田野筆記，2014.03.04）學校原本希望在補救方案實施的過程中，從多方的管道與機會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但因老師理念的堅持，以及課業與社團的衝突，造成補救教學的精神無法落實，是實施方案時的一大挑戰。

B、教材準備。參加補救的學童，通常是無法跟上既定的課程者，因此老師若能因材施教，對學童的助益應該最大，但這也是一大難題，這亦是受訪者心聲：「我覺得最有挑戰的是教材的準備，因為學生的程度不一樣，所以教材方面要特別為學生設計，也要去理解學生的程度……」。(QE2-1/03-07)。但針對不同起始點的學生，要從不同的地方切入。一個學生一種、六個學生就要六種，使教材與備課成為極大的挑戰，尤其學習弱勢的學童，需要反覆、具體的引導，還要不斷的試驗能使他「聽懂」的方法。「我們都是從一對一的教學中，找出他需要的那個管道」(IE1-1/05)。每人要用不同的方式與不同的教材，對

老師極有挑戰性。

C、時間不足。不論是補救教學課程或是社團，所能使用的時間皆是學生的課後時間，少少的時間，難以累積一個足夠的量來達成教育目標。一如受訪者所言：「（補救教學）像我們這種大型學校，一天留他下來四十分鐘、六個小孩，幾乎等於山上一個班級，它能夠做什麼？我覺得還滿難的，一對一、一對二看還有沒有辦法。而一對六，用很少的錢去做很偉大的事情，我覺得太難了。我們要去思考說，一個家長在家裡面，教一個自己的小孩，我們要教一兩個小時，才能幫他把一點點他不會的觀念建立起來，何況是對六個弱勢家庭的孩子，那又更難了。」（IP1-3/05-11）

四、補救方案的困境—學生參與方面

補救方案最重要的角色雖是學生，但家長、同儕、學校等面向的支持亦相當重要。但這些支持體系，通常都無法扮演促進弱勢學童學習的功能，有時反而是阻礙因素，以下 5 項即為明例。

A、家長支持度低。如何去說服家長讓孩子前來，或鼓勵孩子堅持下去，是一大挑戰。但事實是「孩子回家跟家長說，我不想去了，有些家長其實長期以來對他的孩子的能力也不抱持著期待，他也認為說”讀無冊就讀無冊，啊無嘜去好了”」（IP1-4/02-03）。補救教學課程雖是為孩子免費補救課程學習上的落差，是家長「比較喜歡」的，但是家長仍未因此就會在家配合督促，反而更放心的「交給老師負責就好，我不管小孩。」（IE1-1/18-22）此外，孩子初時參加，後來卻退出的原因，有的是家長寵溺，有的是不抱期待，還有嫌接送麻煩等種種因素，而這些也是學校難以克服的地方。另外還有些家長的理念不恰當，有位受訪者就無奈地說：「（親子教育）該來的他完全不來參加，因為他對這方面沒興趣，除非你還附贈紀念品、醬油、肥皂，利之所趨，他才願意過來。」

所以怎麼去鼓勵家長？很難哪！怎麼去重新教育家長？以學校現有機能是非常難的，……」(IL1-5/29-34)。總體來說，太陽花國小的補救方案，不論是課程或是社團，弱勢學童的家長支持度皆為偏低，家長對孩子沒有積極性，對於學校的多方機會顯得都無所謂。政府、民間與學校投注許多的資源與心力，結果該來的都不來，學校亦是束手無策。

B、學生意願不高。受訪老師談到：「小孩拒學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成就感，所以導致學習動機低落，排斥學習……」(QE2-1/11-13)。這一點的確與學生的反應相符，學生在活動心得單中提到不想參加的社團及其理由：「其它（除舞蹈外都不想參加），因為很無聊」(S2, Q12)；「羽球，要到下午才能回去」(S3, Q12)；「舞蹈，要記很多動作」(S5, Q12)。學生自己不想來的原因，可能是覺得課程無趣，也可能是耽誤到他放學回家的時間，還有那是自己最不拿手的項目。學生也提到參加的活動中「課輔班最困難，因為都要學習我比較不會的數學」(S3, Q3) 要讓弱勢學生有想來的欲望，就好像逼自己去喜歡自己最差的技能一樣，具有一定的困難度。若內在動機不夠、外在支持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學校可能努力的方向就是去營造一個讓他想留下來的友善環境，也就是同儕的支持、師長的鼓勵，以及吸引他的軟硬體設備，包含活動內容與學習環境的改善。

C、同儕影響。同學對學生的影響很大，對於想尋求他人認同的國小學童而言，有時同儕間的影響更甚於師長的態度。在訪談資料中亦充分反映出此一論點：「學生半途而廢的情況很多，……他們的理由是「好朋友不練，如果他不練，我練幹嘛？」然後一個接一個，所以都不是只有一個人，可能是兩個三個四個這樣……」(IP3-7/10-17)。另外亦有：「曾經遇過同儕取笑的問題，因此導致個案不想學習，必須要幫個案排除遇到的取笑問題，個案才願意繼續學習。」(QE2-1/13-15)。以上例證皆顯示學生會因同儕壓力而影響其學習意願強度，如何疏導此類同儕作用力，應是補救教育方案教現場應該特別關注的事項。

D、課業優先。家長對學生的另一個影響是：只注重課業，其餘皆是多餘的。受訪者亦談到：「成員招收不易：家長認為踢球會影響課業而不讓學生參加營隊。」(QE4-1/04)、「我們太鼓第一梯本來有很優的，但是他們後來沒有來，原因是因為要補習。」(IE5-2/15-16)、「這學期好幾個人退了，多是因為要補習或課業的壓力，因有些家長可能認為，你運動只是浪費時間。」(IP3-6/08-10)，家長認定學生到校最重要的事便是學習，且認為課業上的加強更勝於社團的練習，如此讓學生更容易因課業的因素而犧牲原本想參加的社團，並影響其參與率及其他可能經驗的成長效果。

F、挫折忍受度低。對於課程式的補救教學，需要不斷的動腦思索；對於活動式的社團技巧，則有長期耗體力且重覆操作的練習。但學生的挫折忍受力，也讓許多受訪者大嘆無力：「(羽球)就 101 下學期而言，全部約有三十人左右，但後來有在減少，大部份是弱勢的不來了，有的覺得太累了，有的不能吃苦，到最後剩下二十初。」(IP3-5/21-23)、「都免費吔！球拍也都提供，有時他只說不想練了。我們也會鼓勵他啦！不要光羨慕人家有好成績，其實人家營隊是多麼認真、多麼吃苦在練。」(IP3-6/01-03)、「(學生不來是因)舞蹈訓練是長期且耗費體力，除集訓時間外，學生必須利用課餘時間練習動作、拉筋，讓自己的舞姿更優雅。有些學生長期下來，覺得很辛苦。」(QE3-1/10-11)。從引述得知，社團中半途而廢的多是弱勢學生，而一般學生反而能堅持到底。一篇英國對弱勢小學生的策略因應報告中曾指出，弱勢效應經常是累進和普遍的影響弱勢學童的學習成效，因為貧困小孩的學習進展速度通常較同儕來得緩慢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UK, 2009)。因此，研究者推測，弱勢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遭受的挫折較一般學生為多、學習進展更為緩慢，又缺乏足夠的內在自信與外在家庭的堅持鼓勵，因此顯現而出的是不能吃苦，挫折忍受度低的外在表徵。

G、標籤化。有些家長認為補救教學會讓子女被標籤化，以致產生排斥心

理；而參加補救教學的學生也會感覺被標籤化，學習動機較低(張新仁，2001)。而這種狀況亦發生在太陽花小學中，例如：「家長對跳舞和太鼓的看法也不一樣，他們會覺得跳舞的層次比較高，太鼓的就比較”庄下”層次較低；尤其有些弱勢的家長阿公也是在廟裡打鼓，他們（家長）也會把這個做連結。」(IE5-2/03-06)、「(火炬計畫)我們當時叫小朋友來參加活動的時候，.....有些班級的學生會抱怨「怎麼又是他們？」.....有幾個比較調皮的就說「喔！都是你們可以參加」，另外一個就說「難道你希望你的媽媽是新住民？」這不是感覺又被貶低了嗎？」(IP3-3/18-25)。其實在太陽花國小的各項社團中，舞蹈、足球、羽球學生高低程度參雜，而太鼓主要為弱勢學童，部份家長便有「舞蹈高、太鼓低」的觀感。而最明顯的是火炬計畫，活動標明為新住民子女參加，才出現標籤化的問題。其實在國小階段的學童，並沒有將自己與新住民子女做一區分，直到火炬計畫方案的執行，反而讓他們注意到「新住民子女」這個身份別，且言談之間充滿貶意。火炬計畫的原意是培養民眾尊重多元文化，但因身份的聚焦，反而產生負向的困擾，也未因此提升新住民子女對學校活動的參與動機。

H、校外誘惑。除了以上困擾外，外在活動總是比在學校學習更具吸引力，「例如偶爾的廟會活動、電腦遊戲等等」(QE2-1/14-17)。而反映在參與率上，之前曾提及，太陽花小學全校弱勢學生佔 39%，但參與社團的目標學生僅 20～30%，如此低的參與率與校外誘惑脫離不了關係。沒有參加社團、也沒有安親補習的學生，因家庭的支持度低，不會鼓勵孩子參加，反而放任他們在街上遊蕩或在家上網玩電腦遊戲，長期惡性循環下來，就有可能造成未來的社會問題。

五、補救方案的困境—學習成效方面

太陽花國小在實施各項補救方案之後，學業、人際、自信與生活能力皆有不同程度的進步與成長，但又因行政運作、教學實施及學生參與上的難題，而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成效，其中又以學業學習的補救教學課程為甚。以下分別就學習的過程、學生的學習動機、本身程度及學習態度等方面加以探討分析。

A、學習中斷。對弱勢學童的補救教學更應持續進行，以免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然而太陽花國小的補救教學，也面臨了同樣的困境。一位受訪者對此狀況描述得很寫實：「……最困難的就是禮拜二、禮拜三和假日的時候，他就又很容易退回去原來的點。禮拜一上的，二三就退；四五上，六日又退回去，讓進步變得更慢，因為不是持續的五天都是；還有暑假，暑假最可怕了，直接打回原形，畢竟我們沒有辦法跟在他們的身邊。」(IE1-1/05-09)

如 E1 老師所言：「直接打回原形」。外國也有相同的研究結果，並給予一個專有名詞，叫做「夏季失落」(summer loss)(教育部電子報，2013)。政府的補救教學課程雖也能於寒暑假開課，但受限於節數及師資問題，太陽花國小並無法施行，因此學生學習的學習成效無法顯著改善。另外，針對補救教學課程部份，有每年節數的上限，以及通過篩選測驗後即停止補救教學的機制，不但造成學校的補救教學課程無法整年持續，也造成原本持續進步的學生，因測驗合格而不能再來上課的情形。E1 老師曾言，「要花那麼多心力，才能慢慢的把他從谷底一點一點的拉上來，拉了好久。如果因測驗合格而不能來補救，那很快就打回原點，因為他們的家庭根本沒辦法幫他！他們都是靠學校的老師，要溜下去很快，要拉上來卻要花很久、很多的力氣。」(田野筆記，2014.02.14)。然而政府的補救教學政策缺乏彈性，如承辦人 P1 所言，「補救教學就如同醫病關係，學生是需要診療的病人，醫生治你三個月後完全康復，你就該”出院”了。所以補救教學的學生經篩選測驗結果合格後，就不需再補救，線上測驗

時就直接把合格學生的名單鎖死，你也不能再讓他報名了。」（田野筆記，2014.03.03）。因此，在學生尚未能完全主動學習時，學習的中斷會讓補救教學的成效大打折扣；另外因補救成效提升後被判定不需再補救的學生，可能一段時間過後又重新產生需要，但因政府對補救教學節數的限制、學生程度的限制、實施方式的限制等等政策上的機制使然，造成一種學習上的環境障礙，使學校無法再繼續幫助弱勢學童。

B、學習動機低落。弱勢學童易因學習成就低落而失去學習動力，不想主動學習，一如受訪者所言：「這些來的學生，他的心態也沒有改變哪！他覺得他是被留下來的，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重新燃起他學習的熱情。燃起學習的熱情，他才學得來。學生來其實是他符合這個資格，篩選後弱勢的學生。他來了，學習的熱情？沒有。當熱情沒有被激發，是不能好好學習的，這是最大的挑戰。」（IP1-2/15-18）。當然，若弱勢學生參加補救教學課程是被強迫來的，不是心甘情願的，那他的學習成效是有限的，如同學生在活動心得單上所言：「因為我的心沒有在功課上」（S3，Q9）。人來心沒來，怎能學好應學的課程呢？

C、學生程度不一。弱勢學生因經濟、文化、社會三方面的影響，造成他們在學習方面具有「教育劣勢」，使之在學校時，與一般學生在能力與性向表現上產生落差（Thomas,2001）。也就是在學習過程中，和一般學生相較之下，弱勢學生程度是比較不好的，成為教學老師在施行方案時的一大挑戰。以下2位活動老師所言，正好佐證了如此說法：「學生舞蹈基礎落差頗大，編舞時需依學生程度不同，編排不同動作，耗費心力最大。」（QE3-1/04）、「太鼓的學生全部是25個，弱勢的大概20個，他們的程度也都各自不一。……造成我們老師的壓力，可是你又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可是要把每一個都帶上來又很難。」（IE5-1/14-20）。因此，無論是課程或是社團，教學老師都需考量到弱勢學生的需求，設計或加強他們程度落後的部份，但此舉會使老師額外付出相當多的心

力，對已十分繁忙的老師，感到相當的壓力。

D、學習態度不佳。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有很大的正相關。學生學習態度良好，教學施行過程就會順暢，進而就會有不錯的學習成效。相對的，若學生學習態度不佳，不認真的態度會影響學習上的吸收，使得學習成效不佳。例如受訪內容顯示：「(足球)放假來學校，學生認為是來玩，學習態度比較不嚴謹。如果星期五晚上又太晚睡，星期六早上就賴床而造成缺課。」(QE4-1/02-03)，即為例證之一。而有時免費的學習，亦是形塑這種學習態度的重要原因，例如受訪者就談到：「學校補給很多弱勢學生，什麼獎助學金也好，資源也好，各種的，好像讓他覺得，我只要進來就好，我不用努力，什麼都不用錢。現在養成一個壞習慣就是，連家長也這麼認為。」(IP3-8/08-10)

太陽花國小對弱勢學童的協助政策之一，就是補助經費，吸引他們參加想學的社團，結果在施行過程中，因為辛苦、不好玩就半途而廢的多是弱勢學童，或是參加之後也不懂得珍惜機會、不努力學習。免費的補助政策，究竟是使弱勢學生更積極？還是更懶散？社團因屬於非課程活動，相形之下，學生的態度也較為輕鬆，不放在心上。另外，學校因顧及學生的經濟弱勢而給予費用上的免費，但間接的造成學生對得來不易的機會不珍惜的想法。「給他魚吃？還是教他釣魚？」一直是補救方案的爭議之一。

前述分析指出太陽花國小的補救方案從規劃到執行，因種種因素的影響，使弱勢學童的學習成效，與學校預期的目標產生落差。這些可能性因素可分為行政方面、教學實施過程、學生的參與，以及學生的學習成效等四大層面，且各層面彼此間也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後者係因弱勢學生的內外支持環境（家庭與學校）的限制／障礙具有加乘累積的效應所致，舉例來說，當學童在學校學習遭遇到挫折時，即會產生失落感，減損學習自信，若此時家長及學校無法給予適時的支持或協助，那麼學童學習問題將無法被解決，反而會累積挫折感。以上狀況長久累積下來，即可能養成逃避的學習動機低落、學習態度不

佳，以及參加意願不高的結果，如此更會進一步導致學習挫折感的加深，以致無法自拔。

我們認為，如上學習弱勢的累積效果是存在於弱勢學童之中，而前揭所談及的補救教育方案亦無法完全解決此一癥結，即補救教育理想與實踐現實間的缺口是無法避免。不過由第一節的討論中，我們亦可發現太陽花國小補救教學方案對弱勢學童，還是有一定的正面效益存在。因此，如何降低障礙，擴大正功效，恐是所有執行補救教育方案國小，最現實且最應優先考慮的問題。

伍、結論

本研究以嘉義縣太陽花國小為例，探討該校針對弱勢學童的補救方案之施行現況、成效與困境，主要研究結果有二：1. 學校補救方案施行的成效：學校針對弱勢學生的補救方案實施之後，可在學生身上看到人際互動關係的改善與自信心的提升，連帶培養了生活能力，學會做事的方法。而在課業成就方面，雖不至有十分明顯的提升，但至少可減少與一般學生的落後差距，學生也能感受到自己的進步，對於參加課程或社團活動感到十分開心。2. 學校補救方案施行的困境：該校在施行補救教育過程中亦面臨多重挑戰，這些挑戰包括—A.經費方面有經費不足與核銷的問題；B.師資方面，專業外聘師資有所缺乏、校內老師又堅持以學校課業為主，使補救教學無法落實以學生為學習本體的精神；C.學生方面，則面臨弱勢學童因家長、課業、同儕、標籤化、自我動機及挫折忍受力低落的緣故，不來參加或中途退出社團的情形；D.再加上時間所限導致學習的中斷、政策運行的複雜僵化、學生程度不一，以學習態度不佳等種種因素，皆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成效。以上所提及的難題，彼此之間又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使目標學生的學習成效與預期目標產生了落差。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建議未來若要縮小補救教育方案之理想與實踐間

的缺口，可由如下幾個方向著手：

1.政府補救教育方案經費補助，宜充足、彈性，並考慮到長期施行，例如：為使補救教學課程的學習可持續不中斷，建議提高每年補救課程節數上限，使弱勢學童的學習可從學期中延伸至寒暑假，並增加每週上課節數，使老師有充份的時間因材施教，方可有效拉近學習的差距。

2.對於補救教學現場的課程設計與實施，應視不同學校的情況給予彈性及合理調整，如針對特殊弱勢學童施行一對一或一對二教學，或增列 8:00~8:40 的導師時間來授課，既不耽誤正課時間，又可每天補救。影響弱勢學童的因素複雜多重，加上其內外在的支持力又低，若能在執行政策時可因地因事制宜，給予操作上的彈性，不但可增加弱勢學童的參與度，亦可提升補救方案的學習成效。

3.施行補救教學的學校，宜強化內部與外部溝通，確保老師間及親師間對於補救教學精神能理解、並有合理的期待，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及支持學習的環境，以協助學習弱勢學童。

以上建議雖不能完全解除現行補救教育方案的限制，但至少可降低弱勢學童的學習障礙，增加其改善學習弱勢的機會，落實補救方案的教育理念。當然本文僅為一個案式研究，相關研究結果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背景，其實仍有許多值得探的議題在本文中並無法一窺究竟，例如：教育優先區的補助對象由原來偏鄉弱勢學校為主，到目前擴大補助對象，其政策轉折理由；弱勢教育及教育福利（包括原住民部落學校）的歷史比較分析……。因此我們期待未來有更多相關研究，更廣泛地揭露補救教育的理想與現實狀況，若能如此，那麼「適性揚才、多元進路、把每個孩子帶上來」的教育理想方可更具現其實踐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 三花棉業公益教育基金會，網址：<http://www.sunflower.org.tw/>
- 中興保全文教基金會，網址：<http://www.tscf.org.tw/index.asp>
-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網址：<http://www.cdibf.org/>
-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網址：<http://reading.cw.com.tw/>
- 世界展望會，網址：<http://www.worldvision.org.tw/index.php>
- 永齡教育基金會，網址：<http://www.yonglin.org.tw/education-site-embeded.html>
- 呂朝賢、陳柯玫、陳琇惠（2014）。〈童年剝奪及其成因〉。論文發表於臺灣社會福利學會(主辦)，《2014 年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3-24 日）。舉辦地點：嘉義中正大學。
- 李孟峰、連廷嘉（2010）。〈「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實施歷程與成效之研究〉。《教育實踐與研究》，23（1），115-144。
- 兒童福利聯盟（2013）。《2013 台灣偏鄉弱勢學童學習貧窮分析報告》。2013 年 1 月 21 日取自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網址：http://www.children.org.tw/news/advocacy_detail/974
- 尚榮安（譯），Robert K. Yin 著（2001）。《個案研究法》。臺北：弘智文化。
- 洪儷瑜（2012）。〈由補救教學到三層級學習支援〉。《教育研究月刊》，221，13-24。
- 孫秀芳（2014）。《國小學童同儕關係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嘉義：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張新仁（2000）。〈補救教學面面觀〉。論文發表於《義務教育階段補救教學系統研究與實務研討會》。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 張新仁（2001）。〈實施補救教學之課程與教學設計〉。《教育學刊》，17，85-106。
- 教育部（2009）。《教育部補助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要點》。（2009-01-13 廢止

／停止適用），網址：<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8010>

教育部（201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核定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網站》。網址：<http://12basic.edu.tw/>

教育部（2012）。《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2012年11月22日取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網址：http://www.tpde.edu.tw/ap/law_list.aspx

教育部（2013）。《103年度施政計畫，教育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edu.tw/pages/list.aspx?Node=2041&Type=1&Index=9&WID=45a6f039-fcaf-44fe-830e-50882aab1121>

教育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edu.tw/>

許添明（2006）。〈教育優先區對提升弱勢族群教育的實際成效批判〉。《現代教育論壇》，15，433-441。

許添明（2010）。〈弱勢者學習協助計畫：不應只有補救教學〉。《教育研究月刊》，199，32-41。

許添明（2014）。《影響我國偏遠與非偏遠地區國中學生學業成就之教育資源研究》。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8-2410-H-003-009-SS2）

陳淑麗、曾世杰（2007）。《我國弱勢學童課後學習輔導現況與效益分析：調查與準實驗研究》。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5-2413-H-143-001-SSS）。

陳淑麗（2008）。〈國小弱勢學生課業輔導現況調查之研究〉。《臺東大學教育學報》，19（1），1-32。

陳麗珠（2007）。〈論資源分配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關係：以國民教育為例〉。《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3（3），33-54。

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網址：<http://www.boyo.org.tw/boyo/index.php>

鄭勝耀（2013）。〈弱勢學生與補救教學之研究〉。《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30（1），13-26。

譚以敬、吳清山（2009）。〈臺北市弱勢學生教育政策的現況及其未來因應措施之研究〉。《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8，77-94。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UK (2013). *Summer Schools Program for Disadvantaged Pupils: Overview Repor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ummer-schools-program-for-disadvantaged-pupils-overview-report>

INTO (Irish National Teachers's Organization) (1994). *Remedial Education: A Review*. Dublin: Irish National Teachers's Organization

Kellaghan, T. (2001).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Educational Disadvantage. *The Irish Journal of Education/Iris Eireannach an Oideachais*, 32: 3-22.

研究論文

從漢譯偈頌探勘佛教的美學意蘊^{*} ：以本緣部佛傳為考察中心

王晴慧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12 月 21 日。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漢譯佛典文學研究”（批號：12AZW007）階段研究成果。謝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漢譯佛傳的性質相對於其他佛典而言，是較為特殊的，因為它體現了佛教內部以文學形式來塑造佛陀形象的特色，而佛陀形象也成為修行者行為的依歸與典範。漢譯佛傳的形式是以長行與偈頌所組成，相對於長行而言，偈頌的文學特質與美學感染力，實是大於長行的。在吟頌或歌歎過程中，偈頌能引發人類本質裡對美好事物興起共鳴的情感，進而強化及形塑佛教的生命美學走向。故本文以大正藏本緣部中，專門記載佛傳故事且含有偈頌的十部漢譯佛傳，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察漢譯佛傳偈頌所敘之內容及其美學意蘊，試圖揭示佛傳偈頌所蘊含的佛教美學。本文將漢譯佛傳裡蘊含豐富美學意蘊的偈頌，歸納出五點獨具宗教特色、內蘊豐富的佛教美學表現：人格典範美、清淨之美、寂靜之美、力之美、以花供佛之美，並論述此類偈頌所展現的美學意蘊。

關鍵詞：漢譯佛典、漢譯佛傳、偈頌、本緣部、美學

**A Research to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Chinese-translated Gatha—BEN- YUAN- BU
Chinese-translated Buddha Biography as study center**

Chin-Hui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sia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translated Buddha Biography nature relative to other Buddhist scriptures, is more special, because it reflects the use of literary form of Buddhism to shap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ddha image, so Buddha image has become the practitioner's mind and behavior model. Chinese-translated Buddha Biography in the form of prose and gatha are composed, Relative to the prose, gatha of the literary qualities and aesthetic appeal is much greater. Chant or song sigh process, Gatha can lead to good things in human nature rise in emotional resonance, thereby strengthening and shaping the aesthetic life to Buddhism.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ipitaka's BEN- YUAN- BU, devoted to documenting the story of the Buddha and contains verses of te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m, 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examine the content and Aesthetic Translation of Gatha of Chinese-translated Buddha Biography, trying to reveal the Buddhist aesthetics in the Gatha. This paper summarizes Chinese-translated Buddha Biography rich in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Gatha, for five o'clock unique Buddhist aesthetics: The aesthetics of personality models, The aesthetics of śuddha, The aesthetics of parinirvāṇa (The aesthetics of peace), The aesthetics of flower dedicated to Buddha, and discusses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these Gatha.

Keyword :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Chinese-translated Buddha Biography, Gatha (Chih-Song) , BEN- YUAN- BU, Aesthetics

壹、前言

北傳佛教的漢譯佛典，在《大正新脩大藏經》¹第三、四冊的《本緣部》裡，有多部代表性佛傳經典，這些以傳述佛陀生平事蹟為主要內容的佛傳，因結構宏大、描摹細密、構思新巧、表現恢奇，進而形成所謂的「佛傳文學」²，其文學性之強烈與表現，已為佛教文學研究者多所探討。³這些佛傳的共通點是：佛傳的文學敘事性強烈，演繹了佛陀的一生事蹟，建構出後世形塑佛陀形象的認知來源。由於這些佛傳是漢譯的，故本文稱為「漢譯佛傳」，以區別於非漢譯的佛傳經典。

漢譯佛傳的性質相對於漢譯佛典中的其他佛典而言，是較為特殊的，因為它體現了佛教內部以文學形式來塑造佛陀形象的特色，且基於宗教傳播所需及崇敬教主之情，佛傳的內容，往往對佛陀形象的刻畫，有理想化、奇麗式，甚化夸飾性的文學性描述。

漢譯佛傳的文學形式，與其他佛典形式一樣，是以修多羅（梵語Sūtra）或偈頌來表現。修多羅是音譯，意譯即長行或契經，指佛典中以散文述說教義的

¹ 《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以下簡稱《大正》。

² 深浦正文，《佛教文學概論》（京都：永田文昌堂，1970年）將佛教文學體裁分為譬喻、本生、佛傳、理想、贊頌等十種；山田龍城，《梵語佛典の諸文獻》（京都：平樂寺書店，1959年。中譯本《梵語佛典導論》，許洋主譯，收入《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79冊，華宇出版社，1988年）將原始佛教的典籍，分為阿含類、毘奈耶類、譬喻文學、佛傳文學、贊頌文學五大類；水野弘元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佛教的真髓》（嘉義市：財團法人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附設香光書鄉出版社，1986年）第十二章亦視佛傳是一種譬喻（故事）性的文學作品；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台北市：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將佛典中文學性較強的部分，分為佛傳文學、贊佛文學、譬喻和譬喻經、因緣經。

³ 常盤大定，《仏伝集成》（東京：丙午出版社，1924年）；木村泰賢校閱並平等通昭共著，《梵文佛傳文學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30年）；外薗幸一，《ラリタヴィスタラの研究(上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94年）；雲井昭善，〈「佛傳」と「佛傳文學」〉，《龍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33期（1994年11月），頁262-278；河野訓，《漢譯佛傳研究》（伊勢：皇學館大學出版社，2007年）。Nancy Falk, "To Gaze on the Sacred Sites," *History of Religions* 16:4 (May, 1977)。

部份。偈頌則是與修多羅相對，在印度佛教時期是屬於韻文且可歌的詩體。⁴「偈頌」一詞應是梵語Gāthā的音譯與意譯之合名，亦簡稱為偈⁵：「偈」為梵文Gāthā音譯，「頌」則為古人根據Gāthā的文體，相對應於中國本有的文體—頌—而稱呼之。⁶亦即以中國傳統的文體—「頌」，釋義外來的文體—「偈」，應是根據二者之間所具備的共性，亦即“必有讚德”（羅什所言）這一特色。且古人認為頌之文體特色為典雅清鑠、不入華侈，也可說是漢譯偈頌的特色，故將祇夜、伽陀、優陀那統稱為偈頌，應是取其相通之處。⁷

偈頌合稱為一名詞，本文推論可能是東漢末左右方出現於譯經中，但此時並不頻繁運用於漢譯佛典中。考察諸經，用為名詞者，經藏類如吳支謙《撰集百緣經》卷六：「爾時天子，即以偈頌，答帝釋曰」⁸、東晉瞿曇僧伽提婆《增壹阿含經》卷三：「我聲聞中第一比丘，……能造偈頌，嘆如來德，鵬耆舍比丘是。」⁹、《增壹阿含經》卷六：「爾時，釋提桓因即以偈頌問如來義」¹⁰；經

⁴ 據僧祐《出三藏記集·鳩摩羅什傳》，鳩摩羅什曾與僧叡談論西方辭體：「什每為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大正》55・101c）。慧皎《高僧傳·鳩摩羅什傳》亦記載這一段事（《大正》50・332b）。可知在印度國俗中，偈頌的內容是以讚德為主，並且可入弦歌頌的。按：《大正》55・101c 指大正藏第55冊101頁下欄，大正藏本文排版的上、中、下欄位以a、b、c表示，以下皆同。

⁵ 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三：「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陀，梵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陀。伽陀者，唐言頌。」（《大正》51・882c～883a），唐代法寶《俱舍論疏》卷一：「梵云伽陀，舊名為偈，此訛略也，訛伽為偈又略其陀。」（《大正》41・465a）由上文中可知，「伽陀」於唐以前又簡稱為「偈」，唐代則言「頌」。

⁶ 王晴慧，《六朝漢譯佛典偈頌與詩歌之研究》（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27。

⁷ 劉勰《文心雕龍》：「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162）；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頌之正體也。」（《文體序說三種：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文章緣起注》台北市：大安，1998年，頁100）；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頌」：「古作頌貌，今作容貌，古今字之異也。容者，盛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台北縣：漢京文化，1985年，頁416）。

⁸ 《大正》4・230b。

⁹ 《大正》2・557b。

¹⁰ 《大正》2・575a。

錄類如《出三藏記集·鳩摩羅什傳》：「經中偈頌，皆其式也。」¹¹以上這些是當時少數將「偈頌」當一名詞來使用的。本文檢視隋代以前漢譯佛典，以「偈頌」當名詞而頻繁運用於佛典者極少，大多僅稱呼為「偈」；若就隋代以前有偈頌之漢譯佛典統計之，則可發現佛典大多僅以「偈」稱呼長行之後欲吟誦之偈頌；¹²直到隋唐如《佛本行集經》、《方廣大莊嚴經》等佛典中，才開始頻繁使用「偈頌」當名詞，¹³此應係隨時代變遷而譯語逐漸改變的現象，我們現在常稱佛典中的偈為偈頌應是如此，因此本文亦隨順稱呼為偈頌。

偈頌包括九分教及十二分教¹⁴中的祇夜（梵語Geya）、伽陀（梵語Gāthā）

¹¹ 《大正》55・101c。

¹² 例如東漢《修行本起經》於偈頌起始前說「佛說偈言」、「即說偈言」、「以偈答王言」等；東漢《中本起經》於偈頌起始前說「說所聞偈」、「梵志聞偈」、「而作頌曰」、「以偈答曰」等；吳《佛開解梵志阿毘曇經》於偈頌起始前說「為說偈言」；西晉《普曜經》於偈頌起始前說「自然宣出此微妙偈」、「諸天子各各嗟歎歌頌妙偈」、「即說偈言」、「說是偈曰」、「以偈讚佛」、「於是頌曰」等；西晉《佛般泥洹經》於偈頌起始前說「（即）說偈言」；符秦《僧伽羅刹所集經》於偈頌起始前說「說此偈言」、「便說此偈」、「便說是頌」等；《佛所行讚》於偈頌起始前說「而為說偈言」、「而說長辭偈」等；東晉《大般涅槃經》於偈頌起始前說「而說偈言」、「如來即便說偈」等；姚秦《長阿含經》於偈頌起始前說「而說偈言」、「以偈讚曰」、「以偈歌曰」、「自說偈言」、「說此偈言」等；劉宋《佛本行經》於偈頌起始前說「因是說偈言」、「爾時世尊說此偈」、「因說要偈言」等；劉宋《過去現在因果經》於偈頌起始前說「以偈頌曰」、「以偈讚佛」、「以偈讚曰」等。

¹³ 《佛本行集經》與前註所舉佛典相較，較常以「偈頌」當名詞稱之。例如於偈頌起始前說「大臣即以偈頌答彼一切諸小兒言」、「即以偈頌歎菩薩言」、「以偈頌報答於彼諸夜叉言」、「即以偈頌，而白佛言」、「即以偈頌，問佛義言」等。雖經中亦有稱「偈」者，如「而說偈言」、「而有偈說」、「是故偈言」等，但整體而言，稱呼「偈頌」為名詞者，較之直稱「偈」者，已明顯居多。再例如《方廣大莊嚴經》亦是，如於偈頌起始前說「重以偈頌而白於王」、「以偈頌曰」、「即以偈頌讚歎如來」、「以偈頌問迦葉言」等。

¹⁴ 九分教（又作九部經），乃是將佛陀所說法，依其敘述形式及內容分成九種。九部之名稱，各經記載不一，茲舉二經說法以見一斑：據南本《大般涅槃經》卷三，九部分別為：修多羅、祇夜、伽陀、和伽羅那、優陀那、伊帝目陀伽、闍陀伽、毘佛略及阿浮陀達磨（《大正》12・623b）；據《十住毘婆沙論》卷九所載，九部為：修多羅、岐夜、授記、伽陀、憂陀那、尼陀那、如是諸經、斐肥羅、未曾有經（《大正》26・69b）。十二分教（又作十二部經）亦是將佛陀所說法，依其敘述形式及內容分成十二種。十二部之名稱，據《顯揚聖教論》卷六所載，即：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論議（《大正》31・508c）；據南本《大般涅槃經》記載，十二部經之名稱分別為：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優陀那、尼陀

與優陀那（梵語udāna），三者均為偈頌之體，然意義並不相同：祇夜意譯為重頌、重誦偈（即重宣前段修多羅之文義）、應頌（即與經文相應之頌）等；¹⁵伽陀意譯為諷頌、偈頌、頌、孤起頌、不重頌偈（即不重宣修多羅之文義）等；¹⁶優陀那意譯為自然說、法句、歎、自說、無問自說、偈、頌等。¹⁷上三種文體，都是漢譯佛典偈頌的類型。本文考察本緣部漢譯佛傳中的偈頌，發現當中以祇夜與伽陀居多，優陀那則較少。¹⁸

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闍陀伽、毘佛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大正》12・693b）。

¹⁵《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六：「祇夜者，諸經中偈，四五七九言，句少多不定。重頌上者，皆名祇夜也。」（《大正》33・753a）；《大乘義章》卷一：「祇夜，此翻名為為重誦偈也，以偈重誦修多羅中所說法義，故名祇夜。」（《大正》44・470a）；《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祇夜頌此云應頌，謂應重頌長行法也」（《大正》36・711a）；《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44：「言應頌者，謂以勝妙緝句言詞，隨述讚前契經所說。」（《大正》29・595a）綜上，**祇夜乃重頌前述修多羅（長行或契經）所說之緝句。**

¹⁶《顯揚聖教論》卷六：「諷頌者，謂諸經中非長行直說，然以句結成，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或五句，或六句。」（《大正》31・509a）；《法華義疏》卷二：「伽陀，為孤起偈，亦名不等頌。」（《大正》34・472b）；《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六：「伽陀者，如龍女獻珠，喜見說偈，孤然特起，此偈明於剎那頃便成正覺，稱歎於佛成菩提事，喜見孤起歎佛容顏甚奇妙。故知孤起伽陀妙也。」（《大正》33・755a）；《大乘義章》卷一：「伽陀，此翻名為不重頌偈，直以偈言顯示諸法，故名伽陀。」（《大正》44・470a）；《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44：「言諷頌者，謂以勝妙緝句言詞，非隨述前而為讚詠，或二、三、四、五、六句等。」（《大正》29・595a）綜上，**伽陀乃不重頌前述修多羅所說或孤然特起稱歎佛法之緝句。**

¹⁷優陀那（梵 udāna）音譯為烏陀南、鄔陀南、鄔陀南、優檀那等，係指佛陀不問自說的偈頌集錄，成立於第一結集後。《法句經》可說是集成極早的偈頌集，部派佛教時期的法藏部及說一切有部，即稱呼《法句經》為優陀那：如法藏部的《四分律》卷54，將十二部經的「優陀那」作「法句經」（《大正》22・968b）；《長阿含經》卷三亦同（《大正》1・16c）；說一切有部梵本，《法句經》即名為 Udāna-varga。《大般涅槃經義記》卷五：「優陀那者此翻名為無問自說，不因諮啟而自宣唱，名無問自說。」（《大正》37・747b）；《瑜伽師地論》卷81：「自說者，謂無請而說，為令弟子得勝解故。為令上品所化有情安住勝理，自然而說，如經言世尊今者自然宣說。」（《大正》30・753a）；《雜阿含經》卷三曰：「世尊歎優陀那偈：『法無有吾我，亦復無我所；我既非當有，我所何由生？比丘解脫此，則斷下分結。』」（《大正》2・16c）《俱舍論疏》卷一：「鄔陀南者，此云自說，即十二部經中第五自說經也。」（《大正》41・468c）。綜上，**佛陀不因請法而隨宜宣說，自行以偈頌說法者，即稱為優陀那（自說）。**

¹⁸祇夜，在漢譯佛傳中極多；伽陀則如《佛所行讚》、《佛本行經》整部經，或其他散見於佛傳中不重述前面長行文意者；優陀那，如《佛本行集經》卷四：「今當略說優陀那偈，而說偈言：『說施及年數，種姓并壽命，聲聞眾集會，正法與像法。彼等諸世尊，

偈頌中的伽陀與祇夜都是依動詞的Gai語根而來，乃是詩、歌等之意，可說是有韻律的文學作品，每每一唱三歎，富於感化的力量，故《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二云：「梵云伽陀，此翻為頌。頌者，美也，歌也。頌中文句極美麗，故歌頌之故。」¹⁹相對於修多羅而言，偈頌的文學特質與宗教美學感染力，實是大於修多羅的，在吟頌或歌歎過程中，偈頌能引發人類本質裡對美好事物興起共鳴的情感，進而帶出審美理想，審美理想並進一步強化及形塑佛教的生命美學走向。尤其在佛教傳播過程中，偈頌的文學特質不啻更加强宗教感化及普及的力度。²⁰

如上所述，在佛典中，偈頌既然以美文、韻文形式出之，有別於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其他文體，則在特質上便已與「美學」有所關連。偈頌內容除了重述長行內容或獨立吟誦佛法意涵外，應亦將佛教對於世間、出世間的美學思維隱喻在其中，加上佛傳經典的特色，本在於歌頌、讚揚佛陀一生事蹟，其間必然投射出佛教的宗教美學思維。而學界目前對於佛教美學的探討雖已有卓著，²¹然對於漢譯佛傳偈頌的美學意蘊探討尚屬闕如，故本文擬從漢譯佛傳偈頌切入，試圖揭示其中所展現的佛教美學意蘊。

此外，雖然經、律藏中傳述佛陀事蹟者，即便片段記錄，都應算是佛傳資料；然本文基於經典完整性與否，及呼應本文以偈頌美學意蘊為研究課題的考

住世般涅槃，釋種大師子，總說悉已訖。』」（《大正》3・672a）。就三者於漢譯佛傳中之比重而言，優陀那佔最少。

¹⁹ 《大正》34・684a。

²⁰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偈頌，對佛法的表達來說，有他獨到的特色。……偈頌，有韻，是便於記憶傳誦的。文句簡要，容易普及流通。這是文藝作品，每每一唱三歎，富於感化的力量。所以在佛法的普及流傳中，這是比丘們日常吟咏的……尤其是初學，或一般信眾，這是更適合的，影響是極為巨大的！……凡稱為「誦」的，大抵是偈頌，這可以想見古代對於偈頌傳誦的普遍！」（台北市：正聞出版社，1986年，頁801-802）。

²¹ 蔣述卓：《佛教與中國文藝美學》（廣州市：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曾祖蔭：《中國佛教與美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皮朝綱：《禪宗的美學》（高雄市：麗文文化，1995年）、祁志祥：《中國佛教美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量，故在研究範疇的設定上，擬以《本緣部》中專門記錄佛陀生平事蹟，且含有偈頌的漢譯佛傳，作為主要研究文本；至於專門描述佛陀或弟子們於過去世無數劫以來修行菩薩行故事的本生經，則不列入本文所研究的範疇內。雖然漢譯佛傳中，或多或少會提到佛陀本生的故事，但多半只是本傳開展前的前述部分或內容中的小部分（其作用乃在說明今之所以如此的往昔因由），整體內容主要仍以佛陀在世的行誼事蹟為主。

貳、本緣部佛傳經典概述

《大正藏》本緣部，可說是漢譯佛典敘事文學的大本營，其中有關佛傳之經典含藏多部，有的佛傳以長行為主並無偈頌，²²有的佛傳則通篇偈頌，²³亦有的佛傳長行與偈頌兼備，²⁴這些佛傳的敘事性濃厚，建構出後世形塑佛陀形象的認知來源。

印順法師云：「佛的一生事迹，在佛教界，本是多方面的片段的傳述。為了表達某一法義，某一制度，某一事件，由編集者編成次第而敘述出來。由短而長，漸形成大部的佛傳。」²⁵佛傳的編撰過程，大體是佛陀涅槃後，由於佛弟子們對教主的景仰與懷念，遂結合先前出現在經、律中的片段佛陀事蹟，逐漸加工、補充，最後組織成完整的佛傳。²⁶佛傳並非一人一時一地所成，而是經過長期的結集、加工，當中含有記錄佛陀的生平大事，但也或多或少地把紀元前後流傳於印度及南亞地區的神話故事、民間故事，編纂、附會到佛陀身上，

²² 如《異出菩薩本起經》、《佛說十二遊經》。

²³ 如《佛所行讚》、《佛本行經》。

²⁴ 如《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普曜經》、《佛本行集經》、《過去現在因果經》、《方廣大莊嚴經》等。

²⁵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 358。

²⁶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頁 357-365。依淳：《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台北市：佛光，1997 年），頁 190。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台北市：台灣東華書局，1985 年），頁 10-14。

以研究角度來看待，這些佛傳經典，已不全是歷史的佛陀傳記，而是經過修飾加工後，含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宗教傳說，因此視其為宗教文學來看待也是適合的。²⁷

這些佛傳經典在編撰過程中，必然寄寓佛教徒對歷史上佛陀形象的看法及口耳相傳中的佛陀一生事蹟，而佛教對於世間、出世間的美學思維自亦隱喻其中。本文以被編撰在《大正藏》本緣部內含有偈頌的漢譯佛傳作為研究文本，計有十部，如下所示：

- ✧ 《修行本起經》（東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大正》3・461a-472b）
- ✧ 《中本起經》（東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大正》4・147c-163c）
- ✧ 《太子瑞應本起經》（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大正》3・472b-483a）
- ✧ 《普曜經》（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大正》3・483a-538a）
- ✧ 《佛所行讚》（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大正》4・1a-54c）
- ✧ 《佛本行經》（劉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大正》4・54c-115b）
- ✧ 《過去現在因果經》（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大正》3・620c-653b）
- ✧ 《佛本行集經》（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大正》3・655a-932a）
- ✧ 《方廣大莊嚴經》（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大正》3・539a-617b）
- ✧ 《眾許摩訶帝經》（宋代法賢譯）（《大正》3・932a-975c）

上述漢譯佛傳內容，主要是述說佛陀降生、入胎、誕生、求學、成婚、出家求法、成道、涅槃等一系列在世時的經歷，可說是佛典中的「傳記文學」。這十部佛傳橫跨的譯經時代由東漢至宋代，亦即由譯經初期至後期皆囊括在內，²⁸內容上大多屬於聲聞藏，也有少部分屬菩薩藏者，故在研究範疇上較可做整體性考量，不侷限於某一時期、某一類經藏中，以此範疇來考察漢譯佛傳

²⁷ 河野訓，《漢譯佛傳研究》（伊勢：皇學館大學出版社，2007年）。Nancy Falk, "To Gaze on the Sacred Sites," *History of Religions* 16:4 (May, 1977), pp.281-290。

²⁸ 梁啟超〈佛典的翻譯〉一文將佛典翻譯分為三期：自東漢至西晉，為第一期；東晉南北朝隋為第二期；唐貞觀至貞元為第三期。見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206-222。

偈頌所體現的美學意蘊，在研究意義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性，而非單一性。

十部佛傳中，有些是同本異譯，故以下歸納為六類以方便述之，並就各經錄考察各經屬性，再按譯經時代排序，就各經內容分述其異同處，以明瞭經典內涵。茲概述於下：

一、同本異譯之聲聞藏—《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

《修行本起經》共二卷，是東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及康孟詳所譯，內容敘述佛陀前生為菩薩時，由錠光佛授記到現世佛陀降魔成道、度化提謂、波利二賈客為止。此經屬聲聞藏（小乘經），隋代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數人合撰之《眾經目錄》（《彥琮錄》），卷二將本經歸在「小乘經重翻」，並與吳支謙所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及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過去現在因果經》，並列為同本異譯。²⁹

《太子瑞應本起經》共二卷，是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所載內容、偈頌，大體與《修行本起經》如出一轍；唯說龍王皈依佛陀、五比丘得度、三迦葉皈依等事，為《修行本起經》所無。³⁰此經亦屬聲聞藏，明代智旭《閱藏知津》總目卷三將本經歸在「小乘經」³¹，其內容之編排或記述之體裁，大抵皆與《修行本起經》類似，兩經均採十七歲納妃、十九歲出家之說，《過去現在因果經》

²⁹ 《彥琮錄》見《大正》55·160a。又，隋代法經《眾經目錄》（稱《法經錄》）卷三、《歷代三寶紀》卷十四、《彥琮錄》卷二，皆僅記載《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為同本異譯，並未記載《異出菩薩本起經》為同本異譯；但明代釋智旭《閱藏知津》卷三，則已列《異出菩薩本起經》與上述三經為同本異譯，仍列入「小乘經」項下。按：比對上述四經，《異出菩薩本起經》完全無偈頌，經文較短僅一卷，且內容僅敘及佛初轉法輪度化最初追侍太子的五人即止，成佛前的降魔重要情節並無述及，證道後商人奉麝蜜及度化三迦葉、舍利弗、目犍連等情節亦無，且不採十七歲納妃、十九歲出家之說，而以二十歲納妃，似並非與另三經為同本異譯，或係自三經中擷取並修改之、或係他本另譯。

³⁰ 所引敘事，分別見諸：《大正》3·479b-479c；480c；480c-483a。

³¹ 《大正》32·120b。

亦如是。

《過去現在因果經》共 4 卷，為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內容敘述自佛陀前生為善慧仙人淨修梵行，由普光佛授記到現在世成道、龍王皈依佛陀、度化五比丘、三迦葉、舍利弗、目犍連出家為止，並一一敘述過往因緣。此經內容情節大體同於《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但更為詳盡鋪陳，唯善慧仙人得五奇特夢以示將來成佛之相、諸天子跟隨佛陀下生人間為諸王子、太子出家前以左手指妃腹使其有娠、太子妃眠臥得三大夢及舍利弗、目犍連出家等事，³²為前述二經所無。此經亦屬聲聞藏，《閱藏知津》卷二十九〈小乘經藏〉之四列此經為小乘經。³³

二、承續《修行本起經》內容之聲聞藏《中本起經》

《中本起經》共 2 卷，東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內容敘述自佛陀成道、行世度眾轉法輪，到向弟子說明之所以食馬麥的前世因由為止。《中本起經》與《修行本起經》關係密切，依《歷代三寶紀》卷四所載，此二經之梵文，原本皆係曇果自迦毗羅衛國攜至洛陽譯出；³⁴二經內容均為佛傳一部分，據研判，此二經之梵本當為同一部佛傳，但漢譯時，被分成前後二部分別譯出，《修行本起經》為佛傳前半部；《中本起經》為佛傳後半部。³⁵故《中本起經》開頭即以「轉法輪品」為內容起首，佛傳中普遍敘及的兜率降生、入胎、出家、降魔成道等事，於此經皆無，顯然這些內容已於「前半部」（《修行本起經》）敘及，故於此經不再贅述。而《修行本起經》中所無之「五比丘得度、三迦葉皈依、舍

³² 所引敘事，分別見諸：《大正》3·622c-623a；624c；632b；632c；652a-652c。

³³ 《大正》32·120b。

³⁴ 《歷代三寶紀》卷四：「修行本起經二卷，右一經，二卷。亦是曇果與康孟詳，於迦維羅衛國齎梵本來。沙門竺大力，以建安二年三月，於雒陽譯；孟詳度為漢文。釋道安云：『孟詳所翻，弈弈流便足騰玄趣矣。』（《大正》49·54b）

³⁵ 水野弘元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大乘初期至中、後期菩薩思想的變遷〉，《香光莊嚴》72 期（2002 年 12 月 20 日）。

利弗、目犍連出家」等情節，則於此經中皆有敘及，³⁶綜合二部佛典來看，可謂為完整的佛傳敘事。

此經較《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內容增多者，如：佛陀返父國度眾、調達出家、須達長者獻祇樹給孤獨園供養佛陀、佛陀養母大愛道出家、度化波斯匿王、阿凡和利等五百女人受五戒、佛食馬麥因由等事。³⁷此經亦屬聲聞藏，《彥琮錄》卷一、《閱藏知津》卷廿九皆將此經歸在小乘經藏。³⁸

三、同本異譯之菩薩藏—《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

《普曜經》共八卷，乃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內容敘述佛陀自兜率天降生、入胎、誕生、成婚、出家、證道、初轉法輪，至回到父國迦毘羅衛城度眾為止。與前述諸經相較，此經為早期佛傳經典中，記述較為詳盡者，翻譯卷數與內容篇幅，皆較先前漢譯之佛傳經典更為詳盡鋪陳，偈頌也頗多。內容增有佛陀歸國度眾時，為王妃俱夷印證其子羅云確為佛陀子之事；³⁹然錠光佛⁴⁰授記之記載，僅簡略於偈頌中一語帶過，異譯本《方廣大莊嚴經》亦是，⁴¹而未如前述佛傳中詳述此事。他本佛傳中重要情節如出城四遊、降魔、龍王皈依佛陀、度化五比丘、三迦葉、舍利弗、目犍連出家等，《普曜經》及《方廣大莊

³⁶ 所引敘事，分別見諸：《大正》4·147c-149a；149c-152a；153b-154a。唯「龍王皈依佛陀」之事，於此經則無記載。

³⁷ 所引敘事，分別見諸：《大正》4·154a；155c；156b；158a；159b-161a；161b-162a；162c-163。

³⁸ 《大正》55·154a；《大正》32·120b。

³⁹ 《大正》3·536c。

⁴⁰ 梵名 Dipaṃkara，音譯提洹竭，提和竭羅，經文中或作錠光佛、燃燈佛、然燈佛。《大智度論》卷九：「如燃燈佛生時，一切身邊如燈故，名燃燈太子。作佛亦名然燈，舊名錠光佛。」（《大正》25·124b）；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三：「提和竭，或言提和竭羅，此云錠光，亦曰然燈佛是也」（《大正》56·856a）。

⁴¹ 《普曜經》：「時定光佛，授我此慧。」（《大正》3·528a）；「其定光如來，授聖清淨決；當得佛道意，人中師子尊。」（《大正》3·529c）。《方廣大莊嚴經》：「然燈如來授我記，汝於來世成正覺，作佛名號釋迦文。」（《大正》3·603a）。

嚴經》則詳述之。

《普曜經》屬菩薩藏（大乘經），《閱藏知津》卷九將本經歸在大乘經藏，且載明與《方廣大莊嚴經》為同本異譯；《開元釋教錄》卷十一亦記載此經與《方廣大莊嚴經》為同本異譯。⁴²此經又稱《方等本起經》（方等為一切大乘經之通名），乃對應聲聞藏之《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等而立之異名。⁴³

此外，有關佛陀證道後，商人提調、波利二人敬奉妙蜜一事，在《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中，並無佛陀為二人授記來世為佛之記載，僅記載布施者種福得福，將有大功德福報；然《普曜經》〈商人奉妙品〉中，則記載：「於是世尊無等倫德歎其功勳，以是德本於將來世，諸賈客等當得作佛⁴⁴」。異譯經《方廣大莊嚴經》（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亦作「以此施食之功德，當來得成無上道，名為末度三瞞佛。商人蒙記心歡喜。」⁴⁵由此可推測佛傳編撰輯錄過程裡，由聲聞藏（小乘）過渡至菩薩藏（大乘）時，“人人皆可成佛”的觀念已更加彰顯於菩薩藏思想中。又，有關他本佛傳所述龍王皈依佛陀之事，於《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中，不僅有記載，且更增加龍王妃禮佛皈依之情節。⁴⁶

《方廣大莊嚴經》共十二卷，乃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三、《開元釋教錄》卷十九、《閱藏知津》卷九，皆將此經歸在大乘經，亦皆記載與《普曜經》為同本異譯。⁴⁷此經內容，基本上同於《普曜經》，皆有為王妃耶輸陀羅印證其子羅睺羅確屬佛陀子之記載；⁴⁸然關於上生兜率及降生之因緣，《方廣大莊嚴經》特別著意描述其因由，此為《普曜經》無，略

⁴² 《大正》32·16c-17a；《大正》55·591b。

⁴³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大乘重譯經目卷之三〉（《大正》55·397a）。

⁴⁴ 《大正》3·527a。

⁴⁵ 《大正》3·602c。

⁴⁶ 《普曜經·迦林龍品》（《大正》3·514b）；《方廣大莊嚴經·詣菩提場品》（《大正》3·586c-587ab）。

⁴⁷ 《大正》55·458c；《大正》55·682b；《大正》32·16c。

⁴⁸ 《方廣大莊嚴經》改俱夷為耶輸陀羅，改羅云為羅睺羅。

說於下：(1)於〈兜率天宮品〉描述佛陀過去世得以成道並命終生兜率天之因緣，乃過去無數世曾於無數佛處做布施、教化無數聲聞眾，故得以命終生兜率天⁴⁹。此是將佛陀得以成道之因緣，上推到極為久遠以前，而非僅只於他傳所言錠光佛授記之說，並強調無數布施、教化所帶來的因果業報。(2)由兜率天降生前，佛陀又向諸天大眾說十二年前，有一位淨居天，下降人間為婆羅門，曾向大家預言十二年後，將有一勝人會以白象形入母胎中，此人具有三十二相，若在家，將為轉輪聖王；出家，將可成佛。另有一天子下降人間，亦告訴摩燈辟支佛應捨此土，因十二年後當有菩薩降神入胎於此土，摩燈辟支佛遂化火焚身入於涅槃中，波羅奈國五百辟支佛聞天子所語，亦復如是。⁵⁰此處強調了佛陀降生何時、何處，早已有十二年前預言之說，表示世間一切皆有因緣，並著意於預言之真。

此外，欲以誰為佛母，於《普曜經》僅述及白淨王王后前五百世皆為其母，其德行清淨故宜降神入胎；然《方廣大莊嚴經》則羅列女人需具備三十二種功德，方得為菩薩母。⁵¹又，關於白象入胎之因由，《普曜經》有說明白象的象徵意涵為救護一切的“大乘菩薩精神”；⁵²而《方廣大莊嚴經》則僅記載白象入胎，而無說明因由。凡此，是二經詳略出入之處，但皆屬小情節，並不妨礙整體敘事內容的主要精神。

⁴⁹ 《大正》3・540c。

⁵⁰ 《大正》3・541b-541c。

⁵¹ 「菩薩」這個名稱最先為釋迦牟尼在成道前所專用，也是早期佛弟子（由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對成道前的釋迦牟尼的稱呼。三十二種功德見《大正》3・542c-543a。

⁵² 《普曜經・所現象品》：「『以何形往？』答曰：『象形第一。六牙白象頭首微妙，威神巍巍形像殊好，梵典所載其為然矣。緣是顯示三十二相。所以者何？世有三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差猛，猶不知水之深淺也；白象之渡盡其源底。聲聞緣覺其猶兔馬，雖度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譬若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大正》3・488b）

四、同本異譯之雜藏—《佛所行讚》、《佛本行經》

《佛所行讚》共5卷二十八品，為馬鳴菩薩所撰，內容敘述釋尊一生事蹟，自誕生、出家、成道、涅槃到分配舍利，及至阿育王造塔為止，全經以五言偈頌行之。

劉宋寶雲所譯之《佛本行經》共七卷三十一品，其第四至第三十一品，內容略同《佛所行讚》，二本應是同本異譯。然日人鎌田茂雄認為《佛所行讚》是寶雲所譯，會將其視為曇無讖所譯，乃是始於《房錄》；⁵³日人小野玄妙亦就《佛所行讚》經本之翻譯與文章，認為此漢譯五卷本應是劉宋寶雲所譯。⁵⁴本文檢閱諸經錄：《出三藏記集》卷二已有記載「佛所行讚五卷……宋孝武皇帝時，沙門釋寶雲，於六合山寺譯出。」⁵⁵《法經錄》卷六、《歷代三寶紀》卷十、《彥琮錄》卷二、《大唐內典錄》卷四、唐代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卷三、唐代釋靜泰《眾經目錄》（靜泰錄）卷二、釋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亦皆記載此經為寶雲譯；⁵⁶《歷代三寶紀》卷九、⁵⁷《開元釋教錄》卷四、《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六、《閱藏知津》卷四十一，則皆記載此經為曇無讖譯。⁵⁸綜上，考察諸經錄記載，似由《歷代三寶紀》或《開元錄》起，方將

⁵³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在現行的《大藏經》中，以《佛所行讚》五卷作曇無讖譯；而《佛本行經》七卷則作寶雲譯。但《佛所行讚》是寶雲所譯，因為《佛本行經》在《出三藏記集》的目錄中，並非作曇無讖譯出，故而我們認為其譯者，可能不是曇無讖。《歷代三寶記》卷九（大正四十九·八四中）雖然把《佛本行經》作曇無讖譯，但那是靠不住的。」（高雄縣：佛光，1985年，頁77）。按：鎌田氏所云，係指《歷代三寶紀》卷九這段文字：「佛本行經五卷……右二十四部合一百五十一卷，晉安帝世，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曇摩讖，或云無讖。」（《大正》49·84b）

⁵⁴ 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台北市：新文豐，1983年），頁85。

⁵⁵ 《大正》55·12a。

⁵⁶ 諸經錄，分別見諸：《大正》55·146a；《大正》49·89c；《大正》55·161b；《大正》55·258a；《大正》55·362a；《大正》55·195c；《大正》55·436a。

⁵⁷ 《歷代三寶紀》卷九：「佛本行經五卷……右二十四部合一百五十一卷，晉安帝世，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曇摩讖，或云無讖。」（《大正》49·84b）此處「佛本行經五卷」，應是指後世所云佛所行讚五卷。

⁵⁸ 諸經錄，分別見諸：《大正》55·519c-520a；《大正》55·816c-817a；《大正》32·

此經視為曇無讖譯。

歷代經錄有判經者，皆將《佛所行讚》入於菩薩藏或雜藏中，⁵⁹而不入聲聞藏中：例如《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五〈大乘重譯經目卷之四〉，將此經記為《佛本行經》五卷，並註明「北梁沮渠世曇無讖譯」，雖經名有異，然卷數與譯者皆同《佛所行讚》，可知所載《佛本行經》即指《佛所行讚》，並將此經歸為「大乘經藏」，與寶雲所譯《佛本行經》7卷同列為同本異譯；⁶⁰《閱藏知津》卷第四十一將此經歸在「雜藏」中的「西土撰述」內。⁶¹

與《佛所行讚》同本異譯的《佛本行經》七卷，於《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五〈大乘重譯經目〉中，被列為大乘經；⁶²《閱藏知津》卷四十一亦將其與《佛所行讚》一起歸在「雜藏」中的「西土撰述」內。本文認為此二經內容，雖有大乘法，但亦與小乘教義相關，屬於聲聞藏過渡至菩薩藏階段的作品，其文學形式係以偈頌出之，故印順法師云：「『雜藏』，是各種偈頌集的匯編。」⁶³二經由此角度來看，若將其歸類於菩薩藏，其偈頌文意因不完全屬於大乘教義，將有些爭議，而歸屬於雜藏則較妥貼。

二經與前述（一）（二）（三）佛傳內容相異者，如：增加佛陀為報母恩而

164c。

⁵⁹ 小乘之大眾部立四藏，即經藏、律藏、論藏、雜藏四種。《增一阿含經》序品：「契經一藏律二藏，阿毘曇經為三藏；方等大乘義玄邃，及諸契經為雜藏。」（《大正》2·550c）；《分別功德論》卷第一：「所謂雜藏者，非一人說。或佛所說，或弟子說，或諸天讚誦，或說宿緣三阿僧祇菩薩所生。文義非一，多於三藏，故曰雜藏也。」（《大正》25·32b）；《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雜藏者，所謂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如是等比諸偈誦，是名雜藏。」（《大正》22·491c）。綜上，雜藏起源於祇夜與伽陀等偈頌，是所有不歸入修多羅（梵 sūtra）文類的經典集合，是經藏之一，除了赤銅牒部稱小部，其他都稱為雜藏。

⁶⁰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大乘重譯經目卷之四》：「佛本行經一部五卷（第二出），右北梁沮渠世曇無讖譯，出長房錄。佛本行經一部七卷（一百一十四紙），右宋元嘉年釋寶雲於楊都譯，出內典錄。……同本別譯。」（《大正》55·401b）。

⁶¹ 《大正》32·164c。

⁶² 《大正》55·401b。

⁶³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雜藏』，是各種偈頌集的匯編」（頁801）

上昇忉利天為母說法、⁶⁴調達（提婆達多）慫恿阿闍世殺父僭王位及放醉象欲害佛陀、⁶⁵佛陀涅槃、分配舍利、阿育王造塔⁶⁶等事。佛傳內容至此，文學敘事性愈發濃烈，情節豐富，完整地將佛陀一生敘述詳盡，創造出佛傳中人物形象飽滿鮮明的佛陀。

五、聲聞藏《佛本行集經》：

《佛本行集經》共六十卷六十品，為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此經是佛傳中內容最繁博的，經名的「集經」即是彙集五部派流傳之佛傳而成的綜合佛傳之意。⁶⁷諸佛傳中以此經的本生譚比例最多，其餘諸佛傳在敘事上，並未放入如斯多的本生；此係因此部佛典乃綜合五部派之說，乃集大成者，故包含佛陀及其弟子的本生傳說較多。

此經所述佛陀事蹟雖和其他佛傳大致相同，然此經除了敘述佛陀過去世至現在世等生平事蹟、所化弟子的事蹟和本生因緣外，關於佛陀出身的兩種世系亦有所敘述，且隨處舉出各部師的異說，此為獨特之處。

經文內容，可概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前三品，從〈發心供養品〉到〈賢劫王種品〉，乃敘述關於佛陀出身的兩種世系：(1)宗教中諸佛次第相傳的法

⁶⁴ 《佛所行讚·受祇桓精舍品》（《大正》4·39c）；《佛本行經·昇忉利宮為母說法品》（《大正》4·88b-89a）。

⁶⁵ 《佛所行讚·守財醉象調伏品》（《大正》4·40c-41a）；《佛本行經·降象品》（《大正》4·93c-94a）。

⁶⁶ 所引敘事，分別見諸：《大正》4·50a-54c；《大正》4·106b-115b。

⁶⁷ 《佛本行集經》卷末記載此經是彙集了五個部派的佛傳而成：「或問曰：『當何名此經？』答曰：『摩訶僧祇師，名為《大事》。薩婆多師，名此經為《大莊嚴》。迦葉維師，名為《佛生因緣》。曇無德師，名為《釋迦牟尼佛本行》。尼沙塞師，名為《毘尼藏根本》。』（《大正》3·932a）摩訶僧祇即梵名 Mahāsaṅgha 之譯名，乃小乘二十部之大眾部；薩婆多即梵名 Sarvāstivāda 之譯名，乃小乘二十部之說一切有部；迦葉維即梵名 Kāśyapīya 之譯名，乃小乘二十部之飲光部；曇無德即梵名 Dharmaguptaka 之譯名，乃小乘二十部之法藏部；尼沙塞即梵名 Mahīśāsaka 之譯名，乃小乘二十部之化地部。五部皆為律部，故此佛傳是綜合五部律師之說而成。

統，⁶⁸ (2)世俗中諸王次第相傳的王統。⁶⁹第二部分為後五十七品，從〈上託兜率品〉至〈阿難因緣品〉，乃敘述佛陀之本生譚及上生兜率天、降生託胎於摩耶夫人、誕生、學習、成婚、捨宮出家、六年苦行、降魔成道、初轉法輪、成道後行化六年，六年中教化弟子耶輸陀、富樓那、那羅陀、娑毗耶、迦葉三兄弟、優婆斯那、大迦葉、跋陀羅迦卑梨耶女、舍利弗、目犍連、五百比丘、優陀夷、優波離、羅睺羅、難陀、婆提唎迦、摩尼婁陀、阿難等事蹟；其中的〈耶輸陀因緣品〉至〈阿難因緣品〉，又可視為佛弟子們的列傳，此是有別於其他佛傳者。

此經屬聲聞藏，《歷代三寶紀》卷十四、《開元釋教錄》卷十三、《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三及卷三十皆將此經歸在小乘經。⁷⁰又，此經是漢譯佛傳卷數最浩繁且內容詳盡者，統合而言，異於其他佛傳文學之特色有四：敘述諸佛次第相傳的法統、敘述釋族諸王次第相傳的王統、含有多數本生譚、雜糅各種異傳傳說。⁷¹

六、聲聞藏《眾許摩訶帝經》：

《眾許摩訶帝經》共 13 卷，又稱《眾許摩訶帝釋經》，為北宋法賢譯，內容初述太古三摩達多王與釋尊間之世系關係；次述釋尊由兜率天降生、阿私陀占相，及娶耶輸陀羅等三夫人、遊觀世間生厭離、出家苦行、成道、受商主布

⁶⁸ 《大正》3·669a-672a。

⁶⁹ 《大正》3·672a-676b。

⁷⁰ 諸經錄，分別見諸：《大正》49·115c；《大正》55·616b；《大正》55·949b。

⁷¹ 例如敘述耶輸陀羅與佛陀前世為鹿王、鹿后之故事（《大正》3·887c-888a）；耶輸陀羅懷孕六年方生子，羅睺羅出生後受到眾人懷疑，佛陀父王聽信周圍人詆毀，甚且欲處死耶輸陀羅母子，佛陀請毘沙門天王持其書信至父王所，證明羅睺羅為其親子，耶輸陀羅亦投石於池中，並自誓我所生實是太子子息，若然，則令此大石浮於水上終不沈也，大石果浮於水上，方還耶輸陀羅母子平安（《大正》3·888b-889c）；佛陀生母白淨王妃生子七日後往生之原因（《大正》3·701a-b）、提婆達多與佛陀前世結怨之故事（《大正》3·665a-666b；923c-924b）等等。

薩利迦供養，度化五比丘、耶舍、俱梨迦、諸長者子、三迦葉等事蹟，卷末並述及釋尊在迦毗羅城教化釋種及剃髮師烏波梨等事。本經屬聲聞藏，《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七、《閱藏知津》卷廿九，皆將本經歸在小乘經。⁷²

綜上所述，可知諸本漢譯佛傳，在內容上皆以敘述佛陀降生、誕生、成長、成婚、出家、降魔、證道至轉法輪等事蹟為主，少部分佛傳則再述及佛陀涅槃、分配舍利、阿育王造塔等身後事蹟。就結集時間及內容思想而言，大部分佛傳皆歸屬為部派早、中期之聲聞藏，少部分則歸屬為部派後期進入大乘佛教初期所集結之菩薩藏。整體而言，部派佛教時期的佛傳，比較謹守舊說，此時的佛傳經典，所描述的佛陀形象與現實世界中的佛陀尚未差距遙遠，雖然基於宗教立場，對其形象描述仍是不無神秘、靈異的成分，但總體結構也總是统一到現實的基礎之上，例如寫到佛陀的活動，地點一般是他曾行經的歷史地標、景點，所面對的人，大多是他的弟子。故本文認為佛傳基本上是在現實基礎上茁根的，作為研究文本的十部漢譯佛傳，基本上皆是反映出一定現實面基礎上的佛陀事蹟，在此一整體脈絡中，以詩歌、美文身姿吟詠讚歎的佛傳偈頌，又會呈顯出如何的佛教美學意蘊？此即下文欲考察之重點。

參、漢譯佛傳偈頌所顯現的美學意蘊

佛教很少正面闡述美學問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佛典在闡發其世界觀、宇宙觀、人生觀、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時，已隱然流露其豐富的美學意蘊，孕育出自身獨特的宗教美學思想。

美學之父德國哲學家鮑姆嘉滕（Baumgarten）首次使用「美學」一詞，認為美學是研究情感愉快與否的感覺學，⁷³蔣勳亦將美學稱之為「感覺學」，⁷⁴梁

⁷² 二經錄，分別見諸：《金藏》1501 經·747b；《大正》32·120c；696a。

⁷³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296。

啟超則說佛法就是心理學；⁷⁵由這些角度來看，「佛教美學」可說是討論佛教觀照世相時，對於能引起情感怡然、愉快、快樂、歡喜、喜樂等正向情感的對象及其價值評判的心理認知感覺學。佛教在教義立場上雖然是「愉忿共情、親怨等觀」⁷⁶的平等觀，然佛教對於引發清淨無染的快樂、愉快、喜悅之因由，仍是會肯定且宣說的，此樂並非是世俗所追求的功名利祿之樂、貪愛執著之樂，而是適悅身心、無所求的上妙樂。⁷⁷探析佛教美學的精神，也必須持此一角度來看待、體會。

祈志祥於《中國佛教美學史》中說：「佛教對純粹的官能快感對應的形式美、形象美持否定態度，而竭力追求清淨無染的道德美、真實無妄的本體美。因此，佛教美學總體上說不是形式美學，而是道德美學、本體美學。」⁷⁸誠然，佛教在宗教情感與美學態度上，是有著否定世俗美、肯定出世美的基本美學傾向。然佛教對於世俗美也並非全然否定，畢竟佛教是立基於人的社會中的，它既是一種宗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更是一種社會意識的體現。在人的社會中立教說法，佛教要完全迴避世俗生活，是不可能的，為了隨機教化眾生，佛陀「主張隨順世俗之見教化眾生，引導眾生在有中觀空，在妄中求真，在美的形式中領悟佛道，就成為佛教及其美學的另一取向。正是這一取向，使佛教美學對其否定的世俗美和形式美加以變相的肯定，因而呈現出豐富多彩的世俗美學

⁷⁴ 蔣勳：〈美學的原點〉（《商業週刊—alive 優生活》，2009年7月），頁22。

⁷⁵ 梁啟超：《梁任公學術演講集》（台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110。

⁷⁶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大正》7·986a）。

⁷⁷ 《佛本行集經》記載佛母懷孕時，內心平和喜悅、無惱無憂：「童子在胎，童子之母受大快樂，身體敷愉，無疲無倦。」（《大正》3·698b）；《佛地經論》云：「適悅身心名樂」（《大正》26·315b）；《漢譯南傳大藏經·長部經典》記載聽聞勝法、熱誠學習之樂乃是愉快而喜樂的：「彼成為聖法之聲聞，熱誠學習，了得一切法，成為不親近愛欲、不親近不善法者。彼不親近愛欲、不親近不善法而樂生，更樂之喜樂生。」（《漢譯南傳》7·172a）；《大方廣佛華嚴經》所云「世間一切上妙樂，聖寂滅樂為最勝。」（《大正》9·399b）；《普曜經》：「樂於閑居心意寂然，慈念十方欲益天人。」（《大正》3·510a）。

⁷⁸ 祈志祥：《中國佛教美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

趣味和形式美學建樹。」⁷⁹ 祁氏認為佛教標榜「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從否定現實界的美和經驗的美，進而肯定涅槃之美與淨土之美，亦即從對美的否定，走向對美的建構，故可說是“在反美學中建構美學”。例如佛教藝術的輝煌成就（文學、音樂、戲劇、繪畫、雕塑、建築等），即為對世俗美與形式美的變相肯定。黑格爾亦認為「宗教最接近藝術」⁸⁰，二者之間的共通處，乃在於具備一定的美學因子可溝通。故本文認為佛教雖意不在建構美學，但佛教是立基於人間的，所關注與解決的議題亦是由人間世相中開展的，故在建構教義與傳教過程中，也無可避免形塑出自身有別於他教及世俗的美學思想。

在佛傳中，佛陀於觀照萬物中，進入一種體認本心的澄明之境，其觀照萬物、照見真實而興起的適悅身心之美感歷程，亦可說是種超越世俗美的審美歷程——在色中照見空，在空中照見色，在緣起中照見無我，在有我中照見假有——是以立基於世俗而又超越世俗價值觀的美學思維，達到對佛法之美的體認。

前文說過偈頌具有文藝之美，富於感染力的特質，故本文試圖由十部佛傳偈頌所敘內容與象徵意涵，來考察其間所展現的佛教美學意蘊；囿於篇幅所限，本文由各佛傳偈頌所闡述的佛教思想與美學意蘊，歸納出五點獨具宗教性、內蘊豐富的佛教美學特色，以見一斑：

一、人格典範美

佛傳偈頌中，對於佛陀人格美的推崇極多，而其敘述策略，往往是從時空觀上流露出對累世修善行的佛陀人格美之推崇。

佛教的時空觀有別於中國文化本有的時空概念，佛典中常言「三千大千佛國土」，體現出佛教特有的空間觀，展現出古代印度人對空間概念的想像與表

⁷⁹ 祈志祥：《中國佛教美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7。

⁸⁰ 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125。

現。⁸¹從佛教的觀點來看，時間和空間是不可截然劃分的，從因到果的前後關係是時間相，現象之間的賓主關係是空間相，為說明空間概念與世象因緣而有三世之說，如《首楞嚴經》卷四對時空觀的闡釋：「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當知，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現在、未來為世。」⁸²所謂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即為「十方」（梵語 *daśa diśah*），佛教主張十方有無數世界及淨土，稱為十方世界、十方法界、十方淨土、十方剎等；又如《大寶積經》卷九十四云：「三世，所謂過去未來現在。」⁸³此皆說明佛教認為時空是相續相生，也是相對性的觀念，故未出離生死至涅槃境界，便有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之無盡流轉，三世之說，既指涉時間概念，亦指涉空間概念。

在佛傳偈頌中，常有藉累世時空的不間斷布施行善，以烘托對佛陀人格美的讚歎，如《佛本行集經》記載諸天子中的作瓶天子見悉達多太子在宮內受五欲樂，為使太子宿世善根能覺醒而發出家證道心，遂以其神力令宮內諸嫖女，自然以偈唱頌法聲，令太子求道之心醒覺。⁸⁴其偈頌內容即透過累世時空所修善行來形塑佛教對人格美的看法：

⁸¹ 古代印度人之宇宙觀，認為三千大千世界是以須彌山為中心，周圍環繞四大洲及九山八海，稱為一小世界，包括日、月、須彌山、四天王、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兜術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世天等。此一小世界以一千為集，而形成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集成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集成大千世界，此大千世界因由小、中、大三種千世界所集成，故稱三千大千世界。在佛典的宇宙觀中，三千世界乃一佛所教化之領域，故又稱一佛國。見《佛說長阿含經·第四分世記經閻浮提州品第一》（《大正》1·114b~114c）。

⁸²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19·122c）。

⁸³ 《大寶積經》卷九十四（《大正》11·535b）。

⁸⁴ 《佛本行集經》卷十四：「爾時，虛空有一天子，名曰作瓶，彼天見是太子，十年在於宮內受五慾樂，作是思惟：此之護明菩薩大士，縱極多時在彼宮內受諸五慾，莫為貪著是五慾故，心醉荒迷情放盈溢。百年迅速，時不待人，護明菩薩今須覺察，早應捐棄捨俗出家。……威神感動發勸因緣，復以太子宿世善根福德力故，令彼宮內嫖女伎兒所作音聲歌曲，不順五慾之事，唯傳涅槃住持信解微妙之聲，自然而述說於偈言。」（《大正》3·122c）按：護明菩薩即悉達多太子。

仁昔作大王，名為月光者，
 其次名勝行，其次名連兔，
 其次名方主，其次名健施，
 次名迦尸王，次名寶髻王，
 如是諸大王，即仁是非異。
 種種珍寶貨，來乞皆隨與，
 仁彼世財施，今勸捨法財。
 仁昔於過去，見佛如恒沙，
 彼諸佛世尊，仁悉曾供養。
 無量供養具，布施無慳吝，
 求道不休息，眾生解脫故。
 今正是其時，速出莫住家。⁸⁵

此偈頌敘述作瓶天子借眾嫫女之口向悉達多太子訴說今世降生為太子前，已於無數阿僧祇劫勤苦修善行，輪迴為諸大王時，不吝惜地布施珍寶，並禮敬供養諸佛，如此善行人格，正該一以貫之，以證道成佛，故力勸太子捨俗出家證道。偈頌中隱含佛陀此世降生為悉達多太子，正是關鍵一世，往昔累劫所修善行，正待今世開花結果、證道成佛之意。佛教是以「成佛」為終極目標，並認為成佛必須歷經累劫行善修德的歷程，且重視在人間成佛的必要性，故累世行善而上生兜率天的佛陀，仍舊降生人間來成就佛道。由偈頌的敘述中，可見其敘事策略乃是透過累劫時空的修善行德，來肯定並讚歎人格美的形象為何。佛教重視實踐證道，強調累劫修行的功德，故對於人格美的看法，也往往表現在行為實踐上的描述。

再如《佛本行集經》中，記載諸天歌頌佛陀往昔宿世行善布施，功德圓滿，

⁸⁵ 《大正》3・718b-719b。

故上生兜率天：

我此護明大菩薩，往昔在於諸有中，
常捨極所愛婦兒，奴僕象馬財珍寶，
或復割截身骨肉，頭目髓腦血皮膚，
如是來索悉不違，或百或千皆施與。⁸⁶

偈頌中以諸天之口敘述佛陀因往昔累劫常行布施，甚且無畏割截身肉以布施，遂累積了上生兜率天的善因緣，此處形象化地帶出對佛陀人格典範美的讚歎——即便要割肉護生，凡能因此助人或護生，則「或百或千皆施與」。顯然除了身外之物的布施外，犧牲自我肉身以挽救他人性命，亦是「施無畏」人格美的展現。與此相同意涵之偈頌於《普曜經》中亦有，諸天女以偈頌嗟歎佛陀前世無數億劫種下積德修善、持戒忍辱等善因，方得今日之身好如須彌：

前世積功德，長夜來善本；
布施得真正，故今致奉敬。
尊本無數劫，惠施愛男女；
以斯施果報，雨天諸花香。
害身肉稱之，用哀愍鳥故；
由此布施果，餓鬼蒙食醬。
尊本無數劫，護戒無所犯；
由禁獲果報，消盡惡道難。
本無數億劫，志道行忍辱；
忍行致此果，慈心愍天人。

⁸⁶ 《大正》3・680a。

本無數億劫，上進無怯劣；
以是精進果，身好如須彌。⁸⁷

由此可知布施、護戒、忍辱、慈心，皆是人格美的形象建構，累世不間斷的精進之，則能修得身好如須彌的堂巍之美。此不啻是開展並建構出佛教的道德美學路線。

再如《普曜經》裡悉達多太子坐菩提樹下證道成佛時，諸天唱頌此偈以讚歎佛陀：

從無數劫來，積德行六度；
四等心四恩，護三界之將。
大慈無蓋哀，欲脫癡聾盲；
今當成大道，具三十二相。⁸⁸

此偈述說佛陀前生自無數劫以來，廣行六度、並行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又報得四恩，今日終因無數劫以來所種善因而證道成佛，具足三十二相好莊嚴。

上述這些佛傳偈頌，展現出佛教所讚歎的人格美，是重視善行實踐面的，且其強調布施、忍辱、護戒、慈心的人格典範，以及累劫行善必可獲致善果的思想，亦成為佛教有別於他教或中國文化的道德美學思維。此外，展現人格美的偈頌，其敘述策略，往往是透過時空觀強調累劫修行的勤苦，並傳遞出行善的果報，以感召世人在日常生活中應有的作為與態度。這些藉由描述佛陀人格而形塑出人格美的指標，蘊含了佛教的道德美學、生命美學於其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人們處事作風的指導準則。

⁸⁷ 《大正》3・490c。

⁸⁸ 《大正》3・512c。

二、清淨之美：

漢譯佛傳中，對於人的內在、外在描述，常以「清淨」為尚。清淨（梵語śuddha或viśuddha）一詞，音譯輸陀、毘輸陀，於佛教中係指發心求智慧，遠離因惡行所致之煩惱而得身、語、意、相清淨，亦有指心清淨者。⁸⁹《究竟一乘寶性論》卷四說二種清淨，即：(1)自性清淨：萬法皆空，本來即清淨；(2)離垢清淨：離煩惱而成為清淨。⁹⁰《大智度論》卷四十三亦列舉三種清淨：「得身清淨、心清淨、相清淨故，是菩薩不生染心，不生瞋心，不生癡心，不生憍慢心，不生慳貪心，不生邪見心。」⁹¹故「清淨」乃包含心、身、語、意、相之清淨。而此種觀點亦蘊含佛教看待世間萬象所持的美學取向。

「清淨」可視為佛教視世俗美之所以為美的觀照態度，它表現於佛傳偈頌者，如《方廣大莊嚴經》中，悉達多太子以偈頌向諸大臣開列所欲迎娶王妃的條件，需具備相清淨、心清淨、身語意清淨等美德方可：

具足相好清淨人，諦語稱心無放逸，
我今為書陳所好，汝宜依書善求覓。
若有少盛好威儀，不恃麗容而起慢，
無憍無吝無嫉妒，無諂無誑無諸病。
恒常質直起慈心，憐愍眾生如愛子，
好行惠施無諸過，供養沙門婆羅門。

⁸⁹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十八：「若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學般若波羅蜜多，便近一切相智。是菩薩摩訶薩如如近一切相智，如是如是得身清淨、得語清淨、得意清淨、得相清淨。」（《大正》5·212c）《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二十七：「本性清淨，心相應故，其相清淨。」（《大正》27·140c）。

⁹⁰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四：「清淨者略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自性清淨，二者離垢清淨。自性清淨者，謂性解脫無所捨離，以彼自性清淨心體不捨一切客塵煩惱，以彼本來不相應故。離垢清淨者，謂得解脫，又彼解脫不離一切法，如水不離諸塵垢等而言清淨，以自性清淨心遠離客塵諸煩惱垢更無餘故。」（《大正》31·841b）。

⁹¹ 《大智度論》卷四十三（《大正》25·370a）。

乃至夢寐無邪心，未曾懷孕至貞潔，
恒為心師不高舉，執意卑慙猶如賤。
不貪滋味及欲樂，有慚有恥而無害，
未嘗歸依諸外道，恒與真正理相應。
身語意業常清淨，昏沈睡眠皆遠離，
所作無不善思惟，恒行善行未曾捨。⁹²

當時，白淨王（太子之父）欲為悉達多太子娶妻，以息其出家之心，太子向群臣所開出之條件，即顯示佛陀選妃的審美標準，是以「清淨」作為第一考量的。太子妃需具足清淨行以修得相好莊嚴，是以先以宿世善因所致之相好為起始，再述及行為需能具足威儀、不因外型姣好而起驕慢之心、好行布施、供養諸修行人、心性貞潔無邪心、身語意業恆常清淨等，作為其選妃要件。此處雖是太子順應父王、群臣之期待而做出的權宜舉措，但其實也蘊含了佛教以清淨為尚的美學取向。

又如《普曜經》卷一裡，佛陀以偈宣說其母身語意清淨及相清淨，故為諸天人所喜所讚歎：

端正天玉女，形體最清淨；
諸天人睹之，正觀無厭倦。
無瑕如奇珍，質直言柔軟；
安隱無麤諍，面悅顏不變。
行法懷慚愧，離慢不輕舉；
所聽無諛諂，常慈好布施。
淨邪行十善，身口意常諦；

⁹² 《大正》3·561b。

以渡女人態，未曾有缺漏。⁹³

結合偈頌前之長行，可知「天玉女」是指佛陀生母，偈頌中敘述其母言語柔軟真誠、行為安穩不輕慢、面容和悅、慈心布施、淨行十善等，故為身語意相皆清淨之人，此亦蘊含佛教對女性美的審美理想。

再如《修行本起經》裡，道士阿夷觀悉達多太子初生之相，具足三十二相好觀，遂以偈答白淨王：

今觀太子身，金色堅固志，
無上金剛杵，舂破婬欲山。
大人相滿具，足下安平趾，
居國常平治，出家等正覺。
手足輪相現，其好有千輻，
是故轉法輪，得佛三界尊。
鹿脯而龍髀，隱相陰馬藏，
觀者無有厭，是故法清淨。
纖長手臂指，軟掌鞞中里，
是故法久長，千歲在世教。
皮毛柔軟細，右旋不受塵，
金色鈎鎖骨，是故伏外道。
方身師子臆，旋轉不阿曲，
平住手過膝，是故一切禮。
身有七處滿，千子力當敵，
菩薩宿作行，是故無怨惡。

⁹³ 《大正》3·486b。

口含四十齒，方白而齊平，
甘露法率眾，是故有七寶。
頰車如師子，四牙萬字現，
佛德現天下，是故豐三世。
味味次第味，所食識其味，
是以設法味，施與於一切。
廣舌如蓮華，出口覆其面，
是故種種音，受者如甘露。
語聲哀鸞音，誦經過梵天，
是故說法時，身安意得定。
眼相紺青色，世世慈心觀，
是故天人類，視佛無有厭。
頂特生肉髻，髮色紺琉璃，
欲度一切故，是以法隆盛。
面光如滿月，色像花初開，
是以眉間毫，白淨如明珠。⁹⁴

所謂相清淨，乃是宿世修行清淨法所致，展現在佛傳偈頌中，則為三十二相好莊嚴之身。⁹⁵偈頌中從足安平相到足下千輻輪相、手指纖長相、手足柔軟相、手足縵網相、腠如鹿王相、手過膝相、身縱廣相、身如獅子相、四十齒相、齒白齊密相、廣長舌相、眼色如紺青相、梵音深遠相等等，一一細數太子所具足的三十二相好，一方面說明此乃宿世修行清淨法所獲果報，一方面亦顯現出

⁹⁴ 《大正》3·464c-465a。

⁹⁵ 《眾許摩訶帝經》卷三：「於過去世無量百千萬億劫，長時精進無間修習一切戒行及諸善法而無遺餘，今得成就相好功德。」（《大正》3·940b）《大智度論》卷4：「如難陀……生迦毘羅婆釋種中，為佛弟子，得三十大人相，清淨端正。」（《大正》25·92a）。

佛教對清淨相好的人體美學，係建築在德行實踐之上，仍是延續道德美學的路向。

除了果報的「相清淨」之外，緣起的「心清淨」自是修身之始，故《中本起經》記載佛陀向須達長者開示清淨觀，乃在於心清淨虛懷，心念淡泊不為外物所憂所喜，初果之人能證悟真理自能見真諦，而斷欲界之見惑，超越五道輪迴，最後進入涅槃，得到安樂：

無憂無喜相，心虛清淨安，
已能無所生，見諦入泥洹。
覺正念清明，已度五道淵，
恩愛網斷壞，永寂悅彼安。⁹⁶

須達長者聽聞佛陀說法後，便發清淨心，皈依並受五戒，成為清信士。

再如《佛本行經》中記載悉達多太子出家初求道時，摩竭國瓶沙王（頻婆娑羅，梵名 Bimbisāra）表達其願奉國土給太子，使太子盡享榮祿，祈請太子正值盛年宜當理政，待垂老之年再行出家。悉達多太子遂以偈回應瓶沙王，並肯定其清淨心猶如日出花開：

具照知王意，正直且清淨；
慈愛恭敬意，充盈於心懷。
今王雖興於，衰末濁亂世；
以善自將御，乃踰上世王。
見王諸淨意，內意清淨徹；
猶如晝陰霧，花開知日出。⁹⁷

⁹⁶ 《大正》4·156b。

以上偈頌乃太子讚頌瓶沙王清淨心之美好，即便生於衰末濁亂世，其善念功德亦將使其超越上世諸王之成就，獲無上果報。再如《方廣大莊嚴經》中，佛陀於兜率天向諸天說敬持清淨心，方能領悟其所開示之最勝法：

汝今離眾難，生天遇善友，
又聞最勝法，滅除諸貪妄。
棄憍慢貢高，調柔行質直，
應勤修正道，決定證涅槃。
當以智慧燈，銷滅愚癡暗，
以勝金剛智，破煩惱隨眠。
我得無邊法，當為汝宣說，
如是無邊法，汝豈能盡行？
我當證菩提，方灑甘露雨，
汝心若清淨，我當授勝法。⁹⁸

由此偈頌可看出佛教對修持清淨的重視，即便是已離眾難，因福生天的諸天人，佛陀仍告誡其須勤修正道、滅除愚癡煩惱，所謂「滅除諸貪妄、棄憍慢貢高、調柔行質直、銷滅愚癡暗」等皆是清淨身語意之修行法；而「汝心若清淨，我當授勝法」更強調唯有心清淨，方能領略佛陀所授之勝法。

綜上所舉，可清楚地看出佛傳偈頌中反覆強調的「清淨」，不僅是其教義思想所著重的部分，亦是映現出佛教在修行實踐意義上的美學趨向。

⁹⁷ 《大正》4・72c。

⁹⁸ 《大正》4・545c。

三、寂靜之美：

古印度民族，十分重視內向自省的靜思功夫，《奧義書》中云：

思念既止息，善惡業皆息，
以彼清淨靈，居此自我域；
乃可得享受，至樂永恆福。⁹⁹

調習靜坐、冥想入定、入山修行求道，是佛陀當時所處的印度社會風氣，佛陀所開創的佛教，亦是吸收並發展了當時印度對於靜坐冥思的修身養性方式，並進而發展出禪定解脫的理論。如《修行本起經》記載佛陀未出家時，坐閭浮樹下，一心禪定，已得第一禪；還宮後思惟道之清淨，認為不宜處宮，當處山林精研行禪，遂於十九歲夜半時離宮出家，出家後亦是入山求道。¹⁰⁰山林的空曠、寂寥、寂靜、清幽，與佛教的「空」觀及出世思維，有其呼應、象徵之處，故入山修行不僅是遠離塵囂進入大自然空曠寂靜之場域，亦是呼應內心由雜染回歸平靜寂靜的本質。

佛教所言的「寂靜」，一方面指主體放下萬緣，回歸無憂離苦的禪定狀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九所云「調伏諸根，威儀寂靜」¹⁰¹；一方面係指寂滅無相的涅槃境界，如《大悲經》卷四所云：「如是涅槃寂靜清涼、無塵離垢，一切苦息」¹⁰²。

於佛傳偈頌中，有許多讚歎禪定寂靜之記載，如《佛所行讚》記載佛母摩耶夫人懷有太子時，厭惡塵囂喧鬧，樂處空林園中，內心好寂靜：

⁹⁹ 徐梵澄譯：《五十奧義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465。

¹⁰⁰ 《大正》3・467b-468b。

¹⁰¹ 《大正》23・669c。

¹⁰² 《大正》12・965c。

母悉離憂患，不生幻偽心，
厭惡彼諠俗，樂處空閑林。
藍毘尼勝園，流泉花果茂，
寂靜順禪思，啟王請遊彼。¹⁰³

與此相似情節，如《方廣大莊嚴經》中記載佛母懷太子前，夜夢白象入胎，貪瞋等煩惱皆消除，心樂寂靜如在禪定中：

我於睡夢中，見象如白銀，
光色超日月，身相甚嚴淨。
六牙有威勢，難壞如金剛，
支體甚堅好，來入於我腹。
貪瞋等煩惱，結使皆銷滅，
我心寂靜樂，如在禪定中。¹⁰⁴

再如《佛所行經》卷二記載悉達多太子出城遊行時，見到沙門威儀安庠寂靜，遂興起欲求解脫之道：

威儀戒寂靜，法服手持鉢；
太子告御者，迴車往行就。
太子問沙門，尋聲而應之：
「六情無諸漏，捨家轉離患。
山巖空閑樹，止宿獨靜處；
無老死憂苦，亦無別離惱。」

¹⁰³ 《大正》4・1a。

¹⁰⁴ 《大正》3・549a。

甘露永乖滅，吾願求是處。」¹⁰⁵

上述偈頌所描述的沙門，威儀寂靜，獨處山林靜處，無生死憂惱之苦，主要是宣揚佛教以寂靜為尚的態度，也是佛教呈現本體美學的境界。這些描述「寂靜」之美之樂的，有的以空林流泉之清幽雅靜來烘托內心寂靜之狀態，可說是以具體的相來呈現；有的則直指如在禪定中，可說是以神秘的宗教冥想體驗來呈現。

此外，關於寂滅無相的涅槃境界，如《佛所行讚》描述佛陀欲入涅槃時所述：

吾今中夜時，當入於涅槃。
長劫之所規，我今始獲得，
已度根境界，無盡清涼處。
離地水火風，寂靜不生滅，
永除於憂患，云何為我憂？
我昔伽闍山，欲捨於此身，
以本因緣故，存世至於今。
守斯危脆身，如毒蛇同居，
今入於大寂，眾苦緣已畢。
不復更受身，未來苦長息。¹⁰⁶

偈頌中對於涅槃的描述，是寂靜、無生滅、無盡清涼、不復受苦的，體現出佛教死亡美學的極深意蘊，如同祈志祥所說：「佛教認為肉體死亡是人生痛苦的結束，是走向新生的開端，是無常本體的象徵，因而佛教並不懼怕死亡，

¹⁰⁵ 《大正》4・65c-66a。

¹⁰⁶ 《大正》4・46b-46c。

相反倒是善待死亡、笑迎死亡。佛教美學也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臨終關懷的“死亡美學”」¹⁰⁷。

四、力之美：

佛傳中雖不刻意強調力大為美為勝，然敘事中往往自然顯露出佛陀其力大於他人，無人能勝之的刻畫。此種對力大的推崇與讚歎，雖非佛法所強調之處，然我們由佛傳相關描述中，可見出佛教對「力」及其強度所投射的基本美學觀。

例如《普曜經》裡諸天人讚頌悉達多太子，能將死於路旁之象，以右手拋擲於城外，以免死象之臭味熏於城內：

手執大白象，已死身至重；

擲棄於城外，離塹極大遠。

此必為至聖，平等離俗身；

逮成一切智，以聖力常存。¹⁰⁸

在〈王為太子求妃品〉中，敘述太子娶妃前有場比試大會，調達為與太子爭勝，便捏殺所帶來之象以顯其力之強，¹⁰⁹難陀見後亦以將象牽移於路側展現其力，最後當悉達多太子來到象前，認為象身巨大，其屍臭將普熏城內，故以右手接擲，拋置於城外，諸天人遂以偈讚歎其聖力。

其後進行射藝比試時，調達射中四十里，難陀射中六十里，輪到太子張弓

¹⁰⁷ 祈志祥：《中國佛教美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8。

¹⁰⁸ 《大正》3·501a。

¹⁰⁹ 《大正》3·500c：「時執杖釋種言：『我等本性有藝術者，乃嫁與女；太子有術，明知射御手博書數禮樂六藝備悉，乃與女耳。』……王問菩薩：『藝術云何？』菩薩曰：『此間寧有奇異妙術與我等乎？將來觀之。』王即時笑：『能現術乎？』菩薩曰：『能！請會一切諸釋親族，當共現術。』……於是調達手執牽象來入城門，見諸釋集欲現其術，即以右手牽象頭，左手持鼻，撲捏殺之。」

時，卻因其力巨大，弓遂折斷。太子詢問城中是否有異弓供其使用？其父曰：「昔吾祖父名曰師子，所執用弓奇異無雙，身沒之後無能用者，著於天祠。」¹¹⁰然釋迦族無人能拉動之弓，一交到太子手中，太子「以手捺張，桴弓之聲悉聞城內」¹¹¹，且射程遠極百里之外，箭沒地後，涌泉自出，國土皆震動。虛空諸天人遂以偈唱頌：

不起于座上，即時張此弓；

如是具諸願，必建成天尊。¹¹²

如此非凡的神力描述，顯然是欲將佛陀神化之，然佛傳中多處以力大來讚美佛陀的描述，亦凸顯出佛教對力大為美事的美學取向。

又如《修行本起經》記載阿夷道士來拜見白淨王，欲瞻仰新生太子。敘事中為襯托悉達多太子已修得金剛之身；便以擁有能制伏百壯士之力的阿夷道士「方抱太子，筋骨委震¹¹³」，來映襯新生太子的神力威猛。其偈頌云：

身有七處滿¹¹⁴，千子力當敵，

菩薩宿作行，是故無怨惡。¹¹⁵

偈頌中所云「千子力當敵」，即是對太子具備能抵擋千子力的金剛力之讚頌。可見佛教對威力、力大的讚揚，這其中除了飽含對佛陀的崇敬之情外，亦

¹¹⁰ 《大正》3・501c。

¹¹¹ 《大正》3・501c。

¹¹² 《大正》3・502a。

¹¹³ 《大正》3・464b。

¹¹⁴ 「七處滿」是指七處滿足相（如來三十二相之一），大智度論卷四：「七處隆滿相：兩手、兩足、兩肩、項中，七處皆隆滿端正，色淨勝餘身體。」此係佛於因位時，勤於布施，不計福田非福田，所感得之妙相。

¹¹⁵ 《大正》3・464c。

呈顯出佛教以“力”為美勝事的態度。

又如《眾許摩訶帝經》中，敘述毘舍離城的國人將一大象獻給悉達多太子，提婆達多聽聞此事後，心生嫉妬，遂持器仗殺象。難陀見到後，欲與提婆達多鬪其勇力，又執象尾拋至象死處七步之外。悉達多太子來到後，遂以一手執持死象尾，向空中拋擲而去，象身飛躍七重城之遠。毘舍離城的國人遂以偈讚頌太子的大威神力：

我等遠馳象，為獻於輪王；
遇斯凶惡人，即時行殺害。
難陀手執尾，擲象七步外；
菩薩大威神，擲象如拋塊。¹¹⁶

偈頌中歌詠了難陀手擲象尾拋於七步外的力大，但更讚歎悉達多太子擲象如拋土塊的威猛神力。

再如《佛本行經》記載佛陀與弟子們行經力士國土拘夷那竭城時，五百力士認為山妨礙城門通行，遂將山繫於畜頸，集眾人、眾畜之力欲移山，然縱然使盡全力，仍不能撼動山半分。此時佛陀以左手舉山，置於右手中，並拋入虛空直至梵天處，山從虛空掉落後，又回至佛陀右掌，佛陀輕吹口氣，即令山碎之為塵，隨後又將之聚合，恢復山原貌並將之遷徙於他處。偈頌云：

去彼土不遠，拘夷那竭城；
城門中有山，五百力士集。
還共論議言：「是山妨城門，
共合力舉徙，顯我等盛力。」

¹¹⁶ 《大正》3·942a。

後世流名稱，馳周遍四方；
精勤力備具，無有斷絕時。」
議已便共出，將象青牛馬；
拖材木繩索，共行詣山下。
設若干方便，繫山於畜頸；
各手引繩索，以材木捩撮。
皆共舉聲嚙，同一時出力；
大聲震一國，不能動搖山。
佛將弟子眾，行次至其所；
諸力士見佛，金色之光明。
霍如千日出，妙相三十二；
見佛懷喜踊，捨山往行詣。
敬意禮佛足，右遶三匝已；
佛因問之曰：「諸壯士何故？
聚會在此也。」同共白佛言：
「我等生土地，種類號力士，
是山妨城門，吾等共集議。
欲移徙是山，令城門道平，
流名於後世，顯示力士力。
故牽致象畜，及自竭其力，
盡大方便勢，山永不可動。」
佛與大眾俱，行往詣其下。
撿攝其衣服，以左手舉山；
置於右手中，便挑擲虛空。
乃上至梵天，山中聲出言：

「世間皆無常，諸法皆無我，
唯無為滅苦。」山從上來下，
還住佛右掌，佛以口氣吹，
皆令碎為塵，又還收合聚；
還復如本山，徙之著餘方。
於是諸力士，見世尊大士；
心喜踊無量，舉身毛衣豎。
加敬意於佛，皆前禮佛足；
長跪叉手言：「唯然天中天！
向者所用力，為是乳哺力？
是神足力者？是道定力乎？」
佛告諸壯士，諦聽受所言：
「吾左手取山，置於右手中；
擲虛空中者，是吾乳哺力。」¹¹⁷

佛典中記載印度十六大國之末羅（梵名 Malla），意譯為力士，為住於中印度恆河北方之拘夷那竭城之種族，佛涅槃時，由其族抬佛棺木。¹¹⁸相傳此種族為大力之士，然合眾力士、眾畜之力尚且無法移山，佛陀卻不費吹灰之力而將山移開，此即以對比夸飾筆法烘托出佛陀與生俱來之乳哺力何其大。雖本品接續闡明除了乳哺力外，尚有福德力、智慧力、神足力、定意力、無常力等，且乳哺力僅是基本，猶粗淺於他力；然起首處以佛之乳哺力與力士族之大力相較，乃在推崇力大，並蘊含佛力強大於世間凡力之意蘊。

佛教藉力大為美勝事，強調佛力無可限量，塑造出威猛懾伏一切的佛陀形象，此「力」並非現實中的物理力量，可以科學、理性思維來計量，其內含的

¹¹⁷ 《大正》4·103a-c。

¹¹⁸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大正》1·27c）。

美學意蘊，與佛典中形容佛陀說法如「獅子吼」¹¹⁹般有異曲同工之妙，皆是以具有震撼力、能摧破一切外道異見的崇高感，及以智慧精進為核心力量所帶來的震撼力度，為其美學意蘊。¹²⁰

五、以花供佛之美：

插花藝術在中國有著悠久而輝煌的歷史，然它實是源於佛教的供花。以花供佛的記載，散佈於諸佛典中，而佛傳偈頌中亦多有記錄。供花於佛，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寄託著佛教的審美理想。佛傳偈頌中，有不少供花禮佛的描述，如《修行本起經》記載佛陀前世為儒童菩薩，本來隱居山林，因入城時聽聞群眾說起錠光佛今日當來，遂心生歡喜，欲以花供佛；但當時因為全國之花皆被國王命令集中於王宮，欲獨自供養錠光佛；儒童菩薩遍尋不得花以供佛，遂心生不樂。錠光佛知曉儒童菩薩心願，便以佛力使宮中一女持瓶盛花而過，並以光明徹照花瓶，使儒童菩薩見到瓶中有花。於是儒童菩薩持五百錢欲向宮女買五株花：

銀錢凡五百，請買五莖花，

奉上錠光佛，求我本所願。¹²¹

女子起初不願意，後來知道儒童菩薩是希望能以花供佛，成就未來成佛之心願後，遂以後世能作為儒童妻為交換條件，出讓五株花給他，並求其代獻兩

¹¹⁹ 《長阿含經》卷十六：「所謂師子者，是如來、至真、等正覺，如來於大眾中廣說法時，自在無畏，故號師子。……如來在大眾中勇捍無畏，作師子吼，善能說法。」（《大正》1·104a-b）比喻佛陀說法猶如百獸之王獅子之吼叫聲，發大音聲，震動世界，百獸悉懾伏，能摧破外道異見，具有震撼力。

¹²⁰ 《方廣大莊嚴經》卷一偈頌：「如來大法音，外道悉摧伏，／譬如師子吼，百獸咸驚怖。／智慧以為手，從於精進生，／無量諸魔軍，自在能摧伏。」（《大正》3·541a）。

¹²¹ 《大正》3·462a。

株花予錠光佛。錠光佛接受儒童菩薩供花後，為其授記百劫之後當為釋迦文如來。此段以花供佛的記載，於《太子瑞應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中亦有。佛陀前世以花供佛並被授記之事，姑且不論其真偽，然諸經中常提此事，應可視為佛教以花禮佛的美學表現。

《普曜經》中，亦記載有諸天人唱頌以花供佛之偈頌：

散花供養聖，奉仁名花香；
悅心天人尊，離欲安無患。
意妙清淨花，善願演光明；
迦夷¹²²散眾花，等供福清淨。¹²³

此偈頌是描述佛陀於兜率天欲降生前，諸天人以愛敬心各持花香以供佛¹²⁴，並唱頌此偈。同經〈迦林龍品〉中，記載佛陀於菩提樹下成道時，十方無央數天人菩薩往詣佛前，集諸華、名香等供養佛陀：

或受持華香，樹葉華香散；
佛子現半身，卑已散華香。
或受分陀利，青蓮若干華；
住相三十二，歎尊無所著。¹²⁵

偈頌中的「分陀利」乃指白色蓮花，¹²⁶上述偈頌描述諸天人以白蓮花、青

¹²²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梵迦夷天(此言淨身天也，梵淨也，即初禪梵天也)。」(《大正》54·358a)

¹²³ 《大正》3·489c。

¹²⁴ 《大正》3·490a。

¹²⁵ 上引普曜經二偈，見《大正》3·489c；516b-516c。

¹²⁶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曰：「奔荼利迦花，古云芬陀利，正梵音云本拏哩迦花，唐云白蓮花，其花如雪如銀，光奪人目，甚香亦大，多出彼池，人間無有。」《大正》

蓮花等若干眾花供佛，稱歎佛陀證道。由此可知獻花供佛此舉，於佛教中實有長久的歷史，其目的在於表達對佛的禮讚與恭敬，也代表花在佛教美學裡，是與美好、讚歎、光明、清淨、禮敬等意涵連結在一起的。

再如《佛本行集經》卷十四，記載作瓶天子欲使悉達多太子捨宮出家，遂以神力令太子宫中諸婬女所作音聲歌曲，唯傳涅槃信解微妙之聲。諸婬女唱頌如下：

昔有佛名曰，廣大日天面，
多持眾花嚴，供養彼世尊。
其次復有佛，號名為勝尊，
持妙多銀華，莊嚴彼佛上。
蓮花上佛前，布施諸瓔珞。
法幢如來上，散諸妙花香。
然燈世尊邊，五青蓮奉施。¹²⁷

此偈頌訴說累世以來，佛陀皆曾以不同身份供花於諸佛，最後以五青蓮獻於然燈佛前（即前述所言儒童菩薩供花於錠光佛之事）。凡此，皆可見出佛教對以花供佛之行為，乃視之為美事，供花禮佛可說是佛教基本美學態度之一。

再如同經卷五十二〈優陀夷因緣品〉，記載佛陀與弟子們行遊至迦毘羅婆蘇都城，住於尼拘陀樹林內時，向弟子以偈述說遊歷諸國所遇勝妙之事：

釋種如來大師子，瞿曇¹²⁸最勝威德者，
往觀城邑及聚落，悉有廣大諸異相。

54 · 324b。

¹²⁷ 《大正》3 · 719a-719b。

¹²⁸ 指佛陀俗家族姓。

所欲至於村聚落，往見如來大聖師，
處處一切諸人眾，恭敬尊嚴來迎奉。
所欲至於村聚落，往見如來大聖師，
凡是一切諸華樹，悉各傾向世尊所。
至於一切林樹下，世尊若立若止息，
是樹自然雨其華，遍布其地悉充滿。
所至一切林樹下，世尊於中若止住，
是樹甘果自然落，枝葉婀娜悉低垂。
有樹人所攀及者，華果紛雜自可憐，
瞿曇如來大聖師，遊行應感如是事。
樹有人所不及者，妙華甘果自然落，
瞿曇雄猛大聖師，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華名曰薑迦羅，
瞿曇雄猛大聖師，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華名曰曼殊沙，
瞿曇雄猛大聖師，威德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於雜種妙色華，
瞿曇雄猛大世尊，威神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華名曰曼陀羅，
瞿曇雄猛大聖師，威德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華名曰波利耶，
瞿曇雄猛大聖尊，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華名曰毘婆伽，
瞿曇師子大聖師，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華名曰香勝香，

瞿曇師子天人尊，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於種種妙香華，
瞿曇大聖人天眼，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華名曰普至香，
瞿曇雄猛大聖尊，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於微妙金色華，
瞿曇雄猛大聖師，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諸微妙寶色華，
瞿曇十力大聖尊，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諸妙色寶莖華，
瞿曇雄猛人天眼，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雨優鉢羅微妙花，
瞿曇雄猛天人師，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隨順佛行路，悉持種種妙香華，
為彼大聖天中天，隨路雨華恒至膝，
彼時無寒復無熱，種種蚊虻諸惡蟲，
微妙大聖天中尊，應感能招如是事。¹²⁹

上述偈頌乃在說明 佛陀遊歷 諸國時，所遇種種「勝妙事」：當佛陀來到林樹下，樹木便將其花朵自然飄落，遍布其地，以獻其禮敬之心；行遊度化時，諸天在虛空裏，亦皆灑下種種香花供佛，花朵之多，幾可堆疊至膝，故云「隨路雨華恒至膝」。諸天所獻之花有 薑 迦羅花、曼殊沙花、曼陀羅花、波利耶花、毘婆伽花、香勝香花、普至香花、金色花、寶色花、寶莖花、優鉢羅微妙花、雜種妙色花、種種妙香花等，偈頌中羅列如此多名目之花，無異是

¹²⁹ 《大正》3・893a-893c。

彰顯以花供佛之恭敬與 勝妙，故偈頌起始前，有長行云「以偈說遊歷國土勝妙之事¹³⁰」，可見以花供佛乃「勝妙」之事。佛教以何者為勝妙的觀點，在此著墨於供花一事上，表示供花乃其美學表現的一環。

又如《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記載佛陀欲降生前，佛母摩耶夫人於眠寢之際，見六牙白象騰虛而來，並見諸天焚香及散種種妙花於虛空中：

見有乘白象，皎淨如日月；
釋梵諸天眾，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花，并作眾伎樂；
充滿虛空中，圍繞而來下。¹³¹

從偈頌中可知，對於佛陀降生人間的讚歎，諸天以散花來表達恭賀與禮敬之心。

綜上可知，佛傳偈頌中將供花禮佛一事，視為對佛的歡喜恭敬心呈現。各佛傳偈頌描述：當見佛時、當佛下生時、當佛證道時、當佛行遊時，皆可以花供佛，表達內心的歡喜與虔誠。「花」在佛傳偈頌中，是體現持歡喜心、恭敬心禮佛的美好之物，可說是投射佛教美學思維的「符號」，而「供花禮佛」之美感體驗，是愉悅歡喜的，展現修行主體由心形之於外的美，映現出供花在佛教美學上的獨特性。

肆、結論

統括本文所研究的十部佛傳，可發現記錄佛陀一生事蹟的這些佛傳，雖在

¹³⁰ 《大正》3・893a。

¹³¹ 《大正》3・624b。

敘述佛陀成道歷程，但亦將佛教看待世間萬象的基本美學態度，濃縮於偈頌中。本文綜合以上論述，將漢譯佛傳裡蘊含豐富美學意蘊的偈頌，歸納出五點獨具特色、內蘊豐富的佛教美學表現，此五點也可說是佛教美學作用於佛典中的獨特表現：

一、人格典範美：

佛傳偈頌展現出佛教所讚歎的人格美，是重視善行實踐面向的，且其強調布施、忍辱、護戒、慈心的人格典範，以及累劫行善必可獲致善果的思想，亦成為佛教有別於他教、中國文化的道德美學思維。此外，展現人格美的偈頌，其敘述策略，往往是透過「時空觀」強調累劫修行的勤苦，並傳遞出行善的果報，以感召世人在日常生活中應有的作為與態度。這些藉由描述佛陀人格而形塑出人格美的指標，蘊含了佛教的道德美學、生命美學於其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影響人們處事作風的指導準則。

二、清淨之美：

漢譯佛傳中，對於人的內、外在描述，常以「清淨」為尚。「清淨」乃包含心、身、語、意、相之清淨，此種觀點蘊含佛教看待世間萬象所持的美學取向，可視為佛教視世俗美之所以為美的觀照態度。例如佛傳偈頌中記載太子選妃的審美標準，是以「清淨」作為第一考量的，且歷述三十二相好，緣自宿世修行清淨法所獲果報，顯現佛教的人體美學係建築在德行實踐之上，仍是延續道德美學的路向。佛傳偈頌中反覆強調的「清淨」，不僅是佛教教義所著重的部分，亦映現出佛教在修行實踐意義上的美學趨向。

三、寂靜之美：

佛教所言的「寂靜」，一方面指主體放下萬緣，回歸無憂離苦的禪定狀態；一方面係指寂滅無相的涅槃境界。佛傳偈頌中，有許多讚歎無憂離苦的禪定寂靜之記載，主要是宣揚佛教以寂靜為尚的態度，也是佛教呈現本體美學的境界。這些描述「寂靜」之美的，有的以空林流泉之清幽雅靜來烘托內心寂靜之狀態，可說是以具體的相來呈現；有的則直指如在禪定中，可說是以神秘的宗教冥想體驗來呈現。佛傳偈頌中對於涅槃的描述，是寂靜、無生滅、無盡清涼、不復受苦的，體現出佛教死亡美學的極深意蘊。

四、力之美：

佛傳偈頌中自然流露出佛陀其力大於他人，無人能勝之的讚歎。此種對力大的推崇與讚歎，雖非佛法所強調之處，然我們由佛傳描述中，可見出佛教對「力」及其強度所投射的基本美學觀。多處偈頌中對佛陀非凡的神力描述，顯然是飽含對佛陀的崇敬之情，欲將佛陀神化之，然不啻說明了佛教以“力”為美勝事的美學取向。此「力」並非現實中的物理力量，可以科學、理性思維來計量，其內含的美學意蘊，與佛典中形容佛陀說法如「獅子吼」般有異曲同工之妙，皆是以具有震撼力、能摧破一切外道異見的崇高感，及以智慧精進為核心力量所帶來的震撼力度，為其美學意蘊。

五、以花供佛之美：

從諸多佛傳偈頌中，可知以花供佛此舉，於佛教中實有長久的歷史。佛傳偈頌中將供花禮佛一事，視為對佛的歡喜恭敬心呈現。各佛傳偈頌描述：當見

佛時、當佛下生時、當佛證道時、當佛行遊時，皆可以花供佛，表達內心的歡喜與虔誠。可見「花」在佛教美學觀裡，是與美好、讚歎、光明、清淨、禮敬等意涵連結在一起的，是體現持歡喜心、恭敬心禮佛的美好之物，可說是投射佛教美學思維的「符號」，而「以花供佛」之美感體驗，是愉悅歡喜、勝妙美好的，展現修行主體由心形之於外的美，映現出以花供佛在佛教美學意蘊上的獨特意涵。

透過對漢譯佛傳偈頌豐富的美學意蘊分析，本文認為佛傳偈頌不僅敘述了佛陀一生的聖行事蹟，也闡揚佛教豐富的美學意蘊，傳遞出佛教對宇宙、對世界、對個體生命的美學思想。

參考文獻

一、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按譯者、撰者時代排序）：

（一）佛傳類：

[東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大正藏第三冊）。

[東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大正藏第四冊）。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大正藏第三冊）。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普曜經》（大正藏第三冊）。

[西晉]居士聶道真譯：《異出菩薩本起經》（大正藏第三冊）。

[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佛說十二遊經》（大正藏第四冊）。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大正藏第四冊）。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藏第三冊）。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大正藏第三冊）。

[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佛本行經》（大正藏第四冊）。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大正藏第三冊）。

[宋]法賢譯：《眾許摩訶帝經》（大正藏第三冊）。

（二）經錄類：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隋]沙門法經等：《眾經目錄》（法經錄）（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大正藏第四十九冊）。

[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數人合撰：《眾經目錄》（《彥琮錄》）（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釋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釋靜泰：《眾經目錄》（靜泰錄）（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釋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沙門智昇：《開元釋教錄》（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唐]沙門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大正藏第五十五冊）。

[明]釋智旭：《閱藏知津》（大正藏第三十一～三十二冊）。

（三）經音義類：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大正藏第五十四冊）。

（四）其他經律論藏：

[東晉]釋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大正藏第二冊）。

[東晉]佛陀跋陀羅與法顯共譯：《摩訶僧祇律》（大正藏第二十二冊）。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長阿含經》（大正藏第一冊）。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大正藏第廿二冊）。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九冊）。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藏第二十五冊）。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大正藏第二冊）。

[後魏]勒那摩提譯《究竟一乘寶性論》（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梁]寶亮等撰：《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

[梁]慧皎撰：《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冊）。

[北齊]那連提耶舍譯：《大寶積經》（大正藏第十一冊）。

[隋]智者大師撰：《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

[隋]嘉祥寺胡吉藏撰：《法華義疏》（大正藏第三十四冊）。

[隋]慧遠撰：《大般涅槃經義記》（大正藏第三十七冊）。

[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

- [唐]天台大師智顗說，灌頂筆錄《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六冊）。
- [唐]菩提流志等譯：《大寶積經》（大正藏第十一冊）。
- [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大正藏第三十冊）。
- [唐]玄奘譯：《顯揚聖教論》（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大正藏第廿七冊）。
-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大正藏第廿九冊）。
- [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記》（大正藏第五十一冊）。
- [唐]義淨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大正藏第五十四冊）。
- [唐]澄觀撰：《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大正藏第三十六冊）。
- [唐]普光撰：《俱舍論記》（大正藏第四十一冊）。
-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大正藏第四十一冊）。
- [唐]般刺密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第十九冊）。

（五）電子光碟索引：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光碟（2014 年版）。

二、古人著作（按撰者時代排序）：

-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84 年）。
-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台北市：大安，1998 年）。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縣：漢京文化，1985 年）。

三、近人論著及期刊（按出版時間排序）：

常盤大定：《仏伝集成》（東京：丙午出版社，1924 年）。

木村泰賢校閱並平等通昭共著：《梵文佛傳文學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30 年）。

深浦正文：《佛教文學概論》（京都：永田文昌堂，1970 年）。

Nancy Falk, "To Gaze on the Sacred Sites," *History of Religions* 16:4 (May, 1977)。

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台北市：新文豐，1983 年）。

鮑山葵(Bosanquet, Bernard)著，周煦良譯《美學三講》（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年）。

水野弘元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佛教的真髓》（嘉義市：財團法人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附設香光書鄉出版社，1986 年）。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市：正聞出版社，1986 年）。

山田龍城：《梵語佛典の諸文獻》（京都：平樂寺書店，1959 年。中譯本《梵語佛典導論》，許洋主譯，收入《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79 冊，華宇出版社，1988 年）。

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台北市：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外薗幸一：《ラリタヴィスタラの研究(上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94 年）。

曾祖蔭：《中國佛教與美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雲井昭善：〈「佛傳」と「佛傳文學」〉，《龍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33 期（1994 年 11 月），頁 262-278。

依淳：《本生經的起源及其開展》（台北市：佛光，1997 年）。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14 年）。

水野弘元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大乘初期至中、後期菩薩思想的變遷〉，《香光莊嚴》七十二期（2002 年 12 月 20 日）。

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

王晴慧：《六朝漢譯佛典偈頌與詩歌之研究》（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年）。

河野訓：《漢譯佛傳研究》（伊勢：皇學館大學出版社，2007 年）。

祁志祥：《中國佛教美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研究論文

社會工作的職場靈性^{*}

張英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4 年 11 月 19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12 月 21 日。

^{*}作者通訊方式：yc66c@ncnu.edu.tw。另外，作者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職場靈性」是西方管理學界於 1990 年代，回應全球化與後工業發展中，工作環境高度競爭、人際孤立疏離、員工士氣低落等問題，所提出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希望藉此提升組織績效。作為一個心智與情緒高度密集的勞動，台灣社會工作者同樣面臨了工作環境與條件惡化等問題，除了高流動率與流失率外，也出現許多質疑投身社會工作有何意義的反思。本文將從社會工作先驅瑪莉·派克·芙蕾特（Mary Parker Follett, 1868-1933）討論職場靈性的視角出發，運用管理學研究結果，闡述職場靈性於內在生命、工作意義和社區歸屬等三個面向，進而提出以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工作實務，如何搭配靈性領導知能，追求社會工作之職場靈性。然而，職場靈性具有一刀兩刃的黑暗面，呼籲社會福利組織管理者不應只關注職場靈性的工具性意義，必須同時具備倫理省思，以發揮職場靈性的積極正向效益。

關鍵字：職場靈性、社會工作、瑪莉·派克·芙蕾特

Spirituality at Workplace of Social Work

Ying-Chen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has been largely used in workplaces as an important managerial tool since 1990s, to cope with high turnover rate and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work force. Many believed that the instability of work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decade have turned the workplace in to an environment where workers were demoralized. Corporate leaders and managers try to improve performance through workplace spirituality programs. The deteriorating work conditions for social worker had made social work a less meaningful job. The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 contributions of Mary Parker Follett on current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then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of three aspects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such as inner life, meaningful work and sense of communit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use of relationship-based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spiritual leadership to create a friendly and spiritual workplace. Finally, a call for the leaders of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not task-oriented driven but with spiritual and morality.

Keywords: workplace spirituality, social work, Mary Parker Follett

壹、前言

工作之於人的意義是甚麼？在高度競爭的工作環境下，工作耗費了人們絕大多數的時間與精力，除了獲得薪資外，人們是否還能冀望從工作中獲得快樂？免強餬口的薪資，充其量只是滿足基本生存需求，但是關愛、歸屬感與自我實現呢？捷克經濟學家賽德拉切克（Tomas Sedlacek）指出，機器人 robot 這個字彙源於古捷克文與斯拉夫文的 robota，其義為「工作」，指涉凡遭遇到貶抑、變成只是工作者，即謂機器人（劉道捷譯，2013）。換言之，一個人的工作若只是謀生工具，那人與機器又有何差異？

在某些因緣下，筆者頻繁地接觸一些任職於大陸台商企業的台籍人力資源管理幹部，發現即便在年年調漲薪資、處處增加福利的企業裡，招募工人仍然是大陸人資管理每天的首要工作；工業區裡幾乎每家企業都是高缺工率與高流動率。為了控制員工流動率高所造成的高成本，人資幹部也試著用各種方法來維繫員工：鼓勵幹部閱讀《論語》、《菜根譚》、讀佛經、做志工、強化生活倫理教育等，似乎想透過「心靈改革」以提升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當缺工與留才變成企業的經營難題之際，我們應該凸顯的是，工作不是簡單關於獲得報酬而已，它還有意義與價值的詮釋；又或許，這才是更核心的問題。

以勞力與情緒密集勞動為特色的社會工作，其高流動率與高缺工率，恐怕也是所謂「專業」之冠。各種關於台灣社會工作者勞動現況研究與報導指出，社會工作場域，人力不足、工作負荷高、時間急迫性與情緒壓力強、薪資低、人身安全議題多，都導致社工流動率很大（嚴祥鸞，2010）；特別是保護性社工、偏遠地區、微型社福組織，其社工流動率更高。張紉（2003）的研究指出，私部門的社工流動率（32%）遠高於公部門（13%）。鐘文鏐、鄭怡世（2011）針對民間組織的研究顯示，社工員平均任職 2 至 3 年後就曾轉換工作，有一半的社工員想要離開現職；雖然多數仍表示會繼續留在社工界，但年資淺、流動

率高仍然是中、小型民間組織的宿命。

如何「留」住社工？許多主張「留」住社工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改善工作條件，給予合理的薪資、提供意外險、合理的工作量與工作內容、適當的工時、落實人身安全計畫、提供專業訓練、重視與親友的情感連結、健全的督導體系與功能和強化組織的支持體系等（陳欣怡、鄭淵全，2010；嚴祥鸞，2010；Graham & Shier, 2010）。作者認為，社工的大學畢業起薪水準，相對於其他行業的起薪並不算低，但因為缺乏其他績效與獎勵金制度，也較少垂直式的向上升遷機會，因此數年後就會面臨生涯發展困境。如果我們只用一般企業留才的角度來思考社會工作的人力問題，或嘗試模仿企業的職場文化管理或靈性管理方案以解決問題，不僅無法有效維繫人力穩定，更無法凸顯社會工作的本質性意義，亦將辜負社工在情緒勞動上的付出與投入職場的原初認同。經過一段長時間的閱讀、思考以及與社工員的對話中，作者認為，工具性的職場靈性論述，無法回應多數人選擇投入社會工作的動機—因宗教與靈性因素（Faver, 2004）而投入社工行列。因此，管理者應該更審慎地關懷社工人員的宗教與靈性需求滿足問題。

全人關懷（holistic care）是社會工作的核心理念，主張工作者應兼顧服務對象的身、心、靈與社會（bio-psycho-spiritual-social）之需求。同理，社會工作管理者亦應於管理過程中，兼顧社會工作者的身、心、靈、社會之全人需求。然而，有多少管理者關心社會工作者的靈性需求？宗教信仰與靈性觀點雖不必然畫上等號，但兩者絕對有密切關係；但有多少源於宗教背景的知名民間組織，在政府與社會期待「宗教自由」與「不得傳教」的壓力下，絕口不提信仰與靈性？這種形式主義下的抉擇，是政治正確還是自性失落？

本文將從社會工作先驅瑪莉·派克·芙蕾特（Mary Parker Follett, 1868-1933）討論職場靈性的視角出發，運用管理學研究結果與社會工作實務的靈性觀點，闡述職場靈性關於內在生命、工作意義和社區歸屬等三個面向，

進而提出以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工作實務，如何搭配靈性領導知能，追求社會工作之職場靈性。最後，文章將討論職場靈性一刀兩刃之黑暗面，呼籲社會福利組織管理者不應只關注職場靈性的工具性意義，必須同時具備倫理省思，以發揮職場靈性的積極正向效益。

貳、芙蕾特與職場靈性

有別於傳統的人們在於宗教的神聖性中追求靈性與內在生命意義，1990年代以降的職場靈性（workplace spirituality）觀點，試圖帶領人們在世俗的工作領域內去追求靈性。管理學研究溯源指出，職場靈性之探討源自於一個被遺忘的社會工作先驅芙蕾特¹（Johnson, 2007; Pandey & Gupta, 2008; Quatro, 2004）。雖被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與諸多學者尊稱為「管理學之母」或「管理學的先知」（Graham, 1995），著作也編纂成管理學重要理論文獻（Metcalf & Urwick, 1942），但芙蕾特其實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社區睦鄰運動工作者，她畢生在美國波士頓從事睦鄰工作長達 20 餘年；因此，她也是一位社會工作先驅，特別是在組織管理方面。

或許因為社工實務的背景，芙蕾特提出許多超越其同時代學者的管理學概念，例如領導、充權、衝突、控制、整合等，均有其先見之明，也被認為是人際關係學派的創始者；職場靈性概念也由她奠基而展開（Johnson, 2007）。很長一段時間，公私領域被強行二分，靈性被歸為個人私生活，在職場中少被重視。然而，芙蕾特很早就主張，人的生活是一種不斷持續的過程，而且人與環

¹ 芙蕾特之所以被稱為「被遺忘的社會工作先驅」，是因為她生長的年代大約與亞當斯（Jane Addams, 1860-1935）、芮奇孟（Mary Richmond, 1861-1928）同時。可是社工界大都熟悉亞當斯和芮奇孟，對芙蕾特卻很陌生，甚至連暢銷的社會工作概論教科書或社會工作管理的書籍都很少提到她。但是她的貢獻已被管理學界、政治學界、社會教育學界等領域所肯定，卻被社會工作界給遺忘。

境也是彼此相互影響；人類生活的各個面向，例如產業活動、商業活動與靈性發展是無法獨立分割。尤其是在一個機械化的年代，如果將靈性生活與日常活動分離，那將是致命的二元論。早在百年前，她似乎就預見了現代人的工作困境：（Follett, 1924: 87-88）

假如工作時間短，就可能有一種時間救贖的理論：意即在一天之中，工作會讓我們沉淪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我們還可以花幾個小時去接受教育。這樣的話，靈性的影響力可能會勝出。問題是，我們的生活無法如此切割，八小時工作的影響力會持續影響到休閒那段時間；我們必須將八小時的影響力估算在其中。

芙蕾特在《創造性經驗》（1924）一書中明白指出，在企圖尋找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個人要能保有正直的品格，就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讓靈性的價值不斷地擴展。她並沒有指出具體的技術去擴大靈性的價值，而是強調一種稱之為「循環式回應」（circular response）之過程。所謂「循環式回應」強調，人類的日常生活都是在「關係」（relating）當中進行。人類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裡，透過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以創造生命的意義。藉由「循環式回應」，互動的雙方可以隨時改變，創造新的自我與互動關係。芙蕾特認為，在循環式互動關係中，不是「我」回應「你」，而是回應「你和我」（you-plus-me）。她進一步解釋：（Follett, 1924: 62-63）

「我」不可能影響「你」，因為你已經影響我；意即人在相遇（meeting）的過程裡，同時也藉著相遇的過程，雙方都變得不一樣。這樣的改變在我期待相遇，甚至在相遇之前就已經產生。

芙蕾特意指，人與人相互回應，其實是在回應關係，是「我和你」（I-plus-you）與「你和我」的相遇。在這種相遇的過程中，人類不斷地展開進步的經驗，也就是在關係中創造累加價值（plusvalents）。芙蕾特認為，如果我們無法掌握「循環式回應」關係，就無法真正理解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及國際關係。

除了日常生活中人與人的關係之外，芙蕾特認為，人也應該和神建立關係；透過人與神共同創造世界，才能展實現自我，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她認為：（Follett, 1918/1998: 103-104）。

每個人都能在創造性的過程中參與分享，這就是民主；這就是我們的政治，我們的宗教。神是推動世界的力量，而人類總是被期待能和神建立關係；在不斷地創造過程中，人類是共同的創造者（co-creators）。……促成人和神共同進行這偉大工程的正是人性的自我創造（Humanity self-creating），神不斷地召喚我們去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我們必須結合眾人的力量去實踐這光榮的使命。這就是真正的民主（True Democracy）。

芙蕾特從八歲開始就是聖公會的信徒，從一個基督徒的角度，她認為追求靈性不只是透過人與人的關係，也需要藉由神與人的關係，呼應神對我們的召喚。透過「循環式回應」與「真正的民主」等主張，芙蕾特強調，靈性生活是透過團體的過程中，不斷地與他人共同創造新的經驗，因而促成自我實現。而關係是個人、職場、或任何生活領域中追求靈性的方法（Johnson, 2007）。芙蕾特關於工作與生活、自我實現與關係的看法，至今仍影響當代職場靈性的重要論述。

參、何謂職場靈性？

行政院勞動委員會（目前的勞動部）《101 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分析》指出，台灣的勞工有 50.7%有延長工時（加班）的事實，一年內遇過加班超過 12 小時的勞工高比例達 27%。事實上，在服務業中，許多人每日工作超過 12 小時似乎已成正常現象。當一個人將生命的絕大部分獻給工作，真的是正常嗎？假如人們覺得在職場上工作很快樂，那麼這種奉獻還算值得。可是多數人並不覺得快樂，工作似乎只是謀生不得已的手段。儘管社會工作的工作條件不好，社工的流動率也高。多數社工即使離開原來的社工組織，但還是留在社會工作的崗位。或許談不上「樂在工作」，至少還有些人「苦中作樂」吧！

我快樂嗎？我想是吧！

雖然待遇差強人意，我依然快樂！

雖然工作成就感不高，我依然快樂！

雖然案主的成長很遲緩，我依然快樂！

雖然週末常常沒有休假，我依然快樂！

雖然社會的環境沒有改善，我依然快樂！

雖然機構的政策搖擺不定，我依然快樂！

雖然政府的督導應接不暇，我依然快樂！

雖然募來的款項一直不夠，我依然快樂！

雖然和同事的配合一團混亂，我依然快樂！

雖然主管過時的價值觀無法轉變，我依然快樂！

我快樂因為我知道為何而來。

我快樂因為我知道所做一切的價值何在。

我快樂因為我知道我不孤單。

我快樂因為我知道天上的祂會喜歡。

（漂流社工電子報《試刊二號》你快樂嗎？2002 年 6 月 28 日，
<http://mypaper.pchome.com.tw/fsw0621/post/1111674>）

上面這文字是引自一位「漂流」社工發表在《漂流社工電子報》〈你快樂嗎？〉這個專題中的一段話。從這些文字裡顯得這位社工相當有靈性，頗具有當代職場靈性的重要因素。從字裡行間透露出作者是一位基督徒，面對那麼多的「雖然...」，在艱困的社工職場中，許多無法自我掌控的因素，但他仍願意把自己交付給神，而無怨無悔地繼續從社會工作中找到內在的生命意義。這段文也顯示了他積極回應神對他的召喚，因此他「不孤單」，因為神與他同在。從這位基督徒社工身上所看到的是，一個有靈性的社工，不同於一般專業者對其工作的認同，其認同是建構在作為「神的子女」（child of God）的角色上。

「神的子女」意味著社會工作者本身與服務對象都是依據「神的肖像」（*Imago Dei*）所創造，作為「神的子女」更看重自己的內在價值，將自己與別人看成是「人」（people），而不只是「社工」與「案主」，而樂於與神同在，也因成為「神的子女」而喜悅（Pooler, 2011）。

1980 年代以來的新右派思潮與全球化競爭，導致了工作者因企業人員緊縮、組織改造與資遣等因素而士氣低落，因此企業期望用靈性管理來激勵員工，甚至以發展靈性來創造競爭優勢。社會文化面則因受到傳統的鄰里、教會、公民團體與家庭逐漸失去連帶、戰後嬰兒潮人口老化、亞洲文化與哲學強調冥思、忠誠與靈性修為等因素影響，使得管理學界陸續提出「以人為本」的管理哲學（Ashmos & Duchon, 2000; Johnson, 2007）。

到底甚麼是職場靈性？管理學界所謂的靈性意涵指涉，追求生命的意義、促進個人的成長與發展、與建立和社區的連結，如此能協助個人自我超越，成為社群的一部分。雖然，關於職場靈性的定義仍有許多爭議，但最常被引用的

定義則是艾許默和杜雄的觀點：(Ashmos & Duchon, 2000: 137)。

職場靈性是肯定員工都具有內在的生命，這個內在生命可培養有意義的工作，而有意義的工作亦可滋潤內在生命。而這種互相影響的過程必須是在社區的脈絡中產生。因此，職場靈性可包含三個要素：內在生命(inner life)、有意義的工作(meaningful work)和社區(community)。

自 1990 年代至今，職場靈性研究基本可分為兩個重要取向，一為解釋取向(exploratory approach)，另一為結果取向(consequential approach)(Gotsis & Kortezi, 2008)。解釋取向著重於探討職場靈性的意涵，對概念的詮釋有相當歧異，但基本主張職場靈性是一個複雜且多面向的建構，具個人化與抽象化特質。另有部分學者則嘗試建構職場靈性之操作化指標(Ashmos & Duchon, 2000)。解釋取向著重於分析職場靈性的多元面向，從艾許默和杜雄對職場靈性的定義來看，職場靈性包含意義、成長與連結三個密切相關的面向(如表 1 所示)。意即在生活中找尋生命的意義與目的；從生活的各個層面發展自我，包含自我超越；和從工作中建立社區關係。

表 1 職場靈性的面向

喜歡工作	● 從工作中獲得動力
	● 工作中獲得人生的意義與目標
團體層次 (社區意識)	● 與同事有連結的感覺
	● 同事之間相互支持
	● 有共同的目標
組織層次 (與組織的價值結合)	● 感受到與組織的目標有連結
	● 認同組織的使命與價值
	● 組織關心員工

資料來源：Milliman, J., A. J. Czaplewski and J. Ferguson (2003).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Employee Work Attitudes: An Exploratory Empiric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16(4), 428.

解釋取向也探討具爭議性之靈性與宗教關係。有人認為宗教與靈性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宗教是一種形式與結構，是一種正式化的信念與儀式；而靈性所關切者為本質性的問題，著重探討生命的意義。但是也有人主張，宗教與靈性雖然概念不盡相同，但兩者密切相通，甚至認為要討論靈性，是無法避談宗教與信仰（Quatro, 2004）。

不同於解釋取向，結果取向論者，著重於職場靈性作為一個工具，所實質產生的績效。這方面累積了許多重要的研究發現，例如，職場靈性能促成實現組織目標、提升員工對組織的忠誠度、促進組織內的信任度、提升創造力、創造更高的利潤、提振員工士氣、強化組織績效、提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降低員工流動率等等（Gotsis & Kortezi, 2008）。就此觀點而言，職場上注重靈性發展，不僅對組織本身有好處，而且對員工個人也有正向利益。目前的實證研究比較缺乏探討職場靈性對社區所產生的利益，否則將會有更多證據來說服大眾：職場靈性是個人、組織與社區的三贏策略。然而，這個觀點也被批評為過度強調工具性角度，將會失去追求靈性的「靈性」（本質性意義）。

社會工作專業早於 19 世紀末興起時，即已經與宗教與靈性產生密切關係；後來隨著國家介入社會福利領域越深，以及社會工作專業的世俗化，宗教與靈性的觀點在社工專業中逐漸淡化。直至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由於社會工作強調身、心、靈與社會的全人關懷和多元文化的實務工作，才又重新重視靈性的觀點（Sheridan, 2002），但至今仍非社會工作的主流論述（Healy, 2005）。靈性觀點之運用也多聚焦於服務案主的臨床實務上，較少討論其於社會工作職場脈絡中的角色。因為探討靈性觀點皆起源於神學，所以社會工作的靈性觀點，大致與管理學的討論有共通處。社會工作的靈性觀點強調一種非物質的世

界，亦即個人信仰與價值的內在生命；靈性存在於人與神或神秘力量的關係，即便不同文化對神或神秘力量有不同的詮釋，可能是唯一的真神，也可能是大自然；但靈性在道德理念的指導下，持續影響個人行為、人與他人的關係(Healy, 2005; Mathews, 2009)。綜合諸多社會工作文獻關於靈性的界定，「**靈性是指人類對未知存在的主觀關係，以及人如何與宇宙、世界、他人、自我、道德價值、自我的意義感建立關係**」(Senreich, 2013: 553)。

或許其他助人專業也會強調靈性觀點，例如心理治療的靈性觀點會著重於自尊與個人責任(Krieglstein, 2006)等，但社會工作的靈性觀點與芙蕾特的主張一樣，都強調「關係」的重要性。社會工作之所以能夠持續進行，主要是仰賴社工與神聖力量的關係，社工與工作的關係，還有社工與同事、案主和朋友的關係。社會工作的助人過程中，關係才是核心，關係也是靈性所強調的重點(Faver, 2004; Krieglstein, 2006)。

肆、靈性的社會工作職場

如以結果取向論靈性的價值，社工職場採用職場靈性，應該會讓社工員覺得社會工作是項有意義的工作吧？社工員也應會從工作中獲得更多成長，並與服務對象、同事和社區建立和諧的關係。對組織而言，應該會降低社工員的流動率，讓社會工作的服務更有績效？如從解釋取向觀點看，源自西方基督宗教的社工專業，其強調之人性尊嚴、服務、關懷、社會正義等價值，重視人在環境中的觀點等，再再與職場靈性觀點吻合。加之以台灣不同規模、絕大多數的社會福利組織都有宗教背景，創辦時有基督教、天主教的標印，牧師、神父、修女為創辦人，晨更、讀經融入例行工作中也時有所聞，社會工作職場似乎沒有忽視靈性關懷的理由。然而，現實中的社工職場管理，是否真的有靈性的觀點？如是，為何社工仍發出陷落的求救信號？如否，到底是甚麼阻礙了靈性關

懷在職場中的落實？早期的靈性觀點關注於如何激發服務對象的靈性意義，實踐全人關懷的精神，但職場對員工的靈性關懷則仰賴個人的宗教信仰與獻身；相關社工管理文獻也很少，僅少數論及社會福利機構主管如何在平時的行政管理工作中運用靈性觀點（Chamiec-Case & Sherr, 2006），或以靈性關點協助具有替代性創傷的社工員（Dombo & Gray, 2013），以靈性觀點來維繫社會工作人力（Chadwick & Waring, 2009）等。

這些都是 1990 年代後的研究，因此我們必須質問，強調社工職場的靈性觀點，是一種回應新管理主義與績效追求大軍壓境，社工職場環境日益惡化，宗教世俗化帶來的信仰與價值式微的反動？還是一種用以激勵社工奮勇奉獻、掩蓋剝削社工心力的麻醉劑？其是否真正落實到社工本身的關懷上？或只是管理者的美麗修辭？這個疑問或許永遠沒有答案，但不能不慎思審問。

理想上，社會工作管理者應秉持全人關懷的理念，將靈性關懷融入於組織管理的架構中；尤其是組織變革，至少在組織文化與領導型態等方面應該有所改變（Polley, Vora & SubbaNarasimba, 2005）。本文接下來將從工作設計與組織領導兩個面向，探討如何在社會工作職場中運用靈性觀點。

一、以關係為基礎的工作設計

一位仍從事社工的朋友，在他擔任某縣市家暴中心的社工督導時，曾在臉書上寫道：「我熱愛社會工作，但我討厭現在的工作」²。這個乍聽矛盾，但卻切中要害的宣稱，點出了當今社工職場中，許多社工的工作內容已經偏離本意與初衷，讓人質疑社工意義的困境。從醫院到社區，從身障者到低收入戶，各個領域都可以聽見大小聲不一的質疑，或哀嚎，許多社工夥伴正面臨嚴重的價值與認同衝突（請別要求我提出「證據」，請讀者自行去「傾聽」、「觀察」或

² 引用此話已經於 2014 年 1 月 13 日徵得這位社工朋友的同意，他希望能藉此表達許多社會工作者的心聲。

一設計問卷去驗證？可惜的是，大家都不願面對的真相，是無法用一般研究法調查、統計數字呈現的）。評鑑與績效考核、管理制度的風險與高壓控管，再再讓人喘不過氣來；多少社工們每日忙進忙出，但卻好像不是社工最應該做的事？最終也得不到長官與服務對象的肯定。

台灣與世界各地的社會工作職場，正面臨相同的處境，也就是工作條件惡化、專業認同消失（Ferguson & Lavalette, 2013）。在經濟全球化影響下，市場化成為社會工作職場服務輸送的引導原則；市場化下的社會服務變成商品，讓原本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工作，走向以物質和商品為中心。社工員所提供的服務皆可化成貨幣單位，也必須從成本考量去追求所謂的「最佳價值」。為了符合競爭與效率原則，社工員要背負沉重的個案量，而且需要依據標準作業程序，因而喪失最能代表「專業」的自主評量空間，試想，如果每個人只要按表操課、照流程處遇，社工有何不可取代性？為證明績效，終日忙著統計服務數量；無止盡的文書報表工作，使得社工無暇、也無法與服務對象建立長期的友誼關係（friendship），甚至與同事和督導討論實務工作的時間也變少了；督導變成一個執行內部控管的行政機器。

社會工作本是一個以人為中心的專業，社會工作的先驅們強調「與人共事」（work with people）的理念。如果社會工作要回歸以人為本的工作，需要從社會工作的職務再設計出發。從芙蕾特的觀點來看，關係是職場靈性最核心的概念。對於關係的重視其實是社會工作長期以來的傳統，只是到了 1990 年代以後受到管理主義講究效率的影響，讓社工員無法專注於與服務使用者建立長期的關係。近年，有越來越多的社工再度重視以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工作實務（relationship-based practice）（許雅惠與張英陣，2006; Beresdord, Croft & Adshead, 2008; Faver, 2004; McLeod, 2010; Reimer, 2013; Ruch, Turney & Ward, 2010）。

芙蕾特所強調的關係是一種「循環式回應」過程，是人與人建立靈性關係

的基本原則，在此要從靈性的觀點進一步說明關係的本質。畢斯特神父的《個案工作關係》(Biestek, 1957)和波爾曼的《關係：助人的核心》(Perlman, 1979)兩書是社會工作中討論專業關係的經典之作。兩位作者都認為助人的關鍵在於和服務對象建立「愛的關係」，可知「愛」是關係的重要本質。專業關係的愛就是 *agape*，是對陌生人展現利他之愛，有了愛才能真誠的同理他人，並與人建立平等的友誼關係。

愈來愈多社工實務研究指出，案主認為好的社工就像是朋友一樣，在案主有需要的時候能給予支持，也願意和案主分享。因此，社工員需要重新審視與服務對象的關係，社工員應該是要有更多的時間與服務對象接觸，讓社工有足夠的時間與資源運用社會個案工作與社會團體工作的方法 (Beresdord, Croft & Adshead, 2008; McLeod, 2010)。目前許多組織裡的社工，是將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外包給心理治療師或輔導諮商師，社工員自己則忙於購買式服務契約的外包文書工作，造成社工本身與外包的專家，都無法與服務對象建立長期的關係。美其名是個案管理，其實真正做的是資源管理或記錄管理。作者認為，我們應該在工作設計上，讓社工員找回當初投身社工的感動，讓社工們落實社會個案工作與社會團體工作服務，才能讓社工在與案主建立關係中，感受到助人的意義，也才能讓社工與服務對象之間有更強的連結。

其次，在工作設計上也須重新重視社區工作方法。社區工作原本就是社會工作三大方法之一，過去這三十年來，社會工作走向個人化治療取向，亦即著重個人或家庭的問題解決，而逐漸失去了「社會工作」的「社會」面向，使得社區工作方法在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工作實務中都逐漸邊緣化。雖然在 1990 年代，許多國家的各項公共服務都強調社區化，但是這種社區化的工作目標是汲取社區資源、縮減國家責任，而非建立社區意識、與居民共事的社區工作。如前所述，社區的連結與社區意識是職場靈性的構成要素，若在社會工作職場中採用靈性觀點，則應該重新重視社區工作方法之運用，且不只是福利供給的

「福利社區化」，而是具有靈性的支持性社區（Mathews, 2009），讓服務對象與社工員都能與社區有更緊密的連結。

第三，重新納入宗教福傳元素，讓服務內容與工作內容與組織使命更融合。台灣約有 80% 的人口具宗教信仰，且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台灣的社會福利組織中很多是具有宗教背景的組織，而且近年來地方教會、寺廟，也積極投入社會服務工作。非營利組織研究也因看到宗教組織的影響力日愈擴大，所以將宗教型組織稱為「第五部門」（Cnaan, Sinha & McGrew, 2004）。台灣的宗教型組織，特別是基督宗教信仰的組織，在參與社會工作服務的過程中經常面臨福傳（宣教）與服務的衝突，起因於政府與社會不希望服務的過程中帶有「傳教」的成分，組織也為了強化社區對「專業」的認同，因此都避談靈性觀點的服務。作者認為，信仰自由與不同宗教信仰的寬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宗教型組織在服務與管理過程中融入靈性的觀點也應該被接受，如此方能符合宗教型組織的使命。不過宗教型組織在管理與服務過程採用靈性的觀點，若運用一些較具有宗教意涵的策略時，當然要考慮員工與服務對象的意願，不該強制員工或服務對象接受。

第四，創造神聖的靈性空間與互動，融入靈性技術於工作內容中。職場靈性觀點不僅適用於宗教型組織，也適用於不具宗教背景的組織，就像採用職場靈性的企業，絕大多數不具有特定宗教信仰，但同樣採用靈性或宗教性的方法。社會工作是一項高風險的專業，案主往往帶有創傷，許多社工在面對案主創傷時，經常有替代性創傷風險，也常常遭遇人身安全威脅，在工作情境中心生恐懼。不論是預防或處理創傷事件與恐懼經驗，工作過程中都可融入靈性的觀點。在宏觀面的層次，可在組織中設計一個神聖的靈性空間，讓工作人員可在這個空間冥想、禱告與反思，管理者應主動安排時間讓工作人員可定時運用這個空間。在中距面的部份，機構的督導與工作團隊應該要能發揮情感支持的功能，關心工作人員的靈性成長，幫助社工肯定助人專業的意義。在微觀的層

面，可運用各種冥想的技術處理替代性創傷與恐懼經驗（Dombo & Gray, 2013）。

二、靈性領導

假若職場靈性是組織管理的文化大革命，那麼這場巨變將仰賴高階管理革命來完成；領導者必須在理念與管理策略上進行大轉型，學習如何成為靈性的領導者。芙蕾特認為，在組織內不需要老闆（bosses）、主人（masters）或司機這樣的角色，組織所需要的是真正的領導者。領導者要了解日常生活中不同的觀點，領導者不是將其英明的決策強加在被領導者身上，而是引導大家做明智的決策。領導的力量應該是整合的力量，藉由這股整合的力量，才得以創造出社區（Follett, 1918）。

格林里夫（Robert Greenleaf）的「僕人領導」主張亦與芙蕾特類似，他認為偉大的領導者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必定是僕人，只有當領導者被證明為僕人性格時，人們才會心悅誠服地從其領導。檢測一個好的僕人領導，可以從其服務對象身上來驗證，被服務者是否變得更健康、更有智慧、更自由、更有自主性，更願意成為僕人？同時也應檢視社會是否因此獲益，或至少是不再加深痛苦（胡愈寧與周慧貞譯，2004；Quatro, 2004）。芙蕾特與格林里夫所談的領導，都強調領導者需要服務其追隨者，並讓追隨者與社會都能蒙受其利，這可謂開創近代靈性領導的先河。

靈性領導是「包含了一些價值、態度與行為，藉由召喚（calling）與夥伴關係（membership），激發個人與他人能擁有靈性存在的感覺」（Fry, 2003）。此一定義包含兩層的意義：

（一）創造一個願景，使組織的成員能有被召喚的感覺，也因此可讓個人的生命有意義，並覺得可以改變世界。

(二)建立一個以利他之愛為基礎的社會與組織文化，讓領導者與追隨者在這其中能真誠表達對自己和他人的關懷、關心及賞識。因此能產生歸屬感，以及相互了解與欣賞的感受。

傅萊 (Fry, 2003) 更進一步指出，靈性的領導者應該具備三項特質：願景 (vision)、利他之愛 (altruistic love)、希望與信念 (hope/faith)。如表 2 所示，靈性領導三項特質就是領導者應該具有的願景與德行。

表 2 靈性領導的特質

願景	利他之愛	希望與信念
人 廣泛訴求於主要的利害關係 指明目標與過程 思考更高的理想 激發希望與信念 建立卓越的標準	寬恕	堅忍的毅力
	仁慈	刻苦
	正直	責任心
	熱情	擴展目標
	誠實	追求卓越
	耐心	
	勇氣	
	信任	
	謙虛	

資料來源：Fry, L. W. (2003). Toward a Theory of Spiritual Leadership.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4, 695.

目前被全球廣泛接受的社會工作定義，是國際社會工作協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 於 2000 年所提出的定義，其揭櫫社會工作的使命，是在促進社會變遷與社會正義。因此，社會工作職場中的領導者不僅本身應將這個使命納為自己的願景，也應該協助社會工作者實踐這個使命。

尤其是處在「福利摳節」(welfare austerity)的時代，許多福利服務使用者的問題被個別化，認為是個人因素所造成，因此政策與實務趨向處理個人問題，而忽略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社工職場的領導者應更洞悉當代管理主義對社會工作的影響，進而突破此困境以實踐社會工作的使命。

此外，強調「依法行政」的義務論倫理觀，仍是目前行政管理倫理的主流。惟於多變的社會環境中，這樣的倫理觀念可能會忽視服務對象的需求與處境而造成傷害。作者認為，相較於義務論，當前的社會工作實務更需要德行論的倫理(virtue ethics)(McBeath & Webb, 2002)。馬斯洛在補充需求階層理論時，特別強調追求靈性的「存在價值」(Being-values, B-values)，這個價值可以呼應佛教所提倡的「菩薩道」(Bodhisattvic path)精神，或希伯來人所謂的聖人「查帝克」(Tzaddik)(Hoffman, 1996)；也可以視之為儒家所強調的「智、仁、勇」、老子所說的「慈愛、節儉、不敢為天下先」或西方的四樞德「正義、智慧、勇敢、節制」等「德行」。

雖然現代的組織強調參與式管理，但領導仍是影響組織績效的重要因素，做為一個靈性的領導者，講求德行倫理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領導者只講求利潤的績效與快速的效率，恐怕很難成為靈性的領導者。從當前的社會工作環境來看，社工員不可能會越來越健康、快樂與自由。所以，社會福利機構也迫切需要有靈性的領導。

可惜的是，社會工作領域內的靈性領導之討論仍相當有限。察彌·凱斯與薛爾(Chamiec-Case & Sherr, 2006)的研究指出，有些社會工作管理者已經將靈性的觀點融入於社會服務機構的管理當中，但因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具有基督宗教信仰的社會工作管理者，所以其靈性觀點也傾向與基督信仰有關。根據該研究發現，社會工作管理者將靈性觀點融入於管理的過程中，主要呈現出七個核心原則：

- 1.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因為神依據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類，而且無

條件的接納人類，由於神無條件的愛人，所以人也應該將這種愛延伸到其他人。

2.神的旨意：神對每件事都有祂的計畫，創造每個人也都有祂的目的。社會工作管理者在職場上做每項決策時，都要去思考神的旨意，而願意將一切交付給神。

3.神擁有一切：管理者應該了解神的旨意，將這些資源用於神所喜愛的，特別是依據聖經上所教導的，要幫助窮人與弱勢者。

4.神的至善：對基督徒的社工管理者而言，痛苦或負向經驗是學習克服挑戰的機會，在痛苦的過程中她們堅信神不會遺棄她們。

5.祈禱的重要性：多數參與研究的社會工作管理者都認為，禱告是在職場中融入靈性觀點的重要元素，是與神建立關係的方法。特別是在做重大決策時，禱告顯得特別重要，透過禱告可以改變事情。

6.分享信仰：基督徒的最大使命是使萬民成為使徒，所以社會工作管理者也會在適當的時機向同工或案主分享其信仰。

7.仰賴聖經的教導：對基督徒來說，聖經的內容代表的是神的話語，是人類行為的準則。在職場上必須有更高的標準與期待才能符合聖經上的要求，而且職場的工作也是為神而做的。

此外，管理學研究中也有零星探討伊斯蘭教與佛教信仰，對職場靈性的影響（Quatro, 2004）。台灣的社會福利機構，具有佛教與道教信仰的數量不多，但還有增長空間，未來應可從不同宗教信仰的角度探討靈性領導更多的實踐。

基本上，領導風格與工作內容不符社工的專業期待，仍是影響社工員流動率的重要因素。社會工作的領導者需要給社工員一個理想的組織使命，作為社工員的工作目標；而領導者也需要了解社會工作的使命與價值，促使組織的願景能吻合社會工作的使命與價值。有不少組織的領導者之所以進用社會工作人員，只是因為政府單位或聯合勸募補助社工人事費，有了此人力可以協處理組織的許多行政工作，以及連結更多的社會資源。可是領導者往往不清楚社工

員的角色與專業期待，致使社工員沒有太多時間去接觸服務對象並和案主共同解決問題，而做許多讓社工覺得「沒有太大意義的事」。社工是關懷的專業，在沒有優渥薪資、缺乏升遷管道的條件限制下，要留才、要激勵，讓社工仍願意盡力為服務對象追求最佳利益，或許獲得靈性的回饋是個契機。何況，作為一個高風險的職業，社工人員更迫切需要領導者的關懷，在身、心、靈與社會生活面向上獲致生活的和諧與生命的意義。管理者應避免讓社工覺得組織只關心績效與經費預算；當一線實務者面對來自服務對象、家屬、民意代表等責難或威脅時，更應挺身而出，而不是在背後託辭為考驗社工應變能力。我們的服務對象經常是處於絕望或不知所措的弱勢者，期待社工給予希望、支持和面對問題的勇氣；同樣地，社工也需要領導者給予持續工作的希望與信念，以視社會工作為天職。

伍、職場靈性的省思

靈性的追求，不限於特定的場所或活動，更非只能在教會、寺廟或靈修中心作冥想、禱告、讀經等活動才能發展靈性。誠如禪宗六祖惠能所說：「**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新道家強調的「塵勞」就是入世去從事利他的「功行」。但「功行」本身並無目的，最後的目的仍在於成「道」（余英時，2004）。

社會工作本是一種有意義的助人專業，許多人受此吸引而投身社工行列；雖然在新管理主義的壓迫下，社工人員可能感受到「社會工作是有意義的，但是工作卻沒有意義」（meaningful in work but not meaningful at work）的異化經驗；但作者相信，社會工作仍可從靈性的觀點，重新再塑造工作的意義，並實踐以關係為基礎的實務工作，讓社會工作者與案主能和社區有更密切的連結。

靈性觀點與社會工作早期的歷史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可是也在社會工

作追求專業化的過程中反而逐漸淡忘了靈性觀點。不僅在實務工作中缺乏靈性的觀點，在台灣的社会工作教育中也長期忽視靈性觀點的重要性。在國外的社會工作教育中已經開始講授靈性與社會工作的相關課程，而且也有專業期刊的出版。或許未來台灣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在社會工作理論、社會工作倫理、社會工作管理、多元文化或實務領域等課程中可加入靈性觀點，讓學生及早認識靈性觀點在社會工作實務中的意義。

然而，靈性觀點雖然可以舒緩，甚至再造社會工作的職場，但卻潛藏著危險，關鍵在於組織領導者與管理者是否真正認識靈性的理念，而非僅以工具性的角度來追求組織生產效率和創造利潤；甚至將職場靈性管理，用於組織的控制工具。職場靈性確實有助於員工的靈性發展，但若領導者與管理者缺乏倫理的德行，僅將職場靈性作為管理策略，那麼職場靈性可能淪為像鴉片一樣，變成柔性的控制工具。組織或許可能因此獲得經濟效益，但是員工則可能像是吸食鴉片而蒙受其害（Case & Gosling, 2010; Lips-Wiersma, Lund Dean & Fornaciari, 2009; Polley, Vora & SubbaNarasimba, 2005）。例如，在缺乏相關資源的支持之下，以柔性的方式強調社會工作者要「犧牲奉獻」，如此只是造成更嚴重的勞動剝削，更無法讓社工從勞碌的工作中獲得工作的意義。

社會工作的內含本身就充滿意義，也是給弱勢族群帶來希望的專業。社會福利組織絕對有必要從合理的薪資、工時與工作負荷，並配合安全的職場環境以激勵和維繫社會工作人力；這是根本也是首要。本文所呼籲的靈性觀點，則是希望社會工作者能堅定自己的信仰與價值，重拾社會工作與自我的意義，也在工作中和自我、案主與同事建立起靈性的關係，讓投入社會工作成為是回應靈性的召喚。畢竟，社會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just a work)，更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a meaningful work)。

參考文獻

- 余英時（2004）。《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
- 胡愈寧、周慧貞譯，羅伯·格林里夫著（2004）。《僕人領導學：僕人領導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啟示出版。
- 張 紉（2003）。《世界各國社會工作專業制度比較及國內社工人力需求、運用、困境因應之調查評估研究》。臺北：內政部。
- 許雅惠、張英陣（2006）。〈「有效的」弱勢家庭服務策略：以愛爾蘭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14，205-218。
- 陳欣怡、鄭淵全（2010）。〈桃竹苗地區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角色壓力、工作倦怠及社會支持之研究〉。《社區發展季刊》，129，333-353。
- 劉道捷譯，托馬斯·賽德拉切克著（2013）。《善惡經濟學》。新北：大牌。
- 嚴祥鸞（2010）。〈保護性業務社工人力與合理之工作條件〉。《社區發展季刊》，129，153-165。
- 鐘文鎡、鄭怡世（2011）。〈社工很「悶」！以接受台灣聯勸補助之組織的社工員勞動現況為例〉。發表於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辦，《「社會工作社會發展：行動與展望」》。臺北：東吳大學城區部。
- Ashmos, D. P. and D. Duchon (2000). Spirituality at Work: A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9(2), 134-145.
- Beresdord, P., S. Croft and L. Adshead (2008). "We Don't See Her as a Social Worker": A Service User Case Study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Worker's Relationship and Human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8, 1388-1407.
- Biestek, F. P. (1957). *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 Case, P. and J. Gosling (2010). The Spiritual Organ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Instrumentality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pirituality & Religion*, 7(4), 257-282.
- Chadwick, P. and T. Waring (2009).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the Retention of Social Workers by Children's Services Director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Conference on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 Warwick, 13th -15th July 2009.
- Chamiec-Case, R. and M. F. Sherr (2006). Exploring How Social Work Administrators Integrate Spirituality in the Workplace. *Social Work & Christianity*, 33(3), 268-287.
- Cnaan, R. A., J. W. Sinha and C. C. McGrew (2004). Congregations as Social Service Providers: Services, Capacity,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28(3/4), 47-68.
- Dombo, E. A. and C. Gray (2013). Engaging Spirituality in Addressing Vicarious Trauma in Clinical Social Workers: A Self-Care Model. *Social Work & Christianity*, 40(1), 89-104.
- Faver, C. A. (2004). Relational Spirituality and Social Caregiving. *Social Work*, 49(2), 241-249.
- Ferguson, I. and M. Lavalette (2013). 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 Introduction. *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 1(1), 3-14.
- Follett, M. P. (1918/1998). *The New State: Group Organization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Follet, M. P. (1924). *Creative Experienc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 Fry, L. W. (2003). Toward a Theory of Spiritual Leadership.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4, 693-727.

- Graham, J. R. and M. L. Shier (2010).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High Lev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3(6), 757-772.
- Graham, P. (1995). *Mary Parker Follett: Prophet of Management*.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Gotsis, G. and Z. Kortezi (2008).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 Crit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8, 575-600.
- Healy, K. (2005). *Social Work Theories in Context: Creating Frameworks for Practic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Hoffman, E. (ed.). (1996). *Future Vision: The Unpublished Papers of Abraham Maslow*. Thousand Oaks, CA: Sage.
- Johnson, A. L. (2007). Mary Parker Follett: Laying the Foundations for Spirituality in the Workpl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0, 425-439.
- Kriegelstein, M. (2006). Spirituality and Social Work. *Dialogue and Universalism*, 5-6, 21-29.
- Lips-Wiersma, M., K. Lund Dean and C. J. Fornaciari (2009). Theoriz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Workplace Spirituality Move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18(4), 288-300.
- McBeath, G. and S. A. Webb (2002). Virtue Ethics and Social Work: Being Lucky, Realistic, and not Doing Ones Du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2, 1015-1036.
- McLeod, A. (2010). "A Friend and an Equal": Do Young People in Care Seek the Impossible from Their Social Worker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0, 772-788.

- Metcalf, H. C. and L. Urwick (1942). *Dynamic Administratio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ary Parker Follett*.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 Milliman, J., A. J. Czaplewski and J. Ferguson (2003).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Employee Work Attitudes: An Exploratory Empirical Assessmen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16(4), 426-447.
- Pandey, A. and R. K. Gupta (2008). Spirituality in Management: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and Traditional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Global Business Review*, 9(1), 65-83.
- Perlman, H. H. (1979). *Relationship: The Heart of Helping Peop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lley, D., J. Vora and P. N. SubbaNarasimha (2005). Paying the Devil His Due: Limits and Liability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3(1), 50-63.
- Pooler, D. K. (2011). Professional Flourishing: Re-visioning Self-Care Using *Iamgo Dei*. *Social Work & Christianity*, 38(4), 440-452.
- Quatro, S. A. (2004). New Age or Age Old: Critical Management Theory and Traditional Organized Religious as Underpinnings of the Contemporary Organizational Spirituality Movement.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 3(3), 228-249.
- Reimer, E. C. (2013). Relationship-Based Practice with Families Where Child Neglect is an Issue: Putting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under the Microscope. *Australian Social Work*, 66(3), 455-470.
- Ruch, G., D. Turney, and A. Ward (2010). *Relationship-Based Social Work: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Practice*.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 Senreich, E. (2013). An Inclusive Definition of Spirituality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49, 548-563.
- Sheridan, M. J. (2002). Spiritual and Religious Issues in Practice. In A. R. Roberts and G. J. Greene (Eds.). *Social Workers' Desk Reference*, pp. 567-57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研究論文

十二年國教及少子女化下一家長選擇 子女就讀私立中學與私校經營之研究^{*}

吳俊憲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吳錦惠^{**}

中州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蔡幸芬

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教師

收稿日期：2014 年 11 月 5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1 月 7 日。

^{*}感謝兩位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通訊作者：吳錦惠。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及少子女化下，臺中市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因素，及其帶動私立中學經營競爭優勢與特色之間的關聯性。研究者採訪談法和文件分析進行資料蒐集、整理和分析。研究結論如下：（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波助瀾下，臺中市家長和私立中學更加關注升學問題和相關政策。（二）少子女化下，臺中市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態度日趨積極，而私立中學也力求經營競爭優勢和特色以吸引家長和學生的青睞。（三）臺中市私立中學在辦學和校務經營會利用各種行銷策略來獲得家長及學生認同。

關鍵字：私立中學、家長教育選擇、學校競爭優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The Research of Why Parents Prefer Enrolling Their Children into Private High Schools

Chun-Hsien Wu

Professor & Chai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Chin-Hui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sing-Fen Tsai

Teacher, Chia-Yang High School, Taichung C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the main factors that encourage parents to enroll their kids in private high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All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are analyzed and organized through direct interview with parents and from relevant journals. By defining the main reasons why parents choose private high school for their kids when facing the trend of fewer children and execution of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law, this study is aim to identify the correlation in between “the main reasons why private school is a better option” 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at private schools have in their operation”. Finally, som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execution of 12 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law has encouraged school’s management and parents to pay more attention on educational laws and issues. (2)The trend of fewer children, parents in Taichung City have even more deliberately chosen private school for their kids due to private high school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3) Considering what a private high school can earn trusts from the parents and kids by putting many promotional plans to market the school.

Keywords: private high school, educational choice of parents, 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教育基本法第 7 條第 1 項明訂：「人民有依教育目的興學之自由；政府對於私人及民間團體興辦教育事業，應依法令提供必要之協助或經費補助，並依法進行財務監督。其著有貢獻者，應予獎勵。」由此可知，臺灣鼓勵設立私立學校，希冀私立學校在經營上有較高的自主性和多元發展。教育基本法第 8 條提到：「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國家應予保障。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由此看來，也相當鼓勵家長應實際參與學校運作，並具有選擇學校教育的權利。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於 2014 年正式啟動，由於強調免試升學和多元入學進路，對於許多父母來說，儘管十二年國教的出發點是善意的，但對於實施方式感到一知半解、不知所措，甚至開始質疑政策。以下是一篇 102 年度臺中市學生報考私立國中現況的新聞報導。

《「保 6 年」 私立國中報考火熱》

3 月份成了國中私校考季，根據臺中市教育局統計，全市今年要升國一的學生約 3 萬人，私校報名逾兩萬人次，私校熱讓學生與家長熱昏了頭，12 年國教實施在即，多數家長認為私中有直升優勢，且高中學費拉平，才造成一股私校熱。臺中市 17 所私立國中，今年報考人數最多的逾 6000 人，鄰近的縣市彰化、南投學子都有不少人報考，3 校超過 5000 人，人數最少也有數百人，報考總數近兩萬人次。「東○考完了，明天弘○，下周拚曉○」，一名豐原區瑞穗國小學生在臉書寫著，……「我考了明○、還有衛○」、「華○好難，只好寄望下一個了」，學生的臉書透露出報考多校，情況普遍。不少人不解為何私校這麼熱？突然如此搶手？北屯區的黃姓

家長指出，私校有國中有高中，孩子只要考上私校「保6年」。他說，12年國教連老師都搞不清楚未來走向，他不想讓孩子當「白老鼠」，讀私校比較安全。新光國中校長林寶琴說，私校則因政府學費拉平政策，確實是私立高中職的利基，也帶動私立國中受矚目。……這名家長說，她選私校主要是管教嚴格，教師如發現學生有問題，多會馬上反映給家長，即時溝通。她另一個女兒讀公立國中，言行有偏差，感覺教師不想多管，「我又沒體罰、沒罵學生」就夠了，比較消極。私校學費貴，不過有上班族的家長算算「其實跟公立學校加補習，費用差不多」。也有家長考量，擔心孩子到公立學校會被霸凌或被帶壞，實際狀況並非如此，但還是有家長堅持這種看法。（聯合報／陳秋雲、田兆緯，2013）

從以上可知，面對十二年國教所產生擠爆私校的現象，事實上正代表了一群家長的擔心焦慮，以及充滿了對十二年國教的不信任。

此外，少子女化也影響到公私立學校的經營方向並使得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選擇愈趨重視。面對此一問題，私立學校的校務經營困境在於生源短缺的危機（蔡銘津，2012）。私立學校在這波困境中，如何創造競爭優勢、建立品牌特色，以爭取獲得家長及學生的青睞，已成為備受關注的課題。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波助瀾及少子女化的影響下，臺中市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主要因素。

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波助瀾及少子女化的影響下，私立中學如何提升經營競爭優勢及建立學校特色，以吸引家長和學生的青睞。

三、探討私立中學經營競爭優勢及特色與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之間的關聯性。

貳、文獻探討

一、十二年國教和少子女化下，學校經營面臨重大變革

回應社會快速變動，以及人口高齡化、少子女化現象對國家社會、經濟帶來衝擊，延長國民義務教育年限乃成為一股教改趨勢。臺灣自 103 學年度起實施十二年國教，這是自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後，在教育改革歷史上的一項重大教育工程。其內涵共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前階段的國民中小學基本教育，依據「國民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辦理，對象為 6 至 15 歲學齡之國民，其內涵是普及、義務、強迫入學、免學費等。二是後期中等教育，包括高中、高職及五專前三年，內涵是普及、免學費、非強迫入學及免考試入學等。因應十二年國教乃制訂「提升中小學、成就每一個孩子、厚植國家競爭力」三大願景，並規劃五大理念、六大目標、七大面向，以及 29 個方案（教育部，2012）。

由於十二年國教的理念強調要擺脫升學主義的箝制，扭轉國人過度重視智育與明星學校的迷思，因此賦予學校更多自主權，促使學校可以尋求創新經營特色，凸顯學校辦學品質，以強化教師專業成長及培養學習者的關鍵能力，這正符應「適性揚才」的教改核心理念（吳清山、高家斌，2007；張鈿富、林素鈺，2006；張慶勳，2002；莊玉鈴、秦夢群，2010；楊思偉，2006）。然而鼓勵學校建立競爭優勢和特色的美意，卻在眾人一味地關注於免試入學和特色招生的議題上而產生失焦。造成家長和學生在無法擺脫就讀明星學校的情形下，加上對十二年國教升學多元進路的迷惘，直接或間接地會想到把子女送進私立中學就讀，尤其某所私立中學如果可以保障直升高中部更佳。這個結果對私立中學的辦學等於是注入一支強心針，促使校務經營必須更有競爭優勢和特色才能吸引家長將子女送進來就讀，反之，則可能會遭到淘汰。

「少子女化」現象是近十多年來國內教育界的重要議題，各級學校招生都受到少子女化的影響，出現招生不足的窘境。2010 年適逢虎年，結婚人數創下歷史新低，同年的出生嬰兒數量僅有 16 萬 6,886 人，生育年齡婦女的生育率減少至 0.895 人，換句話說，平均 1 個婦女在一生中生不到 1 名子女。持正面觀點來看，班級學生人數逐年下降，能增進師生有更多的互動，也能加強個別化學習，有助於實現差異化教學和適性教學的理想（吳清山、林天佑，2010）。但持負面觀點來看，學生人數和班級數下降，使得各級學校面臨招生不足，甚至產生小校被合併或廢校的危機，同時也會造成教師超額問題嚴重，教育資源設備的閒置及浪費。另外，由於孩子生得少，也可能因此造成許多家長會太過於保護和溺愛子女，使得親師關係變得緊張。

要言之，少子女化雖然對學校經營帶來許多危機，但學校也可順勢進行「精緻化」教育，把辦學品質提升起來，當家長和學生有更多選擇時，少子女化讓受歡迎的學校的入學更加競爭，也讓不受歡迎的學校受到懲罰。由此來看，重新站在消費者（家長和學生）的立場來調整辦學方向，並採取行動策略，才能在少子女化衝擊下開創校務經營的藍海策略。倘若只是對惡劣的招生環境怨天尤人，於事無補（吳錦惠、吳俊憲、蘇麗娜，2014；林泓成、陳明和，2014；黃政傑 2014）。

二、家長教育選擇權利下，學校強化行銷策略爭取青睞

教育選擇權（educational choice）的概念源自歐美國家，是指家長和學生有選擇學校的自由與權利。此乃基於教育市場化及自由競爭的理念下，「消費者導向」的觀念因運而生（吳育偉，2002；張德銳，1998）。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家長教育選擇的影響因素首要是教學品質與教師素質、教學環境與設備、學校校風與傳統，其次是校園安全、生活便捷性、校長辦學理念、升學成績及對外

表現等（王秋晴，2002；吳育偉，2002；李春滿，2006；高介仁，2006）。綜觀來看，家長選擇學校的訊息來源大多是實際參觀學校或親朋好友引薦，也就是透過辦學口碑和口耳相傳。至於廣告、文宣和網路傳播訊息也是很好的學校宣傳方式。

承上述，學校打造辦學口碑靠的是凸顯學校競爭力或競爭優勢（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因此學校經營在面對教育市場多元化的高度競爭下，學校要致力提升辦學品質，建立學校品牌的獨特性，並長期保有優越的競爭地位（吳錦惠，2012）。因此，現今學校經營必須重視學校績效管理，也要善用教育行銷策略，組織內可以鼓勵教師專業成長、提升組織運作效能、改善學習環境與設施、創新課程設計與教學，組織外要做為顧客導向服務、暢通各種溝通管道、導入家長與社區資源、運用媒體有效推銷學校等。

一般來說，私立學校的經營在師資、課程、教學、經費等方面比起公立學校會有較多的彈性，整體學校辦學理念和教育目標可以更加凸顯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以吸引家長和學生青睞。而家長將子女送進私立學校就讀，由於多半是家長自主選擇的，也因為認同私立學校的辦學方向，因此對於學校教育參與程度也會比較積極（蘇曉蓉，2008）。

不過，私立學校也會面臨經營困境，由於學校經費來源主要是學雜費，因此若是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家長通常會選擇子女就讀公立學校以減少教育費用支出，私立學校的招生就會出現問題（陳珮樺，2011）。其次，私立學校與家長之間的聯結性強，家長會特別重視學校運作績效、重視子女的學業表現，期望學校可以提供需要的服務，因此較熱衷於參與和投入學校教育事務，有時不免產生過度要求或干預教學的問題（蘇曉蓉，2008）。第三是私立學校之間的競爭，各校會推出特色課程、獎學金或就業保證，強打各種行銷策略，結果造成彼此之間絕招盡出、互搶學生，產生惡性競爭。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103 學年度臺中市私立中學的招生班級數、入學評測名稱、考試日期和科目請參見附錄一。本研究蒐集臺中市各私立中學的招生文宣進行文件分析之外，主要採訪談法，探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及少子女化下，臺中市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因素，及其帶動私立中學經營競爭優勢與特色之間的關聯性。透過面對面訪談可以瞭解臺中市家長為子女選擇私立中學的考量因素，同時訪談私立中學的行政人員和教師，瞭解私校在十二年國教與少子女化下，如何經營競爭優勢和特色以獲得家長及學生的認同。

訪談家長方面，主要分成兩類：其一是子女目前已就讀私立中學的家長，訪談他們的子女就讀私立中學之後，是否與原本預期的目標一致，或是否後悔過，以及如何看待私立中學辦學經營的優勢特色。其二是子女目前為小學五、六年級，未來預計讓子女進入私立中學就讀的家長，訪談他們為子女選擇私校就讀的理由為何。訪談行政人員和教師方面，共計四所私立中學接受訪談，藉以瞭解私立中學在面對十二年國教及少子女化下，如何滿足家長的期望和需求，如何創造學校競爭優勢和特色，以及如何將學校經營績效透過行銷以獲得家長和學生青睞。訪談時間自 2014 年 4~5 月，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如下表 1：

表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受訪者類型	家長年紀 /教學年資	私校名稱 (化名)	擔任職務	時間
目前子女就 讀臺中市私	P1-1(40 歲)	明天中學	家庭主婦	4月上旬

立中學的家 長	P1-2(50歲)	破曉中學、衛星 中學	高中老師	4月上旬
	P1-3(42歲)	東東中學	高中老師	4月上旬
	P1-4(42歲)	衛星中學	商	4月中旬
子女即將就 讀私立中學 的家長	P2-1(47歲)	東東中學	家庭主婦	4月上旬
	P2-2(42歲)	常青中學	高中教師	4月上旬
	P2-3(43歲)	東東中學	商	4月中旬
	P2-4(42歲)	東東中學	商	4月中旬
私立中 學行政人員 及教師	S1(年資18年)	甲高中	註冊組長	4月上旬
	S2(年資6年)	乙高中	註冊組長	4月上旬
	S3(年資16年)	丙高中	學務主任	4月中旬
	S4(年資10年)	丁高中	註冊組長	4月下旬

訪談題綱如下：

第一種類型：目前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家長

- 1.當初您為何想要將子女送進私立中學就讀？
- 2.就讀私校後，是否與您當初的期望（例如教育方式）相符合？或是有理想和現實的落差？
- 3.請問您認為子女就讀目前這所私校有何競爭優勢或特色？

第二種類型：子女即將就讀私立中學的家長

- 1.請問您為何想要將子女送進私立中學就讀？
- 2.您目前已鎖定讓子女就讀的私立中學，請問有何吸引您的地方？

第三種類型：私立中學的行政人員及教師

- 1.您任職的私立中學在經營上有何競爭優勢或特色？
- 2.面對十二年國教和少子女化下，您知道目前學校面臨哪些經營問題？要

如何突破困境？

3.您認為要推動什麼學校革新工作，要如何運用教育行銷策略，才能提升家長和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

訪談過程取得受訪者同意全程錄音，並於結束後進行錄音資料轉譯成為逐字稿，然後進行編號做為分析依據。詳見下表2：

表 2

訪談資料的編號方式

資料蒐集類別	編號方式範例	編 碼 釋 義
訪談	訪-P1-103/04/04	受訪者為「P1」表第一類家長 受訪日期為 103 年 4 月 4 日
	訪-P2-103/04/05	受訪者為「P2」表第二類家長 受訪日期為 103 年 4 月 5 日
	訪-S-103/04/06	受訪者為「S」表學校行政管理 及教師 受訪日期為 103 年 4 月 6 日
文件	文 1-103/3	代表編號為「1」的文件 日期為 103 年 3 月蒐集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目前子女就讀臺中市私立中學的家長意見之分析

(一) 臺中市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主要因素

研究者想要瞭解家長安排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究竟是考量哪些原因？或是私立中學在辦學方面有何競爭優勢或特色能吸引到家長？或是為了讓子女在私立中學能獲得更好的照顧嗎？

第一原因是進入私立中學會經過一項入學考試篩選機制，學生在學習素質上會比較齊一。反之，公立學校學生來源沒有經過篩選，學生素質落差大。有鑑於國中階段是品德養成的關鍵時期，進入青春期的子女在成長過程中很容易受到同儕影響，因此一些重視子女教育的家長就會主動安排子女進入私立中學就讀（訪-P1-1-103/04/05）。第二個原因是，這些家長對私立學校的經營模式相當清楚，再加上選擇私校的家長通常對於家庭教育和教育觀念會比較接近，所以寧願放棄學費便宜的公立學校，反而認為幫子女選擇私校即使在金錢上要做比較多的投資也是值得的（訪-P1-2-103/04/09）。

第三個原因是，家長對十二年國教一直處在「霧裡看花」的情形，而且也對政策沒有信心（訪-P1-3-103/04/10；訪-P1-4-103/04/11）。尤其是針對十二年國教的入學方式，由過去的「國中基測」改為「國中大會考」，可能會以為只是換湯不換藥，但一個新名詞又讓家長焦慮了，到底未來要如何入學？分數採計如何計算？如何準備考試？新的入學方式真的公平嗎？依照免試學區入學，超額比序採取抽籤決定方式，不會有問題嗎？政策裡面有太多的不確定，讓家長產生質疑，結果只好考慮先將子女送進私立中學再做其他打算（訪-P1-2-103/04/09）。對家長來說，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培養子女具有學習實力，如果家長無法改變不清楚的政策，至少可以先為子女選一所私校預作準備。

第四個原因是，中區多所私立中學的校務經營和學生表現亮眼，被家長視為「名校」而成為子女入學的首選，為了擠進這些名校，還提早幫子女規劃主要學科的補習，以及參加學校舉辦的營隊活動（訪-P1-1-103/04/05；訪-P1-2-103/04/09；訪-P1-4-103/04/11）。第五個原因是，這些私立中學對於品德教育比較重視，加上學校經營管理比較有彈性，可以和家長做比較多的溝通，

讓家長感到放心不少（訪-P1-1-103/04/05；訪-P1-4-103/04/11）。

第六個原因是，各私立中學競爭激烈，為了創造特色、吸引家長目光，絞盡腦汁規劃出各種特色課程及特色班，例如數理或語文資優班、ESL 英文班、藝才班、精英班、科學班等，提供家長許多選擇。此外，學校辦理的學生社團也相當豐富，讓學生可以參加多元的課外活動，像是營隊及體驗活動等，學習到不同的知識技能，也從中培養出其他興趣（訪-P1-1-103/04/05；訪-P1-4-103/04/11；訪-P1-3-103/04/10）。例如：

我女兒他社團是參加童軍社，他們常常利用週末去露營，我覺得那也都是一種刺激，對她的學習也是，因為她可以去開開眼界，我想這都是課本以外學不到的東西。而我另外一個大女兒，她們會利用暑假辦理所課遊學團，他們今年規劃去新加坡的南洋女中、上海第一女子中學，還有日本一間學校，整個遊學活動是由學校直接過去學校，由學校對學校去討論交流活動，而且每個學校的重點都不一樣。（訪-P1-2-103/04/09）

第七個原因是，家長考量到學校的學習環境和距離家裡的遠近，例如：

我們都非常喜歡東O中學這個學習環境，因這個學校座落在大學的校園裏，整個校風具有濃濃的文學氣質，考試的過程中也帶孩子去參觀這個學校，孩子都還蠻喜歡這個環境，而當時還在考慮要唸那間學校時，小孩自己決定要唸這個學校。而我們也尊重她自己的決定。（訪-P1-3-103/04/10）

離家近是一個考量，以目前就讀的學校，相對其他的學校來講算比較方便。（訪-P1-4-103/04/11）

綜合上述，臺中市家長在眾多的私立中學選擇一所心目中最理想的學校讓子女就讀，要考量的因素絕非單一原因，而是參考了校風、升學率、課程多元性、生活教育、學習環境或是朋友的推薦等，有時透過網路或媒體報導也可以從中獲得很多訊息。

（二）子女就讀私立中學後與原先預期的差異

子女進入私立中學就讀後，是否與家長當初的期盼有所不同？研究發現，每位家長在談及學校經營和辦學理念時都覺得有落差，也許是因為每個學生的個性和特質都不一樣，入學後要面對的問題也不同所造成的結果。不過，家長們仍然對於自己所選擇的學校多所肯定，並表示很

配合學校推動的各項措施，當然也都會適時的跟學校溝通（訪-P1-1-103/04/05；訪-P1-4-103/04/11；訪-P1-2-103/04/09）。

其次是針對私立中學教師教學方式。家長都認為教師教學與帶班方式對學生學習影響很大，而當初將子女送進私立中學就是相信會遇到一位好老師，能用心地教導子女在課業和品行都有良好表現（訪-P1-1-103/04/05；訪-P1-2-103/04/09）。但也有家長表示曾經遇到教學經驗比較不足的教師，在處理班級事務時沒有做得很好，例如：

孩子的導師是新老師，也許在處理班上的一些糾紛事情方面比較沒經驗，例如一位班上同學，因和同學有點糾紛，他們老師的作法好像有一點強硬作法，老師的處理方式是覺得不對就一定要記過，而家長心中也是很不舒服。（訪-P1-3-103/04/10）

第三，從學生的同儕學習來看，家長表示在私校裡的學生會因為同儕之間

的相互競爭而變得加倍努力，學習態度會更積極與主動（訪-P1-4-103/04/11；訪-P1-1-103/04/05；訪-P1-2-103/04/09）。事實上，研究者間接地發現到，許多家長真正關心的仍然是子女的課業學習，但值得省思的是，家長仍存有升學主義的觀念，其子女身處的家庭環境可能比別人優渥，真正缺乏的也許是社會技能，現在把這一群性質相近的學生又聚集在私校裡，是否反而限制了其他方面的學習，這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二、子女即將就讀臺中市私立中學的家長意見之分析

「私立中學真的比較優質嗎？將子女送進私立學校真的會比較好嗎？」家長表示考量的是子女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像是身高比較矮、個性比較膽小或是直率，由於擔心升上國中後會在一般的班級裡受到欺負及排擠，所以就直接送到私校會比較放心（訪-P2-1-103/04/02；訪-P2-2-103/04/09；訪-P2-4-103/04/11）。

其次是為子女選擇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家長表示私校在環境設施上都做得很好，而且長久以來帶給家長的觀念是私校都會做到「嚴管勤教」。另外，在教學上比較彈性，子女的學習狀況會隨時告知家長，讓家長也能隨時掌握子女的學習，而且同儕間的讀書風氣也很好（訪-P2-4-103/04/11；訪-P2-3-103/04/11）。

第三，也有家長表示在選擇私立中學時，大都會去詢問目前子女已經就讀私立中學的親朋好友，透過口碑推薦會比自己盲目地尋找來得好（訪-P2-3-103/04/11）。有的家長則是在每年的三到四月的招生期間參加私校辦理的招生活動，或是讓子女先去參加私校舉辦的各種營隊，從中再觀察子女是否喜歡某所私校（訪-P2-3-103/04/11；訪-P2-2-103/04/09）。第四，有些家長看中的是私立中學會安排多元的課程，豐富子女的學習內容（訪-P2-1-103/04/02；

訪-P2-3-103/04/11；訪-P2-2-103/04/09），有的是考量到交通問題（訪-P2-1-103/04/02；訪-P2-2-103/04/09；訪-P2-3-103/04/11），有的則是重視學校經營者的辦學理念，例如：

參加常○中學的家長會，我很推崇他們的背景，他們的創辦人，創辦人的兒子及太太都是教育博士，而現在的董事長都是博士，我想他們應該可以把教育辦得很好，現在的校長都是台中市的教育局長，而教務主任及學務主任都可以講得很好，他們將對學生的管教、設備及學校的活動等等都向父母交待得很清楚，讓我們家長很放心。（訪-P2-2-103/04/09）

這間學校的新任校長是由某實驗中學校調任，對學校的管理非常用心及投入。而第二間學校，雖然校舍較老舊，但一到該校，可以感受學校學生的自信與開朗，充滿了美式的教育風格，孩子表現落落大方且又表現得很得體。（訪-P2-1-103/04/02）

第五，少子女化使得許多公立中學逐年減班、併班，但臺中市私立中學反而逆勢成長，為了讓子女通過私立中學的入學考試，不少家長甚至費盡心思讓子女提早準備，先去幫子女報名參加課業加強衝刺班補習（訪-P2-4-103/04/11；訪-P1-4-103/04/11；訪-P2-1-103/04/02）。例如：

他就是在李老師那補習，剛開始只有數學和國文，後來比較後面的時候才開始加自然和社會，我們那個從小六才開始補，但我覺得時間好像太慢了，應該要從五年級開始就要衝刺，也就是要衝前面，我們真的太慢開始補習了。（訪-P2-3-103/04/11）

不過也有家長其實不認同上述作法，為了讓子女考上心目中的明星私立中學，讓子女提早做一些填鴨式的考試練習並不恰當（訪-P2-2-103/04/09）。

綜合上述，對於即將把子女送進私立中學的家長而言，多位家長都是因為家裡的第一個子女要就讀國中，因為帶著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盼，考量子女的身心狀況，以及學校的師資、課程、環境、活動等因素，再經過友人的推薦，於是在心中就已經做出打算，讓子女在小學畢業後就送進某所私立中學就讀。然而值得省思的是，過程中是否考量到子女的感受和意願？有些私立學校的招生宣傳為了吸引注目，會不會只是片面的展現辦學成果？一些建築設施會不會只是華麗包裝而缺乏實質內容？家長是否經過多方的旁敲側擊後才做下選擇決定？

三、私立中學行政人員與教師對學校經營競爭優勢和特色的意見分析

事實上，私立學校要跟公立學校競爭，也要跟其他私立學校競爭，因此，許多私校都相當重視如何營造優勢、創造特色的課題。以臺中市為例，目前這些私立中學有哪些競爭優勢？究竟面臨到哪些威脅？又要如何化危機為轉機？

（一）私立中學的優勢和特色

首先，受訪者表示學校有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師資就是一項優勢，學校會做能力分班教學，而且獎學金也給得非常優渥（訪-S4-103/04/25；訪-S1-103/04/02）。例如：

我們學校已有 43 年歷史，因有健全的體制，所以我們老師的流動率不高，

這樣子學生家長在選擇我們學校的時候，老師的流動率是一個考慮的因素，再來就是我們自己老師本身的薪資是比公立來的好。(訪-S3-103/04/13)

其次是私立中學很重視學生的生活常規和品德教育。受訪的私立中學表示都有把品格教育列為辦學重點，主要是讓家長能放心，也讓學生從中養成對周邊人、事、物的關心(訪-S2-103/04/02)。例如：

我們學校蠻重視的，而且家長也蠻認同的就是我們的品格教育，品格教育實施在我們國高中都有，我們會有一個品格教育週，品格教育週就是學生要住宿一個禮拜，在這個禮拜當中，學生住宿，希望培養他們要打理自己的生活，因為很多家長對孩子也都蠻呵護的，反而學生他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他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整個禮拜過程，學生要學會如何跟同學相處，也就是如何適應一個團體，且必須跟別人合作，每天晚上都會安排不同活動，我們最主要是要陶冶學生的品格。(訪-S2-103/04/02)

在學校的招生文宣中也可以看到：

以「勤教、善導、啟發」為教育理念，創造孩子無限的發展空間；推動孩子參與校園、社區服務，陶冶善良品格。(文 4-103/3)

重視品德與愛，推動校園的「友愛精神」，視人格情操為教育優先，讓博愛精神，烙印在每一個人的心裡。(文 5-103/3)

第三，六年或九年一貫的課程設計成為私立中學招生的亮點。這是因為臺

中市有多所私立中學都設有六年或九年一貫的課程，從國中到高中一貫式的課程設計，讓家長能夠清楚瞭解學校設有一套系統化的課程規劃，藉以吸引家長青睞，而這些私立中學也藉此可以吸引到一些國中部的優秀學生留下來直升高中部就讀，這就是學校的辦學優勢（訪-S1-103/04/02）。例如：

我們學校的外語課程是整個一系列的規劃，我們從附小、國中部、高中部的外語課程整個是九年一貫的課程設計，……再加上校長是從新竹某實驗中學轉過來的，校長他在完全中學的經營其實有蠻多他的理念，希望說能夠在我們學校裡面，在他任內，就是把他所有理念都落實，如他所堅持的卓越、創新、精緻、溫馨等理念，這也是我們學校經營的優勢。（訪-S2-103/04/02）

目前坊間都流傳說 12 年國教是買國中送高中，家長對直升高中的部分，只要學校在高中升大學的部分有好的表現，就會吸引家長選擇像我們這種完全中學，這是我們現在這個部分的優勢。（訪-S3-103/04/13）

從以上可知，私立中學從國中到高中一貫式的課程設計上，讓家長清楚地看見未來子女升學就讀高中及大學的藍圖，再加上學校辦學有亮眼的表現，對於一些非常重視成績的家長而言，就是一項很重要的選擇因素，這同時也成為私立中學的招生利器。例如在學校的招生文宣中可以看到：

學校教育除應講求「品質」與「績效」外，更應致力於「改革」與「創新」，強調教學創新，學習多元。（文 2-103/3）

自主發展課程與教材的彈性與能力，我們有很好的課程計畫、最優質的

教學團隊與很有效率的行政後盾。(文 4-103/3)

從附幼、附小、附中、大學.....博士班一脈相承，完整的教學延續、師資支援，為國內第一個上、下連貫的教育體系。(文 5-103/3)

以中等教育六年一貫課程設計，強調數理、語文能力培養，奠家國、高中課程所必須的自學研究基礎及創造思考能力，期使國中階段就能發揮潛能，並在高中階段優質學習。(文 6-103/3)

第四，對於私立中學經營而言，要吸引家長讓子女來就讀的話，軟硬體設備的充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就是要家長來到學校就能留下深刻印象，例如：

我們學校位於大學的校園裡面，所以我們有一些資源可以和大學一起共用，比如說我們師資可以共享，比如說我們辦大型活動也都會在大學的操場那邊辦活動等等，很多的設施或場地，我們都可以一起共用。(訪-S2-103/04/02)

921 地震之後，我們整個校園有重新再整修，因此我們現在的教室具現代化且設備都很齊全，所以這個部分會讓家長覺得與其他學校作比較之後，很願意將子女送進我們學校，有時候小孩子自己本身參觀後，也會比較喜歡這樣的環境，所以這個部份也算是我們蠻優質及具競爭力的部分。(訪-S3-103/04/13)

此外，在學校的招生文宣中也會提及這項優勢：

E 化的知識管理、現代科技，提供學生安心學習、營造優質教育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具備多元能力的核心價值。(文 2-103/3)

完善學習環境，友善溫馨校園，在優美校園環境中擁有學生宿舍、運動場、游泳池及英語村的環境。(文 3-103/3)

硬體設備投資，質與量並重，冷氣空調多媒體，提升學習我最 E，經過教育部優質認證的學校。(文 4-103/3)

擁有 150 甲的林蔭森林，有著原始但透著人文的美，全新打造的六星宿舍，給的不是奢華而是配置齊全，要是是讓所有遠來學子有一個安全、舒適、便利、輕鬆的住宿空間。(文 5-103/3)

第五，透過家長之間的口耳相傳，其實效果很大，再加上選擇讓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家長，在所得水平和社經地位皆高的條件下，捨得對子女做教育投資，也願意支持學校活動，這些都會變成學校的競爭優勢。例如：

我們的家長素質都還滿高的，比如中科高科技員工、榮總醫師，有一些家更遠從彰化、苗栗、新竹甚至從臺北特地來就讀我們學校，那最主要家長他們都是口耳相傳。(訪-S2-103/04/02)

我們很多家長是醫師、專技人員、教師、會計師、律師等等這類的，其實我觀察像我們現在家長的組成裡面這些都算是中產階級以上，也有很多校友畢業之後會再孩子送進我們學校就讀，這樣的例子其實滿多的。

(訪-S1-103/04/02)

第六，私立中學相當重視外語教學，甚至有多所私立學校在招生時就是強調學校設有國際班、ESL 班、雙語班等，除了每週增加外語教學節數，也會辦理外語體驗營或海外遊學，藉以吸引家長青睞（訪-S2-103/04/02；訪-S1-103/04/02），例如：

我們目前在國中的部分也 ESL 課程，是中部最早開始做規劃的，再加上我們自己本身有推廣部，我們對於國小的推廣是蠻成功的，我們有直升的制度，所以我們國三直升的同學會送去澳洲遊學，這個部份很吸引家長，對這些 M 型化比較前端的這一些家長會比較注重這一塊也喜歡這一塊，……，我們 ELS 班就有八班，且學生的外語能力很強，這些學生在澳洲遊學的時候都有辦法直接跟外國人做很流利的英文對談。（訪-S3-103/04/13）

面對全球化、國際化日益競爭的未來，本校國中除秉持優良辦學績效外更積極推動 ESL 雙語教學，無論從英語教學的流路到學生升學的通路皆做完整規劃。亮麗升學成果及孩子有擁有傲人的雙語能力是本校之鵠的。（文 1-103/3）

全方位增進英語能力，同時培養 21 世紀所需的技能，正常學習國內教育部頒定課程，畢業後可選擇國內外升學。每週 10 節外籍教師全英文授課課程，採小班制分組教學，教材與美國中學同步，評量方式多元化。（文 5-103/3）

第七，現今社會強調學生要具備多元能力和適性發展，這同時也是十二年國教的精神及目標，因此，私立中學也積極開設多元的課程及社團提供學生選擇（訪-S1-103/04/02），例如：

其實我們會讓學生去接觸，我們在家政的課程裏，我們就會安排一些簡的烹飪課程，讓孩子瞭解到餐飲的部分，像我們的美術科我們會用到我們的專業教室，而不會只在班級教室，我們有攝影教室，我們可以教一些拍攝等等的，……我們會提供多元的環境，讓他們去接觸不同職業的性向。（訪-S4-103/04/25）

重視多元智慧，實施全人教育，引導適性發展，落實五育並重，並提供多樣性的社團供學生選擇。（文 3-103/3）

推動孩子參與校園、社區服務，陶冶善良品格，規劃國中部專屬的語文、數理圖書館，重視閱讀與表現能力，運用社區資源，定期舉辦國立臺中圖書館、美術館等校外教學活動，讓學習多元化。（文 4-103/3）

藉由多元學習激發學生潛能，透過深度閱讀藝文活動、研習、競賽及校園故事描寫等，養成讀書習慣建立良好學習風氣。（文 5-103/3）

國中更規劃 ESL 美語、雲端資訊及多元學習（財務金融、生化科技、生活科學、人文社會、藝術美學）等課程，讓同學在相關領域裡得到最尖端、國際觀及全球資訊聚焦的人、事、物學。進而具備足夠涵養與能量，因應未來高度的國際競爭環境。（文 6-103/3）

第八是私立中學設有優渥的入學獎學金，相當誘人。從各校的文宣及入學簡章中都可以發現：

多元智能成長營暨 ESL 研習——許孩子一個未來的國際競爭力，參加此成長營學生名次在第 1 名至第 100 名同學，則擁有 18 萬元至 6 萬元整不等的入學獎學金。(文 1-103/3)

小太陽研習營-國中菁英班，國小畢業領取各校直轄「市長獎」入學新生，頒發獎學金 2 萬元整，研習成績 PR 值達 85 以上，三年學雜費約減免 17 萬元。(文 2-103/3)

參加多元智慧活動成績優異，第 1 名至第 200 名，有入學獎勵金 8000 元至 30 萬元不等的獎勵方式。(文 3-103/3)

參加潛能探測評量成績優異，名列前 5% 至 10%，可獲得 12 萬至 18 萬元等獎學金。(文 4-103/3)

最後，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可視為私校經營的契機。對於私立學校而言，學費貴、少子女化、經濟景氣等現象似乎都直接衝擊到私立中學的經營，但從訪談中發現，由於十二年國教的不確定性及政策不明朗的情況下，對私立中學反而帶來校務經營的轉機，因此讓臺中市在最近兩年左右的私立中學招生人數和報到人數都不減反增（訪-S2-103/04/02），例如：

目前教育制度尤其是今年面臨到 12 年國教，整個會考成績反而不是很重要，所重視反而是在校其他的表現，如社團、志工服務、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等成績，這些非課業上的表現，反而變成說家長從一路就要開始考量的因素，家長對高中部分就會比較選擇像我們這種完全中學的學校，像目前坊間都流傳說 12 年國教的推動，讀私立中學有此一說，買國中送高中，這也是目前我們學校的優勢。(訪-S3-103/04/13)

現在十二年國教及教育制度的改變，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家長的不確定性，使得鄰近的學校對於它招生的部分，就會有一些相對有利的說法，也許家長對於國家的政策沒有抱持很大的信任，而私校可以滿足家長對於這方面的信任。(訪-S4-103/04/25)

面對十二年國教體制的改變及推動，未來不僅課業重要，品德心性及生活智慧更是學習重要元素之一。所以學校細密的課程規劃及生活教育，將直接影響孩子日後在高中、大學階段能否成功圓夢最大的關鍵，而這些影響學習效益的因子，我們的教學團隊都已經顧慮周全，並備足了讓家長放心、信任的辦學條件，也使孩子學習之旅充滿無限可能。(文 6-103/3)

(二) 私立中學校務經營的威脅

全臺中市共有 15 間學校附設有國中部，私校同儕之間的競爭相當激烈，也帶來威脅。所有私立中學入學考試大約都在每年三月舉行，儘管考試時間都有錯開，但每位學生不只報考一所私立中學，於是各校無不想盡辦法招生(訪-S1-103/04/02)。例如：

雖然整個中彰投的學生人數很多，但相對大里地區霧峰地區這個地方的私中競爭最激烈、最嚴重，這裏的私中超級多，像明○、華○、葳○、

僑○、明○這些學校全部都在霧峰大里地區，這些學校本來大部分都是職業類科學校，後來從職業類科轉型成高中，轉型成高中後又開始設立國中部，所以我們面臨的大問題就是同性質的學校太多了。（訪-S3-103/04/13）

其次，經濟不景氣也威脅，因為對一般上班族而言，一旦經濟不景氣就會影響到收入來源，然後就會影響他們將子女送進私校就讀的意願（訪-S1-103/04/02；訪-S4-103/04/25），轉而選擇學費比較便宜且辦學還算不錯的公立學校。

第三，教育政策的限制帶來威脅。過去教育部為了鼓勵私人興學，給予私立學校很多的彈性與多元發展的機會，但歷經多次教改，將大部分的補助款花費在公立學校，使得私立學校的經營面臨困境（訪-S1-103/04/02）。現在十二年國教實施雖然在學費上都有補助到各公私立高中職，但也限制了私立中學國中部直升高中部的名額，造成經營困難，例如：

像之前公立學校如完全中學一直在增設，像忠○、惠○、長○這些學校的增設對我們來講也是很大的衝擊。再加上國中升高中直升名額一直下降，目前已降到六成，而且要以國、高中班級數較少的數字去結算六成的直升名額，讓原本私校學生來源有限的狀況下更加不好經營、影響整個學校財務運作。（訪-S3-103/04/13）

從以上可知，私立中學經營面臨到許多威脅，使得私立中學經營者必須更加戰戰兢兢，為了吸引家長及學生選讀自己的學校，不只在軟硬設備、課程、教學、師資、社團等多方面都要有所提升和進步，也要善用各種宣傳行銷來突顯辦學特色。

最後，為因應上述經營困境和威脅，私立學校提出一些因應策略，茲整理如下：

1.因應十二年國教和少子女化，調整整個學校的經營方針，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出學校特色和口碑（訪-S4-103/04/25；訪-S1-103/04/02）。

2.要將學校辦學理念與家長做好溝通，也要讓家長清楚知道學校對其子女所作的各種學習規劃。另外，面對十二年國教，很多家長不清楚政策及未來升學方式，私立中學更要加強與家長做好雙向溝通，讓家長瞭解學校用心規劃（訪-S1-103/04/02；訪-S3-103/04/13）。

3.要持續提升教師的教學實力與專業，也要加強親師合作溝通，讓家長放心將孩子送進學校（訪-S2-103/04/02；訪-S4-103/04/25）。

4.學校整合校內外資源並規劃配套，提供多元學習的機會，讓學生能夠依照自己的特質和興趣做適性發展（訪-S1-103/04/02；訪-S2-103/04/02）。

5.少子女化、十二年國教，加上各私校之間的激烈競爭，學校必須透過各種媒體、廣告、網路或文宣等行銷方式，將辦學成果傳達給所有的家長。有的私校也會利用寒暑假辦理相關的營隊讓學生來參與，藉以銜接三月份的入學考試，讓家長及學生參與活動之後更進一步能認識學校，進而認同學校，達到招生行銷的目的（訪-S4-103/04/25；訪-S2-103/04/02；訪-S4-103/04/25；訪-S3-103/04/13）。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十二年國教及少子女化下，臺中市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考量因素相當多元

選擇讓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家長，大多是特別重視子女教育又經濟能力較佳的家長，因此對孩子的要求和期盼相對比較高，希望透過私立中學的人學甄試篩選，讓學生素質可以比較一致，其次是看中私立中學很強調品德教育與生活管理，第三是可以因應家長及學生需求提供多元化且具特色的課程供學生做適性發展的選擇，第四是考量到私校的傳統優良校風和口碑，第五是學校有加強外語教學，第六是能針對十二年國教政策提供家長訊息和因應，第七是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及交通便利。

（二）十二年國教的推波助瀾及少子女化下，臺中市家長選擇子女就讀私立中學的態度日趨謹慎，私立中學力求經營優勢和特色以吸引家長青睞

私立中學為了滿足家長和學生的需求，加強與家長做多元溝通，藉由召開家長座談會達成親師之間的默契，讓家長放心。其次，私立學校經營靈活度高、敏感度也高，常常是公立國中尚未清楚家長要什麼，私立中學已因應家長需求作出許多的調整，也作出學校特色，這就是私立中學的經營優勢，得以贏得家長的認同，然後家長也會口耳相傳給親朋好友，幫學校建立起辦學口碑，間接地成為一項學校行銷的利器。此外，學校推動學生多元學習，重視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質，也能讓家長和學生直接感受到辦學的用心。

（三）臺中市私立中學能利用各項行銷策略來獲得家長及學生認同

私立中學為了能創造辦學特色，皆能規劃彈性的課程活動，例如依據學生的特質開設各領域課程，或加強寫作能力、設置科學班、ESL 課程、烹飪課程、藝術課程、音樂專長課程等。此外，學校有外語學習環境，從全民英檢、英文話劇表演、英文演講或利用寒暑假安排遊學活動，也是吸引家長的焦點。最後，私立中學相當善於運用行銷策略，有的結合社區資源、做社區志工服務或社區才藝表演等，其實是趁機會讓更多人可以認識學校，有的則運用網路媒

體、報章雜誌或廣播電視，將學校辦學成果行銷出去，增加學校曝光率和知名度。

二、建議

（一）給家長的建議

將孩子送進私立中學之前，家長一定要先想楚為何將孩子送到私立中學，瞭解問題及需求是選校的第一步，不可以因為自己忙於工作沒時間照顧子女，將學校當成安親班，過程中也要瞭解子女的特質與需求，不應只是一味的站在家長立場幫孩子作決定，和子女溝通並適時修正自己的觀念。還有在選擇學校時，不要對明星國中存有迷思，應多方面的慎重思考。

家長願意花費昂貴學費將子女送進私立中學就讀，本身對教育或對學校就有多一些的期盼與要求，但不可以向學校做出不合理要求，反而要多參與學校活動，例如家長座談會、班親會、親師講座、運動會等，藉此清楚學校辦學方向及理念，也能知道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另外，也要增進親子互動機會，隨時掌握子女身心狀況，多給予多元學習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二）給私立中學經營者的建議

要多方瞭解家長及學生的需求，提供最好的服務品質。面對少子女化，每個子女都是父母的寶貝，因此私立中學應該特別重視「客戶滿意度」、「市場導向」作為學校發展重點，主動且積極的回應家長需求。此外，也要關注「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育理念，鼓勵教師不要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多以鼓勵代替責罰、以肯定代替挑剔，看見每一位學生的優點讓學生直接感受到關懷和用心。最後是建立學校品牌，區隔學生來源，由於當前私校之間的招生競爭相當激烈，學校經營和行銷策略必須開拓藍海策略，建立自己的品牌及具特色的產

品，才能帶來更高的利潤。

參考文獻

- 王秋晴（2002）。《臺南市國民小學實施家長學校選擇權意見之調查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育偉（2012）。《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以花蓮縣為例》。花蓮：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清山、林天佑（2010）。《教育 E 辭書》。臺北：高等教育。
- 吳清山、高家斌（2007）。〈臺灣中等教育改革分析：1994-2007 年〉。《教育資料集刊》，34，1-24。
- 吳錦惠（2012）。《學校競爭優勢與行銷策略：高中教育改革與發展》。臺北：五南。
- 吳錦惠、吳俊憲、蘇麗娜（2014）。〈少子化下小校經營特色和競爭優勢的策略〉。載於黃秀霜（主編），《少子化的教育因應策略》，頁 131-138。臺北：五南。
- 李春滿（2006）。《臺北市文山區家長教育選擇之研究》。花蓮：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泓成、陳明和（2014）。〈少子化現象對國民教育的衝擊與因應〉。載於黃秀霜（主編），《少子化的教育因應策略》，頁 121-130。臺北：五南。
- 高介仁（2007）。《國小學生家長教育選擇權認知與教育選擇行為之研究－以雲林縣國小為例》。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鈿富、林素鈺（2006）。〈十二年國民教育之定義與詮釋〉。《研習資訊》，23（1），5-12。
- 張德銳（1998）。〈教育選擇權對教育機會均等的影響〉。《教育資料與研究》，21，1-7。

- 張慶勳（2002）。〈國民教育概念之評析〉。《教育政策論壇》，5（2），123-136。
- 教育部（201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2012 年 10 月 30 日，取自網站：<http://12basic.edu.tw>。
- 莊玉鈴、秦夢群（2010）。〈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政策之分析與建議〉。《臺灣教育》，662，2-9。
- 陳珮樺（2011）。《少子化對私立學校經營管理之個案研究－以臺南市私立興國中學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碩士論文。
- 黃政傑（2014）。〈少子化教育問題的解決宜有整體規劃〉。載於黃秀霜（主編），《少子化的教育因應策略》，頁 1-12。臺北：五南。
- 楊思偉（2006）。〈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政策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2（2），1-31。
- 蔡銘津（2012）。〈少子女化的教育政策走向與應變〉。《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5），1-7。
- 蘇曉蓉（2008）。《臺灣公私立國民中學經營特性對學生成就的影響：政治與市場邏輯的檢證》。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附錄一 103 學年度臺中市私立中學的招生班級數、入學評測名稱、考試日期和科目

學校名稱	班級數	評測名稱	考試日期	考試科目
衛道中學	15	教育心理測驗	103/3/23	性向（國語文、社會）、 智力（數學、自然）
曉明中學	7	教育成就測驗	103/3/22	國語文、數學
華盛頓中學	6	數理語文菁英競賽	103/3/8	美語能力、文藝創造、邏 輯推理、自然科學
明道中學	20	雙Q親子成長營(學 力鑑定暨入學評 量)	103/3/16	數學、自然、國語文、英 語聽力
立人中學	20	多元智能成長營 暨 ESL 研習	103/3/9	國語文、數學、英文、自 然
大明高中	5	小太陽親子研習營	103/3/16	英聽、英閱、口試、學科 綜合評量
弘文中學	12	小小發明家科學營	103/3/16	腦力激盪（數學）、文藝 創造（國語文）
宜寧中學	4	學習潛能探測	103/3/9	國語文、英文、數學
新民高中	8	雙語/認識自己	103/3/8-9	語文表達（國文、英語）、 數理邏輯（數學、自然）
常春藤中學	4	多元智慧活動	103/3/9	國語文、數學、英文
葳格中學	4	多元創新探索營	103/3/8	國語文能力、英語文能 力、數學邏輯能力
嶺東中學	3	語文數理競試	103/3/9	國語文、數學、英文
僑泰中學	4	學科全能競試挑戰	103/3/15	國語文、數學、英文、自

		營			然
東大附中	6	自我探索活動	103/3/15	國語文、數學、英文	
麗澤中小學	1	多元智慧探索活動	至6/20	登記入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研究論文

App市場的時間維度分析：一個系統理論觀點^{*}

鄭志文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14 年 11 月 6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1 月 7 日。

^{*}作者通訊方式：chihwen.c@gmail.com。另外，作者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 APP 系統運作中的時間維度特徵，並且以偏向現代性及生產面的巨觀層次，觀察 APP 系統的自我合理化現象。在理論的選擇上，以德國學者 Niklas Luhmann 的「系統理論」為主。奠基於系統理論，APP 系統的時間成為一種現代性下的可能性，它意味著發展出一套處理與社會環境之間充滿高度複雜的時間關係。本文結論有四：第一，APP 系統的時間代表的是外部市場複雜性的時間化，因而必須釐清並簡化它。其次，為了建立系統的封閉運作，必須切斷與電信或資訊工業的共時結構。第三，APP 系統的大規模化，造成了系統時間上量與質的急遽變遷。最後，一個自我生產的 APP 系統，其時間意指精確控制系統的價值鏈。

關鍵詞：系統理論、時間維度、共時結構、自我生產、行動應用軟體

An analysis on the time-dimension of the APP market: From a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

Chih-Wen C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ime dimension featured in the App system. It then reveals its self-rationalization phenomenon with views adopted from modernity and production ecology. According to German sociologist Niklas Luhmann's thesis of "Systems Theory", the cause of time attached to the App system turns modernity into a new possibility – means, within such macro-structure, it is developing a highly-sophisticated time-relation so this system can react functionally to contemporary social environment. Thus, four extended findings sha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 firstly, the logic of time within the App system projects the complexity of time-framework structured in its external market.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and simplify the process. Secondly, it has to disconnect the synchronic structure engaging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industries in order to maintain self-production of the system. Thirdly, the oversize App system triggers a rapidly transformed timeline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final point shall be addressed here is that, a self-produced App system indicates to a controllable value chain within such delicate system.

KeyWords: Systems Theory, Time-Dimension, Synchronic structure, Autopoiesis, APP

壹、研究背景

2008 年當 Apple 電腦首先跨入行動通訊，推出全球第一款智慧型手機「iPhone」，Apple 公司在市場上的主導與領先地位，關鍵在於 iPhone 造成的市場熱銷與後續效應，這也就是說 Apple 以市場先進者之姿，率先掌握了智慧型手持裝置（Smart Handheld Devices）的市場利基（niche）。然而 Apple 強大的產品線優勢不僅於此，2008 年 7 月，Apple 在 iPhone 這個硬體的裝置之下，建立了智慧型手機線上網路商店「Apple App Store」，這個線上商店在其封閉式作業平台「iOS」的運作下，不但開始了行動應用程式市場的可能性，更透過其一貫封閉的生產鏈，控制了 APP 藍海經濟的巨大利益。

隨著 Apple 的成功，iOS 平台立即帶動了市場上的另一個龐大的競爭者 Google，建立了「Android」平台的產業群聚。更由於這種線上下載應用程式之爭而造就了「第三方市場」，也就是由中小型軟體設計公司為主體的開發商，開始逐鹿於智慧型平台上的閱聽人使用權。時至 2014 年，這種 APP 經濟帶來的市場已不容小覷，根據 GSMA Intelligence 的估計，每年有超過 1,000 千億次的 APP 下載次數，而光在歐洲每年即產生了超過 100 億歐元的盈收（2014: 35）。

所謂的智慧型行動裝置，可定義為是在一個行動裝置（例如手機或平板電腦）上安裝了作業系統（例如 Apple iOS、Google Android、Windows Mobile 或其它等），並且經由網路連接而允許消費者自行安裝應用程式（APP, Application）。在市場經濟推動下，一個透過 APP 創新傳佈的「APP 文化」（Apps Culture）也正在成形（Taylaor & Levin, 2014: 760）。在這些龐大的數字背後，引人注意的是這些傳播科技所建立的經濟系統，其帶來的意義為何？特別是它如何建立起一般性的運作原則，以系統化市場？從產業或市場的結構角度來看，APP 市場從 2008 年以降即以跳躍式的節奏形成資

訊工業與電信產業下的新領域，並且自成一個系統運作模式。如果 APP 已自成一套自我的運作方式，則這套規則除了商業經營與銷售之外，是否在社會的層次帶有不同的意義？而這個 APP 產業在面對過去的電信工業、資訊工業、媒體業或甚至遊戲產業，又是如何形成一套系統秩序？這種秩序又如何從社會的層次去進行觀察？

從 Karl Marx 對資本主義的診斷來看，APP 經濟這種收集利潤的方式，設定的不只是小量販賣，更重要的是過去媒體通常以銷售消費者功能性的資訊或刺激性的娛樂來建構市場，現在的 APP 則導向經營行動或效率上有需求的消費者，以商品化消費者的無聊及零碎時間。Marx 的「時間」商品化點出了零碎時間被商品化的可能性，在一般消費社會中，生產者一則為產品加入想像或價值，以增加商品價格，另一方面，也會透過消費時間的增長或更效率化，以期讓消費者花更多代價來換取消費，以達到增加利潤。然而過去的商品消費這個動作，並不容易在消費者零碎的等車時間、聊天談話中空出的幾十秒鐘時間達成，但 APP 的本質卻是收集這些破碎時間的短暫消費，集成龐大市場利益。這種可能性不但改變了消費者，鼓勵他們能在各種生產活動或社會活動的秩序中找到時間的間隙，甚至重組時間的先後序列以完成 APP 消費。

重組時間的觀念不僅用於消費者使用 APP 之時機，更從一個 APP 市場如何在時間的軸承中演化成為一個有能力的社會次體系中被注意到。APP 如果自成一個系統，則除了與使用者的時間產生關係，它如何在共時的時間序列中找到與外部環境適應的規則，從而建立系統的內在秩序？本文的目的即在探索這種新興 APP 系統在時間框架內的一般性運作特徵。換言之，透過對該系統的時間維度觀察，理解其如何構成 APP 的系統性通則。為了具體定位時間維度於 APP 產業中，本研究視 APP 為現代社會系統的一部分，對一般現代性理論而言，即為是「現代性的結果」之一。在視為系統的前提下，本

研究採取 Niklas Luhmann 的「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y) 為架構，以理解並詮釋 APP 系統在系統取向下時間關係的意義，並成為 APP 系統的運作方式。

貳、理論回顧

一、系統理論

Luhmann 的系統理論視社會為一種特殊的「關係」結合體，社會是由各種不同的系統獨立運作，但又統合成社會體系。這種系統的概念與結構功能論並不相同，是一種對真實過程的概念為始，討論各種體系之間的種種關係，而成為一套世界運作的整體關係 (Ball, 1978: 66)。也因為系統理論的重點在研究關係，因此可應用到社會中的小型團體或組織，亦可應用到大規模的世界社會層面。

不似結構功能論將社會視為各系統間功能性的有機組合，Luhmann 的系統論將世界或社會拆解成「系統」與「環境」二部份，系統之所以可以被辨認出來，在於它不是環境，並且可由系統與環境的差異中區別出來，因此尋找出如何區別之道就成為理解系統演化的根本。在系統理論中，即使環境與系統自身常相互滲透，但其本質終究不同。環境與系統的差異就在複雜性 (complexity) 的不同，環境始終是高度複雜，且不斷加入新變因使其演化方向更難掌握。但系統必須生存，因此總會在高度複雜的環境條件下進行選擇，系統被迫進行的選擇就是一種偶然性 (contingency)，並且在偶然性的社會中力求控制系統內部的秩序。

系統不斷由環境的複雜性中發展，其方式就是降低或簡化環境的複雜性，以合理化系統內部的規則運作。但系統終究不比環境複雜，以致於被迫做出的選擇始終帶有風險 (risk) 的成份，這種偶然性帶來的風險即是一種不

確定性，使得系統必須再發展出更複雜的次系統，以面對環境造成的困境。這種更複雜次系統的改變方式構成了演化，也使得演化的原則從原本的簡化環境複雜性，變成以系統複雜性化約環境複雜性的社會規律。（Luhmann, 1995: 26）。系統不斷透過更複雜的次系統來應付環境，也導致系統不斷地產生功能分化與演化，並且在穩定的秩序規則中達到系統的自我生產，並且是封閉的系統內部自我生產。

自我生產成為成熟系統的主要特徵。Luhmann 指出當代社會的制度與法規不斷分化的結果，愈來愈多的看似理性的原則，將未來納入並依賴現在的決策與選擇（1993: 118）。從系統理論的角度，包含市場秩序、媒介科技、媒體產業，及媒體文本與類型在內的社會各系統，都需要進行不斷地演化與功能分化。在系統理論中，所謂的「演化」指的是一種不斷錯誤與嘗試的過程，Luhmann 演化觀的重點在於系統為求穩定與生存，必須降低由環境高度複雜性下產生的危機，因此必須在系統中「扭轉不太可能成為可能」。Luhmann 以「雙重偶然性」解釋社會分化後的後果，行動者一方面依賴那些可能發生或不發生的特殊事件的出現，一方面又受這些事件偶然性的影響（高宣揚，1998：721-723）。據此，可以從 Luhmann 對現代社會系統的解讀中找到至少兩個特色，一則不斷的理解「反思」成為理解當代社會系統與行動的關鍵，二則，「時間」維度似乎都是系統發展中的共同基礎，有理由進行更多的釐清。

二、反思性與時間維度

要理解 Luhmann 對於時間維度的重視，必須回到 Luhmann 對於系統分化的看法。當任何一個系統要維持不間斷的運作，也就是成為一個自我生產的系統時，依靠的是對於環境與系統本身的正確理解和區隔，在這個過程

中，有意義的「溝通」成為必要的手段。而任何一個溝通之所以有意義，又必須向其它非本身的溝通進行「參照」或「指涉」，才能得到自身存在的意義。例如媒體必須向經濟制度的貨幣運作參照，以理解媒體市場的運作方式；或者智慧型手機必須向電腦的中介運作方式，以及向手機的行動通訊本質參照，才能找出在自身系統中的意義來源（鄭志文，2011）。換言之，溝通必須在重複的自我參照脈絡下不斷進行，任何一個系統，不論其各個運作的組成要素為何，也都必須要透過各個成份間不斷地溝通與整合，「自我參照」也就成為系統運作的內在邏輯。為了剖析參照的內涵，Luhmann（1984: 596-597）指出系統自我參照的三個基本層面：首先，系統的自我參照是為了降低環境的複雜性，以維持系統內部的穩定。第二，這種參照不但是一種自我生產，同時也是一種以與環境區隔的方式生產，因此帶有製造與創造的雙重意義。第三，為了區隔於環境，這種參照往往是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分析，而成為了一種自我觀察。

要對系統中的「時間」理解，必須先理解 Luhmann 社會系統中的系統演化分類，根據 Luhmann 觀點，社會系統最後可區分成三大類，分別是「互動系統」、「組織系統」和「社會系統」（1982: 70）。「互動系統」乃根據語言系統的意義網絡而建構起來，行動者透過面對面的傳播，在感知過程中，開始建立起跟其它不同時間維度的他人或事物產生關係，於是時間成為連結不同時空中的他人的共同基礎。其次，「組織系統」透過組織狀況的連結，並在組織的內在因素和環境要求下建立一般性的規則和形式，只是這個規則並不是簡單的運作規則，它指的是在時間、空間、事物和符號系統中，統合起來以簡化環境複雜性的方式（高宣揚，2002：210）。如此一來，也表示時間在系統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卻同時必須內含一般化的運作結構。至於 Luhmann 所稱的「社會系統」，其實就是前二者系統的彼此關連與參照。這也就是說，不論是對社會中任何具體的系統進行分析，都有必要透過「時

間」找到基本規則，從而由「互動系統」與「組織系統」的運作，才能找到「社會系統」的邏輯。這也就是說，社會系統中的次系統，包含媒介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或法律系統等，都有其內在在不同的互動與組織依據，必須由各次系統內所演化與高度分化的特徵分別理解，然而同時它們也有共同的演化模式，「時間」即為其共通基礎之一，換言之，要分析 APP 系統，也從理論上找到了「時間」維度的切入點。

三、時間的不同社會意義

聚焦到時間層面，Luhmann 的時間維度根據上面說法，同時是參照的基礎，也是反思的基礎，更是產生溝通已完成系統的基礎。這種時間框架的概念可以由文化社會理論中其它學術看法而進一步釐清。如同對社會結構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的興趣，Anthony Giddens 也在解釋社會的結構與主體能動的二元對立中，指出了時間概念的重要。Giddens（1984）試圖打破社會學、歷史學與地理學的限制，也就是社會、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建立大型的社會結構化理論，透過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ng）的概念，指出社會原是時空關係的組合，因此社會這個時光旅者（time-traveller）會製造或結構化社會關係，以影響在場（present）與不在場（absence）的彼此關係，因此，物質資源或權力資源的主導者得已建立特定的宰制結構，進行時空控制（time-space control）。由於深受現象學的影響，Giddens 特別著墨於時間對社會系統的影響，特別是由時間而產生的社會結構如何與行動者之間進行相互約制，這也使得在當代特定結構下的行動者，例如媒體的消費者或閱聽人，對其主體的反思觀察（reflexive monitoring）成為理解這個社會結構的重要關鍵。

在 Max Weber (1968) 的觀點中，時間是以「效率」的形式再現，因為效率原本即是對時間的高度理性計算，因而帶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崛起，差別在於 Weber (1958) 乃透過西方新教倫理的天國永恆時間，連結世俗社會的有限生命時間，使得時間的永恆性在於未來升天，但卻實踐於入世工作效率。相較於傳統 Marx 和 Weber，Pierre Bourdieu (1984) 重視的現代性時間結構，表現在時間的象徵性和反思性，特別是對現代消費社會中的時間投資與使用，並透過文化產品的消費而展現的象徵性社會地位。所謂時間投資的長短與濃縮度，成為衡量消費物之品質高低的內在價值，也只有社會階級或階層越高的雄厚社會資本者，才越有能力也越願意花下長時間投資於掌握消費物品的能力（高宣揚，2002：268）。在這種情況下，行動通訊或 APP 所造成的時間投資與消費，其關注的重點就不在於勞動的擴大與閱聽人的商品化，而是行動者生存心態（habitus）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日常生活實踐。

對 Luhmann 而言，作為系統的時間，其實就是從「現在」觀看過去、展望未來的差異參照點，這使得 Luhmann 的時間觀表面看起來與上述學者不同，像是線性單向的思維，但實際上 Luhmann 對時間的看法不僅如此。由於現代性使得行動者對於環境的觀察高度複雜化，這種時間的參照也就隨之包含無數變化與可能性。因此，Luhmann 並不苟同傳統時間觀的單向性、不可重複性與不可逆性所造成的化約主義及因果論，反而更強調行動的相互包含與穿插，因此，在當代資訊化、科技化與媒體化的多重象徵結構中，時間就具有更大的延展性、壓縮性、共時性與交錯性（同上註：267-268），這也就是說，傳統社會理論中視時間僅具有「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aet）的看法，是一種對時間表面狀態的誤解，時間同時也具有「可逆性」（reversibilitaet）的本質。

強調將這種現代性發展下的時間觀念整合進入系統觀，時間維度在系統中成為環境與系統關係複雜性的最重要因素，因為時間正是直接關係到系統與環境的區分、複雜性以及自我參照性。根據 **Luhmann** 的觀點，可概念化出時間在系統中的具體意義。第一，時間是構成系統的複雜性和選擇，人們非得在時間的各種「可能性」下做出選擇，以產生確定和不確定，或可能和不可能的區別（1984: 70-71）。第二，由於時間是構成系統與環境複雜性的起點，因此系統在運作時，勢必要切斷由時間而帶來的與環境的複雜關係，從時間的運作而言，也就是切斷與環境當中時間的「共時結構」（**Synchronic structure**）。第三，系統的時間雖然象徵系統簡化後的確定性，但它更意味著內含系統內的不可確定性，這也就是系統即便已然在時間層次上做出選擇，確定的行動或選擇在當下是確定的，但它所連結的外在價值卻是不確定的（**Luhmann**, 1984: 80）。

根據 **Luhmann** 的系統觀，時間維度構成了系統的基礎，也同時是系統內行動者做出選擇的開始。因此，傳播與行動科技在此結構下作為系統的社會維度，而智慧型手機與 **APP** 功能則是系統的物質維度，兩者在資訊社會下，構成了閱聽人實踐行動的外在連結點。透過對 **APP** 外部的參照與反思，任何一個 **APP** 的媒介的生產行為都應該是在與外部網絡進行意義或價值上的取得後，在系統內完成了溝通的程序，而在特定時間的當下「生產」、「下載」或「消費」。於是 **APP** 經濟在時間維度的行動，構成了特定時空的連續體，也完成了 **APP** 系統的作為傳播通訊系統或媒介科技系統下的子系統。

叁、研究方法與問題

本文旨在透過 **Luhmann** 系統理論的觀點以探討 **APP** 系統的時間維度，經由上述對時間維度的討論，可以理解到在系統的概念下，任何社會中的系

統都是系統與環境之間的產物，並且是在社會複雜的關係網絡下形成。根據 Luhmann 的系統觀，「時間」維度構成了系統的基礎，因此透過系統理論拆解 APP 系統的時間維度，本研究設定以下研究問題：

- (1) APP 系統的時間如何在系統與環境的關係下產生關連？
- (2) APP 系統的時間本質如何產生變化？
- (3) APP 系統的時間如何對系統內部產生影響？

為了理解時間在系統中代表的意義，本文將 APP 市場視為是產業、科技與內容的組合，並解讀在時間的框架內 APP 進行的行動重組，以分析系統運作的規則與反思過程。據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方式。這個次級資料指的是在一般既有的 APP 組織、產業、市場，與服務或功能的研究中，找出 APP 產業目前在科技、功能與具體市場數字的表現，目的是尋找有關其可以在物質、社會及時間維度上的既有運作，以釐清系統與環境之間的時間關係。

次級資料是為客觀，且具說服力的數據與研究證據，也是一般在媒體社會研究中，理解特定媒介發展的必要手段之一。透過各種資料庫將 APP 經濟與內容的資料系統性地在時間序列中整理，可得到系統中產業發展的軌跡，對媒體產業而言深具潛在價值。特別是 APP 產業屬性特別，往往是屬於全球流通的平台標準設定與內容開發，在全球的層次上欲直接研究或訪視各大 APP 的開發歷程，在研究上有其執行可行性疑慮，因此更需要次級資料的補充與支撐，APP 是全新且快速崛起的媒體類型，需要各種客觀的產業素描，皆有待各專業期刊、商業報告，及電子資料庫之不斷更新輔助。

肆、APP 系統的時間維度

一、APP 外部市場複雜性的時間化

在系統的前提下，「選擇」、「下載」與「使用」APP 都是一種佔據原本使用者自然時間的客觀事實。對經濟市場而言，這樣的時間特質是一種商業行為轉換，然而反映出的現象卻不僅是商業時間，更是使用群眾的社會行為時間或日常生活時間的變化，也就是一種「社會時間」的實踐。換言之，消費者使用 APP 的時間是種日常社會行為的反映，然而行動科技與媒體產業必須對這樣的日常時間進行市場化，也就是 Marx 強調的商品化過程。這個商品化過程未必成功地促成傳統媒體閱聽人的被商品化，亦即閱聽人未必全然接受市場的供應，但對 APP 市場而言，使用 APP 的一連串行動，必須臣服於市場的供應結構。這就像是電視觀眾不可能每天觀看 24 小時的電視節目，但電視媒體必須規劃出 24 小時的時段安排，以結構化觀眾的有限選擇。

消費者的 APP 時間從接受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開始，已在 APP 產業的結構中成為有條件的選擇，這種條件又是 APP 產業或行動通訊產業外部市場的演化結果，端視最後由何種品牌建立市場主導權，也就成為決定使用者的傳播來源。表面上使用者下載與使用 APP 所消耗的時間似乎是純粹使用者時間的商品化，但 APP 市場的鉅額產業利益與競爭，卻使得消費者的選擇行為像是捉摸不定的組合，不僅是消費時間，更是 APP 複雜市場下的偶然行動。在這種情況下，APP 的時間並非線性與連續的時間，而是一連串電信與資訊產業複雜關係及 APP 選擇性的歷程，因此時間反映出 APP 生產、競爭與消費的歷程，是經濟生產的後果，也是將自然時間予以轉化成脫離自然時刻的時間規律，融合了社會性的內在特質而成為社會時間。

故觀察 APP 使用者的時間必須從最基本的 APP 系統外部環境觀察，APP 經濟在歷史時間脈絡下是一種偶然的演化過程。自 2008 年 Apple 建立起全球性的 Apple Store，APP 市場才初露頭角，這個經濟次體系的成形並非自然而然，它對整體過去傳播媒體與資訊社會的既有系統造成極大衝擊與失序，也就是於 APP 市場之外，在更廣大媒體系統的外部環境與外部系統中創造了高

度不確定性。為了使 APP 系統在媒體系統「內」發展成下一個次系統，APP 市場必須讓自身系統逐漸適應於系統時間的不可逆性，以對複雜環境與失序的媒體自身產生簡單化，也就成為 APP 系統中複雜性的時間化。

以 APP 市場中重要的遊戲 APP 為例，它具體地將過去的遊戲投入時間由家庭式遊戲機與可攜式行動遊戲機，轉移到移動式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遊走空間，改變的是一場外部遊戲市場的生態變遷。過去在沒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時代，所謂的行動遊戲產業絕大部分指的是可攜式遊戲產業，也就是由 Nintendo DS 與 Sony PSP 寡佔超過 20 年以上的遊戲系統生態。根據調查機構 Flurry 對美國的調查數據（下表 1），在 2009 年遊戲 APP 市場崛起之始，APP 陣營中的 Apple iOS 與 Google Android 的市佔率僅有 19%，此時 Nintendo DS 市佔 70%，Sony PSP 則擁有 11%。隨即 Apple iOS 與 Google Android 在 2010 年市場滲透率達 34%；再觀察 2011 年營收，Nintendo DS 與 Sony PSP 各自被 APP 遊戲產業侵蝕至僅餘 36% 及 6% 市場，Apple iOS 及 Google Android 遊戲已吸納市場 19 億美元營收，而 Nintendo DS 及 Sony PSP 僅餘 14 億美元（Takahashi, 2011.11.09）。

表 1：2009-2011 可攜式遊戲軟體營收（美國）

時間	iOS & Android	Nintendo DS	Sony PSP
2009	19%	70%	11%
2010	34%	57%	9%
2011	58%	36%	6%

資料來源：Takahashi, D. (2011.11.09). Apple and Android are now dominating mobile game market. Retrieved January 10, 2012, from <http://venturebeat.com/2011/11/09/apple-and-android-are-now-dominating-mobile-game-market/>

隨著遊戲 APP 逐漸將遊戲時間的分佈予以行動化與普遍化，導致外部遊戲機市場的危機，也使得原本穩定的遊戲產業進入了科技遞嬗的不穩定期。由下表 2 可發現，當行動遊戲 APP 進入遊戲市場，全球主要遊戲機平台在美國、日本及歐洲的市場逐漸縮小，2013 年上半年即減少了 25% 的銷售量（Harding-Rolls, 2013），相當可觀。外在的遊戲機市場作為 APP 系統的環境，同時反之，APP 系統亦作為遊戲機系統的「環境」，二個系統自 2008 年到 2013 年在時間框架上產生關係，各自以市場起落做為穩定自身系統的適應方式，而這段時間的遊戲市場發生結構性變化，各自市場彼此競爭，使得 APP 系統的時間維度充滿了現代資本主義式的彼此攻防，展現了高度現代性的時間厚度。

表 2：美國、日本、歐洲遊戲機的販售量（單位：百萬台）

遊戲平台	2012年第二季	2013年第二季
PS2	0.34	0.24
Xbox360	1.38	0.99
Wii	0.72	0.40
PS3	1.49	1.14
Wii U	0.00	0.29
DS	0.54	0.11
3DS	2.04	1.70
PSP	0.64	0.36
PS Vita	0.48	0.40
Total	7.50	5.68

資料來源：整理自 Harding-Rolls, P., (2013). Games hardware sales Q2 2013. *Media & Technology Digest*, 505, 10.

作為一個系統的過程，當 APP 這個準系統與外部原本媒體市場發生相互侵擾之後，仍須進行溝通以完成自我 APP 系統穩定化。亦即為了完成 APP 市場的時間化，有必要重整市場中的複雜關係，也就是將原本有限或有可能再開發的遊戲市場按照各個平台或投資者的資金、設備等因素進行選擇性的關係化，於是造成了市場投資生態的重新洗牌，也導致過去大筆資金投入大型遊戲企業體的狀況，逐步向 APP 系統進行不同的連結與秩序建立，因此合理化 APP 系統的發展模式。從 2008 到 2010 年，在北美與歐洲地區，遊戲內容的消費者習慣在這種行動化遊戲崛起的過程中，原本有 25% 從實體通路商零售的購買習慣，降低到約 20%，反之數位與行動通路則由 6% 提高到 10%（Screen Digest, 2011.11: 317），消費者對於 APP 遊戲的習慣轉移正是系統邊界的重新溝通與界定。

重新溝通的不僅是消費習慣重組消費的時間性，也重組系統資金流動的時間性。諸多 APP 遊戲嚴重分食其它多媒體娛樂的情況下，包括電視、電影和音樂的市場都受到市場重構的影響。全球遊戲巨擘 EA 在 2009 年併購 Playfish，接著又在 2011 年以估計高達 13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以《寶石方塊》、《植物大戰僵屍》等 APP 小遊戲而建立市場的 PopCap Games（Primack, 2011.07.12）。此外，全球社群龍頭 Facebook 考量到自身已有高達 3.5 億的閱聽人是為行動使用者，也於 2011 年起決定由 iPad 平台開始，將其遊戲與 APP 均移入行動通訊平台（Screen Digest, 2011.11: 316）。隨著 APP 佔據消費者的使用時間日深，遊戲 APP 正在不斷透過資金、市場與使用習慣的合理化，在時間脈絡下組合企業策略和消費者行動，形成 APP 系統複雜性的時間化。

二、APP 系統與環境的共時結構

不僅是遊戲 APP 試圖切斷與既存遊戲機環境間的時間關係，文書類型 APP 也必須與電腦類型文書軟體進行切割，以求簡化媒體或工具世界的多樣性。然而各類型 APP 與原本已存在科技中的軟體是否能切割清楚就不一定了，端視各類 APP 如何在時間關係網絡上與原本的軟體環境世界進行調整，結果也就決定了 APP 系統是否能建立或強化。換言之，如何調整 APP 系統內的結構和過程成為具有特色的時間性，其實涉及到整個 APP 系統選擇商業策略過程的反思性。也就是要建構 APP 系統，必然是在既有傳播與電腦科技複雜性的前提下，進行時間簡化的程序，這個簡化的程序也必然由辨認 APP 系統與環境的區隔開始，進行相互複雜關係的化約。

具體而言，在 APP 系統開始之前，即存在著資訊科技與通訊系統，但在 2008 年 Apple App Store 初探智慧型手機之後，APP 系統才有了萌芽的契機。然而萌芽的意義不代表 APP 系統的成型，而是代表在 2008 年時，Apple 電腦為自身創造了在電腦硬體與軟體之後的新智慧型行動方式。這是資訊與行動通訊事業二條時間軌道在當時的偶然聚合，但帶有高度不確定性，無法掌握 APP 是否能符合科技生態的發展，更無法確定一般消費者是否願意接受。然而 APP 已幾乎跳躍式地成長，從 2008 年發展到 2014 年，快速地在行動通訊與智慧型平台上建立穩定的系統基礎。下表 3 顯示截至 2014 年，全球 APP 系統的種類主要有 Android、iOS、Windows Phone 等平台，其中一般大眾熟悉的主要平台常是 Android 與 iOS 平台的對決。

表 3：2011-2014 年第三季全球 APP 系統之平台市佔率

時間	Android	iOS	Windows Phone	BlackBerry OS	其他
2014第三季	84.4%	11.7%	2.9%	0.5%	0.6%
2013第三季	81.2%	12.8%	3.6%	1.7%	0.6%
2012第三季	74.9%	14.4%	2.0%	4.1%	4.5%
2011第三季	57.4%	13.8%	1.2%	9.6%	18.0%

資料來源：整理自 Smart OS market share, Q3 2014.IDC, Retrieved December 13, 2014, from <http://www.idc.com/prodserv/smartphone-os-market-share.jsp>

這種 APP 平台全球分佈的狀況透露出許多在短短 7 年間的系統時間訊息。首先，全球前三大 APP 平台都是結合電腦資訊業者與行動通訊的演化結果，這表示過去各自獨立的電腦資訊系統與行動通訊系統在更大的外部環境中建立複雜關係，並將各自的時間序列交錯，而產生了當前的三大平台。然而光看這三大平台，容易令人接受表面市場分佈狀況而將平台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進而，錯認各大平台組成的 APP 系統是現代性時間中的必然結果，也是 APP 系統時間性中的不可逆性。然而若進一步探討，將發現更符合想像的合理 APP 系統不應是 Android 壓倒性地佔據消費者手機，似乎更該是 2008 年時提出創新的 Apple iOS 平台，或原本即是全球資訊電腦獨大者 Windows。事實上 Android 與 iOS 的區隔在於 Android 是開放式 APP 平台，反之 iOS 是封閉式平台，大眾則決定了開放式平台被接受的程度較高。至於 Windows 成為市場後進者，某種程度上是由於 Microsoft 在早期低估了 APP 市場潛能，使得自身錯失成為市場先行者機會。

若將當前的 APP 系統拆解成 Android、iOS 與 Windows Phone 三個更小的次系統，事實上所謂的 APP 系統也不過就是這三家次系統企業在時間關係上的組合。然而不禁令人懷疑的是，如果知道封閉式 APP 平台無法大量佔據市場，Apple 公司是否會在一開始改變方向？如果知道後來的 APP 市場將成為全球新軟體主力，Microsoft 是否會與 Google 同時加入 Apple 開啟的平台競爭？如果上述二個問題的任何一個答案為「是」，則 2014 年的 APP 平台分佈將隨即改變。這也就是說，當我們認為當前全球 APP 系統的發展代表一種現代性社會的線性前進，事實上它真正的意涵是在前進的過程中，包含更小的、各自獨立的 Google、Apple 與 Microsoft，在各自時間軸上的曾經採取不同行動選擇的可能性。因此這種看起來不可逆的時間性質，其實是 APP 系統中原本包含著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特質，但最後在可見的時空連續性中呈現最後市場版圖的一種抽象說法而已。

人們經常斷然接受 APP 系統在時間序列上的不可逆性，忽略了在資訊工業或行動通訊中，各個微觀組成部分中所發生的成千成萬的可逆現象，也就是說，自 APP 系統的崛起與穩定化，其過程中有太多可能的發展變數都可能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對現在看來自然而然的 APP 市場產生改變，即使那些特定時間點上「可能」發生的變數不一定發生，或即便發生了，也不一定改變現今 APP 市場演化的後果，但這都已揉合到現在當下的市場現象中。因此，在 APP 市場發展的時間維度上，各個狀況的可能選擇或各個可能選擇的後續可能性並不對等，時間維度上的各個 APP 系統發展和環境之間的相互偶然性，在時間關係上強度並不同，APP 的時間本身即呈現高度不對稱。在這些過往可能產生系統可逆性的變數中，APP 系統的時間關係著實與全球電信事業環境的發展或改變密切相關。

表 4 中呈現了 2010-2020 年全球電信事業發展的重要里程與預測發展。如果不將 APP 系統視為討論主體，則表中的發展即代表著電信事業的系統元

素，構成電信系統；而如果以 APP 系統為主體，電信事業發展的時間關係則成為 APP 系統的環境關係，並且與 APP 系統的演化高度相關。首先，APP 系統的發生奠基於全球行動電話市場的普及化，緊接著 APP 系統又強化了全球行動通訊的規模。全球行動電話規模由 2003 年甫超過 10 億使用者，到 2013 年已三倍增加到超過 34 億用戶（GSMA Intelligence, 2014: 9）。在整體環境變化上，電信事業以電信服務及數據傳輸為主的產業系統，從 2008 年開始與 APP 系統產生相互依存關係，APP 系統成為過去 10 年來電信事業進化中最大的偶然因素，而 APP 系統亦依附於這種電信服務結構的發展，二個系統的時間關係呈現極高度不確定性。

表 4：2010-2020 年全球電信事業發展重要關鍵變數

時間	行動電話訂 戶(million)	電信業者投 資(US\$ Bn)	電信業者獲 利預測(US\$ Bn)	平均全球連 線速度(kbps)	行動網路裝 置數目 (Bn)
2010	2,799	-	-	189	0.65
2011	3,029	-	-	315	1
2012	3,225	185	1,127	526	1.55
2013	3,398	193	1,186	817	2.2
2014	3,589	220	1,239	1,233	2.95
2015	3,745	241	1,288	1,857	3.7
2016	3,890	247	1,331	2,725	4.45
2017	4,023	250	1,367	3,898	5.05
2018	4,134	252	1,398	-	5.6
2019	4,236	261	1,424	-	6.3
2020	4,334	266	1,445	-	-

資料來源：整理自 The mobile economy (2014).GSMA Intelligence, 9, 19, 20, 31.；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On the pulse of the networked society (2014).Ericsson, 7.

電信系統與 APP 系統的不確定性意味著 APP 在 2008 年的正式市場化不一定能為市場所接受，而電信事業已夠龐大的基礎建設也不一定有擴張機會，然而 APP 被市場接受了，電信事業也立即啟動新一代的機能性基礎建設，其結果是全面偶然地演化了全球電信與 APP 系統的面貌。為了繼續這二個系統的演化，電信事業每年以接近二千億美元的資金重構行動電信結構，並期望取得超過一兆美元的營收（見表 4）。如此龐大的產業動能將電信事業昇華成不僅是通訊服務，更搖身成為資訊與內容服務的奠基者。APP 系統表面上既是電信事業發展的結果之一，其自身又是促成電信事業發展的原因之一，APP 系統的時間關係中，揉合了自身無法控制但卻確實改變了的電信系統。由於 APP 系統屬內容服務，為了維持自身穩定，只能不斷戮力尋求建立內容與應用程式的系統規則，而切斷與電信環境的外在共時關係，但同時這種與電信事業的共時關係又內含 APP 的發展邏輯，使 APP 系統的時間關係力求簡化但又高度複雜，永遠必須與外在電信環境進行溝通與適應。

三、時間質與量的變遷

從 APP 系統與環境的時間關係複雜性，可以發現 APP 系統掌握系統演化的能力非常受到電信事業的影響，但 APP 系統最多也只能面對自身的平台、軟體與使用者進行協調，以免過度複雜了系統簡化的生存之道。這種針對系統內部平台效率、軟體數量與使用者的改良進化，再配合電信事業進步，在很大程度革命式地改變了 APP 系統在時間使用上的質與量。若不就消

費者的使用功能進行檢視，則這種時間的質量改變表現在資訊傳遞量的激增與傳輸速率質的變化上。上表 4 中顯示了全球行動裝置行動連線速度的改變，自 2010 年起到 2014 年，全球行動上網平均連線速度增加了 6.5 倍，同時行動上網裝置的數目也在同時間由 6 億 5 千萬台提高到 29 億 5 千萬台（Ericsson, 2014: 7），事實上考量到已開發 4G（LTE）通訊的地區，高速頻寬早已地域性地發生改變。

連網行動裝置的改變賦予大量資訊傳遞的可能性，使得原本 APP 系統的時間關係不僅複雜化，更發生單位時間上量的遽增，為了解決量的傳遞需求，頻寬速度改變了傳遞效率方面質的能力。在此狀況下，單位時間可承載與處理資訊的能力，被突然擴增到原本時間區間內想像不到的巨量，形成當今的大數據時代。表 5 顯示了於行動裝置上的月平均數據流量，自 2013 至 2018 年，這個數據流通量由於終端行動置的大增，加上行動頻寬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平均 61% 的複合年平均增長率（Cisco, 2014: 5）。如此海量資訊逐漸由過去的固網傳輸方式，轉換成行動流通方式，分別在資料閱覽、檔案分享、影音與機器互連上，透過 APP 系統與使用者連結，並加入到使用者的時間分配上。

表 5：2013-2018 年全球行動裝置數據流量（單位：TB／每月）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資料閱覽	606,405	957,382	957,382	2,073,797	2,832,137	3,531,107
檔案分享	66,671	127,235	127,235	308,643	391,641	466,347
影音	793,994	1,458,730	1,458,730	7,094,943	7,094,943	10,956,123
機器互連	20,736	113,415	49,286	490,226	490,226	907,472

資料來源：整理自 Cisco visual network index: Global mobile data traffic forecast update, 2013-2018. (2014). Cisco, 34.

為了消化時間關係上如此巨量之大數據，APP 系統須透過分散式的資訊傳遞以合理化共時結構上的資料積累，於是透過大量 APP 軟體以連結使用者。截至 2014 年 7 月，Google Android 平台提供了 130 萬的 APP，Apple App Store 也有 120 萬個應用程式，其它平台也提供了總數近 70 萬的程式供下載（見表 6）。APP 系統中在短短不到 10 年內累積了超過 300 萬個程式工具，不但遠遠超越過去電腦上可用的程式數量，並且具體吸引並消化掉消費者的時間。經由 APP 程式消化使用者的資訊需求是系統簡化時間的方式，然而大量數量程式瓜分資訊的方式卻是瑣碎而零亂，這些 APP 一方面疏導系統在單位時間上承受的大量資訊，一方面亦透過無所不在的行動方式侵入消費者的零碎時間，使系統時間的量與質在超載的情形下被迫更有效率地融入使用者日常生活時間中。

表 6：主要智慧型平台提供的 APP 數量（2014 年 7 月）

平台	Google Play	Apple App Store	Windows Phone Store	Amazon Appstore	BlackBerry World
數量	1,300,000	1,200,000	300,000	240,000	130,000

資料來源：Number of apps available in leading app stores as of July 2014. (2014).

Statista, Retrieved December 14, 2014, from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6623/number-of-apps-available-in-leading-app-stores/>

四、時間象徵系統價值鏈的控制與精確

APP 系統如果成形穩定，也可被視為是 APP 經濟生產生態（ecosystem）的穩定，某種意義上代表 APP 系統已精巧掌握時間性的程序，亦即在時間序列中，精確掌握控制和了解各變化之間的可能性，這種變化展

現在 APP 系統崛起後獨特的價值鏈方式，也就是說，APP 獨特的經營方式是在 APP 時間關係中被確認可行的簡化方式。從外部而言，這一方面涉及行動 APP 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 APP 是在特定政治政策的國家社會體制下，建立相符合的經濟市場運作規則，才得以具體運行的政治經濟產物，因此 APP 反映了市場背後的政治經濟協商與結構條件。另一方面，APP 系統也顯示這種經濟生產下的 APP 如何與傳播的接受端產生結合，最後具體展現在行動 APP 之生產價值鏈的完整連結。

APP 系統行動產業價值鏈的獨特之處，在於結合了傳統行動通訊產業中「手機與電信業者—消費者」的行動終端販賣模式，以及「開發商(軟體)—消費者」的軟體販賣模式，並介入了如 Apple 的 iOS 與 Google 的 Android 等構成的新興「平台供應商」元素，串聯起一個更大型複雜的價值鏈。這個價值鏈因而成為「軟體開發商→平台供應商→手機／電信業者→消費者」模式。

就時間關係上的控制而言，這條價值鏈表面上是 APP 線性運作的必然過程，實際上卻是多種可能的生產狀態，在歷經時間的競爭之後產生的結果。對 Microsoft 來說，在過去開發商對消費者直接銷售的年代，一套 Office 家用版售價約為新台幣 5,000 元，但在 iPhone 或 iPad 平台上的 Keynote、Pages 和 Numbers 各自售價 9.99 美元，相加一起也不過約新台幣 900 元。這個情況透露出兩個消費者在不同時間點選擇購買 Office 產品的意義。首先，過去軟體開發商對消費者的直接銷售行為已經在時間序列中轉變，APP 平台成為行動通訊時代的重要中介。根據 IHS Screen Digest 調查，從 2008 到 2010 年，軟體開發巨擘 Microsoft 的三年成長率為負 4.1%，而同樣過去是較弱勢陣營的 Apple 卻以 48.1% 的成長率不斷佔據市場（Screen Digest, 2011.08: 232-233），這迫使原本販賣軟體為主的 Microsoft 也必須考量進入新 APP 式的價值鏈序列。

其次，化整為零的生產模式也被納入 APP 精確的時間原則中。在早期的軟體市場中想像不到如何用通常平均不到 0.99 美元的價格，可以產生好的服務並創造龐大的市場利益，即便如 Office 家族 APP 化後的價格，也不到原本的五分之一。然而在 APP 系統中，以免費和低價而成功的 APP 卻不斷發生，譬如約有六至七成的下載遊戲都屬免費，因而低價或接近免費的 APP 趨勢已成為市場趨勢，並且產生龐大利潤。例如瑞典 Rovio 遊戲開發商，從 2009 到 2011 年的三年時間，就透過 Angry Birds 遊戲造成了二億五千萬次的下載量，並累積到 7000 萬美元的營收（曠文琪、林俊劭，2011.07）。

在這個時間關係中，手機與電信業者退居成為載具，平台供應商成為中介 APP 與使用者之間的核心單元，因此其模式更像是一種以「平台供應商—開發商—消費者」所共構的三角關係。一反過去手機內建好預設的應用程式集，當前的智慧型手機系統透過消費者對於平台的挑選而進行「第一道選擇」，並在這個平台決定的前提下對上百萬種由開發商提供的 APP 進行「第二道選擇」。在此前提下，消費者對任何 APP 的時間使用行動成為了「選擇」的結果，而 APP 的生產也須面對平台構成的「結構限制」，以及消費者選擇行為充滿偶然性下的高度風險。

表 7：2014 年第一季行動上網花費的時間百分比（美國）

類型	百分比
APP	86.0
遊戲	32.0
臉書	17.5
其它社	
交網絡	9.5
工具	8.0

YouTube	4.0
娛樂	4.0
生產力	4.0
新聞	3.0
推特	1.5
其他	3.0
Browser	14.0
Apple	7.0
Safari	
Google	5.0
瀏覽器	
其他	2.0

資料來源：Apps solidify leadership six years into the mobile revolution. Flurry. Retrieved January 02, 2015, from http://www.flurry.com/bid/109749/Apps-Solidify-Leadership-Six-Years-into-the-Mobile-Revolution#.VLX_riuUfjU

從消費者的「選擇」行動出發看這種新價值鏈，對 APP 系統的生產而言，任何一個 APP 類型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消費者的下載與使用行動，這個在現實世界中確定發生行動的「時間」因此是 APP 價值鏈競爭的結果，也就是由過去的軟體壟斷市場與銷售形式，透過資本主義市場轉化成為現代 APP 新型價值鏈。這是一種對自然時間的掌控，藉由對消費者時間的吸引與控制，也就是透過智慧型手機平台的無所不在，加以消費者樂於隨時隨地使用，使得原本消費者的獨自私下時間，也被整合入 APP 系統的消費時間，大量增加了 APP 經濟可以產生獲利的時間量，以完成資本主義商品增值的目的，時間

基本上是生產鏈下被商品化的市場基礎。然而從 Luhmann 的觀點，儘管 APP 生產鏈在實際上或表面上是線性世界時間脈絡下的時間行動，佔去了消費者的「自然時間」，不過任何消費者的行動真正代表的意義，是在時間當下可做的多樣行動中的一個選擇行為，不同的價值鏈時間關係下提供消費者不同行動的可能性。因此選擇任何一種 APP 的下載行動，只是被迫在時間的脈絡中，對於可能的和不可能下載的，以及確定和不確定下載的選擇行動，「時間成為在複雜系統中不得不選擇的基礎」（Luhmann, 1985: 70），於是消費者的 APP 下載反映出的是在特定時間，多種軟體販賣或是使用行為，都有被採納的可能性組合。

在消費者不得對 APP 做出選擇的情況下，時間則成為了平台與 APP 類型競逐的場域。APP 時間成為可能性組合的基礎，似乎容易被誤解為消費者行為充滿變數與不可預測，然而事實上它指的是 APP 系統總是如一般社會系統地充滿高度複雜性，也因此更須依賴簡化原則來穩定 APP 的生產。如何對消費者產生時間確定性，正依賴於在時間脈絡中，各個 APP 行動選擇的連貫程度和穩定程度，換言之，合理並緊扣消費者的價值鏈是導致 APP 系統能否不斷成長，並決定個別 APP 是否掌握消費時間的條件，在這條生產鏈中，「平台」居於核心地位。對 APP 而言，時間構成平台競逐的場域，但這並不是指各個平台不斷競爭消費者的時間，而是指時間構成了各個平台運作，並介入消費者行動的潛在可能性，使得消費者選擇 APP 行動的時間成為可能性的場所。

APP 系統不同於既有的軟體或資訊系統，APP 系統是由平台主導生產與開發的可能性，因此平台業者不同，生產導向與開發能力即不同。平台的重要性在於它決定 App 系統中時間性的程序，是控制與了解開發商與消費者的基礎。亦即，平台不但限制了 APP 開發商的方向，更在平台與開發商的結合下，對消費者也產生了結構性導引。

正如 APPLE 採取了封閉式作業平台設計，即簡化了由 iOS 平台組成 Apple Store 經濟的時間關係，也就是未經由 Apple 授權的開發商不會成為侵擾 Apple APP 系統的外在變因，而未購買 Apple 系列終端設備的消費者也無法成為系統中互動的一員。Apple 的 iOS 平台不但創造了 APP 語言，卻也同時切斷非 Apple 系統中的開發商、軟體與消費者對 Apple 經營造成的影響。平台對系統的關鍵之處即在 APP 系統乃是由平台出發去消除系統和環境之間的共時結構，並組織起系統的順序及關係網絡。因此，Apple App Store 使用者對 APP 的花費時間，反映出 Apple App 系統時間關係網絡的調整，是平台初始對於 App 品質的要求，也是平台與開發商之間不斷對何謂成功 APP，開發什麼樣的 APP 才能在市場上受青睞的相互溝通結果，APP 系統的時間網絡即是行動通訊媒體平台面對複雜性環境後的系統定位結果。

表 8：2015 年 1 月 Apple Store 最受歡迎的 APP 類型

類型	百分比
遊戲	21.14
教育	10.1
商業	9.9
生活風格	8.16
娛樂	6.9
工具	5.13
旅遊	4.61
書籍	4.04
音樂	3.14
生產力工具	2.83
保健	2.74
運動	2.67

參考資料	2.51
照片與影片	2.45
新聞	2.40
金融	2.40
飲食	2.31
醫藥	2.08
社交網絡	1.95
瀏覽	1.21

資料來源： Apps solidify leadership six years into the mobile revolution.
(2015) Flurry. Retrieved January 02, 2015, from
http://www.flurry.com/bid/109749/Apps-Solidify-Leadership-Six-Years-into-the-Mobile-Revolution#.VLX_riuUfjU

除了平台之外，時間對 APP 系統而言也是「類型」的參照與強化。表 8 中列出 2015 年 1 月在 Apple App Store 中最受消費者歡迎的 APP 類型，平台對於系統時間網絡的影響除了是對環境複雜性的再清晰化，可以更具體而言即是平台建構 APP 類型的選擇過程。這也就是說，特定 APP 類型的選擇過程對系統而言，是直接吸引消費者，並簡化環境複雜性的必要手段。因此 APP 系統的內在結構與過程若想保持高度相互連結性或秩序，勢必會在受歡迎的內容和消費者之間取得越來越清晰化熱門類型。這種 APP 系統中的類型生產與消費者選擇，其目的在「簡化」系統，同時也是系統內在自我參照的反思活動，類型反映在特定的時間脈絡下系統的反思活動，透過類型來展現一種恰如其分，並且符合 APP 系統各種事件有序化的時間結構。

APP 的社會時間反應出時間的複雜性格，也呼應了 Luhmann 在系統中強調的時間的凝聚性特質。在行動 APP 的系統中，任何一種 APP 具體落實於

閱聽人或消費者的下載行為中，佔去了使用者真實的時間，然而這個「真實的」、「社會的」時間實際上反映整個複雜世界中消費者做出選擇行動時的所有可能因素的偶然結合之後果。這個選擇使用的「時間」是 APP 經濟演化的基礎，同時也是生產性的後果，就產業的角度而言，代表從 APP 生產鏈、APP 資本、APP 平台，以及 APP 類型等不斷區分化的象徵。

伍、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 Luhmann 系統論的觀點探討 APP 系統運作中的時間維度特徵，並且以偏向現代性及生產面的巨觀層次觀察 APP 系統的自我合理化現象。綜合論之，APP 系統的時間成為一種現代性下的可能性，它意味著發展出一套處理與電信環境、消費者環境之間高度糾葛的時間關係。APP 系統因此伴隨著現代社會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市場發展，並且在現代科技不斷進化前提下，透過政治體制的鼓勵支持，最後成為多數社會運作與生存的一般性產物。APP 系統因此展現了高度現代性的成就，也合理化或加速現代性的持續發展，更重要的，這種現代性特徵與消費行為被自然化與內化為消費者行動的一部份，成為不可取代的社會實踐行動。

為了維持 APP 系統儘速達到自我生產的穩定封閉系統，亦即為了使 APP 系統成為一個穩定的經濟體系、媒介體系或使用者體系，必須在錯綜複雜的外部環境中產生一套 APP 經濟生態系的簡化原則。時間成為這套簡化運作機制的承載者，它既是過去電信或媒體系統發生的序列組合，亦是當下包含媒體、電信、資訊、內容與消費者等各自運作的小系統發生關係的場域。從現在時間往過去看，APP 系統的形成已將過往這些小系統的關係，組合成當下的客觀市場，帶有一定的不可逆性。但由當下看到未來，則 APP 系統必須在時間關係的偶然性下，儘量拋棄外部環境的複雜性，以掌握 APP 系統未來的

可能發展路徑。如何釐清 APP 系統在時間維度上所面對的複雜性與關係，本文之結論如下。

首先，APP 系統的時間代表 APP 外部市場複雜性的時間化。APP 系統是整體社會系統、媒體系統，或更貼切的說，是電信服務系與資訊工業系統偶然在特定時間聚合的結果。因此 APP 的出現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原本資訊工業的延續、電信服務的擴張，但更可能是在 2008 年 Apple 推出 App Store 後竟大受消費者歡迎的偶然結果。在 APP 形成穩定的產業規模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在時間關係上面對外部環境市場與 APP 市場的競合消長，並做出行動選擇，使得外部市場的複雜性成為 APP 時間關係的多樣變數，而 APP 系統能做的即是儘量簡化它。

因而在 APP 系統必須降低外在社會體系與媒介體系複雜性的前提下，APP 必先在市場的大架構下，重組資金、行動通訊與消費者使用習慣，將大環境的變因簡化於 APP 的時間裡。透過確定諸如遊戲市場、文書軟體市場的板塊挪移、傳統廠商的資金挪移，及主流媒體例如 Facebook 的通道挪移，逐漸產生內部各因子的有序連結，達到 APP 系統逐漸成形的時間自律原則，並逐步進行演化。

第二，為了確認 APP 產業可建立起穩定的、簡單的自我封閉系統，APP 系統必須在辨認出系統內部的邊界後，切斷與外部環境的共時結構。這個外部環境指的大部份是社會中重量級的電信產業與資訊工業，而切斷指的是儘量不使電信產業或資訊工業的各自發展造成 APP 系統的危機。在此前提下，Google、Apple 與 Microsoft 等業者才有機會全面發展規模化的 APP 市場。

然而這種切斷與外部的共時結構不應被理解成是 APP 系統已與外在環境無關，這是系統為了清楚設定系統內部規則，而在特定時間關係上所做的選擇。APP 系統依然必須隨時觀察與溝通電信市場、資訊市場或消費者市場的變化，以求做出正確的發展決策。同時，外在環境亦不應被誤認為僅有電信

與資訊工業，其他包含媒體產業、遊戲產業，甚至健康醫療產業等發展，都會成為內化於 APP 系統的變因，只是在系統發展的原則上，儘量切斷與外在複雜性共構的方式，可保持系統運作的秩序與強度。

第三，APP 系統不只在關係上與外在的社會系統有高度複雜性，即便系統內的已發生的、不可逆的單位時間也發生本質上的改變。這個改變由於電信基礎建設、行動終端設備的改良與擴張，得到量的激化。巨量資訊的消化更依賴傳輸科技的質性成長，特別是電信頻寬、速度等關鍵科技因素的發展，而達到極大化時間效率，同時普遍化各種消費者需求，並滲透入消費者日常生活的所有瑣碎時間。這種時間質量上的加值明顯是現代性的系統後果，然而不應視為是消費者全面的接受。這種高容量的單位時間效率在系統的時間關係上，仍只是提供一種時間品質的選擇，要不要接受這種高容量的時間質量，仍然取決於消費者，而這種時間質量的轉變，也只是一種發生在系統上的可能性，只是這種可能性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正大舉改變人們對時間的理解。

最後，APP 系統時間的最終意義在於形成簡化系統規則與控制變因，因此其時間序列的掌控表現在 APP 價值鏈的建構上。然而在多重平台、多重控制（例如也可能是軟體開發商控制）的可能時間序列中，平台中心原則組成的價值鏈是多種可能性在時間序列下的偶然組合，自然也是因為統合開發商、平台商與通訊業者的模式，由於符合資本獲利並且得到消費者接受，亦即符合 APP 系統做為一個媒體與經濟體系的基本要求，而成為系統中最合適的運作模式。

APP 系統重構價值鏈的合理模式，在平台商（例如 Apple iOS）與開發商（例如 Rovio）的市場營收做為系統穩定的基礎下，發展成以平台做為核心控制元素的生產關係。多種平台的競爭產生優劣之分，而平台控制則成為各種平台在時間序列上提供各種選擇的可能性。此外，由於各自平台又可能連

結著該平台與其外部生產關係的不確定性，因此 APP 的時間性成為平台競逐關係的時間化。

除了平台競爭，APP 類型亦展現內容特質的內在差異。在生產或巨觀的層次，各類型 APP 代表內容上承載市場、開發商及平台供應商的最表面結果。各 APP 類型的受歡迎一則支撐既有市場秩序的時間穩定，二則也逐步侵蝕其它類型 APP 在時間場域上的重點性。最終，APP 系統透過外部市場重組、共時結構單純化、價值鏈重構、平台秩序及類型的清晰化，在現代性的時間關係中逐步形成封閉的 APP 自我生產系統。

參考文獻

- 高宣揚（1998）。《當代社會學理論（下冊）》。台北：五南。
- 高宣揚（2002）。《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台北：五南。
- 鄭志文（2011）。〈初探 App 經濟的社會系統生產：由 Angry Birds 談系統的自我參照性〉。《「2011 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2011.11。臺灣，新竹。
- 曠文琪、林俊劭（2011）。〈獨家進入憤怒鳥基地〉。《商業周刊》，1235：122-129。
- Ball, R. A. (1978). Sociology and general systems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st*, 13, 65-72.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isco. (2014). *Cisco visual network index: Global mobile data traffic forecast update, 2013-2018*.
- Ericsson. (2014). *Ericsson mobility report: On the pulse of the networked society*
- Facebook games and APPs go mobile. (2011.11). *Screen Digest*, 482, 316.
- Flurry. (2015). Apps solidify leadership six years into the mobile revolution. retrieved January 02, 2015, from http://www.flurry.com/bid/109749/Apps-Solidify-Leadership-Six-Years-into-the-Mobile-Revolution#.VLX_riuUfjU
- Games retailers go digital. (2011.11). *Screen Digest*, 482, 317.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SMA Intelligence. (2014). *The mobile economy 2014*.

- Harding-Rolls, P. (2013). Games hardware sales Q2 2013. *Media & Technology Digest*, 505, 10.
- IDC. (2014). *Smart OS market share, Q3 2014*. Retrieved December 13, 2014, from <http://www.idc.com/prodserv/smartphone-os-market-share.jsp>
- Luhmann, N. (1982).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uhmann, N. (1984).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Luhmann, N. (1985).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uhmann, N. (1985a). Society, meaning, religion: Based on self-reference. *Sociological Analysis*, 46(1), 5-20.
- Luhmann, N. (1993).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Luhmann, N. (1995). *Social system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imak, D. (2011.07.12). EA made an offer PopCap couldn't refuse. *Fortune*. Retrieved January 25, 2012, from <http://finance.fortune.cnn.com/2011/07/12/ea-made-an-offer-popcap-couldnt-refuse/>
- Statista. (2014). Number of apps available in leading app stores as of July 2014. Retrieved December 14, 2014, from <http://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6623/number-of-apps-available-in-leading-app-stores/>
- Takahashi, D. (2011.11.09). Apple and Android are now dominating mobile game market. Retrieved January 10, 2012, from <http://venturebeat.com/2011/11/09/apple-and-android-are-now-dominating-mobile-game-market/>
- Takahashi, D. (2011.12.22). Year-end stats for smartphones show iPhone is for games, Android is for apps. Retrieved January 4, 2012, from

<http://venturebeat.com/2011/12/22/year-end-stats-for-smartphones-show-iphone-is-for-games-android-is-for-apps/>

Taylor, D. G., & Levin, M. (2014). Predicting mobile app usage for purchasing and information-sha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42(8), 759-774.

Weber, M.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Weber, M.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Jersey: Bedminster Press.

World's top 50 audiovisual groups: Five groups accounted for 30 per cent of top 50 revenues in 2010. (2011.08). *Screen Digest*, 479, 232-233.

